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

(民國十五年)

吳敬恆序
章進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

章先生編了一書，叫做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許我也在卷首序說兩句。我說，聯俄仇俄問題，如何解決，有這討論集，當然可以莫贊一詞；因為什麼理由，雙方差不多都已說盡，止待真愛國的別擇可矣。但是既許討論，我也加我一點警說，就算作序文，一舉兩得，這是我的取巧法子。我無他說，簡單的幾句，便是問：討論這個問題，若夾着赤化不赤化，我就告訴你：你若真是赤化的，你就仇俄，你若尚未赤化，你就聯俄。因為蘇俄並未共產，免得你失望或瞎說。你若真是一個相信國家主義，並非假冒的，你一定反對帝國主義，你若反對帝國主義，你可別亂要造俄羅斯也是赤色帝國主義，你暗用抵制法，替英日諸國帮忙。你若不用此卑劣手段，自然聯與仇，還由你自己主張。聯與仇，乃國際間極小一件事。好比英日有聯之必要，就同盟；及必要的條件消失了，又解盟。聯之外還有不聯，於是再說到仇，國際間千變萬化，終之止是國際間的一個小小問題而已。若無誠意愛國，止是賣野人頭，甚而至于借着國家不國家，止是爲虎作倀，也就可以不必加入討論。所以討論集是給謀國甚忠之人讀的，不是給開赤化不赤化人作政治哲學談，或作打筆墨官司的訟牒談也。我說我的話，外行得很。在開卷前先博大家一笑，也是百年中難得開幾轉口，使心花六葉開的。不要多吵哩，請讀者細細看，細細討論罷。

編者的幾句話

自去年十月間陳啓修先生在晨報社會週刊上發表了『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一文以後，便引起了各方面的辯論。陳文係根據學理來證明共產主義的國家沒有發生帝國主義的可能，因而『醒獅派』與其他信仰狹義的國家主義者以及研究系等共同煞費苦心所杜撰出來的『赤色帝國主義』一名詞，就有根本搖動之勢，爲此，張奚若先生就首先起來，把陳先生原來的問題一變而爲『聯俄與仇俄問題』，用意所在，不難揣知；所以後來所引出來的文章，也就集中在『聯俄』與『仇俄』的問題，關於這點，祇要閱讀陳文發表後各報章各雜誌中與本問題有關的文字，就可知道的。

本書分上下二冊，上冊係討論性質，所以裏面的文章，即由各報章收集而成，既係討論性質，所以採取的材料那一方面都有；主張或表同情於聯俄的有，主張或表同情於仇俄的也有，更有主張不聯而同時也主張不仇的，甚至也有對於所謂「聯俄」與「仇俄」俱發生懷疑的。編本書上冊的主旨，是在使一般國民知道聯俄與仇俄的理由，意義，及其利害；因爲這是與中國前途的關係至大，所以非得將正反二面的意見知道不可，藉此使國人知其究竟，然後方有採擇的餘地可言。對外政策，當然祇能有一種，決不能採取聯俄政策時而又並行仇俄政策，這是誰都應該首認的。在本書的上冊裏，主張聯俄的與主張仇俄的，他倆都有其理由，并且二方的作者都很鄭重的聲明過是以國家的利益爲前提，決不是爲私人的利害而爭論，如果照這樣說法，豈不是我人應承認二方都不錯嗎？但是將二種水火不相容

的主張，決不能同時採取，因為在理論上既講不過去，而在事實上更行不通；因此，一貫的主張總是不可少，一貫的主張既不可少，那末當然應該將我所持之主張，詳細的發表出來，貢獻於國人，至於舍取之權，當然操諸國人。因為有上種的原因，所以陳啓修先生很願將他的聯俄意見全盤寫出來，一則可以發表他去年未講完的意思，二則又可答覆在去年與他辯難的幾位，他作的文章就是本書的下冊，現在因為陳先生事忙，未能將全文寫完，所以先將上冊出版，至於下冊，則於今年暑假後當可付印。

當編者打算編這書的時候，曾想到作者的版權問題，所以曾寫二信分致京附晨附二位主筆去徵求他們的同意，但是至今尚未見到覆信，後來因陳先生對編者說過，這是關於中華民族存亡的問題，決無人起來爭版權的，又因編者既得該問題發難者的許可，所以敢大胆的將牠付印了。至於本書的編輯方法，簡言之有二：（一）按文章發表日期之前後為序，（二）以文章的性而別先後，譬如一篇駁文，就將牠排在被駁者之後；編者的意思，總使讀者能得便利，但因能力有限，其中不妥的地方，當然很多，望讀者諒之。

本書命名——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曾有人——如陳翰笙先生——提議不如改作「對俄問題討論集」，當然，這也是很有理由的，不過為切題些，仍用今名。再幫助編者的陳啓修，郭亦華，吳稚暉諸先生，應向他們表示謝意。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目錄

| | | |
|------------|---------------|--------|
| 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 | (民國十五年) | 吳敬恆序 |
| 中國共產黨之透視 | (民國二十四年) | 章進編 |
| 共匪西竄記 上 | (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 胡羽高編 |
| 共匪西竄記 下 | 第一編至第九編 | 胡羽高編 |
| 蘇俄據東北 | (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 | 董彥平著 |
| 美國與中國之關係 | (中譯本) | 美國國務院編 |
| 爲什麼失去大陸 | (民國五十三年) | 陳孝威著 |
| 爲什麼失去大陸 | (民國五十三年) | 陳孝威著 |
| 和談覆轍在中國 | (民國五十七年) | 張九如著 |
| 我的回憶 | | 劉峙著 |

目錄

| | |
|---------------------------------------|----|
| 序（吳稚暉）····· | 一 |
| 編者的幾句話····· | 三 |
| 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陳啓修）····· | 一 |
| 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張奚若）····· | 七 |
| 張奚若先生是我們「智識寡淺的學者」的朋友嗎？（陳啓修）····· | 十一 |
| 蘇俄真是中國的敵人嗎？（張榮福）····· | 十五 |
| 怎樣對赤俄？怎樣對帝國主義？（劉勉已）····· | 二三 |
| 請教勉已先生三點（張榮福）····· | 三一 |
| 關於蘇俄仇友問題的討論（徐志摩，陳均，陳翔）····· | 三七 |
| 蘇俄仇友問題（蔣曉海）····· | 四三 |
| 對俄問題的我見（李璜）····· | 四七 |
| 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張奚若）····· | 五三 |
| 論「我國欲修內政以圖強必須先與帝國主義者妥協說」之矛盾（張榮福）····· | 五九 |

| | |
|-----------------------------------|-----|
| 駁張奚若並告青年朋友(陳黃生)..... | 六九 |
| 駁陳黃生之謬論並告愛國青年(趙奉生)..... | 七九 |
| 讀了趙奉生的「駁陳黃生的謬論並告愛國青年」之後(安赤生)..... | 八七 |
| 「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志摩，奚若，江紹原，抱朴)..... | 九七 |
| 爲蘇俄仇友問題告雙方(陳鋪琴)..... | 一一一 |
| 復勉已書論對俄問題(梁啓超)..... | 一一七 |
| 反共產的理由和主張(劉勉已)..... | 一二三 |
| 聯蘇聯的理由(陳翰笙)..... | 一三一 |
| 中國對蘇聯政策應當如何？(陳啓修)..... | 一三五 |
| 赤俄與反帝國主義(抱朴)..... | 一四九 |
| 對俄問題致勉已書(錢端升)..... | 一五七 |
| 讀對俄問題討論號的意見(胡石青)..... | 一六七 |
| 一篇不應該做的文章(張奚若)..... | 一七七 |
| 論對俄問題(丁文江)..... | 一八五 |
| 對於聯俄的疑問(陶孟和)..... | 一九一 |
| 中國的建國策與對蘇俄(劉侃元)..... | 一九五 |

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的理由(常燕生)……………一二三

我也來談談蘇俄(張慰慈)……………一二七

仇俄與反共產者的面面觀(劉侃元)……………一三五

附錄：

(一) 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意義和世界革命統一指揮的必要(蔣 石)……………一六三

(二)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七一

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

陳啓修

帝國主義這個字的意義，紛歧得很。關於這種紛歧的意義，說得非常詳細明瞭的，要算宰葉（G. L. Heré）的帝國主義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e l'Imperialisme）一書。照他的意思，帝國主義含有哲學的，政治的及經濟的三種不同的意義。從哲學的意義說，帝國主義就是向外發展的努力；這種努力，依努力人的地位和目的的不同而可分為種種。例如主張種族向外發展的戈比諾（Gobineau）有他的種族的帝國主義；主張個人的英雄的向外發展的尼采（Nietzsche）有他的超人的帝國主義；主張平民的向外發展，而欲推翻舊來貴族僧侶等級的盧梭，有他的等級的帝國主義；主張階級鬥爭的馬克司，有他的階級的帝國主義。從政治的意義說，帝國主義就是政治的侵略和領土的擴張，例如在古代有雅典，斯巴達及羅馬的帝國主義，後來有該撒的帝國主義，到近代有拿破崙的帝國主義。從經濟的意義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點的時候的一種經濟的侵略；這種侵略有時也許兼着政治的侵略，在表面上鬍鬚會和政治的帝國主義相混，實則政治的帝國主義是與資本主義無關係的，是以領土侵略本身為目的的，而經濟的帝國主義却是伴着資本主義的發達而生的，是為救資本主義在一國內的破滅（因國內利潤漸減及國內階級鬥爭而來的破滅）的，是以經濟的利益為主要目的，所以二者並不相同。

二

現代所謂帝國主義都是用於經濟的意義，不消說，哲學的意義，是沒有人用的了，就是政治的意

義，除了有些漠漠歷史家著書以『羅馬的帝國主義』爲書名外，也就罕見了。

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名稱，最初見於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五年間歐洲列強分割亞非利加的時候，但其成爲世界流行語，却在一八九九——一九〇一年英杜戰爭以後，所以現代帝國主義這句話和張伯倫（Chamberlain）及塞西爾（Cecil）等大名相伴而來的。經濟的帝國主義雖然發生於大英帝國，和大英帝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然而大英帝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學者却並沒有一本關於經濟的帝國主義的有統系的著述。這也不足爲怪，因爲帝國主義的發展，本來是救濟一國內資本主義發達到極盛時的利潤低落和階級鬥爭加劇的秘策，資本主義的國家及擁護資本主義的學者當然不能夠把維持自己繁榮的秘密，向人宣傳。最初揭破此種秘策，述說經濟的帝國主義的理論的，是當時開始和英國人競爭殖民地的德國人，尤其是當時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的德國社會主義的學者。而最後看清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全體統系，預言他的必然的自裂自滅，規畫一種促進他的滅裂的方案，却是在歐洲各國中受經濟的帝國主義壓迫最大的俄國人，是俄國被壓迫人的代表者列寧。關於經濟的帝國主義的理論的發展，說得最好的，是巴弗羅威齊（Borowich）的『帝國主義』一書。照他的研究，經濟帝國主義的理論，主要的可有三說：第一，考茨基說：主張帝國主義是工業十分發達的國家，侵略征服及合併農業國的一種努力。這個說法不是完全對的，因爲帝國主義的要求不單是征服農業國而且還要吞併工業國，例如德國想併比利時，法國想擴張領土到萊茵河左岸，他們想吞併的並不是農業國而是歐洲大陸工業最發達的地方。第二，亨勒費丁（Hilferding）說，主張帝國主義是財政資本發達時代的必然的政策，因

爲財政資本要盡可能地擴張他的消場，盡可能地驅逐外國商品，才能夠維持他的利率提高本國勞工工資和繼續財政資本的統治。這個說法也不充分，因爲他只看見帝國主義是維持資本主義的方法，而沒有看見他同時還是推翻資本主義的原因，換句話說，沒有看清帝國主義的矛盾的發展。第二，列寧說：主張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盛的及最後的瀕死的一個階級。何以帝國主義是最盛的資本主義？因爲在帝國主義時代不但資本主義在國內已經由自由競爭變爲專利壟斷，而且在國際間也有分割世界的消場及原料場的國際聯合，（例如德美電氣公司的聯合，英美煤油公司的聯合）其規模之大爲從來所未有；因爲他不但輸出商品而且輸出資本，其剝削國內外民衆之烈，及其所獲利潤之大，爲前時代所難見；因爲資本家不但在經濟上享有很大的勢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以兩三個財政資本家操縱國會，把持政權，其專恣橫暴肆無忌憚，更爲有資本主義以來所未有。何以帝國主義是最後的瀕死的資本主義呢？因爲這樣龐大充實專橫的資本主義轉瞬有把世界消場和原料場瓜分罄盡，勢不得不爲重分殖民地而發生衝突，極力擴張軍備從事戰爭；因爲這樣的擴張軍備和從事戰爭，足以使本國民衆加多納稅，當肉彈和其他種種的負擔而引起劇烈的階級鬥爭；因爲資本家爲消弭階級鬥爭，只得加倍地剝削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民衆，其結果必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因實際不能生存而起來反抗；因爲這樣的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帝國主義者國內的鬥爭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的反抗足以使資本主義自己宣告自己的死刑。這個死刑宣告的前例就是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和尼哥拉二世的俄羅斯，他的目前的榜樣，就是大英帝國的老牌帝國主義。

三

經濟的帝國主義侵略世界，瓜分世界及重分世界的事實，從列強分割非洲之日起，到現在止，可以說還彰彰在人耳目，現在爲節省篇幅起見，不必列舉出來。若有熱心研究的，可以參看（1）Achille Viallate 的 *L'Imperialisme Economique*，（2）Friedjung 的 *der Imperialismus*，和（3）Eaton 的（？我記不清了，因爲我看見的，只是 Ashcroft 俄文譯本）的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三者之一便夠了。照他們的說法，世界帝國主義的國家，是依英法德俄日美意的順序而長成的，他們的滅亡，現在已經知道的是俄，德，可以推測的是英日的順序。

四

照上面所述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帝國主義了，並且知道現代的帝國主義，在他本質上只有一個，雖然，有某某國帝國主義的稱呼，而白色赤色的區別，却是不應該有的。但是在事實上赤色帝國主義的名稱是存在的；這個名稱據說是隣近蘇聯的幾個介在兩大間的小國如波蘭羅馬尼亞芬蘭等喊出來的。這些小國，本來是當作帝國主義者緩衝國，由帝國主義國家扶植出來的，所以他們一方面受帝國主義者的嚴重壓迫，而仍要感恩，一方面雖不感蘇聯的經濟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仍不得不吶喊；赤色帝國主義的名稱就是由這種吶喊聲中出現的。既有了赤色帝國主義的名稱所以原來的帝國主義就變成白色帝國主義了。但這種區別的用法，實只限於這種緩衝的小國，因爲帝國主義一語到底是有特殊的意義的，所以其他非緩衝的國便沒有赤白色帝國主義的區別。在理論上赤色帝國主義一語是否可以

成立，是要看蘇聯是否是一個財政資本的國家，是否是一個擴張殖民地的國家而定。我們若知道蘇聯前身的俄帝國的財政資本完全是英法比的財政資本，所以蘇聯否認沙皇時代債務，和英法比資本家斷絕關係後，蘇聯便無財政資本的存在；我們若知道蘇聯是工人階級專政，是想聯合世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人民去行世界的赤色革命的；我們若知道蘇聯資本非常缺乏，是要待外國資本輸入，蘇聯工業比起西歐還很幼稚，只能輸出原料，決無力量用資本或商品侵略他國的可能；那末，指赤色的蘇聯爲赤色的帝國主義，簡直可以說牛頭不對馬嘴了。蘇聯用盡他的力量，到世界上各國去宣傳共產主義，到各被壓迫民族中去宣傳反帝國主義，這是事實。這種事實是根據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己利害打算而來的，是他們的自衛手段，是他們的生存策略。我們假如信仰不同，利害迥異，那末我們儘可反對他，稱他爲赤色革命主義或赤色共產主義。但是決不能稱爲赤色帝國主義。何以呢？因爲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即或不認蘇聯爲友，也不應該因爲不認其爲友而失掉了我們真正的敵人。假如認蘇聯爲赤色帝國主義，那就恰恰中了帝國主義者移轉目標之計，真和當我們提倡國貨排斥日貨的時候，日本商人也在鋪門口貼起真正國貨拒絕敵人的條子一樣，會被我們的敵人欺騙了去！

一四，十，四，北京。

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

奚 若

我前天在本刊上寫了一篇極短的東西叫作「副刊殃」，本想接連着再寫一篇「大學災」，約略形容今日學界二豎作祟的狀態。不料昨天早晨起來看見晨報「社會」週刊上有陳啓修先生的「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一篇大文，不由我讀了不舒服，只得攔起「大學災」，先來談蘇俄。

對於陳先生那篇文章我本來想寫兩篇東西反駁他。第一篇名曰「帝國主義果無赤色和白色之別嗎？」，第二篇即是本篇的題目。但我後來仔細一想，覺得陳先生那篇文章的主要意思並不是一定要証明「赤色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通，乃是要告訴我們「蘇聯畢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不應該反對他」罷了。所以我也就只得避虛擊實，舍枝葉而論根本，不和他打甚麼赤白閒話，只同他論仇友問題。

但沒有討論本題以前，先讓我在這裏順便勸告晨報主人一下：一個對於社會上的重大問題總要有一種一貫的主張，若是今日說東，明日說西，那就近于兒戲了。晨報近來反對共產和蘇俄，是人所共知的。在今日人人對於這個重要問題不敢有所表示的時代，你們敢明目張胆的出來反對，不管你們特別原因如何（或者是因為要反對你們老對頭國民黨），只那不爲盧布所誘，不爲俗見所屈的地方，已經令人非常可佩。但我勸你們以後對於這個問題不但要在正張的新聞欄留心，也要在副張的論說上加意，不要使敵人的宣傳品乘機混入。老實說，若是你們昨天沒有登陳先生那篇替蘇俄宣傳文章，我現在就不用着在這裏申斥你們。同時我也不怪陳先生欺負你們的地方。蕭伯訥說「打仗要打倒敵人的營盤裏面去」，然先生于此言可謂得其三昧了。

現在讓我折入本題，看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要討論此點，不得不先引陳先生那篇文

章中幾句要緊的話。他說：

蘇聯用盡他的力量，到世界上各國去宣傳共產主義，到各被壓迫民族中去宣傳反帝國主義，這是事實。這種事實是根據他們信仰和他們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己利害打算而來的，是他們的自衛手段，是他們的生存策略。我們假如信仰不同，利害迥異，那末我們儘可反對他，稱他爲赤色革命主義或赤色共產主義。但是決不能稱爲赤色帝國主義。何以呢？因爲（我請閱者注意以下的話）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即或不認蘇聯爲友，也不應該因爲不認其爲友而失掉了我們真正的敵人。

陳先生這幾句貌似冠冕堂皇的漂亮話，可自「何以呢？」三字以前和以後分做兩段看。第一段只是緊接上文要求我們無論叫蘇聯甚麼壞名字。却千萬不要叫他爲赤色帝國主義者。這好像說：你儘可叫他爲流氓，却不可喚他做强盜。我因上文已經聲明過，不來計較這個枝節的名字問題，所以現在也就不和他爭論這個流氓與強盜的區別。但是第二段所說的與本題所欲討論者有密切關係，也就是我作這篇文章的動機，却不可輕輕放過。

在第二段中陳先生雖然很勉強的容許我們不認蘇聯爲友，但他同時也不許我們認蘇聯爲敵人。他的意思似乎是說：我們的敵人只有一種，就是帝國主義者；一個人或一個國家若不是帝國主義者，他便不是我們的敵人，他或許是我們的朋友。我以爲這個意思無論在邏輯上或在事實上都不能認爲正確。反之，他的毛病大得很。何以呢？因爲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的敵絕對不止一種。這是稍通人情諳歷

史的人，都承認的話，用不着特別解釋。帝國主義者，用不着問，固然是我們的敵人，但同時共產主義者許也是我們的敵人；假共產之名，爲自己的私利，在我們情形迥不相同的國家，利用判斷力薄弱的青年，智識寡淺的學者，和唯個人私利是圖的政客，大搗其亂的人們，更是我們的敵人。陳先生說蘇聯不是帝國主義者，所以不是我們的敵人。但如有人說蘇聯雖不是帝國主義式的敵人，其爲害于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于帝國主義式的敵人，我們防備他比防備帝國主義式的敵人更應該嚴密一點。我不知陳先生有甚麼回話答他。

說到這裏，陳先生和與陳先生同一思想的人一定要問我爲甚麼這樣的仇視蘇俄，說他爲害於中國更甚於帝國主義的國家。我的答語也很簡單：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地主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然毫無原故的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要替他們解釋說應該佔據）；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胆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衛力的國家裏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問不是敵人是甚麼？

張奚若先生是我們『智識寡淺的

學者』的朋友嗎？

陳啓修

昨天拜讀張奚若先生的「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一文，心裏覺得失望的狠；因爲一則當我提筆寫「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那篇文章的時候，本來是期望和國內能夠平心靜氣討論問題的人作一個學術的討論，二則我接到昨天的副刊，看見我平常聽信別人的說話，認爲富於理性的學者且係硬骨漢子的張先生的大名的時候，以爲果然獲着一個可以爲他山之錯的平心靜氣的討論，而事實上讀了張先生大作之後恰與預期相反，所以不得不失望。張先生說還有一篇「帝國主義果無赤色和白色之別嗎？」一文，我期望在那裏副我的希望，所以等了一天，沒有即刻答復張先生。現在張先生既還不肯發表這篇文章，我不能久待，雖然張先生的話沒有動搖着我那篇文章的主意，我不能有關於討論的答復，然而至少我對於張先生，不得不作一個防禦的答復。

張先生原文是一篇雜零的攻擊文，所以我的答復，也難有一個統系，只好針對張先生的攻擊點，分成下面幾層說說。

第一 張先生申飭晨報主人以下的一段話，雖然明白是『大人』罵『小的』的話，用不着我來答復，但是其中有一兩點我應當解釋解釋。張先生說『不但要在正張的新聞欄留心，也要在副張的論說上加意，不要使敵人的宣傳品乘機混入』，一面加晨報主人以一種教訓，一面加我一個偷入敵人營盤的罪名。我明告張先生：「晨報記者要我做文章，不但在副刊上登載，而且還指名可以登載第一二版時論欄，我因事忙，還未曾做，只做了登副刊的文章哩！」晨報之所以爲社會的晨報，也就在他主人以下是一夥不怕官威勢壓的硬骨漢，能容納平心靜氣的討論的文章，張先生的聲色俱厲的申飭，恐怕找錯

了人罷。

第二 張先生是素負盛名的政治學者所以……（對不起陳先生以下二十一字被我擅行略去 勉己）張先生能夠在我那篇文裏，找出「陳先生乃是要告訴我們蘇聯畢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不應該反對他」，找出敵人宣傳品和替蘇俄宣傳的證據，找出「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敵人只有一種，就是帝國主義者，一個人或一個國家若不是帝國主義者，他便不是我們的敵人，他竟許是我們的朋友」，真正高明得狠。但是我要忠告張先生……（對不起陳先生以下九十七字被我略去 勉己）

第三 張先生自命是大學者（我還不面識張先生，但聞張先生曾公言現在國立大學教授，抵不上西歐的中學教員，所以不願當現在國立大學的教授，羞與賸伍）人亦以大學者許之。但是大學者的理論，竟有淺陋下愚不能了解的地方，殊出意表。請問張先生，為什麼不可說「你儘可叫他為流氓，却不可喚他做强盜」？強盜與流氓，難道是同一的東西麼？正張和副刊是一樣的東西嗎？張先生做「副刊殃」何以不說「正張殃」呢？張先生又說「陳先生不許我們認蘇聯為敵人」不知張先生是根據我原文那一點立說的。我原文中『我們即不認蘇聯為友，也不應該因為不認其為友而失掉了我們真正的敵人』怎麼是不許張先生認蘇聯為敵人呢？處在現任的地位的張先生難道把帝國主義者為我們真正的敵人一事也否認了麼？假如還未否認，那末，把流氓和強盜混在一起，不是減輕對強盜的指摘，中了敵人移轉目標之計嗎？不把流氓和強盜混在一起，就是不許張先生承認強盜和流氓都是社會上的姦賊嗎？……（對不起陳先生以下又被我略去三十三字 勉己）張先生設的一問完全是根據「我不許張先生認蘇聯為

敵人」一點來的，這一點既不成立，所以我在這裏不感答辯的必要。

至於張先生在駁我以外的主張，即蘇聯是我們的敵人是更利害的敵人的主張，我以爲有過於輕率論斷的弊病。蘇聯是不是我們的敵人的問題，很複雜，很纖柔，不是幾句話可以說了的，我改日要做一篇文章專論此問題，且待那時再把張先生的輕率論斷指出來罷。爲什麼現在不即刻做出來向張先生請教？因爲我做了一篇『蘇聯事情的研究與對蘇聯政策之研究』，交給現代評論記者，大致可望登出來，這篇文章和「蘇聯是不是我們的敵人」問題的研究法有關，我爲免除寫重複話，所以要等一等。

末了，我要向晨報記者道歉，因爲寫這篇答辯，把記者向我要求，我對記者應允了的關於蘇俄事情的一文耽擱了，不曾寫出。因爲張先生……（對不起陳先生以下又被我略去二十字 勉已）的武斷太利害，所以我不能緘默，不能不問一問張先生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

十月九日，北京。

蘇俄真是中國的敵人嗎？

——質張奚若先生——

張榮福

陳啓修先生在本月六日晨報副刊上發表一篇文章『帝國主義有赤色和白色之別嗎？』之後，觸動了張奚若先生的惱怒，趕急於八日該刊上發表一篇『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抵住，『申斥』晨報主人不當不用選擇稿件的權威，讓陳先生邪說惑人；最後更拿出一段誅心之論，說陳先生了解攻守的『三昧』，借題發揮，鼓吹蘇俄是中國的朋友。我讀了兩人的文章後，始終覺得陳先生是個學者，不識現在國內反共產空氣之濃厚，自己新走俄國回來，不洗洗自己不是共產黨，倒反轉做犯嫌疑的文章，實在令我『不舒服？』；但是，同時覺張先生亦是一個研究政治哲學的專家，並且是新任的局長，說出『禁止自由言論』的話，亦實令我不舒服！總之，我在陳先生的文章裏，從頭至尾發現不出『蘇俄是中國的好朋友呀！』的呼聲（個人主張如何，另一問題），亦發現不出那在俄國受了東方共產大學的聘請為教員，就回國來欺騙晨報主人，做『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的詭計，而在張先生文章裏，倒發現了推論的錯誤，觀察的錯誤，結論的錯誤。

我要分三層請教張先生：（一）世界上真有赤色的帝國主義嗎？（二）蘇俄在中國宣傳主義，其為害於中國，真比（白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害還大嗎？（三）蘇俄不是中國的朋友，就是中國的敵人嗎？以下分開來說。

關於第一層，陳先生已說得很透澈，張先生文章裏只是說到現世有赤色帝國主義，而未說出蘇俄何以會是赤色帝國主義者，故我在這裏亦用不着辯論，還是請張先生趕快把『帝國主義果無赤色和白色之別嗎？』一文發表出來，好讓我們開戰！

關於第二層，我要問，何以「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蘇俄就「爲害於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這一段話，我不知道張先生如何觀察，比較，推論，結論。這些話，我認爲是絕對的錯誤，請看以下的辯證。

現在的世界，是個物質文明的世界，國家亦即是產業的國家。故自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各強國開始用經濟的手段，實行帝國主義，向亞非兩洲發展，這兩洲的許多國家和部族，就成了他們的市場，成了他們的殖民地，因之後者的資財，被他們吸收，後者的手足，被他們桎梏。於是各帝國主義者，挾其經濟的魔力，達其政治的目的，印度即亡，安南即亡，非洲全部，澳洲全部，南洋羣島等，遂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又因要求政治目的的徹底，遂實施其文化（非洲南洋羣島各地，亦可云有原先的文化）的侵略，更因經濟勢力發展的必然，上云各地的文化，亦即當然漸歸消滅，故結果，印度的國語，變成英語，南洋羣島的土人，英荷化，非洲的黑人，漸趨滅種。即於中國八十年來的歷史看，亦是這樣，因英法日美等國經濟勢力之支配，使國內社會脫離農業時代，而不能躍入工業時代，遂致全國人民，用之者衆，生之者寡，百之九十爲消費者，爲無業游民，而社會秩序，因之以亂。由這樣混亂的結果，政治日非，國勢日弱，大有亡國的現象。其所以還未做到文化消滅，國種淪亡，只因我自己數千年的文明，數百萬方里之土地，不如非洲南洋那樣容易罷了。故由此可得一結論曰，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使中國不爲積極抵抗，小之可以亡國，大之可使中華民族亡種。張先生以「僅僅」二字

形容列國經濟的侵略，未免大題小認了。

有部分帝國主義者用其在中國經濟的勢力，勾結軍閥，擾亂中國，使中國頻年內戰，無力振興產業，以爲自強的基礎，便達自己的政治目的，日本二十年來對中國的政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有部分帝國主義者，亦用其在中國的經濟勢力，制中國產業發達於死命，同時勾結軍閥，以達其排擠其他帝國主義者的目的，而穩固自己的經濟侵略機會，英國十餘年來對中國的政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又有部分帝國主義者，亦用其在中國的經濟勢力，箝制中國產業的死命，而同時希望中國內亂平息，便達其擴張貿易的機會，美國十幾年來對中國的政策（其實自主張門戶開放主義以來，就是這樣，不過那時無所謂像今日的內亂罷了），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故列強都是想拿經濟的侵略，來致死中國，所以他們是我們的仇人。至於蘇俄，有世界陸地六分之一，人民只有萬三千餘萬，無論西比利亞尙是寶藏滿地，不曾開發，就是歐俄方面，亦還有些地方待開發，如北部歐洲俄羅斯的森林區。說到經濟，在帝國時代，已經就是一個歐洲產業國家的落後者，當時國內有英國的資本六億鎊，法國的資本六億鎊，美國的資本四億鎊，日本的資本三億鎊，革命以後，經過絕大的破壞，國內產業，頗現奇荒，直到今日，還向那窮極無聊的德國借債，既然如此其窮，還有絕大的資本，向中國行經濟的侵略麼？我們是原料輸出國，俄國倒霉，再把他的原料向我們國裏輸入麼？俄國的經濟，再十年難復戰前的狀況，五十年亦絕難成一個絕大的財政資本家（這是以英美日等國的經濟發達史推算，因其爲社會主義國家，發達資本容易，我還減少若干年），那末，蘇俄亦即在五十年內不敢起經濟侵略中國

的野心。這是我們不怕他經濟侵略的地方（假使他就是一個赤色帝國主義者），故在五十年內，就用不着認他爲經濟侵略的仇人。

蘇俄今日挑撥誘惑我蒙古同胞，使他們建起一個蒙古國，絕不能拿來和千九百零五年以前舊俄帝國佔據東三省比。當時的俄帝國，是在波羅的方面發展不能，巴爾幹方面尋海口失敗，故才找着旅順大連這個天生的港口，他之佔此，是爲發揮帝國主義的，進攻的。而他今日之引誘蒙古，一是實行他民族解放的主張，二是防備日本和白黨以自固。同時，我們又要知道，俄蘇未嘗不明白今日中國的土地，誰個國家亦吞不了（即使蘇俄有并吞土地的野心），明目張胆吃了，一定要惹國際的干涉，故在北京政府（即說是中國軍人罷）無力伸張權力到庫倫，使活佛就範的時候，爲自己安全計，何嘗不可做做對不住鄰人的事，故在這裏所恨的，只是自己國內政治不爭氣，那裏一定要怪蘇俄沒良心。在這裏有人一定要問，蘇俄既自號國際主義者，何以要行這種違背主義的手段，其實自己周圍都是帝國主義者（中國雖不是，而中國是個國際化的國家），不謹防，自己站不住，故不能不暫時對不住中國，達到自衛的目的。他既不是絕對的侵佔，自己亦知道獨吞不得，故中國只須能出兵收復蒙古，蘇俄是絕不敢効法民國元年舊俄帝國的故技，絕不至於不自先謀而謀他人；但是，時日愈久，蒙古羽翼已成，就難說了。故拿這層說，他之引誘挑撥蒙古，只算是中國一個莫有赤心赤胆的鄰居，那裏就說得上是仇人，何況他之爲此，亦有不得已之苦心，我之不能規復蒙古，亦有自取之咎，那末，何嘗不可原諒他！

蘇俄用他的盧布，接濟中國共產黨首領辦黨，這些首領就拿錢來收買學校做黨羽（這用錢收買學生的事，我疑信參半，決不敢說凡共產黨人都是爲津貼入黨，不過，在國家牆壁尙森嚴，而中國又不宜於共產的時候，他們領津貼宣傳共產主義，可恨罷了），使學生壞的卽不讀書，專當流氓，好的亦只了解共產主義，其他則一無所知，戕賊青年，拘束思想，誠然是可恨的事。其實，用錢辦黨，那裏是可怪的事，研究學問的人，覺得他拘束思想，戕賊青年，事功家又何嘗不認爲成功的祕訣，只是一件事，兩面觀察罷了。並且，青年之相信共產，主張革命，或甚至投入共產黨，束書不讀，並不全是對手方盧布的作用，社會擾亂，政治不良，官僚腐敗，學校設備不全，政客把持學校，教授學術不足，件件都要負絕大的責任，何必不責自己，先恨他人！並且，禁止宣傳共產，載在中俄協約，中國儘可拿出證據，嚴重抗議，或多派警探，尾隨俄人及其有關係者。若政府及國人認共產黨爲叛逆，儘可逮捕，處死，暗殺，國法槍砲利刃均在，何必不自振作，只恨他人搗亂。我想只要政治清明，使青年能滿意，學校能有全副條件，使學生能安心讀書，在這既未產業化的國家，共產主義從那裏宣傳起手（這是馬克斯的話）。故拿這層來說，亦只能說蘇俄是個不赤心赤胆的朋友，只是利用金錢，引誘青年相信共產主義，到處掀起學潮，並不配稱中國的仇人，因爲中國政府一旦施行壓迫政策，其効力是大過盧布若干倍的。

至於蘇俄的加倫將軍，是否在廣東當最高級軍事長官，鮑羅庭是否做外交總長，我們不能不疑反對廣東政府的報紙在造謠。要真是如此，他二人以個人之力，能使數萬軍隊，我們若干在廣東當學生

軍的朋友，既不叛亂，又不寫信告訴我們，而且一齊就範，他們真算是二個英雄了，可視為仇人的，只是在廣州的中國人，於蘇俄何干。要是爲這件事把蘇俄當成敵人，蘇俄真要竊笑中國人太笑話了。至於英日等國播弄軍閥私鬥，是否比蘇俄接濟軍械於革命軍更是罪大惡極，我用不着再說。

總之，從上面看來，各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可以底於亡國滅種，真是絕大的敵人，而蘇俄現在之行爲，都可用法制止，比諸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真是有天淵之別，而且其行爲還不配稱爲中國的敵人，其爲害於中國，那裏會比帝國主義者各國還厲害呢！

關於第三層，我以為張先生未免神經過敏，陳先生說的『我們即或不蘇認聯爲友』，並不是說蘇俄不是敵人，就是中國的朋友。譬如，我們自己，有可恨的敵人，有親愛的朋友，還有在隔壁居住，既非敵人，又非好朋友的有來往有關係的人，陳先生說我們反對共產，可不以蘇俄爲好朋友，可以蘇俄爲有來往關係的人，因爲中國已經訂了國交。張先生若以這兩句話，付度陳先生腹中在做欺騙的把戲，我以為可以不必。

最後，還有幾句閒談。一個國家在國際間找與國，應當以何爲決策的標準？請問張先生。我們中國爲列強不平等條約所縛束，已經都是仇人，我們還可不可以同他們赤心的講朋友！蘇俄是列強的仇人（其實日俄國交接近，已經與我們中國以大不利），而他雖不赤心對我，但因共存共榮的關係，總還可以商量，是不是就可以因小忘大，不去同他講朋友，聯合起來抵抗共同的仇人？現在的東亞大勢，日俄了解成功好呢？中俄（或甚至加入德國）聯合成功好呢？

十月八日夜。

怎樣對蘇俄？怎樣對帝國主義？

勉 己

我已經寫了一篇「應怎樣對蘇俄」登在十日副刊，述我對陳啓修張奚若兩先生論文的感想，但「應怎樣對蘇俄」的本題，還未曾詳細討論；稿送副刊主任徐志摩先生時，還煩他做了一篇文章，同時他代表債權者來要賬，並且還是現貨！

我的債務今日方才應付的原因，也不妨在此稍為聲明：（一）對俄問題是涉及政治外交全局的問題，很複雜，很微妙，不是幾句門面話說得了。（二）這不是單純在正張做社論，或為附張撰論文，這是對於陳張二先生評論之評論，所以發表意見，要格外審慎，再打了無謂的筆墨官司；我因此反覆閱讀兩先生的文章，原稿竄改二次，我相信良心上所要說的話差不多已說完，只剩「我為什麼反對赤色共產主義」一文，改日再發表。

在發表我的見解以前，應先將陳張兩先生的論點摘要介紹如下：

陳啓修先生文章的頭三段，係從理論上證明赤色共產主義沒有帝國主義的可能，他的論據是現代式的帝國主義只有伴着資本主義而生的經濟的帝國主義，蘇俄不是資本財政的國家，也不是擴張殖民地的國家，所以赤色帝國主義這句話，理論上不能成立。末一段則謂「帝國主義係我們的敵人，我們即或不認蘇聯為友，也不應該因為不認其為友，而失掉我們真正的敵人」。這是陳先生全文的大意。

張奚若先生反駁陳先生的文章，題為「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他聲明過，本來要先做一篇「帝國主義果無赤色和白色之別嗎？」，後因陳文的主旨，是要告訴我們：「蘇俄究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不應該反對他」因此「避虛擊實，只論仇友問題」，張先生的結論，是「赤色的蘇俄不但和白色

帝國主義一樣是我們的敵人，其爲害於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因此我們「防備他比防備帝國主義式的敵人更應嚴密一點」，他的論據，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至應如何防備蘇俄，張先生却未曾說到。

我以爲對俄問題，應分三層研究：

(一)赤色的共產主義——即蘇俄——究竟有無帝國主義的可能性？

(二)所謂赤禍究竟有沒有？與白禍孰爲輕重？

(三)最後對赤俄應怎樣？對帝國主義應怎樣？

第一，赤色共產主義究竟有無帝國主義的可能性，這個前提，和赤俄爲友爲敵的問題頗有關係，不是僅僅「打甚麼赤白閒話的」。張先生預告我們還有一篇暫擱未做的「帝國主義果無赤色和白色之別嗎？」我盼望此文早日發表，因爲除非把「赤色共產主義沒有帝國主義的可能性」這個理論，根本推翻，那末，陳先生所認爲「帝國主義乃是真正敵人」的結論，就也不能抹殺了。

對於陳先生「赤色共產主義沒有帝國主義的可能性」這個論斷，我覺得無可反對，陳先生根據的理由很透切，不用我再解釋。誠然赤色共產主義是以世界的赤色革命爲自身生存發達之要件，並且爲實的，對外不辭間接訴諸暴力，他可以說是採用帝國主義手段之一部，然而他的本身決不是政治，也不是經濟的帝國主義，因爲領土侵略和經濟侵略，都是和赤色共產主義本身不能並

立的，世界的赤色革命的理想，不能說就是帝國主義，猶其中國古代「王天下」的理想，不能說就是帝國主義。

然而實際上「赤色帝國主義」這個名詞，各地也偶用，這是通俗用語，是民主黨急進派反對共產派而又不願贊成帝國主義的一種政治上外交上的作戰的口號罷了。

赤色共產主義 雖沒有帝國主義的可能性，然而單就他間接用暴力煽動世界的革命這一點而言，其影響於對手國的內政，已很不小；因為他簡直要求汝們無條件的反叛國家，無條件的破壞一切社會制度；什麼通敵，賣國，在這時候都用不着顧忌了。今日世界民族，還沒有解放到如此田地，所以赤色共產派在各國數極寥寥，就是富於國際性的社會黨，也和他分道揚鑣，羞與爲伍，這是列國勞動運動破裂衰頹的大原因。又因爲赤色暴力政策的反動，所以政基薄弱的國家，戰後無有法西斯黨帝制派專政之事；在政制比較穩定各邦，國家主義的潮流，也非常激烈；可見赤色宣傳，影響於一國內政，很爲重大，尤其在武力橫行，紀綱廢弛，民生凋敝，兵匪滿地的中國，應當加意防閑的。年來國中軍閥政客一部，曾倡所謂武力國民聯合之說，他們假冒共產的招牌，利用赤色的手段，志在攫取勢力，主義云云，原非所問。蘇俄對此情形，瞭如觀火，明知真正共產運動，在今日中國勢必不行，然而却喜假手此輩，謀在中國政治社會上，樹其赤幟，並且間接牽掣帝國主義各邦，迫其讓步，這是蘇俄手段惡辣的地方，不容放過的。

陳先生論文中，只辯赤色帝國主義之有無，而對於赤俄暴力政策所及於一國內政的影響，未曾論

及，毋怪反共產主義者相驚以伯有，把他的前提都一併否認了。第二赤色共產主義之足以爲禍於內政，前已說過，然而以較歷年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其輕重強弱，實不可同日而語。今爲便利起見，即借張奚若先生所用的標準來作比較。

張先生說：『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張先生用僅僅兩字，已表示取捨從違之意。這層我的見解，却有不同。我不是赤色共產主義信徒，然而我敢昌言；單就帝國主義者「吸取資財」「桎梏手足」而言，其禍害已甚於毒蛇猛獸，是較任何爲烈的。汝想，血液被吸取，手足被束縛，我們還能自由發長嗎？我們的「良心」「靈魂」都不至受了影響嗎？我們若不知道爲什麼泰戈爾還是亡國的詩人，爲什麼甘地主義始終未能貫徹，便知帝國主義禍害之如何猛烈了。帝國主義者既往以力征威迫的手段，「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直到如今，還隱着暴力主義之下，維持其政策，擴張其政策，五卅慘案，就是一個國民絕大的教訓，什麼關稅會議，法權會議，不是又要白開了嗎？

說到此，我們也不能專責帝國主義了，自中俄協定成立之後，蘇俄藉着防禦白黨和帝國主義者的題目，駐兵外蒙擅捕華人，延宕會議等等，其手段惡辣，使人不勝大彼得主義復生之感，然而平心而論，蘇俄這種惡戲，不能和帝國主義混爲一談。假設中國局面稍爲統一，蘇俄還在那裏搗亂，我們毅然和他斷交，把蒙古赤軍驅逐出境，亦非難事，莫斯科的紅營，是萬無力量來襲，國際也保不生問題的。若在赤色革命以前，我們能斷行這個手段嗎？豈不也和滬案一樣飲泣吞聲了嗎？這便是赤禍和白

禍之牽了。

張先生說：「帝國主義者僅僅暗中幫助北方軍閥，蘇俄竟明目張膽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這也是事實。然而我們要知道：所謂暗助明助，多半分不清，并且暗助的作用，有時較之明助還大。試看中國歷年內亂，那一次沒有帝國主義的痕跡？他們一面參加亂事，一面還擺起不干涉的面孔，挾着「國際承認」的權威，對於僭權者予取予求，毫無忌憚，他們因為利害衝突，彼此牽掣，尚有所憚而不爲，到了什麼「協調」之後，也就明目張膽的干涉起來了，什麼滬案再查，什麼國際共管，豈不是彰明較著的事實。我們終究能道一個「不」字嗎？

張先生說：「赤色共產主義者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所以其害更大」。我以為這是偏宕之論。因爲一國的領土物質是可以侵略的，而一國民的心靈是不容易收買的。人到了連心靈都被腐蝕，那便已不能自立了，便無外患也得亡國了，其咎就不在敵人，而在社會的中堅人物了。

要而言之，赤俄的壓迫，畢竟不外精神上的壓迫，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是物質實力的壓迫，擺脫精神上的壓迫，只要社會中堅人物奮然自立，不受敵人收買就夠了，這是爲不爲的問題。反之，擺脫物質實力的壓迫，就非有恆久的大規模的國民犧牲不可，不是朝夕所能奏效的了。

第三，我們既已比較赤禍白禍之輕重，那末，應如何對蘇俄及帝國主義者的問題，便可得相當的答案了。

（甲）赤色共產主義在不能爲帝國主義這一點，外交上終究是我們一致的朋友，就是反共產主義者

也不容仇視他，也用不着仇視他。然而在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中的中國，蘇俄對我們不免時時弄把戲，我們不能因他藉口防禦帝國主義者遂放鬆了他，我們要時時刻刻防備他，遇必要時，不妨用嚴厲手段對待他，這是載在中俄協定裏面的，我們千萬不要放棄這個權利。

赤色共產主義以暴力煽動世界的革命這一點，在內政上是我們大多數的仇敵，是應該抵制的。抵制的方法，關於對內爲多，可以分爲治標與治本。治標的辦法，就是按國法取締共產派的行動，但關於思想上的宣傳，是應當放任，不當學軍閥一樣黑白不分的。治本的辦法，也可分爲一般個別二種，前者是整肅綱紀綜覈名實，使假冒播騙之徒，無道以自存，其次即標明反共產的旗幟，對國計民生通盤籌劃，確立方策，以爲真正共產之抵制。今日中國不在主義之病，而在無主義之病，惟其無主義，所以一切稗販流行的思想，皆得侵入，以正攻邪，是拔本塞源之道，由上看來，我們外交上不必疏俄，而內政上却要排俄，這不是矛盾的政策，年來日本即本此進行並且着着奏效的。中國政治社會制度和日本不同，對俄交際，更易決定。我們若僅因赤色運動對我內政有害，有認蘇俄爲不共之仇，那就是外交自殺政策。

(乙)帝國主義者，不但侵略我們，壓迫我們，而且內政上還要隱然顯然的干涉我們，他是我們真正之敵，前已說過。那末，我們更對他宣告爲敵嗎？不，這一來可又上了赤色宣傳之當。汝這裏不是談哲學，是討論實際政治外交問題，有許多地方，不能盡憑邏輯的思想，赤色共產主義者迫着實際上的必需，還要和正面的敵人派使通商，何況非共產主義的外交，那能如此斬釘截鐵？爲什麼對帝國主

義者不能乾脆的宣告爲敵？

(1) 簡單一句話，我們不能戰，說來真慚愧，又如何？須知此戰是國與國之戰，是一國對多數帝國主義國之戰，是現代科學之戰，汝那有勝算？

(2) 就讓汝搖身一擺，變成一個赤裸裸紅色共產主義國，汝仍舊不能戰，帝國主義者已盤踞着汝們的腹心，汝若他何？赤俄能夠安然實行其主義，不是紅軍特別能幹，是叨着他的元祖帝國主義巨魁大彼得大王之餘澤，我們不要羨慕他。不錯，共產主義是四海一家的，就讓莫斯科紅軍開來嗎，就請杜洛斯基當前敵司令嗎？爲什麼不可？然而你要假手他們抵制帝國主義者，簡直是夢想。赤色弟兄們縱肯捨身來救汝，他家的門戶教誰去看守？

(3) 降了帝國主義者嗎？不，不，當然要幹，怎麼幹？要全國大規模大犧牲的幹，對外不合作……抵貨與罷工，這就是平和的抵抗，五卅會經嘗試而無終的。汝不要喪氣，仍舊不斷的幹下去，遲早是有功效的。

(4) 不要只在咒咀帝國主義，按着時代的潮流，也是不能久存的，況且他的老巢中，不見得沒有你的朋友，許比赤色弟兄更篤實，現時漸漸的抬起頭了，汝不妨等等。

最後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對碧眼黃髯的先生們，什麼博愛仁義……都是白說的，他們先天就有這種感受性，帝國主義先生這樣，共產主義先生也是這樣的。汝第一幹，第二幹，幹……幹……幹……只要幹，什麼主義都是汝的朋友了。

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晨報正張十四年十月十四十五日出版——

請教勉己先生三點

張榮福

北大張榮福先生，自本刊開始對俄問題辯論之後，連接做了好幾篇有內容的文章，熱誠至爲可佩。這篇通訊，寄來已逾兩週，積壓至今，實覺抱歉。張先生質問我的第一點，係正張與副張關係的問題，與討論對俄本題並無關係，茲爲節省篇幅起見，擅爲略去，（我個人對於正副張的態度，在副張已發表過論文）。張先生質問我的（二）（三）兩點，我相信在我那篇『反共產的理由和主張』（登在上月二十八日正張第三版）文中，已經答辯過，我那篇文章，也可以說是爲張先生而作的，我以爲張先生的誤解，是由於把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併爲一談，這層我在那篇論文中，已有詳論，恕不復贅。

勉 己

勉己先生——

加識年餘，口辯筆戰，不曾幹過一次，現在機會到了，非常高興。我要請教先生這三點，都是和先生爲難，反面說來，就是替共產主義解釋，爲蘇俄辯護，但我同時有兩件事要聲明，即（一）我是贊美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是懷疑第三國際在千九百十七年俄國革命所取的手段的，是反對蘇俄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的，是十二萬分主張以聯俄爲外交政策的；（二）我不是共產黨，自然已用不着聲明。同時我亦不是激進派的國民黨，更不是官僚派的國民黨，我是一個不願帶起眼鏡研究中國和世界政治的『傻子』。聲明已完，提出要請教的三點罷。

（一）（略）

(二)那天在陳啓修先生『帝國主義亦有赤色和白色之別嗎？』一文裏，就提到『赤色共產主義』一名詞，先生在『怎樣對蘇俄？怎樣對帝國主義？』一文裏，就把這名詞正式採用。陳先生說這個名詞，上面冠以『那末……儘可……』的字樣，含有懷疑的意思，而先生確是正式採用，故我亦只問先生一句『共產主義也有赤色和白色之別麼？』不但現在只有一個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到現在馬克斯的真正門徒（不要懷疑這句話，請看下文），亦莫有第二派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打起白色或他色的招牌，致我們把列寧一派的共產主義（其實俄國現在並未實行共產主義，列寧在他的名著國家與革命裏說得好，由資本主義國家到共產主義國家，中間有一段過渡的途程，現在的俄國，正在這個途程上）加上赤色的字樣。考共產主義一名詞之發生，原於千八百四十七年馬克斯自己宣言，說他的主義是共產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此後始有共產主義之名。到了千八百八十七年恩格斯作英文共產黨宣言序時，復云……此共產黨之宣言，非社會黨之宣言也，此宣言所云，實為共產主義……於是共產主義一名詞乃大定。恩格斯與馬克斯為志同道合之革命友人，於千八百四十七年共產黨第一次宣言，亦為馬恩二氏合草，故我們可斷言自千八百八十七年以來流傳之共產主義，是指馬克斯所云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而馬克斯所云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是什麼？他在千八百四十七年共產黨宣言裏說：『公權（Public Authority）已失其政治性（Political Character），為中產階級（Bourgeois）所獨佔，故吾輩無產階級（Proletariat）不能不採革命之手段，以自造成支配階級（Ruling Class）消滅一切不平等，打破一切壓迫……』由這幾句話，我們知道馬克斯共產主義的究竟是『求一切平等』，『打破一切壓迫』，而他的手段

是革命，革命的方法，是無產階級當先鋒隊，革命的對象，是鏟除有產階級，而將生產工具歸之於社會公有。而現在所謂第二國際——如英國的福濱社，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等——是什末，他們根本反對馬克斯的武力革命手段，並且反對在過渡時期中，把無產階級組成支配階級，故他們已不是馬克斯主義的絕對信徒，而共產主義是正統派馬克斯主義者奪佔的名詞，是自古至今，除去第三國際一個系統的人而外，算不得共產主義者，而他們的主義，亦即不是共產主義。並且千九百十八年一部份社會黨在德國開會的結果，自榜其名曰社會主義者。是從這樣看來，世界上只有白色社會主義和赤色社會主義之分，絕不能有赤色共產主義，或白色共產主義之分。

(三)『赤色共產主義以暴力煽動世界的革命這一點，在內政上是我們大多數的仇敵，是應該抵制的』。這話太籠統了罷！第三國際共產黨加於我國和巴爾幹各國的暴力如何，我不曾親眼看過，不敢隨便說，若是辯護，恐怕我又領盧布了。我只問先生，現在的世界應不應革命。在強大民族裏的資勞關係，做出了多少非人道的行爲，勞動者受不過了，該不該起來拿革命手段，去爭回自由，又因資本階級的勢力根深蒂固，該不該用刀斬亂藤的手段，去打倒資本家，這就是在資本罪惡最深的國家，應該行經濟的革命。在中國的軍閥官僚，遍身的橫暴氣，遍身的官僚味，把我們這些當百姓的打入了十九層地獄，這些地獄裏的無辜餓鬼，該不該起來革命，這就是在中國應該行國民革命。弱小民族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和剝削，以至於亡國亡種，這些弱小民族要爭自由，該不該起來做打倒帝國主義者的革命。這就是弱小民族的中國要恢復自由與獨立，最好約齊巴爾幹各國，亞非南美各殖民地起來做

反帝國主義者的革命。這樣一來，現在全世界被壓迫的人類，要求反苦爲樂，只有大家舉行革命，大家照着自己社會的需要，去舉行不同的革命。我們中國的內政，根本就是一個應當革命的內政，不革命把一切遺老遺少鏟除乾淨，那政治上的徇私，舞弊，作威，作福，遲緩，腐敗，莫一件能夠革清。請問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已要先革命，他人來說幾句贊成話，或打幾句和聲，是仇敵麼？至於說俄國在鼓動中國實行社會革命，而中國遍地都是自由自在的小農，除租界上外找不到一個什末大王的資本家，除幾萬鐵路工人和其他什末廠工人二三十萬外，他們到那裏去宣傳共產，走進農村去，他們倒是口尋死亡。但是，有一件危險事，即我聽說中國共產黨已採取招納土匪的計劃了，最近他們有一大隊人進四川。不過，土匪之爲土匪，就是爲取有私財，共產黨要剝奪私財，故他們運動的結果，不但共產不成，並且，宣告本黨死刑，遺毒社會。現在防止共產主義蔓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從速把國民革命做成功，使政治日趨清明，狂妄的中國共產主義者，無所用其宣傳主義之技倆。然則，煽動革命，何以是我們內政上的仇敵呢？

貴刊既以『討究』二字相號召，用敢冒昧書此，請求登載。

十月十六日

關於蘇俄仇友問題的討論

（一）前言

志摩

（二）來稿一

陳均

（三）來稿二

友乎？仇也！

陳翔

我登陳翔君的來稿因爲他雖則沒有什麼獨到的見解但他的意思是極懇切的；我猜想陳翔君是年紀不大的，所以有這樣憤慨的真。平常人說年輕人意志不定，易受誘惑。倒像是年紀就是強固的意志！我有時想這時代如其有希望，希望就在青年們身上，不，我該說在他們的心裏；就這點子直覺得到「真」不計較不顧慮的直着嗓子叫喊便是力量。年紀——經驗——世道的聰明——童真的湮滅。「真」是最無敵的力；最後的勝利是它的。假如我們沒有這個信念，一切的奮鬥都失去了意義。可愛的青年們，你們鼓噪著，歡嚷著，趕那圓圓的皮球進球門去；你們也該來鼓噪著，歡嚷著，把那完全的真理趕進國民的心裏去！

陳均先生有一段話我覺得很痛切，就是中國人只學會了「全是你不好害得我……」一句對人的話，却從不反省他自己的病源，我們現在應該學第二句話了，這是對於自己說的：「全是你自個兒不爭氣看今天多倒霉！」「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這話雖則不是科學的，到底還是一句名言，我們正應該在這上面揣摩，且慢說誰來欺負我，嗚嗚！誰又來欺負我，嗚嗚！呸，這懦怯的呻吟聲我們聽厭了。思想着實嫌淺薄，腦筋着實嫌單簡，這刻骨的惰性与重驕氣是成人的民族的恥辱哩！這一潭水混濁到凝成固體的狀態了；我們的工作是在到這溷濁的底裏去挑開原來清澈活潑的泉眼，讓它一汨一汨的再從地心裏溢出地面，你等着看，要不了多少時候，完全的混濁可以戲法似的變成澈底的澄清，那時候你漱口也成，濯也纓好，反正死的活了過來，正經的事業才有上場的日子！這又是一個無影蹤的信念；人

類是理想活著的。

(二)

啓修先生……在晨報的社會週刊上拜讀了大著——「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很爲先生惋惜，以先生之高明也發出這種議論，難道「蘇俄果無侵略中國的事實」嗎？有名稱的錯誤，有事實的錯誤，因事實的錯誤可變更名稱，只是名稱的錯誤不能抹滅事實。譬如：小兒呼虎爲狗，名稱固然錯誤，虎的事實不能因之取消，現在一般人喊赤色的帝國主義，名稱對不對是一個問題，所指摘的事實有沒有又是一個問題。三個高呼反對帝國主義的學者所下的帝國主義的定義尙且各各不同。普通人對於帝國主義見解的混亂可想而知了。老實說：中國有許多人對於帝國主義是當作侵略主義的別號。狂喊的赤色的帝國主義或新帝國主義就是赤色的侵略主義或新侵略主義的別號。帝國主義縱然不能佔據侵略主義的全部，但是可以說是侵略主義的一種，吾人對於一般人名稱不安，當加以相當的寬恕，且當進而審查他們所指摘的對象，而定正確的名稱，任何名稱皆非無因而發，若蘇俄並沒有任何不滿意的舉動施諸中國，中國人亦何至大起惡感，甚至主張親俄的國民黨人亦有發其悲痛的言論？侵略政策多端，動機亦多端，不因專因生產力的膨脹與溢利的維持或增進。若謂帝國主義當反對，而其他之侵略主義則不必反對，設使不幸吾人早生幾千年，幾百年，對於羅馬，蒙古的武力侵略，應否反對？設使有蓋世梟傑發明一與帝主義國差異的侵略主義，吾人應否反對？蘇俄之拋棄宣言，繼續佔據中東路；唆使蒙古獨立；中俄會議延不舉行；最近之逮捕華人……種種舉動，是否不含侵略的色

彩？若謂有財政資本始足爲患，而財政資本薄弱者（蘇俄並非全無財政資本，不過很薄弱），則可不措意，則日本謀韓時的財政資本是否豐富？避帝國主義之名，而行侵略主義之實，何等可畏！若只認定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不管別的侵略主義，那便是拒虎進狼，名稱的辯護有何益處？

對於一切政治，外交，當考察牠們的實際，不能祇欽佩牠們的門面語。蘇俄名爲工人專政，實則共產黨一黨專政；名爲代表勞動階級的利益，實則愚弄，壓迫勞動者；名爲扶助弱小民族，實則以政治手腕侵略弱小民族的種種非難豈出無因。難道先生毫無所聞？希望先生加以詳密考慮，再發贊美的言論。先生在社會上的地位甚高，不宜輕於隨波逐流，導青年趨入迷途。再者中國人向來有一種倚賴心理。年來聯絡各弱小民族共起革命的論調極爲流行。但是默察一般人的心理，似乎皆有待世界的殖民地革命成功後，中國始得解放的怯懦願望；缺乏先求中國獨立，自由，再負解放各弱小民族使命的勇氣。是不自比於土耳其，摩洛哥，而願爲待林肯放釋的黑奴，結果恐只成爲親日，親俄，親清，三頭不著，終歸亡國的朝鮮。不謀中國的獨立，而斤斤於蘇俄仇友的分辯，已非良策。況且蘇俄侵略中國已有若干難於掩飾的事實嗎？先生當尙非亦化者流。故敢進逆耳之言，願先生以後多發不倚賴的指引中國到獨立自由之路的言論，更不必爲蘇俄不利中國的行動作種種辯護，自損令名！

陳均 十月九日病中，北京

（三）

自我看見奚若先生爲陳啓修先生的「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而作的「蘇俄究竟是不是我

們的朋友？」以後，心裏就發生一種感想。奚若先生此文之作，赤裸裸地顯露其愛國熱忱，我非常敬佩他！我們貴國人，盲目的居於多數，私利存心的，更是十中八九，這種劣根性，一日存在，國家一日不能脫離危險狀態。我常痛恨那班貪心鬼，務求不正當的金錢，凡可以遂其私利的，無論敗名毀身，都可以不顧，國家拍賣，有什麼要緊？真是可傷！真是可痛！這種國民的劣根性。

陳先生是個有名的教授，「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是純然爲學理上的討論，還是帶有宣傳的色彩，我未知其素行，不敢斷定。但我認蘇俄之對我們中國，與帝國主義者不差其旨趣。帝國主義者今日侵略吾國，算是盡其能事。然而借友華之名而施侵華之實的蘇俄，又何肯鬆其壓迫，使我們國民翻身一下呢？國人若不相信，我可舉出蘇俄侵略的證據來：

（一）經濟的侵略——蘇俄口口聲聲道：扶助被壓迫民族，援助中國。但其行爲，則大背馳。外蒙之俄國銀行，橫然設立，以東印度公司之形式，明目張膽的侵略，毫不讓帝國主義者一步。即此一例，餘可概見。蒙古之俄人經濟勢力，咄咄迫人，直使我們臥榻之旁，要容俄大爺鼾睡。

（二）政治的侵略——蘇俄以共產主義，標榜於世，口口聲聲，以扶助勞工爲任。孰知這就是他政治侵略的張本。蘇俄之共產主義其最終目的，就是這樣。我們試看廣東的政局，真可痛心疾首！現時俄國人，居然做起軍官，這非蘇俄宣傳共產主義之豐功，侵略中國政治之偉績嗎？受盧布的朋友們！蘇俄做中國的朋友，就是這樣的呢！你們可曾知道？

（三）文化的侵略——什麼良心，廉恥，受盧布的朋友們，都拋諸九天雲外了。他們甘願人格破產，做

蘇俄的走狗。月受二十元，就可賣身，搖尾迎客，反首噬主人，這是多麼奇怪！但是這些人，看來可惡，實也可憐。他們忘却國家，受人愚弄，都是蘇聯的搗鬼。蘇俄之文化侵略，實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每年不惜費巨萬盧布，由莫斯科運過來，將青年良心之苗壓倒，腐蝕我們經幾許心血栽培的愛國性，可惡而直可殺！同胞們！英日之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國仇；蘇俄之共產主義，也是我們的國仇。

(四)治外法權之侵略——蘇俄侵略我國，可謂爲英日帝國主義者而上之。治外法權，是任何獨立國家之駐外使節所應享的。然而蘇俄——貌親善而實侵略的蘇俄，竟橫然毫無理由的探闖我國在俄使館，要捕館員。把萬國公認之治外法權，悍然蹂躪。豈不是蘇俄任意破壞我們中國的國際榮譽。

俄國人又無端把我國留俄學生及他種僑民捕去，禁諸囹圄；東正教堂所占之大面積的舊俄侵略土地，亦不交還，而謂蘇俄是我們的朋友，此話只有叫鬼信，人誰也不敢信。我這段話，在四圍都是共產化的空氣中發出，定有許多人起而攻擊，罵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或指爲帝國主義套出來的，以攻人方法，去掩他們俄大爺的侵略，替他們俄大爺緩頰。這可不必，受盧布的朋友們！你們的國家未亡，不其良心。蘇俄若是中國真正的朋友，是最愛惜你們的生父，那你們儘管去和他親善。然可先泯而到了今日，蘇俄已赤裸裸地露其侵略之鋒刃，你們還不知悔悟，是與西崽之奉承帝國主義者而不知廉恥爲何國家爲何者同一喪心病狂！我老實告你們受盧布的朋友，蘇俄於中國，仇也，非友也，別再昏迷！盧布不貴，人格要緊！國家要緊！

蘇俄仇友問題

蔣曉海

這幾天來看報，關於赤色與白色帝國主義及蘇俄仇友問題的爭論，見到了不少。究竟「赤色帝國主義」這一個名詞，有沒有存在的可能，現在暫不管他；不過以我的見解，覺得蘇俄對於我們，總還算得「差強人意」。在這帝國主義快壓制我們到死的時候，蘇俄畢竟可說是我們唯一的朋友。

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瀰漫了全球。被壓迫民族的反抗運動，是否一個單獨的力量所能做到？我想凡是對於世界情形稍留心的人，必定知道不成。像印度之反抗英國，朝鮮之反抗日本……在很久的奮鬥中，未見絲毫效果。所以反抗任何帝國主義，決不是任何弱小民族獨力所能做到，非要組織偉大的聯合戰線不可。

蘇俄是反抗帝國主義同志中最勇敢的一員：縱然他的利益與中國不能完全一致。但是他與帝國主義立在反對方面，決不至於互相勾結，「狼狽為奸」的。我們為達到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起見，所以可與蘇俄為友，同力禦敵！

現在反對與蘇俄為友的人們的論點，大概不外乎：蘇俄現在是積極在向世界宣傳共產主義，煽惑青年；我們若與為友，恐怕這種不適國情的共產主義，將乘機行於中國。哈哈！真是「因噎廢食」了！須知我們與蘇俄為友是一件事，蘇俄之宣傳共產主義又是一件事；我們與之為友，不過是外交上的一種策略，並不是承受其共產主義。請你們放開眼睛看看：土耳其與蘇俄極親善，同時，他又是怎樣反對共產呢？

至於說蘇俄侵佔外蒙，逮捕華僑學生；這都不足拿來做反對與蘇俄為友的根據。蘇俄對於蒙古，

是不是對絕的侵佔，還是一個問題。（請參觀十月十二日本刊，張榮福先生之「蘇俄真是中國的敵人麼？」一文。）逮捕華僑學生，也不是甚麼稀奇的事。因為在他們國家裏，反對他們的共產主義，這與在帝國主義勢力之下宣傳共產主義，是一樣的不可可能；所以被捕是當然的了！（我並不是說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我是說在共產主義的國家內反對共產主義，就保不了不被捕的。）

即或現在大家都以為蘇俄是向我們侵略，但是他前此之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已經比較帝國主義好得多！凡事總有輕重，我們也該把蘇俄暫時放下，先用全力去對付帝國主義。這與滬案發生後，主張對英日，丟下其他帝國主義，是一樣道理。

因上列各種理由，所以我主張『可與蘇俄為友』。

末了，我要聲明：我並未入何黨派，更不是受盧布的驅使，與蘇俄作辯護。

這篇東西，本擬寄往晨報的；但是他們現在很細心的防「敵人的宣傳品乘機混入」，像這類性質的文字，一定不得登載。所以只有向京報副刊借點地方了！

一四，十五，於慈慧禪林。

——京報副刊三〇一號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對俄問題的我見

李璜

勉己同學兄：

我的文字可以勉強的使他不冗長，然而終不免于沉悶。我答應你要做的那一篇文字是根本不會合你的要求，我還是改題另做，改日交卷罷。我知道你看見這幾句，一定要說：「老李要賴債了！」其實我的文債太多，賴之一法是常常有的。不過你這是第一次找我，我既答應了你，絕不會就這樣算了。

甚麼學理的文字，我本來不配去做他。就做起來，自家都不大開心，看的人當然更不開心了。這兩天你們的副刊鬧蘇俄是不是朋友的問題，好像鬧得很開心的樣子。因此我也願意湊湊熱鬧，與你譚譚這方面的話。你們官司一開始的頭兩篇文章——陳啓修先生的「帝國主義也有赤色白色的分別嗎？」和張奚若先生的「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我並沒有看見。這是因為你的大作連日連篇登載出來，纔引起我的注意的。陳先生和張先生的文章大意也是在你的大作裏得見到的。張先生和你都好像疑陳先生做前篇文字難免有點爲蘇俄宣傳。據我個人看來，這或者是種誤會。我雖則與陳先生見面不過三次，不甚深知他的政治理想，但是第一次在北海相見時，他對於學藝社同人所講的話，很足以表示他對於蘇俄的態度。他對我們譚話一開始便說。因為他是從俄國回來，朋友們都好奇的愛問他俄國的事情，所以他不能不談俄國的事情。並且他接着說：「這幾年來外國人和中國人都是一樣，崇拜蘇維埃政府的人便就一偏之見把俄國說得太好，厭惡蘇維埃政府的人又據不周全的調查把俄國說得太壞，所以他願意用比較客觀的態度和比較周全的調查，來概括的譚譚。他說了許多俄國的

政況，他的結論是：俄國現在並沒有實行共產主義而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在這個結論上看來，陳先生的態度是與國內一班替蘇俄宣傳的共產黨人態度大不相同的。國內共產黨人從來不說共產主義未能實現於俄國的話。陳先生接着還說：『蘇俄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並不完全是因為共產主義行不通，乃是列寧他們老早決定要這樣做。既決定了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所以還是照着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樣，對外通商以圖買進所需的原料和機器，或是賣出所製造和所豐餘的物品。……蘇俄四處派出通商交涉代表，無非爲此。』陳先生這幾句話我相信是合于事實，並且這個事實差不多是人人共見的。陳先生說：『蘇俄的農業工業現在漸漸恢復起來。』我也相信是真的，只是在這裏我有個疑問，就是：蘇俄實業發達以後，出產和製造多了，是不是還得如同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樣，要在實業不振的地方謀商業的發展啊？

論到蘇俄在中國宣傳主義，陳先生的議論很是合我的意思。他說：『蘇俄也明知在俄國還不成功的共產主義，在中國當然無實現的可能。但他的宣傳並不是爲中國人和爲主義而宣傳，乃是爲他自己和爲對付英國人而宣傳。在遠東尤其是在中國的英人勢力不動搖，英人一旦毫沒有了遠東之憂，英人又要一力對付俄國了。』陳先生這個話狠足以說明國中共產主義宣傳的意義和價值了。

陳先生那天雖然未曾對我們從理論上言明赤色共產主義沒有帝國主義的可能，但是他有兩句話很可以使我們值得注意的就是：（一）據他說，蘇俄在工人和軍隊中施政治教，頗收效果。現在蘇俄的軍隊實力雖不及歐洲強國，但是蘇俄的工人和兵士既抱得有素來要以理想征服世界的那種斯拉夫民族

性，現在又受這種教育，個個都有勇氣去爲理想而戰爭。（二）他還說，在政治理想上譚起主義來固然是很明白不苟的，但是在政治施爲上用起手腕來終不免爲一時利害關係而未能處處顧到理想。陳先生這兩句話更足以表示出他深深的認識俄國人和蘇俄近來的行事了。

我對於蘇俄的事情是比較留心的。我曾爲他發過狂熱。民國八年到十年，我在法國辦「巴黎通信社」的時候，便曾希望他能夠解決歐洲以及世界終不能了的局面。——你試翻民國八年到十年的晨報，中間至少有我的三四十篇報告蘇俄狀況的通信。——我從來不希望蘇俄棄了共產主義而去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那知事實竟使他不能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既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便不能不講商業政策，外交手段；要以商業振興本國，其勢不能不與資本主義的國爭市場；要以外交手段抵制英人，其勢不能不以英人財富中心所在的遠東地方爲武器；因此他便不能處處爲我們中國設想，他便顧不得許多了。蘇俄最近對於外蒙的活動也是本着這一樣的原因：外蒙保守着西北利亞的鐵道，又富於羊皮羊毛，俄人焉能棄而不取。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莫斯科「經濟生活日報」說得好，『這是俄國市場能夠自由榨取物產的唯一地方。』換句話說：外蒙是俄國的利益所在地不能放棄的。中國北部是不是俄國利益所在地？這就難說了！現在的俄國人便能完全棄却從前俄國人的野心而處處顧到理想，主義，不再以自家利益爲念麼？這更是難說了。我們覺得個人與個人間，除了少數有特別的感情而外，都是很容易處處捨棄自家利益以顧朋友，又何況國家與國家間！試問，蘇俄又何所愛惜于中國人呢？所以我們如果要問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不必在甚麼主義上去考察，更不必在甚麼赤色白色上去比

較，只問他的利害關係與我們的利害關係不相衝突便得了。如果蘇俄的利害關係是與我們一致，就使他是帝國主義者，也一定會來講朋友的。如果他的利害關係與我們相衝突，就使他本不是帝國主義者，也會偏偏對於我們做出帝國主義的行徑。這是事實問題，這不是理論問題，因此也就不是以口舌筆墨所能爭得出理由來的。自有人類社會以來，人們的侵奪行為不斷的發生，無非爲的各人自家利益難于放棄的原故。利己的觀念本來差不多是人類的習性；利他的辦法，除了少數由道德的陶養或由感情的衝動而外，不能望之于人人的。可憐的人類！如果早能處處顧到理想，主義，而犧牲自家的利益去做事，世界又不會到今日還是這樣沒個了局啊！因此我對於蘇俄，因爲他的利害所在，要侵入外蒙，要以中國爲抵制英人的武器，種種事實都一點不詫異，都認爲在情理之中，別人不敢以他國爲利益目的地，而專要來到中國。誰教你自家不競呢！

這封信寫得長了。改日再譚罷。即祝

「社會週刊」的勝利！

李璜十月十四日

——熱報社會週刊第三號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

奚若

我在這篇文章裏不但要說蘇俄是我們的敵人，並且還要說他是比帝國主義者更厲害的敵人。你們如要罵我是反革命，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或是其他更壞更下作的東西，那我自然只得由你們。橫豎你們的判斷，也不過只是你們的判斷，你們的詛罵也不過只是你們的詛罵，與我何干！老實說，要是沒有這點撐持，那我不但不敢和你們鬥嘴，簡直就不配和你們鬥嘴。

不好，我已經動了感情了。現在在中國說話，非裝出幾分學者的腔調，是不行的，是要惹人笑的。可是我自己並不是個學者，不是，連「智識寡淺的學者」都不是，那又怎樣裝法呢？試試罷？不行，隨他罷。

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何以是比帝國主義者更厲害的敵人？在未答這個問題以前，我要預先聲明一句：我說蘇俄是我們的敵人，並不是因為他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或在廣東替我們做甚麼高級軍官和外交官。那只是幾件極小的事，別的帝國主義的國家也都做過或差不多也都做過，在近代的中國，只能認為一種普通罪，不能當作特別罪。

然則蘇俄的特別罪究竟在那裏？我敢先總答一句道：在他以金錢的勢力和宣傳的手段，一方面使我們社會上本來很有希望的份子舍了腳踏實地救國救己的途徑，去弄那搖旗吶喊，務虛名忘實際的倚賴事業，一方面扶助我們社會上極惡劣的勢利份子排擠那極好的公正份子，小之足以阻止我們的真正解放，延長我們的束縛期間，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戰爭，增進我們的無窮負累。

此話怎講？別忙，聽我說。

帝國主義者該殺，不錯。不平等條約應該廢除，更不錯。日本是小竊，英國是大盜，美國是市僧，法國是棍騙，不錯不錯，一點都不錯。可是我們既然和這些小竊，大盜，市僧，棍騙等立下了那一大堆不平等的條約，現在又怎樣辦呢？難道多罷上幾回課，多遊上幾回街，多喊上幾聲「打倒英日強盜」，多教加拉罕替你們演說上幾次，就把那些強盜們一齊嚇倒了嗎？若然，何以現在他們還沒有倒？何以不平等條約一條也還沒有廢？這自然是做不到的，因為若是能做到，那豈不是強盜反成了懦夫嗎？強盜固然是壞，但他相當的胆量，總是有的，決不是隨便可以嚇倒的，更不是隨便可以教小孩子們嚇倒的。遠事不提，就是你們的天國蘇俄也都不是拿大話嚇出來的；他有他的紅軍，他有他的杜落次基，他有他那無數有信仰的兵士。反觀我們，情形又怎樣？軍閥割據，政客傾軋都不說，僅僅廣州一城還要請鮑羅廷和加倫來包辦。若以全國或重要的幾省作試驗場，那自然更要到莫斯科去請大批的天兵天將來幫忙。可是這樣一來，那亂子就鬧得大了，那些大盜小竊市僧棍騙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計，就不能不干涉了。結果，那些無數的「惡夫」和「斯克」由西北利亞回他們的天國去了，但是剩下的我們呢？那時，新得勝的強盜們，就是憐憫我們「事出被動，情有可原，」不忍再加我們以特別處分，但是戰費總要賠償罷？已有的不平等待遇總不見得反因此而減輕罷？

這便是我上文所說引起世界戰爭理由。其實，能做到這步田地，還算爽快。我恐怕連這也做不到，結果，僅僅延長比今日更糟的渾沌現象，使我們的真正改革無謂的又展期若干年月罷了。何以呢？因為照蘇俄現在的手段辦下去，我滿保你不要幾天中國社會將完全變成了流氓搗亂的局面（北京

現在差不多已經是的了）：一般青年除共產主義外，不知有學問；除虛布外，不知有廉恥；除傾陷異己外，不知有事業；除蘇俄使館外，不知有中國。這些人除替人做走狗，做爪牙，做奸細，一言以蔽之，做工具外，我不知有甚麼用處。然而蘇俄要在中國搗亂，除這些睜開兩眼，只見虛布，不見人格的和那些專到世上做渾蛋和糊塗虫的人們外，還有甚麼人可用呢？嚴格說，這自然不能怪蘇俄。可怪者，我們自己那些出不盡的愛錢鬼和糊塗蛋耳。但是若照「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和「物必先腐而後虫生之」的邏輯說，那就不但蘇俄不是我們的仇敵，連其他帝國主義者也都不是我們的仇敵了。這樣說法，在我原是無可無不可，不過那些以為中國今日事事都是帝國主義者弄壞的人們，恐怕就首先不答應了罷。無已，只得說他們都是我們的敵人。不過我覺得蘇俄的步驟來得特緊，手段特辣，小之足以阻止我們的真正改革，大之足以給我們引起國際戰爭，所以說他是比帝國主義者更厲害的敵人。

蘇俄最大的功勞，在作我們外交上的與國；他最大的罪孽，在妨害我們內政；但世上焉有內政不修，外交可以真正佔勝的呢？況且所謂外交上的幫忙，也不過是替我們多闖幾個亂子，使小竊大盜等更加有所藉口，事體益加沒法收拾罷了。諸君不信，請仔細看看滬粵案件的起源，經過，和將來的結果便知。然而滬粵案件不過此類麻煩之起點，將來續為滬粵者，更不知凡幾。我在此處要重「聲明一句：帝國主義式的強盜們，不是空口所能嚇倒的。如能，那英國早已不敢要求蘇俄承認英國人在俄國的私有財產權，法國也早已不敢向蘇俄刺刺不休的討還舊債了。」

蘇俄擾亂我們內政的地方有二。要更加正確一點，可說他「我們內政（即妨害我們真正的解放）」

的地方可由兩方面看。第一，他告訴孫中山說「中國問題，完全是個外患問題，並非內政問題；只要能把帝國主義的壓迫者趕了出去，萬事就都好了。」孫先生明白終身，糊塗一時，（或者是因為要用假裝糊塗）就把這種似是而非（頂多也是半是半非）的話告訴了他那在中國社會上本來狠能有大作爲的國民黨，大唱「打倒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諸口號，好像只要條約一廢，大難自平的樣子。這種舍本逐末，舍己求人的叫囂，起先人家聽見，還以為是孫老頭兒來到北方，因受軍閥包圍，不能談內政，只得隨便放幾個外交大砲，一以發洩他在廣東受英國人欺負的牢騷，一以博邀民衆的歡心，敷衍他做國民領袖的面子。不料中華民國不幸，他這位非常領袖不久竟然長逝。剩下那一羣大嘍囉和小嘍囉忘了他的本意（或者是被盧布引誘和加拉罕威嚇不能不忘），在那裏整天的狂號怒叫那幾種打倒帝國主義的空口號。到現在，誰還敢說「中國問題，根本上只是內政問題」的話？偶有人含糊的。咕一兩句，便有人大聲罵你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那你還敢再開口嗎？這種使我們社會上有用的青年和自命是學者的人不去老老實實的做些真正愛國的功夫而去弄那危險性極大的僥倖勾當，不務本而逐末，不求己而求人，把社會上原來極有用極有希望的份子完全化成廢物，不但打不倒帝國主義，連自己都站立不起來，無形中取消這一班人的精神存在和事實存在，是蘇俄妨害我們內政改革的第一罪。

第二，上邊說的青年和學者雖然沒有判斷力，沒有常識，可憐得狠，但比較上終算是些好人。若蘇俄在中國的朋友，只是他們這樣一羣人，那大概還鬧不出甚麼十分大亂子。可是蘇俄的朋友，絕對不止他們。他們外，還有些更無識，更無恥，更不安分，更好搗亂的一部份。蘇俄支配中國內政的原

則是利亂，不是利治，所以這些人的興趣和動作也就是趨亂而避治。越亂越好，越糟越有趣。別的不說，你只看看北京近幾個月來每次學潮的內幕，就曉得我所說的並不是無病呻吟或捕風捉影。比學潮尤顯著的便是那滬案正緊急時北京學聯會的分裂和天安門前的醜劇。這兩件事在他們本身原來沒有甚麼大關係，但是他所指示我們的含義却甚要緊，就是：社會上好份子被壞份子排擠，傾軋，攻擊；好勢力的影響，消等於零，惡勢力的效驗，膨脹到了百度。此等事偶見於一時一事，影響已經夠壞，永遠如此，那還能成嗎？這是蘇俄妨害我們內政改革的第二罪。

在這裏，大概又有人要說「這只怪中國人自己太壞，與蘇俄何關」。不然，有錢的壞人和無錢的壞人，有組織的壞人和無組織的壞人，有勢力的壞人和無勢力的壞人，有軍閥幫助的壞人和無軍閥幫助的壞人，大有分別。錢，組織，勢力，軍閥幫助，都是蘇俄給他們的，所以不能不怪蘇俄。

總之，只要我們能自強，能自己先像個人，能把國家弄的像個國家，那帝國主義式的敵人，不打自倒。日本是先例，土耳其，乃近證。反之，若照現在的辦法做下去，自己先站不起，那裏配說打倒任何敵人。蘇俄就是使我們站不起的魔鬼。所以我說他不但是我們的敵人，並且是我們最厲害的敵人。

論『我國欲修內政以圖強必須先
與帝國主義者妥協說』之矛盾

張榮福

張奚若先生於本月十七日在晨報副刊發表的『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我不敢說是在答覆我那『蘇俄真是中國的敵人嗎？』（見本刊第二百九十五號），因為他只是贊許我提出的幾句問語，和對帝國主義者與中國的一些分析（我不敢說是贊許我，或者是贊許其他的人），而對蘇俄仇友之辯證，又未與拙文針鋒相對。這些都是閒話，還是專門討論『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一文的主張罷。張先生這篇文章，主張如何，是他的自由，反對他的只有細心領教；而他這篇文章構思之粗疎，組織之零亂，實在令我好費勁，才找出兩個提綱挈領的主張。（一）是『我國非修內政不足以圖強，而修內政必須先與帝國主義者妥協』，（二）是『世界戰爭有絕大危險於中國』。我對這兩個主張，非常懷疑，今天先討論第一個，明後日再以『世界戰爭與中國』一文請教。

我提出這兩個問題，並不是撇開仇友之論不談，因為『爲仇』，『爲友』，只是結論。若是結論之前一段辯證：『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青年運動的口號（或者明顯的說，打倒一切軍閥，官僚，政客，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罷），是俄國教我們的，而這個口號的結果，不但使中國政治社會日趨混亂，壞人排擠好人，『糊塗蛋』執掌國事，以致『君子在野，小人在朝』，並且將來之禍是亡國滅種，一點亦不錯，自然蘇俄就是中國的仇人了。故我只提出這兩個問題來討論。

關於『中國欲修內政必須先與帝國主義者妥協』一問題，張先生指蘇俄爲仇的辯證，我爲讀者醒眼起見，先把他摘抄在下面，文字圈點，悉照原文）：

『蘇俄最大的功勞，在作我們外交上的與國；他最大的罪孽，在妨害我們內政；但世上焉有內政

不修，外交可以真正佔勝的呢？況且所謂外交上的幫忙，也不過是替我們多闖幾個亂子，使小竊大盜等更加有所藉口，事體益加莫法收拾罷了。諸君不信，請仔細看看滬粵案件的起源，經過，和將來的結果便知。然而滬粵案件不過此類麻煩之起點，將來續爲滬粵者，更不知凡幾。我在這裏要重行聲明一句：帝國主義的強盜們，不是空口所能嚇倒的……」痛哉斯言！五月中旬以來，張先生好像睡覺去了！痛哉斯言，掀天動地，各國名人學者，自由主義者稱贊的中國青年運動，反轉把國誤了！痛哉斯言，中國人何不俯首帖耳於帝國主義者之前，何反爲國家動亂子！我認張先生主張與帝國主義者妥協，就在這裏。這並不是罵張先生爲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其實你我不配，願當亦莫有人收留。」

『蘇俄擾亂我們內政的地方有二。……第一，他告訴孫中山說：「中國問題，完全是個外患問題，並非內政問題，只要把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趕了出去，萬事就都好了。」孫先生明白終身，糊塗一時，把這話就告訴他那……國民黨，大唱「打倒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諸口號……這種使我們社會上有用的青年和自命是學者的人，不去老老實實的做些真正愛國的功夫，而去弄那危險性極大的堯舜勾當，不務本而逐末，不求己而求人，把社會上原來極有用極有希望的分子完全化成廢物，不但打不倒帝國主義者，連自己都站立不起來……」痛哉斯言，以政治學專家而又留心國事的人，不讀「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不讀孫中山先生「北上宣言」，而妄自評蔑孫先生，以蠱惑不曾專門研究中國現代政治的讀者。痛哉斯言，何北京市上大小學生高呼的「打倒軍

「閥」，和「內除國賊」的口號，竟充耳不聞。）

『第二，……蘇俄支配中國內政的原則是利亂，不是利治，所以這些人（無識，可憐的青年和自命爲學者的人，簡言之，糊塗蛋是也）的興趣和動作也就趨亂而避治。……你只看看北京近幾月來每次學潮的內幕，就曉得我所說的並不是無病呻吟，或捕風捉影。……好勢力的影響減消等於零，惡勢力的効驗，膨脹到了百度。』（……痛哉斯言，趨亂避治之證據何在，吾輩青年真欲以搗亂救國耶！北京學潮——諒張先生亦不敢呼滬案運動爲學潮——真有俄國在後耶，俄國惡章士釗而令學生羣起呼喊驅逐耶！俄國惡張奚若而令北大政治系二年級生反對張奚若代理高一涵先生耶！甚至教會學校學生退學亦蘇俄之命令耶！北京警探勢力，教育部整頓學風令爲好勢力耶，青年學生盡爲糊塗蛋耶！）

『總之，只要我們能自強，……那帝國主義式的敵人，不打自倒。日本是先例，土耳其乃近證。……』痛哉！痛哉！名邦大學畢業之研究政治學專家，而不了解政治外交史，所舉日本和土耳其之例，應責手心，請看後文。）

摘抄已完，歸入本題。本題應分兩層討論：（一）中國是否專賴修內政即可以達到自強目的；（二）與帝國主義者妥協是否能達專修內政的目的。

中國今日的政治社會，只有兩個大別的階級，一個是軍閥官僚政客合組的階級，我名之曰剝削的階級，一個是三萬萬幾千萬平民合組的階級，我名之曰被剝削的階級。前者對於政治的目的，是維持

中國歷代相傳的賢人政治，以延續本階級的特權，實行其贈官，賄賂，中飽，剝人肥己，仗勢臨人的手段，以達自己爲『人王』或支配階級的目的。後者對於政治的目的，是平民政治，要推翻中國歷代相傳的賢人政治，以實現人民應有的權利，使萬民一切平等，建設民治主義，打破官僚主義，消滅政治上剝削，壓迫的行爲。以故現代的中國，剝削階級日嚴其法網，日增其警探，以防被剝削階級之興起，而被剝削階級處於大壓力之下，又無法起而推翻剝削階級，遂到處表現一種心理和企望，這卽是打倒軍閥，鏟除官治主義的口號之所自生。剝削階級又因自己的分裂，各霸一方，這些霸主，要以進攻爲保守，或以進攻達其一統山河的野心，遂勾結帝國主義者，有一派求援於日本，有一派求援於英國，又有一派的靠山是美國，法國就到處點綴，於是十幾年來，此興彼仆，仆後又興，釀成中國的內亂，而這些軍閥官僚對帝國主義者的報酬，就是祕密締約，讓與某項經濟的權利，處處妥協，讓他們對人民施直接的剝削，人民恨帝國主義者刺骨，於是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使大家覺醒，使官僚軍閥警覺，使帝國主義直接受經濟上的損失，做實際打倒的第一步功夫。由這樣看來，專賴修內政，中國是絕達不到自強目的的。剝削階級說的修內政以自強，是以本國的經濟利益，交換帝國主義者的槍械和金錢，以鏟除自己的對手，壓迫平民，使國內無暴動，爭自由運動發生，以妨害本階級的特權。其結果是，國民的經濟日被帝國主義吮吸，平民日處於壓迫剝削的黑暗地獄之下，而帝國主義者的勢力日增，人民的革命思想日濃，這算是內政修明麼，這就可以日趨自強麼？這只算是亡國滅種的徵兆！數十年來，美國操縱南中美各國就是這樣的，墨西哥是最顯的證例。被剝削階級在今日欲以

專修內政自強的目的，更是想夢，自己想學中國歷史上吊民伐罪的辦法而不以經營天子者自居，可惜自己無兵工廠以造軍械，而軍閥不但有兵工廠並且帝國主義者可接濟他們以軍械，壓迫自己爭自由，求經濟解放的運動。故照這樣看來，被剝削階級要想建設平民政治以自強，只有舉行國民革命，打倒軍閥，鏟除官僚政客，而同時射一股毫光在帝國主義身上，妨害他們經濟的吮吸，醒覺他們勾結軍閥政客之失策，然後我們的革命工作，才比較順利進行，才迅速達到修明的平民政治。政治既修明，國內經濟解放軍閥官僚剝削這部分，一切平等革命思想消滅，然後才說得上自強。

由上面的討論，可得一結論，即『中華民族欲求解放，現在必須着手打倒國內剝削階級，而帝國主義者與他們勾結，故同時又要附帶的抵抗帝國主義各國，不然，國內剝削階級打不倒，平民政治永無實現之望。』（在這裏有人要問，『那些勾結俄國，受俄國軍械接濟的如何呢？』我的答語是：只要俄國接濟軍械，是拿給我們革命，而又同時不要求經濟的或政治的報償，則我是十二萬分歡迎贊成的。）

其次，與帝國主義者妥協是否能達專修內政的目的呢？這裏要討論的妥協，是專指被剝削階級而言，剝削階級向來就和帝國主義者是妥協的，並且他們之妥協，亦不能達到修明內政的目的，前段已經說過，用不着再說。被剝削階級若與帝國主義者妥協，其效果最顯而易見，即人民不問帝國主義者之行為，日只埋頭從事於政治事業自動的建設。但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各挾有一個大軍閥之故，這些軍閥就不能不鬭爭，甲與乙斗，乙斗丙與，綿延下去，人民今日建設的政治事業，明日即因他們戰爭

之故而被毀，今日建設的經濟事業，明日即因他們的戰爭而破產等等，人民在這場合下，只是有心無力，日蹙蹙於建設建設，而亦日遭遇於破壞破壞，內政從那裏修明起走呀！其次即不爲排貨，罷工：的行爲，免國家又多一次亂子（因每有此等事發生，他們必要求軍閥官僚們干涉，好像國家又遇了亂子），於是人民俯首帖耳於帝國主義者經濟的吮吸，俟自動的政治事業建設好，『帝國主義就不打自倒』！這真是豈有此理：譬如，一個人的血日被一強者吮吸，這個人說，讓我把氣力練起，就可把他打倒，血已一日一日的少，營養已一日一日的不足，他那氣力還能練得起來麼？國家的財源日枯，國民的經濟日竭，中國社會就漸變成了一個骨瘦如柴的病人，還說可以修明內政，不知這修明的方法在那裏！

由這一段的討論，又可得一結論，即『中華民族欲求解放，現在必須着手於內政之建設，但內政之建設，必不能與帝國主義者妥協，以求一時的苟安，因與他妥協之後，則一方直接吮吸我們的資財，他方助軍閥擾亂社會，都是我們建設內政的阻礙，故欲修明內政以圖強，必在已打倒軍閥，同時抵抗帝國主義者之後』。

由這兩段結論看來，可合成一簡單明瞭之結論如下：

『中國民族欲求解放，必須先打倒軍閥，鏟除官僚政客，而同時抵抗帝國主義者之後，方足以言內政修明，國力日強。』

由這樣看來，中國人民外不與帝國主義者妥協，內不與軍閥官僚政客妥協，專心從事於國民革

命，是今日中國青年救國運動的正當方針。

六六

張先生又叫我們效法日本和土耳其過去之解放運動，其實我們就在效法他們。我們所不同於他們的，只是他們當時的國際形勢不同，和國內情形不同，至於運動之同為國民解放運動，抵抗列強侵略運動則一。這話怎講？日本之脫離協訂稅則，領事裁判權的羈絆，發端在明治初年，成功在明治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之間，是其修約運動前後經過約三十年。日本之能忍耐三十年，而其在英法德美奧等國之經濟侵略期間，不但未為各國之殖民地，反能修武備以內削羣藩，外勝我國，實不可不辨。當時之歐洲，誠然已在普法戰爭之後，列強競發展其帝國主義，然其帝國主義之政治的色彩，遠勝於經濟的色彩，此點吾人一思中日戰後，列強對我國大唱瓜分論之故可知。所以當時日本之受列國經濟的束縛，與今日之我國，實有天淵之別，此點吾人看明治初年以維持國家體面作修約之理由，即可明悉。既為政治的遠勝經濟的，則國民經濟之活動與發展，儘有餘地，只須國家之政治的地位增高，一切不平等條約即可修改或廢除。至我國於今日所處的地位，若有人仍謂修約運動可效日本以三十年或即減之以二十年為期者，小兒亦將耳掩而走矣。至於國內，則明治初年羣藩已漸削除，從末有何國挾一強藩以達其侵略之目的，而反觀我國又何如，國內戰爭，久已變為國際暗鬭，而仍謂吾人今日不當極端仇視帝國主義者，此話何說？何況在日本修約運動期間，其國民之對外抵抗運動，固未與我國今日之國民運動相差幾何，明治二十六年伊藤內閣媚外行為，所引起之國民的攻擊，與當時橫濱之排貨運動，均足以為證明。以吾國民今日所處之形勢與日本當時較，不知相差若干，而吾國運動則未勝過幾

何，尙謂吾人今日之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爲輕舉妄動，吾實百思不得其解。

其次，土耳其於千九百十九之後革命，其國民運動實較吾人今日之運動勝過若干倍，土耳其皇欲承受凡爾塞和約，凱馬爾將軍率領青年土耳其黨起革命，並藉俄國的助力，對內推翻土皇，對外直接戰勝希臘，間接戰勝英法意等國，而青年方面，亦爲掀天動地之排貨等運動，卒使國內共和政治成立，國際不堪其抵抗，以一洛桑條約，將共管土國財政之羈絆解放。張先生教我們效法之，我們固早已效法之矣，所愧者，我們的對內對外雙管齊下政策，未萬衆一心進行，並無領袖作我們之司令官耳。

——京報副刊三〇四號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駁張笑君並告青年朋友

陳黃生

大概在半年以前有一位先生渴望主張好人政府欲與吳佩孚共同爲善的努力週報再世。寫一條追念「努力」的雜感，引起「努力」中一個兵卒出來回答。從這篇回答的文章裏，挾帶出一個張奚若，說「努力非等在巴黎專研究政治史的張奚若先生回國來担任政論，努力不能再世」（文中大意）。我從這時起便很想拜讀張先生的大作。因爲我們處在反動勢力集中的北京，人矣不見敢於正言的政論了，所以渴望得很！不久在現代評論上讀了張先生的文章，使我有些失望，覺得他的文章太不講道理，只是任性。不過在這一點上，他的文章登在一般所謂學者們所辦的現代評論上，也算有一點硬氣。隨後大約有兩三月少見此公的大文，最近才在晨報副刊上差不多每天都得拜讀。張先生的「硬氣」真果話不虛傳。他要請徐志摩先生出馬將一切副刊打倒，至於火燒大學還是他先生已發而未實現的大願。可惜他正立志大幹之時，忽然發見了陳啓修先生蚤夜偷營，惱了他的情性，他便出馬大罵。而且痛責是報主人中了敵計引鬼入宅。我雖感謝張先生的鮮明的態度，但是他所罵的，不過是罵而已。罵人的文章誰也會寫，因爲凡一個人把對方無法的時候，才開口大罵，才任性造謠。假如有道理能夠勝人，又何妨細說？有人說這都是由於張先生做了執政府的什麼局長，受了內感篇的感動，才如此的。我想一個人依靠着大樹子，四面有種種權力保護着出來大罵一般所謂的「亂黨」，已經占了上着，而況一面還可以使有權階級稱讚你的筆下有力呢？張先生這種敢言的胆量，是何等的爲人留了正氣！

其實這不希奇。我們應該原諒張先生的。張先生託足權門這一類話不用說。張先生在歐洲

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中住了多年（據他說他這年是第一回在中國過國慶），所學，所習，所見，所聞，自然要與人不同。一千九百十四年，世界大戰，原也不過幾個大資財家賭氣拼一拼手勁。但偏有一般所謂學者出來替他們出力辯護，鼓吹。傻子如羅素，弄來坐了監。蠢才如羅曼羅蘭迫得退居瑞士不敢歸國。而其他學者如柏格森法朗西諸公，他們雖然高明一世，終久糊塗一時，把張奚若先生放在他們裏面去比，他們必定自愧弗如。就以本國貨而論，如章秋桐陳獨秀兩先生的不同，我們更見出善於處世的好處了。我們當然可以明白，張先生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張先生是為他們本階級而戰，我們何必深怪。大家更不要忘記意大利有一個莫索里先生，他的棒喝黨，比張先生的風頭還要出得高。況且張先生的見解並不是什麼創見，不過讀了幾份醒獅而已。

說到這裏，彷彿我自己便不應該來說這一堆話。但是我有我的原因，第一因為我今天事情少有功夫提筆寫字，第二恰巧有一個朋友與我談到張先生『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這篇文章。有了這兩層方便我便提筆來寫。我望讀者拿去一看，並希望予以公正的判斷。

張先生的文章，極為雜亂，因為他重在謾罵的原故。我只能就最荒謬的地方指出，請大家公判。

（一）蘇俄的特別罪

張先生說蘇俄有特別罪，他的用意即是說蘇俄的罪比各帝國主義者還要大，叫大家不用害怕帝國主義者，而忘却對付蘇俄，並且應該特別對蘇俄聲討。蘇俄是否有罪，是否比各帝國主義者兇惡？這

個問題我們只有用事實證明，不必用口舌空爭。張先生並莫有列舉事實，只是說：

「……蘇俄扶助我們社會上極惡劣的勢利份子，排擠那極好的公正份子，小之足以阻止我們的真正解放，延長我們的束縛，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戰爭，增加我們的無窮負累。」

這段是張先生的得意文章，下面雖會說「此話怎講？別忙！聽我說。」我看了下文仍舊亂七八糟，沒有看見他說出道理來。我只須就原意請問張先生：

(A)我們社會上的極惡劣的勢利分子到底是那一派呢？而極公正的分子又是那一派呢？

我們知道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是主張聯俄的，張先生託足的晨報不斷拚命宣傳國民黨得了俄國的盧布。張先生以國民黨為我們社會上的惡劣分子嗎？張先生若說不是指國民黨；而是指共產黨。(主張共產主義便是惡劣分子麼？)但我們知道共產黨早已加入了國民黨，合力起來努力國民革命。我們取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一讀，我們便可明白他們的態度。國民黨真為惡劣分子麼？我們又知道在我們社會上除國民黨而外，只有研究系安福系政學系還有餘孽存在，不斷的在輔助軍閥作賣國勾當，他們這些都是不受蘇俄幫助，而又受國民黨排擠的人。張先生所說的公正分子便是這些人麼？我感謝張先生，能有膽量見得到，說得出。使我更明瞭張先生的地位了！

(B)我國的真正解放和世界戰爭問題

張先生的意思，「蘇俄的幫助小之阻止我國的真正解放，大則引起世界戰爭。」我們看了這種議論何等使人驚訝！據他說因為蘇俄跑來幫助我們，列強必不容許，必來干涉。假若我國得了蘇俄幫助

而興起，把列強逐於國外，這便是一個世界戰爭。這話真不錯！但是我要問張先生：列強壓迫我國究竟爲的什麼？是不是只爲的與蘇俄搗亂而壓迫我國？只要蘇俄不幫助我國，是否帝國主義者便放手，我國便得到真正解放？而世界戰爭便可消除？至於說蘇俄是主張共產主義的國家，他來幫忙我國，必於我國不利。我在這裏不用討論共產主義是否合宜於中國的問題。因爲在事實上蘇俄幫助的乃是中國的國民努力革命，而不是社會革命。蘇俄何以來幫助中國的國民革命，一方面是爲的自救，一方面依列寧主義的見地，即指明出被壓民族的解放即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重要的工作。從這裏我們便看見蘇俄幫助國民黨與帝國主義者幫助軍閥的目的不同。張先生偏要瞎說，不是替帝國主義者張目到是爲的什麼？至於世界戰爭問題，誠然中國不自振作必引起戰爭，所以我們要起來自救以消弭世界戰爭。但是世界戰爭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張先生既然研究過政治史當然知道是資本主義。如今資本主義發達到了頂點，到了最後階段，使張先生都覺得有所謂帝國主義了。我國爲消除世界戰爭起見，爲自救起見當然以打倒帝國主義爲天經地義。先進的蘇俄與帝國主義是不兩立的，我們爲自救，爲打倒敵人，爲什麼不與蘇俄攜手？爲什麼要認友作賊？認賊作友？張先生你如果真心擁護資產階級，你如果真有胆量，你不如再說明白些，高唱聯列強以抗蘇俄。那你才不失爲一個硬漢！

（二）蘇俄的大功勞在作我們外交上的與國，他最大的罪孽在妨害我們的內政……？

這兩層意思，真正妙不可言！張先生可惜還不及克勒門梭的中國門徒聰明啊！請問在外交爲與國何以便要妨害內政？難道要在外交上爲敵國才有益於內政嗎？張先生以爲蘇俄在外交上帶我爲有功，

在內扶助革命勢力便算有罪。這裏我無話可說，因為我知道張先生原來是革命勢力的死對頭。無怪張先生這樣拼命淆亂是非。最喪心病狂的在下面批評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不顧內政，只喊打倒帝國主義。我寫到這裏，真不願再寫了。因為張先生已成了一個不可與言的人了。孫中山去歲北上誰也知道有兩種目的。

第一召集國民會議，

第二取消不平等條約。

誰也知道第一是對內用以解決一切糾紛，第二是對付帝國主義者，這兩種辦法當然是極合需要的。他老人家臨死猶諄諄以此為囑。破壞孫先生的主張是誰？不幫助孫先生革命的又是誰？是共產黨嗎？是蘇俄嗎？抑或是研究系安福系，和一般在旁說風涼話的學者先生們呢？張先生裝着不知，乃瞎眼咬定孫先生聽俄人之命不管內政，作外人工具。我實在不知張先生居心何似。我只可恨一般右派分子拼命與軍閥，反革命派勾結，竭力替帝國主義者攻打革命派。張奚若不過反動勢力中一個小將，其荒謬奸狠已不可以理喻。我也不願再往下說了。

青年的同胞們！我們處在現在的社會裏大家務必要注意！

在現社會上無處不是人畜雜處，鬼怪密佈。我們並不怕對方的明火戰鬪。因為我們便是不怕惡勢力的。我們只怕我們隊裏出了「漢奸」，甘心造謠來破壞我們的戰線。我們更怕青年有望的同胞中，心志不定受狐迷的誘惑，忘却自己的工作。大家要明白帝國主義者現在對付我們的反抗有幾條毒計。

條條毒計的原則，不外轉移我們攻擊的目標。他看着我們在攻打他，他便使一般買辦階級，資產階級出來說『你們不用專攻打我們，其實蘇俄也是與我們一樣，都是帝國主義者。你們注意罷。』因此暗示了張奚若之流出來，拼命宣傳，把我們全力的攻擊線破壞。高明的帝國主義者知道他是這樣，一定還不能完全滅我們對於他的攻打。因為他看着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於二年間猛進，勢力如排山倒海一般向他們打去。他想若不使這一支主力軍破壞，他們在東亞的地位必定危險。他又用轉移目標的毒計，散佈謠言，說國民黨被共產黨把持，說國民黨赤化。他的用意便是使國民黨起內爭。他在旁便落得清閒，收漁人之利。我們試看這兩條計毒也不毒。張奚若付琦之流不過替帝國主義者搖旗吶喊而已。我們大家知道處在現在的中國，欲挽救國家只有革命。我們革命的陣線異常分明。能革命的便應一致同心起來打倒我們的敵人，便應該擁護廣州國民政府。廣州國民政府是中國革命勢力唯一的集中點。他為民族，民權，民生，三者不斷奮鬥，歷有四十餘年。自然要遭敵黨，軍閥，反革命派，違反大多數利益的自私自主義者，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學者們的嫉視，其必造作謠言來中傷誣蔑，原是意中之事。我們明白這一點，我們便應該努力去作革命的工作，才能將敵人打倒。與他們空鬭嘴，是無益之事！還有一般學者先生們，與帝國主義者兩心默契。他們本是狡猾，看着民族運動的高漲，青年革命精神的可畏。他們極為高明，知道明目張胆出來反對，於他們的『清譽』有損，而且更要激起革命精神的奮興。他們想了一條妙計，便是勸青年同志莫問國事趕快讀書。本來書堆中，原是麻醉有生氣青年的好處所。因為一個青年生氣減少，學者態度增加的時候，必能得資產

階級權力階級的垂愛。他們有千種萬種的物質幸福來供你揮霍。把你的爲下層階級謀幸福的革命精神消磨至於烏有。這便是他們勸青年讀書的用意。這種計策真算惡毒極了！這裏的實例隨處皆是，不用列舉。我並不是勸青年同志不求志識。我以爲我們爲作革命事業，尤應求智識。但是這種智識不止書本上的智識。實際的工作才是我們真智識的求得所。況且我們一面作工作，一面也可讀書。這種必然的事理，誰也知道。但是一般妖狐偏要說出來騙人，大家注意！勿爲所惑。說到讀死書本來是最危險的事。我們知道資產階級的效力的偉大，不但靠他的武力維持。他的文化的麻醉更比武力偉大。他的武力不過足懾服我們於一時，他的文化的麻醉，那才是麻醉我們，使我們沉醉的一種妙劑。張奚若不過受了資產階級的文化的習染，他的靈魂已經沉迷於巴黎倫敦資產階級的豪華富麗裏，那裏會知道祖國中農工階級猶墮在無底深淵。他更怕農工階級翻身，將他的主人打倒，將他的迷夢打破。所以他便大驚小怪嚷起來。這裏我們便可得一個教訓。凡願意遠涉重洋到巴黎倫敦去求學問的青年，我們不要小視了張奚若。他便是在資產階級文化的中樞深有所得的人。我們不說他沒有學問，但是他的學問是資產階級的學問。是替權力階級辯護的學問，因爲他有這樣的本領，所以一回國便能託足權門，便能在資產階級的報紙上大吹大擂。大家試想這樣的學問拿來做什麼？這樣學問那裏是學問不過鴉片嗎啡而已。一般學者先生們他們在故紙堆中，飽吸了嗎啡鴉片，他們不知自悟，要請普天下的青年同他們去吸。真不知他們的居心何似。這就是他們所提倡的讀書運動。青年同志們！我們生長這個時代，革命事業便是我們的生命，除此而外我們別無生命。但是革命事業絕不是替權力階級，資產階級張目。

革命事業也不僅是一個報仇運動。我們實是爲的自己，實是爲的剷除一切不平，爲人類謀真正的自由與和平。爲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便應從獻身國民革命做起。我們認定了目標，做到身死爲止。什麼『不依賴過去人物，不利用已成勢力』這類話，只是被想當首領的虛榮心所衝動，那裏真正在愛國。孺子將入井都必匍匐將救，那嗎當着國民黨正在扎硬寨打死仗的當兒，正在與軍閥及帝國主義生死相拚，血肉相搏的當兒，不但不加入援助，而且在旁面站着造謠，希圖破壞對敵反抗的勢力。亡奴之心可見，青年同志，不要被他們瞞着了！（轉移目標的毒計，陳啓修先生在歡迎廣東代表會上言之極詳，本文舉出大概，特此聲明。）

——京報副刊三〇三號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駁陳黃生之謬論並告愛國青年

趙奉生

十月二十日的京報副刊，發表一篇陳黃生君的「駁張奚若並告青年朋友」。他這篇文立論的偏宕謬誤，和淆亂是非謠言惑衆，很可以代表一般中國共產黨徒的言論，（陳君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徒我不知道，）讀者切不要誤會。要知道我作這篇，並不是替張奚若君辯護；乃在指摘陳文中的謬點，並為全國青年進一忠告。

我們把陳文讀一篇，就可以知道他只知道現在世界只有階級戰爭；只有農工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算是革命（如蘇俄）；所以凡是主張排俄的人，都認為反革命派，是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的走狗。這是他文中大謬而特謬的地方。我們中國受各方面的壓迫，決不限於所謂資產階級，我國中受壓迫的人，也不限於農工階級。俄國的革命以農工階級打倒資產階級；但是我們中國決不需要蘇俄這樣的革命，我國應當要看看蘇俄與我國有利害的衝突沒有，換言之，就是以中國的利害為前提來考察蘇俄，然後才能決定對俄的態度。我們就事實上考察，蘇俄決不像我們的朋友；所以我們革命就革命，無需乎蘇俄的幫助。蘇俄對於我們不敢說沒有好處。但是陳君只說他好處，不說壞處，這種偏宕之論絕對要不得！我們既不承認一定要聯俄，——我們為利害計也許防俄——那麼主張排俄的人，就是反革命，是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的走狗嗎？我們看他的原文說：「張先生在歐洲資產階級專政中的社會住了多年，所學，所習，所見，所聞，自然要與人不同。一千九百一十四年世界大戰，原也不過幾個大資本家賭氣拼一拼手勁，……我們當然可以明白張先生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張先生是為他們本階級而戰。……況且張先生的見解並不是什麼創見，不過讀了幾份醒獅而已。」我們為消除世界戰爭起見，

爲自救起見，當然以打倒帝國主義爲天經地義。先進的蘇俄與帝國主義是不兩立的，我們爲自救爲打倒敵人，爲什麼不與蘇俄攜手？爲什麼要認友作賊認賊作友？」就看出他的意思來！他不但說張先生是帝國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走狗，並且認爲張先生的見解，得之於醒獅週報。凡沒有讀過醒獅的，一定要受他邪說所惑；至於讀過醒獅的，是決不會信他的謠言。醒獅週報是發源在上海，主筆是曾琦先生，他的宗旨是本着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精神，用全民革命的方法，以改造中國。他的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凡是看過醒獅的，沒有不知。但是陳君指他是反革命，帝國主義的走狗，這種可畏的顛倒是非，謠言惑衆，真是共產黨徒唯一的太特色！諸位不信，可以看一看最近一期的醒獅（五十三號），就足明白醒獅的真相，不致爲共產黨人所惑了！

他又說中國之排俄，視同帝國主義。是中丁帝國主義者轉移我們攻擊目標的毒計。又說國民黨受共產黨的破壞，是帝國主義者的謠言。這又是他邪說惑人的地方。他說：「大家要明白帝國主義者現在對付我們的反抗有幾條毒計。條條毒計的原則，不外轉移我們攻擊的目標。他看看我們攻打他，他便使一般買辦階級，資產階級出來說：『你們不用專攻打我們，其實蘇俄也是與我們一樣，都是帝國主義者，你們注意罷。』因此暗示了張奚若之流出來，拚命宣傳，把我們全力的攻擊線破壞。高明的帝國主義者，知道僅是這樣，一定還不能全滅我們對於他的攻打。……他又用轉移目標的毒計，散佈謠言，說國民黨被共產黨把持，說國民黨赤化。……我們試看這兩條計毒也不毒！張奚若曾琦之流不過替帝國主義者搖旗吶喊而已。」前邊已說過，我們對付蘇俄的先決問題。近來國中主張排俄的，也

是鑒於蘇俄對於中國，包藏禍心。這從事實上可以證明，無須口爭。我們爲國家安全及獨立計，蘇俄果誠心來結交，可以親他；不然就應當排他。帝國主義者他有多大能力，制國人言論。我國人全都像共產黨那樣甘心受人指揮嗎？又像國民黨被共產黨破壞，人人皆知，國民黨員自己承認；但是陳君還說是帝國主義造謠，並且說張奚若曾琦等全是替帝國主義搖旗吶喊，我真佩服陳君的顛倒是非謠言惑衆左袒蘇俄的能力偉大，同時我覺着也許是蘇俄虛布的能力更大啊！

張奚若君深知共產黨爲害於中國，所以說：「蘇俄最大的功勞，在作我們外交上的與國，他最大的罪孽，在妨害我們的內政。」（見十月十七日晨報副刊張君之「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張先生的意思說：「蘇俄妨害我們的內政」是說他宣傳共產，擾亂國內。陳君駁的真妙，他說：「請問在外交上爲與國，何以便要妨害內政？難道在外交上爲敵國，才有益於內政嗎？張先生以爲蘇俄在外交上幫我有功，在內扶助革命勢力便算有罪，我這裏無話可說。」張先生說：「蘇俄扶助我們社會上極惡劣的勢利份子，排擠那極好的公正份子。小之足以阻止我們真正的解放，延長我們的束縛，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戰爭，增加我們的無窮負累。」他所謂「極惡劣的勢利份子」，是指共產黨之類；「極好的公正份子」，是指國民黨及真正求中國的統一獨立打倒帝國主義的人，這是很明顯的。但是陳君駁的尤其妙，他說：「張先生以國民黨爲我們社會上的惡劣分子嗎？張先生若說不是指國民黨，而是指共產黨，（主張共產主義便是惡劣分子嗎？）但我們知道共產黨，早已加入了國民黨，合力起來努力國民革命。我們取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一讀，我們便可明白他們的態度。國民黨真爲惡劣分子嗎？我

們又知道社會上除國民黨而外，只有安福系研究系政學系還有餘孽存在，不斷的在輔助軍閥作賣國勾當。……張先生所說的公正分子便是這些人麼？」張君所說：「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戰爭，增加我們的無窮負累。」他的意思是說，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中國果被蘇俄利用弄共產，列強將出師有名來攻擊我們，（英國因為廣東政府用俄人而抗戰，是一明證，世界戰爭雖然引不起來，但是中國受了大害了。——作者）這是很明顯看得出的。但是陳君駁道：「據他說因為蘇俄跑來幫助我們，列強必不容許，必來干涉，假若我國得了蘇俄幫助而興起，把列強逐出國外，這便是世界戰爭。……」總而言之，陳君所駁張君的話，全是先有成見在胸——認定張先生是革命的死對頭，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張先生說的話，多拿當做帝國主義者所說的話，所以駁的實在無理取鬧，顛倒是非！

作革命事業，實際工作固然是不可少；但是也要讀書——求知識。就是革命也要懂革命的方法，一方面破壞，一方面還須建設，這些知識從那裏來的，不是要讀書嗎！但是陳君不主張從書本上求知識，要專從實際工作上求知識。所以他非常反對讀書，他說，「他們（帝國主義者）想了一條妙計，便是勸青年同志莫問國事（凡是有點腦筋的人，都知道現在青年應當注意國事，有些人主張青年不要專做愛國運動而不讀書，沒有聽見誰勸青年不問國事，專讀書的。——作者）趕快讀書，本來書堆中，原是麻醉有生氣青年的好處所。因為一個青年生氣減少，學者態度增加的時候，必能得資產階級權力的垂愛。他們有千種萬種的物質幸福來供你揮霍。把你為下層階級謀幸福的革命精神消磨至於烏有，這便是他們勸青年讀書的用意，這種計策真算惡毒極了。」這真是荒謬絕倫的話，照他的意思，

中國的青年簡直無需讀書，都一直的做革命事業好了。全國的大中小學全可以關門，讀書既是麻醉青年的事情，那麼中國就無需乎教育了！光從實驗工作，能得多少什麼知識？我們看看世界上的革命大家，那個沒知識？那個不讀書？陳君說讀書可以消磨青年的革命精神，我以為讀書正可以養成青年的革命精神。因為人讀書愈多，知識愈多，中國世界的形勢他越明瞭，革命方法革命的宗旨革命後建設他都可以非常明瞭，再看見各國革命成功，更足以增加他的革命精神。假設使青年一無知識，便想這革命成功，恐怕天下沒有這樣的容易事呢！革命這件事情，不是隨隨便便求得一些很淺近的智識便夠了，一定要有些深的智識，沒有深的智識，不配談革命。知識既充，然後從事於革命，才有好結果，「一面作工作一面讀書。」一來有限，二來困難。總而言之，凡有新思想的人讀書正是增加他的革命精神；如果是一個沒有思想的人你要不先換一換他的腦筋，無論什麼都不能振作起他的革命精神！也就是處處事事都可以消磨他的革命精神！

我舉出上邊幾個例，足可以見出陳君的謬論。我說的也不少了！最後我對於全國青年，進一些忠告：

愛國的青年們！你們已經知道中國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不能不作救國運動了。你們也知道救國的唯一途徑，就是革命。但是有一件你們一定要知道的，就是救國的方針——我們革命是如何進行，我們將來對於中國抱什麼主旨。這是一件最重要的必具條件。我們既想救國，一定要讀書，求作救國運動的知識與工具，我們對於現在中國一切的問題，都要來研究研究。我們一面抵抗前面的帝國

主義，後面要抵抗共產主義。「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實在大大的危險！諸位要知道共產主義是絕對不能行之於中國的，中國的共產黨，多半受盧布的驅使，替他拼命的宣傳，凡是他們的文章，都是說蘇俄好，至於蘇俄壞處，他絕對不說。他們常用階級鬥爭——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的鬥爭，——來煽惑一般青年。我國最大最大的仇人，是外國帝國主義，外國資本家和本國軍閥。我們非把他們打倒不可，這是中國全國人的生命關鍵！區區階級鬥爭算得什麼東西，中國有什麼資本家；資本階級？中國是工商業落後的國家，努力發達還來不及呢；還互相鬥爭嗎？諸位要知道俄國並未行什麼共產主義，他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陳啓修先生的話，）他也不知道一時來行共產主義是自戕，所以行國家資本主義。可見中國萬不能行共產的。愛國的青年們！請你們立下堅定的志向，勿受一切喪心病狂的邪說所惑，受盧布的人們，是甘心賣國，甘作蘇俄的奴隸走狗。一般志向不定的青年往往受他的害，這才是真正的「漢奸」呢！這才是我們救國運動中的最大障礙呢！！

——晨報附刊一二九九號十四年十月卅一日出版——

讀了趙奉生的『駁陳黃生的謬論』
並告愛國青年之後

安赤生

我打開趙君的『駁陳黃生的謬論並告愛國青年』大作一看，見滿篇寫了許多的『謬論』，『偏宕謬誤』，淆亂是非，謠言惑衆，『大謬特謬』，『無理取鬧』，『盧布趨使』，『甘心賣國』，『蘇俄的走狗』，『漢奸』……等名詞，立即鼓動起了我的感情，不由叫道『陳黃生何人，竟敢如此！』而這篇大作也就逼得我不得不仔細去讀了。

讀了一遍之後，總覺得趙君謾罵的天才，比常人高出萬萬；陳黃生之罪，則絕不如此！再讀之後，又覺得有許多的謾罵名詞，只合於趙君自己，而陳黃生倒可以宣告無罪的。

三讀，四讀之後，情不自禁的寫出了這篇東西，敬求大家指正。

趙君說道：『我們就事實考察，蘇俄絕不像我們的朋友；所以我們革命就革命，無需乎蘇俄的幫助。蘇俄對於我們不敢說沒有好處。但是陳君只說他的好處，不說壞處，這種偏宕之論絕對要不得！我們既不承認一定要聯俄——我們爲利害計也許防俄——那麼主張排俄的人，就是反革命，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麼？』

我讀了這段妙文，不能不佩服趙君之縱橫詭辯，但同時要勸他細讀幾本邏輯。按他說就事實考察。不知所謂事實，究竟是些什麼？蘇俄自動的取消不平等的條約麼？表同情於中國的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麼？即以趙君夢中有一種說不出的事實爲根據，也不過肯定了蘇俄不像中國的朋友而已！蘇俄的好處又是趙君不敢說沒有的，不知又根據了什麼事實，由不一定聯俄，一轉而防俄，又一轉而爲排俄。好奇妙的邏輯，可惜只有趙君一個人應用！

趙君引了他所要駁的陳君的原文道：『我們爲自救起見，當然以打倒帝國主義爲天經地義。先進的蘇俄與帝國主義是不兩立的：我們爲自救爲打倒敵人，爲什麼不與蘇俄攜手？爲什麼要認友作賊，認賊作友？』這種說法，是因爲利害相同，敵人相同，聯合起來，以期速將敵人——帝國主義打倒。趙君對於這些話未駁一言，就說陳君是『可畏的顛倒是非，謠言惑衆，真正共產主義的一大特色』了！奇極！妙想！

趙君又引了陳君的話道：『大家要明白帝國主義者現在對付我們的反抗有幾條毒計。條條毒計的原則，不外移轉我們攻擊的目標。他看着我們在攻打他，他便使一般買辦階級，資本階級出來說：『你們不用專攻打我們，其實蘇俄也是與我們一樣，都是帝國主義，你們注意吧。』因此暗示了張奚若之流出來，拚命宣傳，把我們全力的攻擊線破壞。』而趙君駁道：『近來國中主張排俄的，也是鑒於蘇俄對於中國包藏禍心。這從事實上可以證明，無需口爭。』趙君說了話只怕旁人不信，故說蘇俄包藏禍心，從事實上可以證明，但趙君開口事實，閉口事實，畢竟事實究在那裏？懸想中抑夢中呢？排俄的根據究在那裏？

趙君又引了陳君的話道：『高明的帝國主義者，知道僅是這樣，一定還不能消滅我們的攻打。：他又用了轉移目標的毒計散佈謠言，說國民黨被共產黨把持，說國民黨亦化！』趙君駁道：『又像國民黨被共產黨破壞，人人皆知，國民黨黨員自己承認的。』對此我要問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從何時起？國民黨右派分子之搗亂又在何時？右派分子雖然搗亂而共產黨與左派聯合是不是又作了許多的革

命工作？對於這幾層一加思索，就知道共產黨是竭力維持國民黨而共同幹國民革命的。委因右派分子有反革命的根性——階級利益不同。一旦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暗示，而從事於搗亂。須知破壞國民黨的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暗示反對革命的右派分子——直到現在還不斷的到執行部去吵。而共產黨是拼命維持的——最近幫助國民黨發展組織，幾增黨員三分之一以上，這是有號本可查的。

同時，趙君罵陳君道：『我真佩服陳君的顛倒是非，謠言惑衆，左袒蘇俄的能力偉大，同時我覺得許是蘇俄盧布的能力更大啊！』這種謾罵是極無聊的，倘若陳君反罵道：『你是受金磅，日金的支使啊！』這究於論點有什麼相關呢？

趙君說：『張奚若君深知共產黨爲害于中國，所以說「俄國最大的功勞，在作我們外交上的與國；他最大的罪孽，在妨害我們的內政」張先生的意思說「蘇俄妨害我們的內政」是說他宣傳共產，擾亂國內。』陳君駁的不能說妙與不妙；但第一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是共產？中國共產黨的現行策略是什麼？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時，曾發表了宣言，說是幫助國民黨努力國民革命，至于共產云云那是他們最後的目的，要按步就班的去做，他們的第一步就是國民革命，與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是同時合作的，他們加入國民黨就是一個明證，他們究竟擾亂了國內什麼？何必那樣大驚小怪呢？

趙君又說：『張先生說：「蘇俄扶助我們社會上極惡劣的勢力份子，排擠那極好的公正份子，小之足以阻止我們真正的解放，延長我們的束縛，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戰爭，增加無窮負累。」他所謂「極惡劣的勢力份子」是指共產黨之類；極好的公正份子，是指國民黨及真正求中國的統一獨力打倒帝國

主義的人，這是很明顯的。」但這裏有可注意者：把共產黨加上劣惡的形容辭，出之謾罵者的口吻，是無足怪的；把共產黨加上勢力兩個形容字就生出許多疑問來：倘這勢力是指的帝國主義者，軍閥的勢力，那誰也知道共產黨與帝國主義者，軍閥是不兩立的——只看帝國主義者以赤化污人，軍閥槍殺共產黨員，可爲明證，若說是民衆的勢力，那他們當然是不客氣的承認。他們忙着組織羣衆即是爲此。至於把極好的公正的形容辭加在國民黨上，也有疑問發生。除共產黨外，國民黨還有革命與反革命的左右兩派：左派是革命的，與共產黨攜手的，他們也只合於『極惡劣的勢力份子』之徽號，而右派則是反革命的，屢思搆接軍閥，作官發財，故與左派相水火，不久便要與左派分家。他們正合於『極好的公正的份子』的官稱。

趙君重引張奚若所說：『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戰爭，增加我們的無窮負累』，並註疏道：『他的意思是說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中國果被蘇俄利用弄共產，列強將出師有名來攻擊我們。（英國因爲廣東政府用俄人而抗戰，是一明證。世界戰爭雖然引不起來，但中國受了六害了，——作者。）這是很明顯看得出的。』讀了這段名論，哭不得笑不得！還是張奚若比趙君高明，張君只發表泛論，而趙君偏要把他註實，以致鬧出大笑話；連張君的謬誤，也暴露出來：

趙君顧慮的倒也周到，因爲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不兩立，就怕列強出師有名來攻擊我們，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能兩立麼？國民黨三民主義之第一種就是民族主義，趙君，趕快大罵國民黨吧，倘若因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之不兩立。列強出師有名來攻擊我們，趙君豈不受了他們的累？一切民衆運動高

呼打倒帝國主義的，都是與帝國主義不兩立：趙君，趕快大罵他們吧！帝國主義出師有名來攻擊我們是可怕的！尤其是趙君受累！

奇怪，趙君發狂了！精神錯亂了！怎麼自己也喊着說『我們一面抵抗前面的帝國主義』，『我國最大最大的仇人，是外國帝國主義……』呢！趙君！趕快大罵你自己一頓！趕快恢復你的精神！趕快吃藥治你的瘋狂病！不然，帝國主義者聽得你說抵抗他們，說他們是仇人，他們就出師有名來攻打我們：這回可就是你自己連累了你自己，就是你多能謾罵，也只合你自己挨了！

至於趙君說『英國因為廣東政府用俄人而抗戰，是一明證。』尤為可笑！北京政府曾否也用了俄人？對北京政府統治下的上海，漢口，……等慘案的發生，又是什麼緣故。大概是帝國主義者要這各地同胞都流了鮮血而做我們赤化的證據吧？趙君！不要太孩子氣了，帝國主義者的宰制，侵略，屠殺我們，正是他們帝國主義者的特徵。強者對於弱者，帝國主義者對於被壓迫民族，大肆屠殺，躊躇滿志之後，欲加以罪，何患無辭呢？

復次，我們要談讀書救國的問題：

陳君的原意：『我並不是勸青年同志不求知識，因為我們為作革命事業尤應求知識。但是這種知識不止書本上的知識，實際工作才是我們真知識的處所。況且我們一面工作，一面也可以讀書。』據此可見陳君並不根本反對讀書，是一方面去讀書，一方去工作，而最要者是在工作中，求得革命的真知識——這種話深自經驗得來，未從事于革命工作的人，是不易領略的。光鑽書本，即便讀的都是革

命的書，也只不過會『談革命』而已，革命的眞知識，必得之于工作中。而陳君所反對者則在『讀死書本。』其意在置救國運動於不顧也。（趙君的意思也作這樣解——只限讀死書本句。）

趙君的駁論中，把陳君不止書本上的知識；一面工作，一面讀書」改爲陳君『非常反對讀書』，『要專從實際工作上求知識』。眞不知趙君是何居心？

而最奇怪者：趙君一方面爲倡讀書救國的名流辯護，說『凡是有點腦筋的人，都知道現在青年應當注意國事，有些人主張青年不可專做愛國運動而不讀書，沒有聽見誰勸青年不問國事，讀書的。』而趙君自己却主張一般青年丟開國事，先求知識！真是趙君要比高唱讀書救國者的名流們還高一等呢！且看趙君說道：

『革命這件事情，不是隨隨便便求得一些很淺近的知識便夠了，一定要有些深的知識，沒有深的知識不配談革命。知識既充，然後從事於革命，才有好效果，「一面工作，一面讀書，」一來有限，二來困難。』

讀了這段之後，就知道我說趙君主張丟開國事，先求知識，並非無據。因爲『一面工作，一面讀書』既然『有限』而又『困難』。又須『知識既充』，『然後』才能『從事於革命』。況且『沒有深的知識』不用說『從事於革命』，還『不配談革命』呢！

看趙君的矛盾吧！趙君說：

『愛國的青年們！你們已經知道中國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不能不作救國運動了。你們

也知道救國的唯一途徑，就是革命。」

我們由趙君的這段文字裏知道全國公認中國的危險，是『千鈞一髮』了！既然這樣危險，『救國運動』，已經到了『不得不』的時期了，『而救國運動的唯一途徑，就是革命。』可見中國已經到了『不得不』『革命』的時期了！

但是，趙君心裏並不這樣着忙，雖然『革命』已經到了『不得不』的時期。他心目中還沒有忘了名流所唱的讀書運動，不，他那比名流還高一籌的『丟開國事，先求知識』獨到主張！且看他說：

『我們要想救國，一定要讀書，求作救國運動的知識與工具，我們對於現在中國一切的問題，都要來研究研究。』

趙君哪！『不得不』的『革命』，逼迫得這樣緊，再容忍着則『一髮』斷矣！『千鈞』墮矣！我們實在沒有你那樣冷靜的學者的態度，對這『不得不』的『革命』丟開，而去專門讀書，求知識；研究中國一切的問題而把『一髮』之斷，『千鈞』之墜置之不顧啊！我們還是照陳君的说法：

『……但是這種知識，不止書本上的知識，實際工作才是我們真知識的處所。……一面工作，一面讀書。』

的道路走吧！這也是時勢——環境使然耳！

讀書救國的問題就算結束了。尙有餘暇，索性再對於趙君罵共產黨的地方——他的大作的後殿，說幾句話。

趙君說：『我們最大最大的仇人，是外國帝國主義，外國資本家和本國軍閥。我們非把他們打倒不可，這是中國全國人的生命關鍵！區區階級鬥爭，算得什麼東西，中國有什麼資本家，資產階級？』

趙君，你要知道：現社會之亂源，是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成了聯合戰線，和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聯合戰線相衝突的原故。故『外國帝國主義』與『外國資本家』聯合起來向我們這中國——弱小民族，尤其是勞動階級——極力壓迫，剝削，而『本國軍閥』不過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工具——走狗。就是你，也把他們看作了『中國最大最大的仇人』，而『非把他們打倒不可』！這種打倒，就是被壓迫階級，對於壓迫階級的鬥爭——這就是『階級鬥爭』的意義，馬克思說：『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可見『階級鬥爭』並不只含着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的狹義的意義。

即就狹義的階級鬥爭而言，階級鬥爭在中國也有很深的意義。中國果然像你所說的那樣絕無資本家麼？絕無資產階級，難道都是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請你攷查一下，誠然是有的，不過比較歐美少些而已！中外國資本家在中國壓迫之甚，你也認為仇人之最大最大者，勞動階級對他們——外國資本家，中國資產階級——難道還要絕對服從，忍受，而不打倒他們？一何可笑！

中國共產黨之受盧布支使與否，要找出強有力的證據，萬不可血口噴人：況中國共產黨所努力的國民革命，在歷史上的使命與意義，是非常嚴重的，更不要無端謾罵！

趙君！一切的青年們！一切的被壓迫階級！我們還是共同快幹中國那『不得不』的『革命』吧！

一九二五，十一，一日在北京。——京報副刊三三〇號十四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

一，前言 記者的聲明

志摩

二，聯俄與反對共產

奚若

三，來信

江紹原

四，蘇俄不是帝國主義嗎？
抱朴

(一)

先前有人告訴我辦副刊的一個秘訣是引起問題的爭論。照往例看，問題越淺薄，告奮勇的人越多。編輯先生只要在旁邊扇；越扇越旺，副刊就不愁填不滿空白了。我是一個滴青外行——不論做什麼事。又是天生的傲氣，內行話老成話我都不願聽，寧可辦糟了喫他們的『如何！我告訴你的！』

也真巧，我才來，問題就跟着到。而且我信這回的問題決不是淺薄的。但這話有語病，因為問題本身只有寬窄大小的區別，淺薄不淺薄得看你怎樣討論法。有時談小問題可以發見大道理，同時大題目底下的文章不定是高明。

這回的問題，說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說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的。這題目不能算小。自從陳啓修張奚若在本副刊對壘以來，來稿真不少，有的說是仇，有的說是友，有的說是赤，有的說是白。假如我們一起發表的話。每期都是這問題的專號了！這是應該的。但同時我以做副刊記者的資格，也以我個人的資格，得在這裏聲明幾句話，免得一部分人誤解。這時代，我有時想，有的就是誤解，存心或不存心，我每回想着看着覺着就難受，因為這一點分明反映時代的心理。我第一要聲明的是本副刊（每周星一星三星四星六是志摩主編的，此外不關我的事）決不是任何黨派的宣傳機關；本副刊撰稿選稿是我個人完全除外的特權，與責任。晨報主人有一天干涉我的時候，竟許就是我解職的時候，因為我不能忍受不完全的信任。晨報本身的主張我絕對不與聞，我也管不着，也不想管。我知道的只是憑我自定的標準與能力編輯這每周四張的副刊。辦好是

我的功，辦壞是我的罪，沒有第二人分得着。再講切實一點，就比如這回在討論中的中俄問題，我個人自信是無成見的。我天天抓緊了拳頭問這時代要的只是忠實的思想，不問它是任何的傾向。誰要看懂我上星期那篇『從小說講到大事』，他就認清了我的評價的標準。我恨一切私利動機的活動，我恨作偽，恨愚闇，恨懦怯，恨下流，恨威嚇與誣陷。我愛真理，愛真實，愛勇敢，愛坦白，愛一切忠實的思想。我曾經登載張奚若反對俄國人幫助中國人進天堂的文章，因為我信得過張奚若的見解至少是獨立的，不含別種動機的，忠實的。他也許錯誤，他也許有他看不到的地方，誰知道；但他的議論至少是對他自己完全忠實的。同時我決不拒絕反駁他的文章，只要來者合我的標準——忠實。有一部分我不刊出的來稿，是為它本身沒有什麼新發見，或是寫得太不清楚；但我決不以正反定取舍。奚若最初說晨報不應該登載贊成或隱惡揚善的文章，我不這樣想。我心目中的友只是我上面列舉的幾條『我愛』，我的敵人也就是上面列舉的幾條我恨。這標準似乎很空泛，不著實際，但我再也想不出更合理的標準。紹原說我『尚不失赤子的心』，我覺得安慰，因為我信得過他這句話裏沒有混入『愛倫內』。就憑着這一點『赤子之心』，如果我真的不會完全失去，我才敢來與你們相見。

我現在特闢這『仇友赤白』一欄，專為登載關於中俄關係乃至聯起的中國將來國運問題，盼望國內有思想的特權與責任的朋友們共同來討論這件大事。

(二)

般人對於「聯俄與反對共產」這個問題大概有三種見解。第一，因要聯俄，所以就不反對共產。

國民黨的左派多半持這樣的態度。第二，因要反對共產，所以就不主張聯俄。狹義的國家主義者和帶有資本主義臭味的人多半是這樣的意見。第三，說聯俄是外交問題，反對共產是內政問題；聯俄自聯俄，反對共產自反對共產，二者不容相混。一般自命頭腦清晰的人多半抱這樣的見解。這三派中，第一第二兩派各趨極端，非本篇所欲評論。第三派在理論上似甚持平，在事實上却有時亦很難行，或者不無討論的餘地。

許多人因為我這幾天來作了幾篇反對蘇俄在中國搗亂的文章，於是遂疑我是反對共產和反對聯俄的人。我敢說，這些人們又錯了。我不但不是籠統反對聯俄的人，在理論上和對於人類的同情上，我竟許是個贊成共產主義的人。不過這是指理論上的共產主義和俄國試行共產主義而言，要把共產主義生吞活剝的拿到今日的中國社會上去實行，那我便是無條件的反對。（我另有「共產主義與中國」一文詳論此點。）這只是講反對共產。說到聯俄，我自然是極力贊成。不過我與多數贊成聯俄者不同的地方在我的贊成爲有條件的贊成而已。甚麼條件呢？並不大，並不難，只要蘇俄不在中國內政上搗亂就行了。

可是這事談何容易呢？因為中國在未經勞動革命以前，蘇俄支配中國內政的原則是利亂不利治，是永遠利亂不利治。既是永遠利亂不利治，那就除過永遠拚命搗亂外，還有別的甚麼方法可使中國長亂而不治呢？蘇俄對於中國內政何以利亂不利治，說來原甚簡單。他因要爭他自己在世界上的生存和達到全世界勞動革命的目的計，不能不與攔他馬頭，和截他去路的帝國主義者鬧一個你死我活。但同時

他獨自一人卻又沒有這麼大的力量，所以不能不找幾個幫手。不過環顧四圍，資本主義的勢力布滿全球，誰又能作他的幫手，誰又能永遠作他的誠心幫手？現在被壓迫的各弱小民族嗎？不是。因為這些弱小民族雖一時因特別利害關係能受他的驅遣，但畢竟也都是些頭腦很舊而且戰鬥力很薄弱的國家。頭腦既舊，戰鬥力又薄弱，引為幫手，有何大益？然則完全放棄了嗎？那自然又不行。因為與其拋棄這些弱小民族使自己依舊沒有幫手，不如赤化他們還能為自己多少增些實力。這完全是一個以俄國為發端，以俄國為歸宿的私利政策，沒有甚麼了不得的仁義道德在內。赤化各弱小民族的根本政策既定，其次就只剩下實行赤化的方法，或策略問題。策略固然因時因地而異，但是無論何時何地他們均有一共同之點，就是：除完全聽蘇俄共產黨直接指揮的政府外，無論何種政府，他都要無條件的攻擊或推翻；除受蘇俄共產黨本身維持的秩序外，無論何種秩序，他都要無條件的擾亂或搗毀。因為如此，所以不但現在的中國政府和現在中國社會上的秩序他要攻擊要擾亂（這兩個我們自己自然也應攻擊，也不願長久維持），就是比現在的好上一千倍一萬倍一萬萬倍，只要不是蘇俄共產黨所要的政府或秩序，那他一定也是要推翻要搗毀的。這也用不着旁徵博引，只要看蘇俄近年來對於新德國新奧國新土耳其和近幾個月來對於廣東半共產派的胡漢民政府的態度便可了然了。現在讓我在這裏順便把蘇俄對於中國內政利亂不利治的理由歸結的說一下：利亂，因為亂極則人心思治，他的共產主義才有風行的機會，不利治，因為治了則這種機會隨着減少，雖屬中國之福，終非蘇俄之利。這在蘇俄一方面為他自己打算，自然是千對萬對，毫無可駁的地力。我們應該十二萬分佩服他的聰明，一百二十萬

分崇拜他的能幹。但是爲我們中國計又該怎樣呢？我以爲我們若是完全贊成赤化，完全贊成中國今日行俄國式的共產主義，那就不說。不然，似乎不應該不做聲的讓蘇俄在我們內政上任意搗亂罷。這並不是一個暫時的問題，這是一個比較永久的問題，我願大家平心靜氣的仔細想一想。

方才說過，我的聯俄是有條件的，而且這個條件並不十分苛刻，只要蘇俄不在我們內政上搗亂罷了。（搗亂二字的意義見「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篇中）可是蘇俄能履行這個條件嗎？上文已經說過，恐怕不容易。蘇俄若不能履行這個條件，那我們又應該怎樣對付他呢？那我們還是聯他呢，還是不聯他呢？照邏輯說和從本國利益上着想，那自然沒有聯他的餘地了。這當然不能怪我們，因爲他聯我們是爲着他的利益，我們聯他也是爲着我們的利益，現在這兩個利益太得衝突，而且係由他成心作祟，我們當然不能瞎着眼睛做傻瓜還去聯他。

有人說，蘇俄自動的放棄了他在中國的許多權利總要算是我們的朋友。不錯，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因他起先有這點好處，于是把他後來的壞處就一概不問了。尤其是壞處過于好處時，更不能不問。況且他這種放棄也只是一種宣傳手段，根本上還是爲他自己的較大利益設想，怎見得是赤心利他的行爲呢？

總之，國際間的關係完全是一種利害關係。聯俄如有利或利多于害，我們就聯他；如無利或害多于利，就不聯他。我認現在中俄的關係，在我們完全是害多而利少甚至完全無利（其詳見「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篇中），所以覺得我們不應該閉着眼睛一味說那些聯俄的感情話而忘了事實上的確切

利害。

本篇就算在此收尾。但我要在這裏附帶一兩句預告的話。蘇俄這個問題很大，不是一兩篇文章所能講完的。所以我預備在最近的幾個星期內再作幾篇關於這個問題的短文，發表我個人對於他的意見。現在預擬的題目如下：

一，共產主義與中國

二，中國共產黨人的分析

三，告蘇俄

四，告共產黨

五，告國民黨

六，共產主義在中國有成功的希望嗎？

七，中國問題到底還是個內政問題

這是我一時所能想出的幾個題目。寫出先後自然不一定。並且我還要為我自己保留隨時更換這些題目的權利。

十四，十，二十，北京

(三)

志摩兄

你編輯的副刊，有幾期我拜讀過。我們二人的興趣，氣味，和處世立身之道，頗不相同。但是我

認你是個不失赤子之心的好人；所以你來辦什麼副刊如果有時用的着我這個青年，我是樂於效勞的。

陳啓修先生論有無赤色帝國主義之文，以及牠引起的討論（至少是一部分），我都看見了。我也有幾句久想說的話，此刻艸艸寫出，給你補白。

蘇俄近來在蒙古的勢力，似乎很使不少的中國人眼紅。他們所說的赤色帝國主義，正指這一類的事實而言。像我這樣一個對於蒙古俄事俱無研究的人，本可不必爲了此點浪費筆墨。但是天下如果還有些事，是那些有特別研究的少數人們以外的人能夠看清的，我自當可以把我所見到的表示出來。橫豎旁人不會過於尊重我的意見。

第一，中國歷來對蒙的關係，只怕也是帝國主義的——這自然既不是白色的又不是赤色的而是黃色的帝國主義。第二，民國成立以來，因爲種種原因，漢蒙的關係似乎未曾進到真真民國主義的關係。第三，據說所謂民族自決的思想，近來在蒙人中頗盛行。所以第四，假使蒙古人不滿於現在的漢蒙關係而力謀改善，我不懂我們爲什麼不認爲正當的要求。漢蒙間應有怎樣的關係，蒙人自然須享有二分之一的自由，除非漢人靠他們的人數衆，文化優，硬把這二分之一打個折扣。蒙人如能取得與漢人真真平等的地位，在所謂『中華民國』裏作個自由的一員，自然最善。他們若得不到這種地位，去而另成一個獨立的國家，漢人似乎不能怨他們。至於他們的國家采什麼政體和經濟組織，更完全是蒙人自己的事；我們靠人數衆，文化優，或任何他種理由去橫加干涉，便是行黃色帝國主義。

漢人們最好把自己的眼睛睜大點，看看十八省或二十一省的局面是種什麼局面，看看其中的男男

女女們是些什麼樣子的人。我們自己如果恨那些到處騷擾的丘八，蒙人爲什麼不可加倍的恨；我們自己如果憎惡那些一見大凶的狗官，蒙人爲什麼不可加倍的憎惡。是的；蒙人是有雙重的理由恨丘八和憎惡狗官的，一因他們是吃人的丘八和狗官，二因他們是吃蒙古人——忽必烈汗的子孫——的漢丘八漢狗官。漢人還有好兵好官，還有財力人才嗎？如果有，留下給自己吧！漢人也知道痛恨白色的赤色的帝國主義嗎？如果痛恨，就莫行黃色帝國主義吧！

我個人對於西藏的態度，和上面所說對於蒙古的完全一樣。據英國官 Sir Charles Bell 的書，英國過去和現在都會供給西藏人許多軍用器，實力援助他們抵抗中國；不過英國並不是完全爲藏人打算，所以甚至於西藏關稅的自主，英國將來也不會答應（參看我替島報七週年紀念刊翻譯的一篇文章，標題爲『英帝國對藏政策』）。將來西藏能知道英國帝國主義也是該打倒的，西藏纔有真自由。

泰戈爾以爲印度人上級社會對於下級社會以及富者對於貧民的待遇如不改善，他們便沒有『道德的權利』去反抗英國人虐待印度人。我樂於說我對於漢蒙漢藏問題的意見，與泰戈爾是有幾分相像的：中國人如不先撲滅自己的黃色帝國主義（或云黃龍帝國主義），便沒有道德的權利去打倒什麼白色的赤色的帝國主義。

下面的一段，是全信中最有關係的一段呵。志摩，你如果是個有心眼兒的編輯人，登稿時就千萬不可刪去。「一段什麼話呢？」讀！讀後不要笑！

我，姓江名紹原，鄭重宣誓，我從來沒拿過蘇俄的津貼，也沒吃過蘇俄的酒飯。蘇俄大使館開館

時，誠然送了請帖給我，而且請帖上，彷彿印有『畧備茶點』的字樣，但是，我，姓江名紹原，彷彿知道裏面有迷魂藥，可沒去吃。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然而志摩是個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也許他看不懂上面的一段宣誓，竟於發稿時刪去。於是又勞有識之士與『人格』之獄了。

即頌 人格沒被人疑問。

弟江紹原。

(四)

自陳啓修先生發表文字，否認赤色帝國主義以後，晨報上起了很大的論戰。當時我因太忙，所以將陳先生的文字，轉寄友人芾甘與惠林等，囑他們詳加批評。不過讀十四日勉己的文字，覺得我有發言的必要。

我對於陳啓修先生的論點，當然不能加以贊同，但對於張奚若與勉己兩先生的意見，也基本上不一致。我於一九二三年自俄歸國後，因高君宇在晨報，否認赤色帝國主義，特著『忍不住了！』一文，指摘蘇俄的帝國主義，後來又著赤色的帝國主義（註一）與蘇聯政府的外交政策兩文，證明蘇俄也是帝國主義的國家。

這次陳啓修於否認赤色帝國主義以前，先研究帝國主義的定義說，現代式的帝國主義是伴着資本主義而生的，所以現在蘇俄未達到財政資本主義，當然沒有實行帝國主義的可能性。並且蘇俄是赤色共產主義的國家，根本上反對帝國主義。

我也承認所謂帝國主義，即財政資本主義的侵略行爲。不過現在有許多國家，雖未達到財政資本主義，却想用政治的侵略行爲，去助長財政資本主義也不能不說是帝國主義。如蘇維埃政府屢次於宣言裏，稱俄皇政府的侵略行爲，是帝國主義的政策。現在的蘇俄既是前俄帝國的後裔，當然有帝國主義的資格。

其次赤色帝國主義的名詞，在學理究有無根據？赤色共產主義有沒有帝國主義的可能性？我爲解答的便利計，先問陳啓修所用的赤色共產主義，有無學理與事實的根據。難道共產主義，也有紅白之分嗎？請問『非紅色的共產主義』究竟怎樣？

我是在中國採用赤色帝國主義名詞的一人，現在不妨將我的理由說一下。本來帝國主義決無紅白之分，凡用政治或經濟手段去侵略他國的，都可叫做帝國主義。但蘇俄一方不拋棄帝國主義，他方又空喊反對帝國主義，所以我們爲方便起見，自然可以稱之爲赤色帝國主義。在歐美各國稱蘇俄爲赤色帝國主義的，不是民主黨的急進派，而是社會黨左派與無政府共產黨。

我們要研究共產主義有沒有帝國主義的可能，先須看俄國是否是共產主義的國家？我記得有次一個大學生問我道：『俄國的共產主義究竟怎樣？』我直捷答道：『俄國有共產黨，而沒共產主義！』因爲列甯在宣佈新經濟政策時，已說這是國家資本主義。何況據末次蘇維埃的議決，私人的權限頗爲擴大。私人資本在工商業中，已佔了很大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可用經濟學家的定義說，蘇俄既然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當然免不了帝國主義的臭味。

不過有人或者要說，蘇俄是『想』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那能採用什麼帝國主義呢？我的理由非常簡單，因為理想與事實不全一致，商店的廣告與貨品，不能完全相符。有時理想與言論，不過是一塊臭招牌。請問那個外交家或政黨，肯自承是帝國主義。所以我們討論問題，應放察理論與事實的兩面。蘇俄現在既未脫資本主義，那末無論他把『共產』當作聖經，也不過痴人的夢話，至於事實上仍是資本主義國家，尙未脫帝國主義的可能性。

我在上面所說的，不過指明蘇俄有帝國主義的可能。至於赤色共產主義，究有無帝國主義的可能，我暫時不加批評。因赤色共產主義的名詞，在理論上不能成立。不過同時我承認，在真正的共產社會裏，確無發生帝國主義的餘地。

現在我們且看蘇俄政府，曾否進行過帝國主義？

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後，蘇維埃討論『作工的與被剝掠平民權利宣言』時，社會革命黨左派與無政府黨主張蘇俄是民族的自由結合。不過共產黨大會的議決案，却明明違反這種精神。布哈林在共產黨綱要說，各民族可以獨立，但須組織蘇維埃政府，不然我們爲該民族的勞動者起見，雖用武力亦所勿惜。

其實蘇俄本非勞農握權的國家，共產黨僅假借勞農的名詞，去征服前俄治下的弱小民族。一九二〇年九月時，蘇俄政府因燃料缺乏，遂曾紅軍佔據巴庫。次年二月又侵佔喬治，故實際俄皇治下的弱小民族，除一部分以武力脫離外，其他仍受蘇俄的壓制。特別是喬治的獨立運動，曾在蘇俄治下暴動

過幾次。有人以喬治去比印度，高麗，所以歐美表同情於喬治的人，向稱蘇俄侵略喬治的運動，是赤色的帝國主義。(註二)

就是蘇俄的對華關係，也免不了帝國主義的色彩。如勉己與張奚若兩先生所引的，都是蘇俄帝國主義的鐵證。勉己先生說：『自中俄協定成立之後，蘇俄藉着防禦白黨與帝國主義者的題目，駐兵外蒙，捕華人，延宕會議等等！其手段惡辣，使人不勝大彼得主義復生之感，』張奚若先生說：『帝國主義者僅僅暗中幫助北方軍閥，蘇俄竟明目張膽的在廣東做我們高級軍官。』難道這種侵略行為，還不是帝國主義嗎？

勉己先生說蘇俄在精神上壓迫中國，不是帝國主義的行為。其實據布黨的解釋，即文化侵略，也是帝國主義，所以中國布黨稱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何況蘇俄侵略中國，已是精神兼物質的了！

蘇俄信徒戴着假面具，在中國空呼打倒帝國主義，完全是一種外交政策。勉己先生對此有很好的解釋，他說道：『蘇俄……謀在中國政治社會上，樹其赤幟，並且間接牽掣帝國主義各邦，迫其讓步，這是蘇俄的惡辣的地方，不容放過的。』

勉己先生所犯的錯誤，就是未認蘇俄是帝國主義。實際這是帝國主義的手段，我敢深信俄英關係，假定不如現在這樣險惡，蘇俄決不致在中國這樣活動。如日俄協定簽字以後，蘇俄竟想用東亞聯盟，去抵制英國的外交政策。

(註一) 見民鐘第十期。

(註二) 去年阿伐洛夫曾著喬治獨立運動一書，在巴黎出版。

一九二五，十，十七日—晨報副刊一二九四號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爲蘇俄仇友問題告雙方

陳鍾琴

這幾天京副農副上，鬧的烏煙瘴氣，聽說爲的是蘇俄仇友的問題。

我急借晨副先看陳啓修『帝國主義有赤色白色之別嗎？』的導火線和答辯。又看張奚若的『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和『我國欲修內政以圖強必須先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的妙文，京副在手邊，張榮福的『蘇俄真是中國敵人嗎？』和反駁張奚若的怪論，不消說早看了。

我與各黨派都無關係，與論辯者私人，全不認識，只以第三者資格來說話。

近來國內文壇，都受了人生觀論戰的餘毒，常以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問題，斤斤爭辯，這一次也不是例外。蘇俄是敵是友，明眼人自知，奚待辯論？陳啓修說俄國是中國唯一的良友，事實未必盡然；張奚若說俄國是中國唯一的仇人，必定別有目的。總之：我認爲雙方俱多事。

聰明的先生們！你們拿上說閑話的時候，去調查調查英人挑撥軍閥的惡計，拿上打筆墨官司的光陰，去看看日本人壟斷關稅會議的陰謀罷！

以上我勸他們息爭；以下是質問張奚若的話。

我有三個問題質問張奚若：（一）俄國是否帝國主義者？（二）中國是否能行共產制？（三）與帝國主義者妥協是否能修內政？

欲明第一個問題，先說蘇俄革命的歷史。

俄國在數十年前，確是帝國主義者，東略我國之滿洲，南征巴爾幹半島。國內亦工廠林立，二兆盧布以上之資本家，達三千五百餘。而爲這些流血汗的，就是六十餘萬之傭人。他們夜以繼日的爲資

本家盡力，得來的錢，不夠溫飽。白天待遇如牛馬，中夜慘淒如死囚。他們有長嘯，最能表現他們的苦楚：

"Danned be the life of miners,

Day and night we toil and suffer,

Just as criminals in prison.

Day and night the candle snuffers,

And we carry death on shoulders."

厥後待遇益惡，不平者漸結工黨。加以農民之窮迫，禁酒令之影響，地方糜爛，國內恐慌。俄皇尼哥拉反不度情勢，日輸兵士於戰場以敵德。致凍，餓，戰，死的兵士，屍如山積。所以在千九百十七年，社會革命黨登高一呼，全國響應。未幾罷工者愈多，俄都入革黨之手，而臨時政府亦告成立。克林斯克數次組閣，但主張續戰，卒為布黨二次革命所敗，而勞農政府以立。列寧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在憲法會議宣言的七，八條說：『蘇俄獎勵全世界各國勞農間相互之交歡，主張非賠償，非併合及民族自決之民主的原則，廢除對於小民族殖民地之壓制，贊同芬蘭獨立，波斯撤兵，及亞美利尼自治之聲明。』議會未通過，不惜解散之。今日之蘇俄，即本此主張進行。

上邊我不惜引用這許多話，為的證明蘇俄立國精神，即根本反對帝國主義。不意曲高和寡，大遭帝國主義者的白眼，持封鎖政策，欲置蘇俄於死地。但蘇俄不以此自餒。他們看東方有個大民族，

五千年的歷史，四萬萬的人民，正被帝國主義者宰割。他們動了同情心，想扶這可憐的民族起來，一同打倒帝國主義者，然後世界纔有和平的希望。中俄條約成立，即其謀略之第一步。但中國人疑心百出，受寵若驚。帝國主義者嫉妬之餘，捏造誹言，而中國的張奚若，亦代表帝國主義者說話：蘇俄是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吸我們資財，蘇俄竟收買我們良心；帝國主義者僅愚弄我們軍閥，蘇俄竟愚弄我們青年。最後竟主張中國要與列強妥協以圖存！張先生！中國人資財固然被人吸盡了，中國人的良心也早莫有了，他們怎樣買？還是照你的高論，在大英國，大日本的膝下，涕泣陳詞曰：我們忘了從前的仇，來和你們要好！

話雖如此說，我還盼望人知道甚麼是帝國主義。所謂帝國主義者，愚弄，搶劫，侵略人之大盜也。今殺人不眨眼者是誰？吸我脂膏者是誰？指使軍閥內爭者是誰？因內爭想藉為口實以遂其把持海關之目的者又是誰？蘇俄固然不可明目張膽在我國宣傳主義；但條約上早禁止，不妨令其歛跡。蘇俄固不可佔據我蒙古；然他們聲明退還，誰去接受？賣國條約，都訂於賊人之手，而蘇俄單獨聲明前帝國條約為無效，因他們主張非併合及民族自決故也，他們能自己打嘴吧，為帝國主義者麼？而中國的聰明人——不是混蛋之尤者——竟以赤色帝國主義的大帽子，強按於蘇俄的頭上。認賊作父，以友為仇，吾又何說？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以為有連帶關係，故並論及。我常說：人的口是狹義批評者的發音器，不意這話，竟適用於本文。民四時，人聽着「國民黨」三字，即「談虎色變」。到民國十四年，人聽着「共

產黨」三字，也「相驚伯有」。究竟你問他國民黨共產黨是怎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可憐哉，盲目之羣衆也！某閣員當面問加拉罕說：你們俄國和中國要好，想教中國共產麼？加拉罕說：中國無產可共！的確，我國大資本家在那裏？工廠有幾個？我們財產，都被帝國主義者和上斷頭台的軍閥刮盡了，還配說共？我國人的傳統觀念及家族制度入人太深，俄國即花錢，不過買到幾個招搖撞騙的出風頭的走狗，而共產與否，仍格格不入。神經過敏之中國人，不要怕的太利害了。

但是到現在，共產這兩個字，還是刺目，究爲何故？應者曰：上了帝國主義者的當了！帝國主義者見我們有點反抗的樣子，於是示意於其一等走狗曰：貴國人赤化後即共產，你們廢盡幾年心血刮下的囊中物，要與他們平分，那多可惜！幾個無辜的百姓下到獄裏，算了一起事。而我們羣衆，也掣這個新罪名互罵，共產共產！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關於第三個問題，本無答辯的必要，然不示以懲罰，將來還有比這好聽的話。

張先生的大意是說，俄國人懲患中國，中山先生又上俄國當，高唱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結果帝國主義者更形猖獗，不平等條約反不能廢。他又說：青年和自命學者，不務本而逐末，不求己而求人，社會反受其害，所以他們是「糊塗蛋」。最後據他的宏才大略，是要先與帝國主義者妥協，俟自動的政治事業建設好，「帝國主義就不打自倒！」哈哈！我早知道中國有個怪物，慣發怪論的！他說中國上當，不當能聽俄國的話，反抗帝國主義，難道說我們應當三跪九叩首在帝國主義者面前，他們踢我們一脚，我們應當抱住他們的尊足接吻不成？中國反抗帝國主義是上了俄國的當，不知

俄國革命，又上了誰的黨？他說：青年和自命的學者，不務本而逐末，不知甚麼是本，甚麼是末？我們應當在屋內起火，煙霧沖天的時候，還抱上書本子咿咿唔唔呀麼？噢！我明白了，我們應當不惟不救火，反拿些救出來的衣物再投到火裏，纔算絕頂聰明，如張先生者，在中國被人壓迫的喘不過氣的時候，還罵反抗爲多事，再替帝國主義和軍閥說話，纔不是「糊塗蛋」。民國的時候，事事都是反面。做官要使人人側目而視，纔有昇發希望。所以學者——不是張奚若——也要勸人讀書，方不愧爲識時務之俊傑。他又說：我們應與帝國主義者妥協，這話猶令人掩耳却走。你打開滿清的歷史看一看，那一回不是讓寸進尺，你越想妥協他越利害。他們吸我們脂膏，割我們土地，騙我們人民，中華民國簡直有名無實！我們譬如是一個骨瘦如柴的大病人，帝國主義者，就是置我們於死地的妖魔。一直到民國十四年，他們還是扼我咽喉，縛我手足，炙我皮膚，而一方面又假惺惺的說：我們實在盼望你早好了！我們被他們的迷魂湯灌的快入土了。自動事業，何由而建？政治狀況，何由而善？讀者諸君！帝國主義者，根本就不想咱們有强有力的政府！我敢再進一步說：在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統制之下，中國永遠翻不了身！即使甲軍閥再能打倒乙軍閥，眼前乙軍閥與丙軍閥又會對打。結果無論那一個得勢，國事依然，專制更甚。志士們！國事前途，在你們身上。拿你們熱血，來點綴神州吧！臨末我要勸告張奚若，你的怪調，早不敢領教了，徐詩哲固允你「盡量發洩」，然牛溲馬勃，豈是搪塞之物？還是早入政界，拉幾個同志，比掛名學者強得多。我再勸陳先生：及早不理張奚若，他自吹自擂莫意思，筆戰就能停止，不然，軍閥爭地盤，智識階級好筆戰，國事前途，就要斷送在這裏！

復勉己書論對俄問題

梁啓超

勉己足下：

我當回你信以前先和你說一段笑話：晚明的智識階級最會拌嘴，那時講「良知」正是最時髦的名詞，有人說良知即「赤子之心」，有人說良知像一張白紙，於是發生「良知赤白問題」。朱舜水集裏頭有句話：『我不管良知是赤是白』，就是由此而來。良知赤白沒鬧得清楚，滿洲人却已進關了。現在打的帝國主義赤白官司，恰好和那時遙遙相對。

你要我在對俄專刊上做篇文字。我老實告訴你，這幾天看見報上筆墨官司打得熱鬧，已經把我的「晚明遺傳習氣」惹動，心癢難熬，想加入拌嘴團體來了。但是，頭一件，因為要討論這問題，須得先把自己對於經濟制度的主張拿出來，立論纔有根據。我不是沒有主張，但把他寫出來也要費好幾天工夫：我現在被學校功課絆住，竟沒有這點空閑時候。第二件，我要講的話，好些被別人搶着講去了，因此把我插嘴的興會打斷許多。文章所以許久作不成，爲此。

你要逼我說話嗎？那麼，最少我得先把我的經濟主張標出個題目來。我的主張是很平凡的——或者也可以說很頑固的，也許連你都不贊成。我不懂得什麼人類最大幸福，我也沒有什麼國家百年計畫，我只是就中國的「當時此地」着想，求現在活着的中國人不至餓死，因此提出極庸腐的主張是：『在保護關稅政策之下採勞資調節的精神獎厲國產』。不妨害這種主張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我都認爲友，妨害的都認爲敵。

因此，一方面，普通所謂帝國主義者，不用說，當然是我們大敵。因為他用他的資本來榨我們的

膏血，連我們自衛的防身刀——保護關稅也搶去，妨害我們獎厲國產，當然是我們大敵。別方面，不管是一「赤色的帝國主義」，是一「赤色的共產主義」，或者是一「灰色白色的共產主義」，只要有破壞勞資調節精神的意思及行爲，便與獎厲國產的目的不能相容，一樣也是我們大敵。

蘇俄友敵問題，我就是這麼簡單幾句算答覆了。

赤色的帝國主義之有無，和蘇俄是否帝國主義者，這是兩件事，不能併爲一談。想辨論赤色的帝國主義之有無，先要問「帝國主義」這句話作何界說。若在帝國主義上加上一個「經濟的」或「資本的」形容詞，變成「赤色經濟的」或「赤色資本的帝國主義」，那麼，我也承認他沒有可能性。但是，帝國主義只有這一種嗎？最少，還有政治的帝國主義。就讓一步說這是歷史上名詞，但眼面前有赤色的人把歷史的古董重新搬演，試問我們能否替他另起一個雅號，不叫做帝國主義？

問蘇俄是不是帝國主義者，我毫不沈吟的答道：他是帝國主義的結晶，他是帝國主義的大魔王，他是帝國主義的……。俗語說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一國的國民性，可是換一面招牌就改得轉來嗎？俄國人頑的政治，對內只是專制，對外只是侵略，他們非如此不能過癮。不管蘇不蘇，赤不赤，頑來頑去總是這一套。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臘正教上帝，列寧便是轉輪再生的大彼得。全俄人民從前是「沙」的腳下草，現在便照例承襲充當執行委員的腳底泥。中國從前是「沙」的夢想湯沐邑，現在便是紅旗底下得意的拋球場。蘇俄啊！你要辨明你不是帝國主義嗎？你那一天把在中國的活動停止，我們那一天立刻就相信你。但是，能嗎？

蘇俄一定說，「我並不是侵略你們，不過我覺得我的共產主義好，可憐你們不懂，受罪，我來替你們宣傳，革命，救你們。」莊子說：「庖人雖不治庖，尸祝固不越尊俎而代之。」國內偉人們「代人民革命」我們老百姓受賜已經受夠了，那裏還當得起外國人來「代」？以一個外國來代我們做什麼做什麼，——不管做的好事壞事，總之已經把我們常做被保護者，兒孫，奴才。這樣不算帝國主義，怎樣才算帝國主義？

共產主義好不好，和我們中國相宜不相宜，且不管；算是好，算是相宜，蘇俄應否以外國人來替我們幹，也都且不管。讓一百步，他果是為共產而運動共產，我們對他總可以幾分原諒，容赦。但是，真的嗎？蘇俄本身是共產國家嗎？若是共產的國家，怎樣會「大人虎變君子豹變」翻一個筋斗會變成新經濟政策來？喂！可憐！天真爛漫的青年們！聽啊！你信仰共產主義，教你信仰的人却並沒有信仰！馬克思早已丟在毛廁裏了，因為侵略中國起見，隨意掏出來洗刮一番，充當出廟會的時候抬着騙人的偶像！喂！青年們！傻子！聽啊！我老老實實告訴你，蘇俄現狀，只是「共產黨人」的大成功，却是共產主義的大失敗！你跟他們走，自己以為忠於主義，其實只是替黨人張牙舞爪當鷹犬，和你腦子裏理想的主義相去不知幾萬里！傻子！可愛的青年們！醒過來罷！

青年們啊！我告訴你：蘇俄現在是想做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他能否做得成功，現在我還不敢說。如其成功嗎？青年們！須知道，須猛醒，國家資本主義的侵略壓迫，還要比私人資本主義加十倍百倍千倍！首當其衝的便是舊們中國。他們為他自己本國起見，自然把中國打得稀爛是他們的

利益。愛國的青年們啊！你爲着什麼來？

總答「赤色帝國主義有無」和「蘇俄是否帝國主義者」這兩個問題，我的答案如下：「蘇俄是灰赤色的國家資本的帝國主義者。」

勉已足下！我胡亂寫這封信算交卷罷。我希望我在較近期間能得一點空再把我那篇極陳腐的經濟制度主張寫出來請教讀者們。

一四，一〇，二三，啓超，清華。

——晨報社會週刊第四號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版——

反共產的理由和主張

勉
己

對俄問題，各方辯論，正在熱烈的時候，我曾平心靜氣的寫了『怎樣對赤俄？怎樣對帝國主義？』一文，登在本月十四十五兩日本報正張，我相信應該商榷的問題，在那篇都已說完，現在應避重複，只述我反共產的理由，和我對於目前中國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主張，以補足我前文的論據。

我先要附帶聲明的，就是援引『赤色共產主義』這名詞有許多人不滿意：贊成共產的人，說我不應於共產上加了赤色的形詞，反對共產的人，又以蘇俄本來不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何勞我賞牠尊號？我以為這個問題，不僅區區名詞上之爭執，和討論對俄方針，很有關係，故特提前答覆。

我以為現在的蘇俄，尚不失為共產國家，然而蘇俄目前試驗中的共產主義，不過為馬克思共產主義之一種；並且因為帶了赤色的特徵——即以暴力煽動世界共產革命——，對手國內政上外交上都要嚴防牠；所以我援用『赤色共產主義』這名詞，很有深意，一面替蘇俄訟直，一面為自己防衛，我認為最平允不過的。

我說：現在的蘇俄，尚不失為共產主義的國家，並且還是世界上試驗中的惟一共產主義國家，我的論據極簡單，便是蘇俄已經毀滅了私產制度——資本主義的靈魂——誠然蘇俄還未將私人資本社會化，他目前所行的，尚不脫國家資本主義，並且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後，也偶有所謂私地主，小商戶的階級，然而從大體看來，牠對私產制度，對內對外，根本上都未付讓步，說列寧往黨已將馬克思先生丟在毛廁，這未免冤枉；今日我們中國，有沒有真正共產信徒，我不敢遽下肯定斷語，然而像列寧一派領袖人物，的確是馬克思主義的殉難者，並且他們的事業，一部份已經成就，這是不可湮沒的。因

爲蘇俄畢竟還是共產主義，所以我說爲外交上比較沒有危險，即使能爲鬼，也不厲害，這層已詳我第一篇論文中，茲不多贅。

我說『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過爲馬克思共產主義之一種』，因爲按馬克思實現共產的方法，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暴力革命手段，這個已經蘇俄嘗試而成就其赤色共產革命一部的；又有一種叫做平和的進化手段，就是依着普通選舉在國會占多數，逐漸推翻現行社會制度的。不過在馬克思時代，歐洲選舉權制限尚極狹隘，要在國會實現共產主義，直是夢想，所以當時共產黨宣言還是這樣說：『我們若要達到目的，非舉一切社會制度用暴力推翻不可，』看這個宣言，好像馬克思主義，是與平和的進化手段，絕對不相容，其實馬先生並不抱此極端的見解，而且自法國西率先實行普選之後，一般共產黨徒，對於暴力革命的主張，已漸漸改變，現時英法德比等國的社會黨，都主張採用平和的進化手段了，我們若看英工黨居然選舉大勝，掌握政權，就不能說平和的進化手段，是絕對沒有希望的。這種平和的進化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名詞，本來可以通用的，因爲社會主義雖有集產共產之分，然而社會主義終局的目的的是共產，集產不過是達於共產的一個過程而已——，外交上比赤色共產主義，更沒有危險性，內政上也不像赤色共產主義會發生問題，也許是未來世界人類之福音，然而如今還不過一個理想，究竟能否實現，以及實現後能否不再踏蘇俄赤色的覆轍，誰也不能担保。

以上所說：也許都是廢話，若不因近日大家辯論漸漸脫軌，我決不在此嘵嘵，現在要趕快進入本題了。

我在第一篇論文中說：『赤色共產主義在實質上不能爲帝國主義這一點，外交上是我們一致的朋友，然而牠爲着或藉着反帝國主義的題目，不免時弄帝國主義式的把戲，我們要嚴防扒手』，我又說：『赤色共產主義在以暴力煽動世界共產革命這一點，內政上是我們大多數反共產的敵人，我們不縱容牠，遇必要時，不妨以嚴厲手段對付牠。』以上立論，都是以反共產主義爲根據，除非主張共產並且要赤色的共產的人，對我的立論，相信都不能推翻，我現在要把反共產的理由，和我的正面主張寫出來，請教讀者們，這却是中國當時此地的大問題，不僅空談理論的。

我不爭論共產的是非得失，這個官司，永古秋千打不完；我僅說：在中國當時此地，根本用不着提倡共產，我的理由是：

（一）中國今日是政治革命問題，不是社會革命問題。

中國今日不是社會上有產階級榨取無產階級的問題，乃是政治上土匪式的軍閥和軍閥附產物的政盡財棍，利用政權武力，壓迫或剝削全國有業階級的問題，所以中國今日國民革命的意義，不是外國式有業階級間的鬥爭，乃是全國有業階級對土匪式主權者軍閥的宣戰，這是政治革命不是社會革命，提倡共產者，無論有無赤色，都是提倡社會革命，在今日中國，不是對症下藥的。

（二）中國只有流氓式的資本主義

外國式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運動，是本主義反動的必然結果，中國沒經過產業大革命，生產技術，交通狀況，都尚在極幼稚的時期，兼以國外帝國主義的束縛和剝削，國民經濟，發展

益難，眼前產業制度，離資本主義尚瞭遠。誠然年來國中類似資本家的階級增多，流氓式的公司銀行，各地林立，其實牠們都是仗着軍閥和國外帝國主義的勢力，假冒撞騙，榨取平民，並非經濟組織上有何顛撲不破的實力，像這類虛偽資本主義的制度，只要軍閥打破，政治修明，不難一紙命令，全部鉤銷，用不着費九牛之力，去實行什麼「社會化」的。

眼前中國社會的深憂，實在於外國真正資本主義者——即帝國主義者——的剝削和壓迫，我們當然要舉國一致的和牠們長期奮鬥，這大部份是對外問題，和提倡共產，是沒有關係的。

(三)由人類進化看來，政治革命，皆先於社會革命。

政治革命，歐美革命，皆已經過許多流血而到了民衆最後勝利的時期；他們現時普通選舉，盡量擴張，法律平等，躋於極度，所需求的，只有經濟上的平等，所以他們目前的政治問題，其背影都是社會問題，社會革命，在他們遲早免不掉的，我們中國情形與此正相反，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政治史，由國民看來，只有「興王敗寇」四字；民國虛度十四年，所光復的，不過是排滿興漢的種族革命，像外國式基於市民運動的政治革命，始終還不會實現，這真是中華民國目前迫而待決的大問題。今日黨人，不能立在前線，反對軍閥，促成政治革命，反每借重軍閥的政治勢力，求實現社會革命，就講他們的動機，是真為社會革命，也是南轅北轍，決不能達到目的的。

以上是說明我反對提倡共產的理由，我對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主張，大要如下：

(一)要激進的徹底的實行對軍閥的政治革命，「激進的」不由說明；什麼叫徹底？就是這個革命

的原動力，不要在現存實力上去尋求，要到民間來創造，說來真不容易，然而眼前沒有第二的捷徑，並且實際上也不是不可能，歸結要着社會中堅，有無真正的覺悟，此層我在本報也曾發表過二三篇的社論，這裏不能多說。

(二)我認爲中國今日用不着提倡共產主義——平和的共產主義，無必要，赤色的共產主義，倒有累——，所以我的經濟政策，當然丟不脫社會政策，然而我不主張什麼勞資協調的溫情社會政策，我要求一個激進的社會政策，這不是趨時髦，有我的理由：

(甲)中國眼前經濟制度，雖夠不上說資本主義，然而不能因此便斷定爾後不發生資本主義，我們一面提倡國產，一面要極力防抑因提倡國產因緣而生的資本主義的弊端；我們一面適宜用租稅政策，盡量減削資本家的利潤，一面尊重勞工的人格，和他在經濟上的價值，譬如勞動總契約，八時間條例，利潤均霑，乃至工人參與產業行政制度等激進政策，不妨參酌躡等施行，不要等到工人開口要求而始施與，這却是消弭勞資衝突的最好方法。

(乙)有人說：激進的社會政策，勢必阻礙生產，這要問我們要獎勵生產到什麼程度，要問我們向後是否也學外國一樣，取極端的工商保護政策，我們若知道獎勵生產不過爲消極的抵制外國資本主義，我們若知道國際經濟戰爭爲中國夢想所不着，并且依他過去必然的失敗經驗也值不得去夢想牠。那末，向後中國經濟政策，大部份是對內政策，在不取消利潤範圍之內，不妨犧牲生產，重置分配，況且生產技術，中國尙大有改良的餘地，成本既輕，資本家的利潤，不見得就大減。這便是我主張激

進社會政策的第一理由。

(丙)中國今日雖尚未經歷國內真正資本主義的弊害，然而年來兵連禍結，民不聊生，加以軍閥財棍，利用內亂，魚肉細民，社會貧富，懸隔愈甚，從人道正義看來，不容輕易放過，眼前急要有調劑之方。我主張倣照外國戰爭利得稅辦法，創設一種內亂稅，或為政治上便利起見，美其名曰國難稅——是強制的——，即由『善後會議條例』中所列舉『軍民長官有勳勞於國家』的先生們出來倡率，這並不是共產主義，戰後資本主義，各國已實行過，具體辦法，各國有成例可供參考，機會到時，我把牠逐條譯出，也不憚煩的。

總上所言，我就中國當時此地，主張政治革命，主張激進社會政策，反對溫情的社會政策，我不是共產黨，也不是社會黨，可算是激進共和黨；並且由今日國情看來，認為共產黨社會黨，都用不着，沒有存在意義的。

附言：我的對俄意見，已盡於前文與此文，對於各方賜教的，恕不另覆。

——民報正張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版——

聯蘇聯的理由

陳翰笙

國際間的關係完全是一種利害關係。聯蘇聯如有利或利多於害，我們就聯他。反之，如有害或害多於利，就不聯他。我認現在我們兩國的關係，實在利多而害少；所以覺得不應該閉着眼睛，塞住耳朵，趁着脾氣，仗着文才，專門理論共產黨的性質而忘却國際間事實的利害。我主張聯蘇聯，現在把聯他的理由提綱挈領的來說明。

羅卡諾會議，使德國與蘇聯間不能合作，法國與波蘭間信仰減少；英國利用國際聯盟反能操縱歐洲外交。英國勢力穩固起來，則我國更要橫遭他踐踏了。我國被日本侵掠是大家知道的。日本政策又大半看英，美，俄三國而轉移。美國對我無非口是心非的，假冒爲善的。巴黎和華盛頓兩會議中他受了英法的影響，何曾能赤心的替我們幫忙呢？美使馬慕瑞兩星期前在歐美同學會有關於關稅會議的演說。他說美國政策是善意的，但須看情形說話。美國何嘗有積極的公正的外交呢？我國在國際上地位處處受英，美，日三國的支配，處處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英國對我倡言共管，利用軍閥，實行他財政，鐵路，銀行等惡辣政策。諸君聽見過沒有？不必去讀京津太晤士報；就看本京出版的東方時報今年五月十六登載的一篇大文章（“Foreign Schemes For China's Salvation”）便明白 David Fraser, Sir John Jordan, “Putnam Wcale” 幾位有勢力的人如何想法了。若參考旁人的觀察，去說明這種共管政策，祇須讀前任駐京日使在東京外交時報所發表的言論（轉載於京津太晤士報本年七月十三日）。國際形勢既然如此，我們完全處於孤立的地位。難道不要聯蘇聯嗎？

即不講現時外交局面，蘇聯與我國亦有經濟上聯絡的必要。兩國接壤數千哩，天然是鄰邦。不管

是仇是友，總要相處的。我們長江一帶的茶葉和滿州的豆食，今年銷往蘇聯的生意很興旺。蘇聯的煤油和木材今年運來的亦很多。將來他們的煤油可以和美孚及亞細亞競爭，他們的木材可以和北美洲的在東亞競爭。市場有了競爭我們就可以享受廉價。我國與蘇聯商業如果發達起來，茶市就不至於全受英國的壟斷，大豆出口亦不至聽命於日美兩國。

以上從外交和商業方面說要聯蘇聯的理由。再說可聯的理由。據在蘇聯住過四年新到北京的一位美國新聞家(Dr. Anna L. Strong)，和北京導報的美國主筆辯論(Mr. Clark, Peking Leader)，新到的新聞家以爲蘇聯現時對中國的政策無非是要我國脫離英國的壓制。至於我國政體的如何變換，與聯我政策根本無涉。他說話是根據蘇聯農村圖書館中七八種政府出版的關於外交的書籍。這話不難相信。因爲蘇聯對於英國暴虐的封鎖政策在十年以內還不易忘却。要抵抗且預防英國所以要來聯合中國。況且我國若被英國的共管政策所打倒，蘇聯亦必有唇亡齒寒的痛苦了。蘇聯在外蒙勢力的最近真相，各方面尙未有正確詳細的報告。因此一時不易武斷蘇聯對我政策的如何實施。即使他們對於外蒙有什麼陰謀，我們爲急與抵抗英國起見亦祇可暫時犧牲一部分權利先謀達到解決大局的目的。忍其小而圖其大，方才能成功。所以意大利的加富爾能聯法又能聯德，土耳其的列末爾能聯法又能聯蘇聯。有人以爲蘇聯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有害於我國內政，且足以引起英美日武力的干涉，故雖欲聯蘇聯而不能。這話的錯誤在乎不知國際宣傳是祇可防備而不可禁止的；不知蘇聯自己現在還沒有實行共產；不知蘇聯亦明白我國不能行共產；並且不知蘇聯在我國所宣傳的亦即爲鼓動民氣，造就共和政

府，脫離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還有人以爲我國社會上搗亂的就是共產黨，或共產黨所以能搗亂都是因爲蘇聯的幫助。這話的錯誤在乎不知軍閥的搗亂比任何搗亂要兇險得萬萬倍；不知軍閥的搗亂都是因政客和內外資本家的幫助；不知赤心愛國的志士要和軍閥，政客，和內外資本家拚命的時候，最易得蘇聯的同情且最易傾向於蘇聯。中國共產黨中不能說沒有赤心愛國的志士。他們中間的搗亂分子即使沒有蘇聯的幫助亦未必能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的去幹什麼事業。祇要不給他們搗亂的機會，他們即使得着蘇聯的幫助，亦不容易露頭角了。又怕什麼搗亂的共產黨呢？三百年前歐洲宗教觀念還有勢力的時候，法國居然聯瑞典攻擊西班牙和奧國。那時的天主教國在「宗教戰爭」中竟可聯合耶穌教國去打倒天主教國。現在的共產國何以不可聯合「共產國」去打倒資本侵略國呢？難道法國那時因爲和瑞典親善後來亦沾染着瑞典的宗教嗎？

英國在歐戰中和歐戰後所失去的經濟勢力，一定要藉政治的手段取償於地大物博的中國。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的國家或來共管，或來瓜分，都是我們的仇敵。要抵抗這種仇敵，非但要聯蘇聯，並且可以聯蘇聯。但最緊要的還是靠着勇敢努力的國民革命，組織有生氣有正氣的政府。我們若無良善或適當的政府，則聯蘇聯也要亡國，不聯蘇聯也要亡國。我勸大家多研究實際的利害，少談些理論的廢話罷！

十四，十，二十四，北京。

中國對蘇聯政策應當如何？

陳啓修

序言：自從我那篇『帝國主義有赤色和白色之別嗎？』文章發表之後，意外的在那篇文章的主旨以外發生了關於蘇聯友仇問題的熱烈的討論，我在無人和我討論赤白問題這一點上雖然感覺得不滿意，然而在大家起來討論友仇問題這一點上，覺得中國現在言論界還沒有被黨派的成見完全鋼閉着，總算是不滿意中的一點滿意；因為對蘇聯政策問題，實在是一個『他的解決如何此後至少要影響中國全國政局十年』的問題，對於這樣重大的問題，掉以輕心固不可，默不作聲更不對，所以言論界肯來討論這個問題，不管他的結論如何，對於中國前途總是好的。我在答張笑若先生的文裏，曾說過要做一篇關於此問題的文，發表我的意見並指摘張先生的輕率論斷，現在這一篇文就是履行那個約的。不過現在我只發表關於這問題的我的意見，至於張先生的輕率論斷，我在這裏却恕我不加指摘了，因為與其我加以指摘而被記者在中間勾去幾句話使全文不貫串，不如不加指摘而得倖獲保存全文，反足以傳我的真意。此外關於張先生其他文章以及陳均先生陳翔先生對於我的教訓，也依同樣理由，不作答辯。只有抱朴先生的文章，是對我頭一篇文章做的，純然是一種學理的討論，所以我想藉這段序言，簡單的附帶着答復兩點。第一，關於是否有赤色帝國主義，抱朴先生主張肯定論，但是只據抱朴先生這次的文章（抱朴先生所引的一九二三年的文章，我還沒拜讀過），我實在不能發見肯定論的根據在那裏。在理論上說，抱朴先生既承認帝國主義是財政資本的侵略行為，又承認用政治的手段去侵略他國的，也是帝國主義，已不可解；其次在事實上姑承認抱朴先生的假定說蘇聯雖未達到財政資本主義也可以用政治手段侵略他國，但是何以抱朴先生不把這種政治的侵略，另叫作一個什麼主義，而一定

要叫他爲赤色帝國主義，其結果一方面是跟着蘇聯所敵視的帝國主義者的御用人走，替帝國主義者張目；一方面在中國現在民族覺醒，反帝國主義運動勃盛的時候，替帝國主義者實行他們的移轉目標之計，減輕國民對他們的抵抗力呢？這更不可解。抱朴先生素來愛國，必有更充分的理由，決不會離開愛國的觀點說話，所以我很願虛心請教。第二，在事實上抱朴先生舉的幾個例，也不妥當。布哈林的語就照抱朴先生的原文說，也只是一種赤色革命主義；巴庫和喬治的例是因爲那裏的油礦主人在俄皇時代原是和外國資本勾結壟斷油礦，榨取本地工人羣衆，所以在俄皇倒後工人羣衆一面自己起而革命，一面請求赤俄的幫助，這時赤俄才出而幫助，這也明明只是赤色革命主義；至於蘇俄對華關係各點，假令事實盡如抱朴先生所舉（事實不盡然，見本文後段）也不過是對於中國主權的一種政治的侵犯；何以這些都是蘇聯帝國主義者證據？我不知道把這些不是帝國主義的東西，偏生要說他是帝國主義，到底有什麼好處？而這種說法，很有害處，他是替帝國主義者張目，替帝國主義者實行他們的移轉目標之計，減輕中國國民對他們的抵抗力，在理論上（見上）和事實上（滬案之無結果，是由於帝國主義者移轉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目標於反蘇聯反共產之上，看這兩月來，各新聞上反俄反共產的宣傳，多於反帝國主義者的宣傳者數倍，就狼明白）却是狼明顯的。第三，關於赤色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我原文上，本是說『儘可稱他』，只是一種替反俄論者設想的名詞，我不是反俄論者，所以我並不主張一定非用這個名詞不可，而且原文上還是這名詞和赤色革命主義二者擇一之意，所以我原文的意思只是不可稱他爲赤色帝國主義，免得被真正的帝國主義者所利用，而不是定要主張用那一個名詞去替

代。但我覺得就用這名詞也未嘗不可，因為在事實上俄國人一方面把屬於第三國際的職工國際叫作紅色國際，把的穆斯德坦職工國際叫作黃色職工國際，一方面也嘗把與黃色職工國際有密切關係的第二國際叫作黃色國際。黃色國際，就是黃色國際共產黨之略字，黃色二字是表示他們主張的所謂革命手段是妥協的，改良的。第二國際既可稱為黃色國際共產主義，則主張激烈的革命手段的第三國際稱為赤色共產主義，有何不可？而且世人一般所謂赤化赤軍，並不是因為他用的是紅色，才用赤為形容詞，而實指他繼承馬克司當時的激進的共產革命的精神，則把第三國際共產主義的全體，拿這精神作表徵，呼他為赤色共產主義，以與黃色的第二國際區別，更有何不可？

一

中國對蘇聯政策如何問題是中國全國國民不能不慎重考慮的問題，因為蘇聯事實上已經成為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運動一個中心，不但他的潛勢力已竄入一切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中間，而且蔓延於各大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中間了（注意！英國共產黨去年正式成立，日本新成的無產階級政黨也是屬於第三國際的），因為中國地大物博，不但被帝國主義者在繼續他的繁榮上，看得很重要，而且被反帝國主義者方面在斷絕帝國主義者的後援上也看得很重要；因為在現在世界上的一面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心的蘇聯有極長的陸地交界，一面和世界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日英法有陸地的交界，和美國有一晝夜兵艦距離的水上交界的國家，除中國外沒有第二個，所以帝國主義者與反帝國主義者間的鬥爭必會把中國牽入漩渦；因為中國數十年來外交上的被動性漸有變為主動性的可能，外交上的無政策漸有變

爲有政策的可能，所以中國現在若自動的有計畫的加入帝國主義及反帝國主義的任何一方面，則所加入的方面戰勝時中國必一躍而爲強國，失敗時必會把現在的這樣不自主不獨立的局面，亦將失去而夷爲真正的屬國，因爲中國若仍採外交上被動及無政策的方針，其結果也只有苟延歲月等到全中國成爲第二的世界大戰的戰場之後再靜候戰勝者宰割，所以不能不有一個主動的政策。中國對蘇聯政策問題，既如此重要，所以應該給全國國民都有充分自由討論的機會。拿親俄和共產以及其他拿盧布的盟友種種不堪的名詞，去威嚇那些主張親俄的潔身自好的智識分子禁止他們發言，及拿反革命，軍閥走狗和帝國主義者走狗等等難受的名詞，去辱罵與實際政治有關的學者及政論家，使他們索性使氣站在反革命方面——這二者都是不應當的，都是不察現在世界大勢和中國在國際上的特殊情形的，都不是真正愛國的。真正愛國的必須自己鄭重的研究，虛心的容納別人的討論，如此才能夠下一個面面俱到的觀察，在複雜矛盾的事象中求出切合需要的結論。

二

這樣重要的對蘇聯政策問題，應當如何研究呢？關於這一點，我曾在現代評論一篇文章中說過，這裏把其中關於這一點的重要的一段，照錄於左：

『對蘇聯政策是國際上的外交政策，所以第一應當研究的就是國際政治形勢，政策的決定要看這形勢如何，英國在法國用武力佔據羅爾法國的勢力席捲歐大陸的時候，首先和蘇聯恢復外交關係；德國在道威斯計畫決定，英美勢力傾軋歐洲的時候，反而承認蘇聯，都是一些好例。』

第二當看本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例如日本對美國，十年以來，無論國際政治形勢如何，總是處於被美國威嚇的地位，所以爲收買重油以供兵艦之用和鞏固背後大陸方面的接濟起見，不得不與蘇俄修好。第三要看本國經濟情狀。例如英國一方面需要蘇聯廉價的食糧，一面想向工業不發達的俄國，輸出工業品；日本一面需要俄國的煤油和木材，一面要把自己不大精緻的工業品消到文化程度比中國還低的西伯利亞去；所以英日兩國不得不拉攏蘇聯（自然是說的二三年前英國）。第四，才講到對手國的政治情狀，看對手國政治是否安定，他的政治上的主義是否於我有碍。以上四點是研究對蘇聯政策時通通要顧到的，對蘇聯政策的決定，要看在這四種觀點上利害的多少，因爲外交政策原是以利害爲標準，說不上什麼利害二字以外的好感或惡感的。」

上面四個標準，自然是假定一國與我尚無任何外交的關係而言的。若是這國與我已有了外交的關係，那麼，自然還要加一個標準，就是：要看這一國在外交關係上對我的態度如何，是親善的抑是侵略的，這一層當然也很要緊，因爲關於這一層的結果如何，足以推斷依其他各標準所得的結論。以下依這五種標準，看一看中國對蘇聯政策應當如何決定。

此外還應說明的，就是那些說什麼『先修內政而後講外交』，『物必自強而後蟲生』，『只說自立，切忌與外人合作』種種根本上否認外交政策的話。說這種話的人只是一個獨善其身的唯我主義的人，這些話只是表現他不但弄不明白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例如中國這樣的國家裏面，原則上內政就是外交，除了

外交就沒有內政（因為在那裏內政直接受外交的支配）的特別的政治原理，而且連現今國際政治上的聯合性（即帝國主義方面必要來壓迫，反帝國主義必要來拉攏，不能閉關自守），國際經濟之帶有世界性，甚至連社會存在的原理，爲人處世的大道，等等，都不清楚。他這樣的說法，當然是最錯不過的。

三

現在國際政治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對壘的形勢，蘇聯是反帝國主義方面的中心，聯俄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方面，在第一段已經說過。中國事實上被帝國主義者壓迫了八十餘年，國民及國家生活一天比一天下落，直到現在二者都被他們束縛着，不能發展的地位，所以我們從原則上說，當然應在反帝國主義一方（那些主張獨立打倒帝國主義，不與任何人聯合作戰的，雖然說爲高潔，實在是表示他們的怯懦，這不過等於『等着罷！十年之後，再和你相見』罷了）。不過還要慮到的，是：在加入反帝國主義方面後，萬一此方面被帝國主義者打敗了，其時中國所受的損失如何一點。假如失敗時損失太大，而成功時所得不多，利害相差甚遠，則上面的原則，當然可以變動。很明顯的，在這一點上說，我們所得的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而我們所失的不過現在帝國主義者束縛我們的這付鎖鍊，（比這鎖鍊還利害幾倍的鎖鍊，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所以我們是失敗時損失小，而成功時利益大，所以我們仍從原則上在國際政治形勢的標準上主張聯俄。

四

中國現在國際地位，對德俄是平等的，對英日美法等是被壓迫而不平等的。以不平等對我的國家中尤以英日為最利害，因為他們對中國國民的經濟剝削程度比較高深，所以他們主張維持對中國的束縛，也較固執。而對於英日利害衝突而又因經濟交往，邊境連接有制英日死命之可能的國家，在以平等對我的國中，只有蘇聯。美國雖與英日利害衝突，而與英日沒有陸地交界，而且他是財政資本的國家，與中國的獨立自主，在利益上根本衝突，所以雖與英日不然而對於中國，實際上總是和英日取同一步調（他口裏說的雖與英日不同）。所以在中國的國際地位上，不想掙扎起來，自謀解放，主動的拿定外交政策和敵人周旋則已，若是想，則在國際地位這一點上觀察，除在後方陸上聯絡蘇俄，前面海上或沿江沿海抵抗帝國主義一策外，更無可能的外交政策。而自謀解放，又是凡中國人都應該贊成的，所以在中國國際地位上說我們應該聯俄。

五

在中國經濟地位上的觀察如何？中國對俄可以輸出的，是茶（從來俄國是中國茶的大消場），對於西伯利亞需要的粗裝工藝品，和農人。前二者是使中國幼稚的產業向外發展之唯一機會，後一件更是現在美奧非洲及日本禁止華人移住，其他地方雖不禁止而事實上不能移住的時候，解決中國北部東部過剩人口之唯一辦法（日人最近和蘇聯定約移九萬農民開墾西伯利亞，已着先鞭）。中國可由俄國獲得的是木材和廉價的煤油，這也是中國隨產業之發展最需要而又最缺乏的東西，在現在美國木材及英美煤油壟斷中國市場的時候，俄國貨是唯一的替代品。由輸入和輸出兩方面說來，和俄國修好通商，

在中國經濟地位上說在原則上當然有很大的利益。而且俄國是曾經放棄特權，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的，所以更不怕他用不平等的通商條約，只行利於他而不利於我的通商行為，所以我們不應該放着經濟發展上一條可走的路不走，而偏要走向被帝國主義者吸膏吮脂不到全身組織停止進行的時候不止的牛角路上去。所以從經濟地位的觀點上，我們應該聯俄。

六

從對手國的政治情況說，問題更簡單。第一，關於蘇聯政治安定與否一點，只要不聽俄白黨的宣傳和中國人限於莫斯科市中的見識和眼光不離鐵路沿線景況（注意！俄國鐵路史明白告訴我們俄國鐵路計畫是沙皇的軍事計畫，所以鐵路經過地不必是經濟發達地）的人的一偏的印象，只要知道俄國大多數人民的工人和農人，在農工聯合專政的名義之下，是贊成俄國共產黨專政的，只要知道在這種專政的下面俄國一般經濟生活是向上的，社會狀況是日趨安定的，只要知道日法英意之承認俄國不是盲目的或知其政府不安而猶麻煩的和他結約的，那末，誰也不能說我們聯俄是徒勞，我們和俄國親善是和將死的人結契約。關於政治上的主義是否於我有碍這一點，我們更用不着白操心，因為與蘇聯立於正反對地位，猶是封建政治的日本和法西斯諦的意大利，尚且和他交好，何況我們是共和國；因為我們連主張帝制復辟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尚且大度包容，何況國外的什麼主義，我們若怕他，則日本的現例具在，也不怕沒有辦法。所以在蘇聯現狀上說，我們聯俄，是可以的，不是無益或有何等大害的。

其次是從俄國對我的態度即看他在對我的關係上是仇是友，去決定我們是否可以根據以上從各點討論的結果，實行聯俄政策。這個問題比較瑣碎，現在一般人所謂友仇問題大概都傾重這一點，所以應該詳細的討論一番。首先應該注意的，就是把俄國這幾年來對於中國政治的功過，討論一回，其次應該把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功過討論一回，再次才把俄國的功過和帝國主義者的功過比較比較以決定到底俄國比較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是仇是友。

俄國對於中國的功，有沒有？若有，那是些什麼？有無問題，誰也不能作否定的答復，因為一則事實具在，二則現在主張俄國的罪惡甚於帝國主義者的張奚若先生都還承認。『蘇俄最大的功勞在作我們外交上的與國，』所以我這裏不必詞費了。俄國的功是什麼？我以為有兩點：

（一）在外交上幫我 帮我的事實有二：一是放棄領事裁判權及其他不平等條約，——這是一個事實，無人能夠否認。但有人說俄國即不放棄，他也未必尙能強我繼續履行不平等條約；關於這一點，根本前提就是一個假定，辯論也是無益，所以我不辯論，但就這事實本身說，不管是俄國取巧不是，他是不是在一切對中國享受不平等的權利的國家中，首先承認中國為平等的國家的第一個呢？這種承認，是不是產生中國主動的外交的一個動力呢？這誰也不能否認罷。一是視中國為頭等國，交換大使，這件事不管他是否是要以此沽買中國國民的歡心，總之，不能說這是降落中國的國際地位的事罷！

(二)在內政上提醒中國民族的自尊心 這當然與上條所舉事實有關；因為有取消不平等條約和交換大使的事實所以中國國民尤其是青年的民族自覺心大受刺激，一時忽焉勃盛起來，所以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及與此類似的口號，二三年來，遂瀰漫於全國。這個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罷！若謂這種民族自覺與俄國的放棄特權和交換大使無關，是自然發生的，則請看自戊戌改變以來約三十年間何以並不發生此種運動。

俄國對於中國的過是什麼？關於這一點最好把反俄論者所舉的，條舉出來加以考慮。

(一)俄在內政上搗亂 反俄論者所舉的事實有二：一是德恩孫中山行國民革命，二是天安門前北京學聯分裂時，俄國幫助社會上惡劣分子驅逐良好分子。孫中山的革命主義，是不是俄人唆使他的，這只看孫中山一生革命的實跡，便有事實證明其非，不必多說；至把孫中山都認為搗亂分子，這真是別有心腸，也用不着說。天安門的事明明是對英和兼對英日問題的策略之爭，不知何以說便是社會惡劣分子與良好分子之爭，不知社會上的賣國賊軍閥官僚政客是良好分子抑是惡劣分子，更不知俄人操縱這種鬥爭有無證據？以上二事，都不足據，所以在內政上這條罪我想難下判決。

(二)俄佔蒙古 關於這一點，我們用不着像江紹原先生一樣，討論蒙古應否有一半自主權，我們只看俄人是不是還佔據蒙古，及俄人何以那些派兵入蒙古。蒙古現在還有俄兵嗎？在中俄協定上中國已經沒有對蒙古的宗主嗎？事實上告我們對於前者的答案是否定，對於後者是肯定。俄政府派兵入蒙是為攻打恩琴，那時的蒙古，已經宣言自主，不受中國統治，而中國實際上亦棄置不顧。俄兵在這種

狀況下入蒙古去攻打欲以蒙古爲根據地的白黨是侵略中國抑是自衛，只要看後來中俄協定俄人承認中國宗主權及自動的撤兵，便明白了。

(三)運軍火助廣東國民政府 在孫中山尙且被認爲搗亂者的反俄論者眼中，幫助國民政府，當然就是幫助搗亂，所以這裏用不着像張榮福先生那樣去辯論幫助槍械的目的是爲革命不是。就認爲是一種過。

(四)設立俄蒙銀行 這個事實，現在我不清楚，就假定有這樣一個銀行，不算得是一個過，因爲國際間設立銀行是常事，只有這個銀行享有條約上的特權的時候，才算得一個侵略機關。若僅設一個銀行，就說經濟侵略，這是羅織罪名。

(五)文化侵略 所舉的事實是拿盧布收買中國人良心和愚弄學者和青年。前一件事實不知有什麼直接或間接的證據？沒有證據而憑空拿被收買的惡名，去誣愛國運動上意見不同者，——這才真足以發生良心是否被收買的問題！愚弄學者和青年，更其縹緲無憑了；所謂愚弄，我反覆尋繹排俄論者的文章大概是指俄國教唆『中國須先打倒帝國主義者才有內政可言』的理論。但是這種教唆若成爲愚弄，必定這個理論是錯的，才說得上。可惜排俄論者並不能在理論上證明這是錯的或指出除這理論之外，還有其他的路可走！

(六)替中國多鬧亂子 所舉的事實，是滬案粵案。滬案是爲紗廠罷工而起的，粵案是爲援助滬案而起的，——這比什麼都明顯。而一定要舉英人嫁禍於俄的口吻，把幾個月來智識階級爲愛國費去的

心血，商人所捐助的汗血，工人所流的熱血種種崇高的可敬的東西，都看做受俄指使而用了去的，這不知道有什麼證據，是一種什麼心理？

(七)佔據中東路 中東路中俄共同管理這不是據中俄協定而來的嗎？何以便是佔據？

(八)牽引中國入世界戰爭漩渦 中國因地理的關係勢不能不牽入世界戰爭漩渦，斷不是依中國的力量而可阻止的，也不是因蘇聯而始牽入的，已見前段。所以不成罪名。

(九)俄人在廣東做官 外人做事務官，是各國皆有的，唯外人做政務官，始可以說是失國體，傷損國權。但俄人在廣東做官的真相，到底是事務官或政務官呢？以我所知，什麼外交總長總司令，都是假的，事實上只是一個高等顧問。而且俄人到中國做官，不必就是俄國的意思和罪過，只看魯軍中有俄兵及官二旅，便是明証。

(十)宣傳共產 中俄協定上是禁止宣傳共產的，中國對於共產宣傳，儘可根據條約極力禁止。假如抓住俄人宣傳證據，自可指為俄人罪惡，若無證據，便是羅織。工人運動原是一國產業時必生的現象，不必要俄人宣傳，試看俄國未成立以前，各國共產主義的團體，已存立好幾十年了。

(十一)延宕會議，擅捕華人，苛稅華人等等 縱令確有實據，也不是一個斷絕國交的理由，何況尙是捕風捉影之談。至於擅捕中國使館員，這全出於李家鏊之昏憤，令正式的公使館員在外從事反帝國主義運動，致令館員受刑事嫌疑而又不明國際慣例，授俄人以口實，竟至捕及館員。排俄論者若就此事立論，更無根據；只消向中國外交部探問何以中國不繼續抗議，便知此事值不得討論。

以上十一條中只有第三條勉強是罪狀。

次看帝國主義者的功過。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當然無功可言，至於他們的過，則至少應有左六條。這些條項都是大家周知的我沒有加說明的必要。

- (一) 侵奪土地 已全奪的香港朝鮮台灣安南緬甸等及未全奪的遼東半島西藏東蒙。
- (二) 經濟的搾取 外債路權貿易內地工業等等。
- (三) 不平等條約的束縛 如關稅條約治外法權等。
- (四) 文化的侵略 如教會學校醫院。
- (五) 操縱內亂 如用借款賣械的方法幫助內亂。
- (六) 干涉內政 如交民巷的太上政府的舉動。

總結起來，在蘇聯對我態度一點上，功二過一所以蘇俄還是可聯。若把蘇聯對我的態度和帝國主義者對我的態度相較，則前者功二過一，後者無功而有六過，所以無論如何，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危害，比蘇聯大得多。

七

全體總結起來，從國際政治狀況，本國在國際上之地位，中國經濟地位，蘇聯情狀，及蘇聯對我態度各點說來，我們對於蘇聯，都應該取友善政策。假如為慎重計，一時還不敢取友善政策，也只應該取一個不即不離的非敵非友的態度。若認蘇聯為比帝國主義者還大的敵人，或同樣的敵人，那是從外交政策的決定原則上的無論那一個標準看，也是說不通的。

赤俄與反帝國主義

——答陳啓修先生——

抱朴

我讀了『中國對蘇聯政策應當如何？』一文後，深佩陳啓修先生的研究態度。我自己是俄國問題的研究者，很願與一般人平心靜氣的討論。所以自莫斯科回來以後，就與人討論『赤色帝國主義的有無』，可惜當時高君宇先生不願答覆，他口頭告訴別人說，各人的觀察點不同，儘可不必加以討論。其次如我友蔣光赤等，僅罵我替赤俄造謠，但對於我的報告，却毫無事實上的指摘。

我現在不但每天須做工十三小時，並且已患了一些貧血病，所以上次的論文比較的簡單。不過陳啓修先生既願意虛心討論，我的朋友又來信囑我，無論如何應繼續加入戰團，所以我不得不抱病再與陳先生談談。

我不但希望陳先生答覆我下面的討論，並希望對於我的著作，如赤俄遊記，俄國革命論叢，俄國革命之失敗三書，與我在民鐘，自由人上所做的論文，給我一個詳細的批評。此外我友蒂甘對陳先生的蘇俄實地考察，已做了一萬字的批評，大概不久可在學燈上載出，也希望陳先生不要『默不作聲』，因為陳先生自認這個問題，與中國前途有重要的關係。

一

我以為要使討論的問題，能針鋒相對而不越出範圍，須互相明了對方的立腳點。這次陳先生否認赤色帝國主義，雖口口聲聲不離『愛國』兩字，但實際他看俄國的利益，已較重於『中華民國』！例如他說滬案失敗時，反痛惜反俄宣傳較前激烈。所以他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的名詞，也因害怕各國移轉目標，使赤俄的外交政策失敗。

陳先生說赤俄是反帝國主義的中心，假定中國人要反對帝國主義，幹愛國主義的運動時，先須把赤俄當作第二祖國。所以他心目中的主動的外交政策，也是除聯俄外別無他法！

我自己不是國家主義者，所以承陳先生稱我素來愛國，不但我個人覺得肉麻，實在也有些不敢自信。不過我同時應該聲明，我不想把中國捐出去拍賣，也沒有賣國的能力與勇氣！

二

與這個重要問題有聯帶關係的，就是所謂『親俄』與『排俄』的界限。有許多列甯黨員，把反對列寧主義的人，稱做俄羅斯的敵人。其實這種宣傳上的用語，分明想造成民族間的仇視吧了。

陳先生是一位學者，但不知爲甚這樣含糊，把列寧的信徒與俄國人，故意混爲一談。他說：『俄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工人和農人，在農工聯合專政的名義之下，是贊成俄國共產黨專政的。』我不知這樣的空洞話，有無事實方面的證實。我們要研究一國的政治，並不是隨便拉一個某國人，問他對於本國政治是否滿意。我在克朗士達脫暴動一文中，曾說明俄國工農反對列寧黨的統治。

我根本上反對列寧主義，尤其仇視政黨專政；但同時我酷愛俄羅斯人，我對於俄羅斯人的愛和平，毫不輕視異國人的態度，不但使我終身不能忘記，並且使我不能不與他們合作。

三

關於赤俄帝國主義的有無，陳先生以爲即使俄國有政治侵略，也不應該反對他，把他稱做帝國主義，因爲這樣便使其他帝國主義轉移目標，未免有碍俄國列寧黨的外交政策。所以陳先生說愛國的中

國人，應當換一種觀察點來說。不過我在前面已聲明過，我不是狹義的愛國主義者，更不願列寧黨的利益，現在我祇從學理上去研究，赤俄究有無帝國主義的色彩。

陳先生說，我既承認帝國主義是財政資本主義的侵略行為，便不應把政治的侵略行為，也稱做什麼帝國主義。但請問實行財政資本主義侵略時，就沒有聯帶的政治侵略或文化侵略嗎？現在列寧黨與國民黨的口號，如所謂取消不平等條約，難道不是反對財政資本的政治侵略嗎？其實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是何等的相聯與密切！假定一國在政治上被他國侵略時，經濟上總要受相當的損失！

並且在他方面說，經濟學上定義的分界，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假定財政資本主義的成熟時期，我們把他稱做帝國主義，但這種主義的進行過程中，我們又應怎樣稱呼他呢？我們是否可以於陳先生或其他學者，尚未想出一個妥當名詞以前，暫時把他叫帝國主義？

其實帝國主義就是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列寧曾稱他是資本主義的最後行程。所以國家資本主義的赤俄，當然免不了帝國主義的色彩。特別是俄皇治下的弱小民族，現在仍受列寧黨的統治，他們在經濟上比較落後，所以把原料供給俄國，忍受莫斯科政府的剝削，難道這還不是帝國主義嗎？不過我記得布哈林說，赤俄政府是為工農謀利益，所以算不得經濟侵略！

四

我們要知道赤俄的帝國主義，須先研究列寧黨治下的喬其亞。因為有許多列寧主義說，有些弱小民族的文化太低，還談不到什麼獨立。但是喬其亞民族却不然，他們有單獨的文字，有極高的文化程

度。他們也與高麗印度一樣，歷來被治於他國政府，完全是政治與外交的失敗，而不是該民族的文化太低。

陳先生解釋喬其亞被併的經過，很有些獨到的見解。他說喬其亞被赤俄併吞時，因喬其亞工人自己起而革命，一面請求赤俄的幫忙，這時赤俄才出而幫助。其實他這裏所指的喬其亞工人，却是所謂『工人代表』（？）的列寧黨，所以假定喬其亞列寧黨有這樣的請求，大概便不算是被侵略了！

關於喬其亞被壓迫的真相，英國職工代表的報告書中，却有一些很好的紀錄。大家知道英國職工代表，對於赤俄是表同情的。他們因想打倒自己的政敵，特別故意到俄國去遊歷，回來後就印了一本巨著，替赤俄吹了許多牛，但他們於二〇八頁至二一七頁間，也承認一九二四年九月的喬其亞暴動，是大多數民衆的革命運動！

五

關於赤色共產主義與赤色革命主義，陳先生自謂是替『反俄論』（指反列寧主義者）設想的名詞。其實反俄論者也有腦筋，何用陳先生這樣勞心！試問反帝國主義的名詞，難道也要帝國主義者告訴嗎？什麼黃色國際與妥協主義者，難道本人也肯自認嗎？

陳先生說赤色共產主義的名詞，是根據他接近的『俄國人』（列寧主義者）！陳先生說第二國際，可以叫做黃色國際共產主義，我認這種名詞真有些狗屁不通。第二國際向不提倡共產主義，他們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

陳先生要知道共產主義的名詞，請他再回莫斯科去念書。因為布爾雪維克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但他們改稱共產主義的名詞，還不過六七年功夫！布黨自說共產主義的名詞，是根據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豈知馬克思與昂格思在一八七二年共產黨宣言的再版序言中說，那本書有的地方已陳腐了！

其實最初用共產主義名詞的，要推無政府共產黨人。他們在一九〇七年以前出版的書，已大書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字樣，至於布爾雪維克却用『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的名詞，括弧內還寫着『布爾雪維克。』陳先生要不信，請查一九一八年以前出版的俄文書！

至於布爾雪維克是否是共產主義者，我在馬克思主義批評的一文中，已從學理上去否認他。可惜這篇文字在晨報擱了一年，至今還沒發表出來。

六

赤俄的對華的態度，究是否帝國主義？我本不想多說話，因為我是國際主義者。如多替中國人說話，未免帶些民族的偏見。何況將來中國共產黨拍一通電，說中國工人願意歸附赤俄，那末我又是罪該萬死！

不過陳先生既稱我愛國，似乎對這個問題也不能沈默。我說俄國對於中國的外交上，縱然口頭上援助中國，但仍未脫帝國主義的色彩。赤俄對華放棄了若干權利？我說絕對沒有！陳先生自己也說，德俄條約都是平等的。難道德國還比俄國和善，願意來幫助弱小的中國嗎？

我想德國才是和善的國家，他對我們沒有什麼要求。至於赤俄却把已宣言歸還的中東路，又隨便

的抵賴了！他們或者還要說，怕中國人不能辦鐵路，所以共同管理呢！

俄蒙銀行已否發紙幣，我尚未得到確實的報告。不過加拉罕歸國時，曾對哈埠記者說，東省當局禁止俄國紙幣，將引起俄國方面的抗議。陳先生要是不信，請讀哈埠赤色的新生活報。（見九月一日）

七

最後，所謂中國的『主動外交政策』祇有聯絡赤俄政府嗎？不然中國便做他國的殖民地嗎？我以為解決這個問題，純以空間與時間而定。因為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中，應利用各國的利害衝突處，設法去找自己的地位。假定有某種必要時，也可單獨反對某一國家，逼迫他不得不讓步。或者甚至聯絡某帝國，去反對其他帝國主義的國家。

現在中國在外交上聯絡赤俄與否，似乎還是無關重要問題。赤俄政府正想與各國妥協，借外債振興農工業。如親俄派能夠担保，赤俄將來借到外債時，還能在經濟上援助中國。則我們自不妨替赤俄政府，在外交上搖旗吶喊的幹一下！不然我們又何必替人家奔走呢？

至於中國向俄運銷茶葉，得到赤俄的木材與煤油，我想不在外交上聯俄，也可得到相同的目的。所以我的結論，現在沒有聯俄的必要。

對俄問題致勉已書

錢端升

勉已兄：

一五八

我正想做一篇文章，討論立憲政體和代議制的真精神，順便要問問這幾個月裏惹得一般「有功世道」的「士林」大驚小怪的科道制，值得不值得我們的採擇。這篇文章要是做得起來，我想把他就教於你，並且搪塞我欠『社會』的債。你現在又催我發表對俄意見，那末我祇得改換題目。你們討論蘇聯的問題，煞是有趣，我有時也忍不住技癢，想湊幾句話；我所以不敢率爾說話，是因為研究蘇聯的事情，實在太不容易了。有的人說，蘇聯共產政策已經完全失敗，國家資本主義亦未見成功；別的人說，國家資本主義施行得狠美滿，農工生產日有進步，快要追及歐戰前的生產率，元氣恢復後，又可實行共產：要從這兩個自相矛盾的說法中求真相，真有如墮五里霧中的狀概。而且他們都不是隨意造謠的，他們都拿得出統計來折服人；可是連這種統計也靠不住。蘇聯的人當然說反蘇聯派的統計是捏造的，反蘇聯的人也說蘇聯公家的統計是掩飾的；如我這樣的人連俄國字一個都不識，什麼統計的準確不能算對，怎樣還能在統計雲霧裏辨是非，認路徑呢？前三天我還偶然在巴黎「兩世界雜誌」中，讀了伯爵考考夫卓夫論蘇聯七年來工業財政狀況的兩篇文章，內容是說蘇聯工業衰頹無起色，財政紊亂無救濟；我敢說他所說的定是不準確，或是他的事實不符，或是他的解釋差了；如果他所說的是不差，那末蘇聯決不能有七年的命運，蘇聯政府也決不能一天一天的鞏固起來；而且這位伯爵大概是亡命在巴黎的一個白黨，他說的話要得打折扣；可是他要反問我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他的話是差的，那我就瞠目不能對了。還有，我們要討論我國對蘇聯的政策時，必得要問蘇聯搗亂我們的內政到底有沒

有，要是有的，倒底是怎麼會事，我恐怕連最恨這種搗亂的幾位先生，也說不出真正的證據來罷。這一次滬案發生，英日方面的人多說蘇俄預先化了七萬塊錢，上海大學得了不少；以後六國調查委員在上海，就把這一點特別留神；聽說他們居然得了些關於蘇聯用錢鼓動學生的證據；可是調查團的報告至今沒有宣布，證據有沒有不得而知，真假更不必論了。以上兩種困難，——第二，關於蘇聯國計民生準確的事實，不容易知道；第二，不能明瞭蘇聯在中國搗亂的狀況，——假使有的，——把我的討論蘇聯問題的熱忱冷淡了許多。況且還有第三個困難，——這一點與蘇聯問題的本身無關，——因為許多我要說的話，已經被你和陳啓修陳翰笙兩先生說過。但是你現在既然要我發表意見，那我就不敢緘默，祇要我能夠把上邊說過的兩種困難放在心上，不裝出百曉的樣子來，我就可以對得起自己，對得起人家了。

我要說的話可分兩層講：（一）帝國主義有沒有赤白的分別？（二）對蘇聯的政策應怎樣？

一 帝國主義有沒有赤白的分別？

這是陳啓修先生第一篇文章研究的題目，因了那篇文章引起了副刊上許多別的文章；他因為沒有人同他討論這個赤白問題，感覺得不滿意，我也替他叫冤；他那篇文章，你已經說過，是一篇學理上的文章，人家非但沒有好好地從學理上同他辯論，反把他罵了一頓，治了一個莫須有的煽惑民衆的罪名。我要把這個赤白問題說一點，夠得上夠不上學理上的討論，我就不敢說了。

原來陳先生那篇文章實在玲瓏：他先把（甲）帝國主義這個名字嵌了財政資本進去，又說（乙）蘇

聯是沒有財政資本嫌疑的國家，又把（丙）蘇聯（沒有財政資本的蘇聯）去代表赤色的國家。這樣說法，赤色的國家當然不會發生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當然祇能在有財政資本的白色國家生存，也當然不能夠有赤白的分別了。這是何等簡易！這是何等合他的邏輯！

陳先生的結論實在是蘇聯沒有帝國主義的可能。欲問這個結論對不對，先要問陳先生所說的（甲）（乙）兩點對不對。他的（丙）點無關緊要，我先把他說一說。赤白與左右的意義是一樣的，都是比較的，都不是固定的。英國的工黨，從英國保守黨眼光看起來，固然是赤，但從蘇聯的眼光看起來，狠是白的。用赤白來標黨見，照我所知，肇始於百餘年前波蘭的黨爭，（那一年我忘了，在亡國以前，或在亡國以後，我也記不得清楚了。）當時憂國的波蘭人，都要想改良波蘭的內政，恢復波蘭的自由；但是他們分爲兩派；一派取漸進，不激烈，不革命；一派取急進，又激烈，又革命；前者尚白，後者尚赤；這是赤白取得特別意義的初次。以後一八四八和一八七〇年，巴黎社會黨起事的時候，也用赤幟，赤色就變成社會黨共產黨的黨色。如今蘇聯差不多如漢朝一樣，國徽用赤色，軍服上也有赤標記，有時連簽名也用赤墨水，赤色更成了蘇聯式激進派的特別標記了。但是我始終以赤白爲比較的名辭，譽人家爲赤爲白，或毀人家爲赤爲白，並沒有永久的意義，所以我還是少問赤白，單討論（甲）（乙）兩點罷。

（甲），陳先生帝國主義的定義，我不敢贊同。他自己在他第一篇文裏說過，（他是引宰葉的說，）帝國主義有哲學的，政治的，經濟的三個不同的意義。哲學的帝國主義，——這就是海格爾那

班大日耳曼民族主義者所提倡的，——流行不廣，歷史上也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要用到那個意義的時候，若要人家不誤會，不能簡稱帝國主義，應當加上說明纔好。

政治的帝國主義有狠長的歷史。帝國主義這個字當然是從帝國這個字推演出來。自羅馬帝國起，迄一八〇六年神聖羅馬帝國的廢除爲止，西方人心目中的帝國，與我國人的天下差不多含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義；皇帝也帶一種「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氣概。這種態度並不是夜郎自大的表演，羅馬帝國的時候，歐洲人祇知道有一個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在當時歐洲人眼目中，也是唯一的帝國；中古時代政治家的最高志意，就是把全世界都耶教化，成一耶教世界，統歸神聖羅馬帝治下；神聖的意義是脫不了耶教的。一八〇六年拿破崙稱帝號以前，西方祇有一個帝國，一個皇帝，這也很可以見得帝國這個字的高貴；所以帝國主義的最大原素，從歷史上說起來，是包含許多疆土和民族，（以全世界爲目標。）神聖羅馬帝國縱然亡了，帝國主義卻不偕亡；經濟的帝國主義未流行以前，大家所知道的帝國主義，完全是政治的意義。

陳先生說過，經濟的帝國主義是一八八一年纔發生的。因為要把這新起來的帝國主義，和向來通行的那個帝國主義分別起來，有人就起了近代帝國主義這個名字。我可以說十數年以前，沒有帽子的帝國主義，還是指向來通行的那個帝國主義；若是要把經濟侵略的意義說明白，必特要加上一個「近代」或「經濟的」帽子，不能單稱帝國主義。近十數年來，近代帝國主義一天的流行一天，於是有的人逐漸地把「近代」或「經濟的」帽子除了下來，簡單稱他帝國主義，有是反把向來通行的帝國主義

加上了「一個『政治的』帽子，這真是喧賓奪主哩。爲免除含混起見，我並不主張簡稱向來通行的帝國主義，不帶上一個相當的帽子；可是我實在不能贊成陳先生那種說法，把政治的帝國主義擯出於帝國主義範圍外邊，（陳先生說：「……假定說蘇聯雖未達到財政資本主義也可以用政治手段侵略他國，但是何以抱朴先生不把這種政治的侵略，另叫作一個什麼主義，而一定叫他爲赤色帝國主義。」）而認定惟有近代帝國主義可以有被稱帝國主義的專利權。因爲向來通行的帝國主義，並不因近代帝國主義是經濟的，資本的，而失去用這個名義的權。況且政治的帝國主義，並不是死東西。美國併了菲列濱羣島後，美國人分爲兩派；一派是帝國主義者，贊成佔有菲島；還有一派是反帝國主義者，反對佔有菲島；美國起初在菲列濱的侵略，政治的性質居多，但是我們有什麼法叫美國不用帝國主義這個名字呢？總之，我們決不能因爲現代通行的帝國主義是經濟的，資本的，而就不許人家稱政治的帝國主義爲帝國主義。

（乙）共產國家是不會有資本侵略的可能，就不會有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可能，這是我可以相信陳先生的。不過共產國家是否可以有政治侵略，是又一個問題。我以爲真正的共產主義最後結果總是國際的。但是在達到國際主義以前，爲自衛起見，爲減少資本國家的搗亂起見，有政治侵略的可能。假使蘇聯爲真正共產國家，波蘭爲代表資本主義的國家，那末，波蘭一定想破壞蘇聯，蘇聯力量夠得到時，也必定實行政治的侵略，把波蘭壓迫起來。在這個狀況之下，政治的侵略，亦即帝國主義，是完全可能的。那末政治的帝國主義在白色國家可以生存，在蘇聯那種赤色國家未嘗不可生存，所以也可

以有赤有白了。

退一步說，假定我們如陳先生一樣說法，專把經濟的帝國主義當作正派帝國主義，那末，蘇聯是
否有帝國主義的可能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我們祇消問一問蘇聯到底是否共產，要是共產，那末就沒有帝國主義的可能；要是不共產，那末問題又多了。據陳先生的意思，蘇聯雖則不是共產，但是也沒有財政資本，所以就不能有帝國主義。蘇聯有沒有財政資本，我的研究不夠，不敢肯定說。但是我以為有沒有財政資本，對於我們問題，並沒有多大關係。蘇聯既不是共產，就有經濟侵略的可能。蘇聯現行的經濟制度是國家資本主義，不是共產，利益觀念並未完全消除；以廉價購進缺乏的原料，以重價銷售多餘的製造品的手段，也不能免；所以有時也不能不留意國外原料供給的地方，和商品的銷路，經濟侵略完全可能。帝國主義也完全可能。

我的結論是：（一）帝國主義不限定是經濟的，（二）共產主義與政治的帝國主義不是不相容的，與經濟的帝國主義却是不相容的，（三）蘇聯既然不是共產國家，兩種帝國主義都有發生的可能。順便我附說：是蘇聯既然算赤色國家，他的帝國主義——要是有了——可以說是赤色帝國主義。

二 對蘇聯的方針

帝國主義者是我們的仇敵，這是不用說了。不過在一種特別狀況之下，我們也許有親近帝國主義的必要。假想這世界上只有中國及甲乙兩國，甲乙都是帝國主義者，彼此又是仇敵，那麼，我們不當與侵略我們較緩和的那一國做朋友麼？至少我們也應當與他好些。國際關係祇講利害，這句話你們副

刊上的諸位作者連張奚若先生也在內，已經說過。我們處英日美諸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下，國際上最要緊的問題是打倒帝國主義，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我上文祇說蘇俄有帝國主義的可能性，並沒有說蘇俄是帝國主義者，況且他是英美等帝國主義者的仇人，不要去管他實力如何，他對於我們的打倒功去，總是多利少弊的。所以祇消他一日反對英美等幾個頭號帝國主義者，我們要一日同他好，即使吃了他幾個小虧，我們也得忍耐些。同樣說法，要是有一天蘇聯的帝國主義比英美的還要兇，假定有這事，那麼，我們也許有友英日仇蘇聯的可能。

親蘇聯去反對帝國主義完全是一種利害關係，與改良內政不相干，我們親了蘇聯，當然還得要掃掃自己的房子。張奚若先生好像說，因親蘇聯的緣故，中國青年弄得自己站不住，內政改革受了妨害，這真比誅心更利害，這是以心誅心了！我想他們親了蘇聯未必就忘了自己內政的改良罷。要是他們的心真的壞得一塌糊塗；那麼，那種心橫豎是不可救藥；親蘇聯是壞，不親蘇聯也未必見得不壞。還有一點，我是不敢附同張先生的，他說我們親了蘇聯，最後必至帝國主義者一齊打進來，滅我們的國。他看得蘇聯實在太重要了。不親蘇聯，帝國主義者未必肯放鬆，就是再親上一點，恐怕帝國主義者未必就要進一步來侵略我們罷！

討論蘇聯問題的幾篇文中，對於蘇聯搗亂我們內政方面，都很注意。我開場就說過，關於蘇聯有沒有擾亂內政的嫌疑，怎麼樣搗亂，我們知道的很少很模糊。我雖然不敢說定違反去年中俄條約第五條的宣傳（傾覆我國政體的宣傳），一點子都沒有，我却敢說，這種宣傳，即使有，定是很少，很無關

緊要；因為若是有了，外交部可以抗議的，恐怕不等外交部抗議，太上政府似的北京外交團就要代我們抗議了。還有一種大家當爲毒害中國智識階級的宣傳，我以爲不一定是壞的。蘇聯在中國對於中國智識階級的宣傳，關於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的攻擊居多，關於共產的到少，大體上講起來，我們對於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的攻擊，應當是默感的。但是中國人的腰筋真奇怪，好像這種宣傳也是夾着毒藥似的，害怕得了不得。讓我舉幾個例出來：半年前我請了加拉罕到清華學校去演講，我本來要他講蘇聯政治經濟的狀況，但是他不聽我的話，講了如何蘇聯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如何中國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却是從未說起那一國，）他希望中國能解除這種壓迫。我想這樣說，不滿足則有之，含了什麼毒藥去毒青年，則沒有罷！可是加拉罕的幾句老生常談，把英美嚇了一跳。天津泰晤士報把他大罵，說他是想把清華學生過激化。那個報把清華的校長罵得更厲害，說他是引狼入室。美國也送了一個抗議到外交部。英美人這種手段，是慣常的，不用希奇，可是那位外交當局先生真正不濟事，他非但沒有把無理的抗議駁回，還把實在無辜的清華校長冤枉了申斥一頓。以後該校校長與泰晤士報打了幾場筆墨官司的時候，他也並不敢說加拉罕說的話是不差，是沒有跑出正當軌道；他祇說清華有請加拉罕的權，他並說清華學生是好的；好像加拉罕真正宣傳了什麼毒藥主義似的。這個小地方狠可以看得見，中國普通社會不但怕蘇聯宣傳共產主義，連宣傳反帝國主義都是怕得要死。奇怪！奇怪！還有一個例，你若同英國公使館的人要好，到那裏去吃飯，大概沒有人罵你是英國派，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可是你要是往蘇聯大使館走動，或者去吃吃飯，那就不得了，人家怎樣要疑心你，我也

不必說。有許多人要仔細申明他們和蘇聯的人沒有關係，就是要防這種無謂的嫌疑。這種現象，析出來講，真正不值一笑，不過也可以知道他們（中國普通社會）看得與帝國主義者的國際關係太自然了，所以和其他的關係至今還是看不自然的，不好意思去承認的。

我敢說一般人民所恐怕的蘇聯的搗亂，——種種不利的宣傳，——一大半是僅僅在不自然的，多疑的，中帝國主義毒的心理上存在，實際上是沒有這會事。所以除非有人能把蘇聯的搗亂着着實實地指出來以前，——並且這種搗亂一定要比帝國主義的害更大，——我還是說蘇聯是應當親的。親的緣故，你和兩位陳先生說了許多，我不說了。

你的最近一篇文章「反對共產的理由和主張」，十分的八九是可以得到我的贊成。要是你是激進共和黨，我可以做法國人換湯不換藥的方法，自稱為共和左黨罷。這文已嫌冗長，不多寫了，望你指正。

錢端升。十四，十，三十一。

讀對俄問題討論號的意見

胡石青

讀本月二十七日晨報副刊對俄問題討論號，觸動思潮，如鯁在喉，不能不吐：

第一，因陳啓修先生嫌無人同他討論赤白問題覺得不滿意，所以我想加入討論助助興。

第二，因陳翰笙先生謂『即使蘇俄對蒙古有什麼陰謀，我們爲抗英起見也祇可暫時犧牲一部分權利來聯俄以解決大局，』的辦法，我覺得這種主張太危險。

所以我將素日的見解稍爲發表，與全國愛國愛民的青年志士，血性男兒討論一下。

陳啓修先生意思似以爲蘇俄不能行帝國主義的，大致他的前提是：

一，帝國主義是經濟侵略主義。

二，經濟侵略主義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特產物。

三，蘇俄是共產主義國家，這一步也是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非資本主義的國家。

所以生出下邊的結論，

故蘇俄無爲帝國主義的可能。

他的論式甚合論理，但他的論據是否確正，須加討論：

第一，帝國主義一名詞，是否即以經濟侵略爲定義，略述鄙意如下：帝國是歐史上名詞，希拉以本半島爲主體統治愛珍海（Aegion Sea）沿岸各民族，羅馬以本城作主體，先統一意大利半島，繼統治地中海沿岸各民族，故稱爲帝國。此種事例極多，故帝國者以一民族爲主體兼統治以外若干民族之放大的國家也。中世紀末期，歐洲帝國漸不能存在。同時各部分人民以生長

同地同受一君主統治者，自謀發達，不受他力干涉，浸成國家主義。故國家主義在常時與帝國主義爲不相容的。其後，怪傑拿破侖欲承襲歷史上帝統，統治歐洲，未成而踣；普魯士承戰勝之威，建德意志聯邦帝國；英人師西班牙經營海上，俄人效蒙古人經略大陸；歐洲近代史上又發生若干帝國的名詞。以一民族共戴一君主兼統治其他若干民族者，謂之帝國；此歷史上之定義。以一民族爲主體抱有統治其他若干民族之野心而構成思想定爲政策者爲帝國主義。凡帝國多爲帝國主義者，而帝國主義者並不必爲帝國，此近代之定義也。

第二，帝國主義之種類，可分爲：

甲，正統的（即政治的）帝國主義，如希拉，羅馬等。

乙，宗教的帝國主義，如亞拉伯，土爾基等。

丙，經濟的帝國主義，依歷史進化的階段，可分三種：

第一步，侵略或滅亡他民族而統治之，但其目的純粹爲經濟的，如西班牙是也。

第二步，侵略一切民族或亡其國家，或保留其國家名目，而攫奪其經濟上特權，如大英帝國是也。

第三步，專圖占有他國經濟特權以發展本國經濟，有時且助他人獨立，以爲此國獨立後占有其經濟特權之預備，如美國是也。

這三種都經濟的帝國主義，但是此主義仍在發達進化中。

由上列第一第二兩項作論據是經濟侵略僅爲帝國主義之一種，而帝國主義絕不僅限於經濟侵略。今再繼續討論經濟侵略主義是否資本主義國之特產物。

普通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均指行私產制度的資本主義而言。私產的資本主義以外，是否有國家的資本主義？我以爲是有的。

一，如德意志帝國時代，所行之社會政策，曾將若干的重要產業歸國家經營，這種國有的資本，很可以作經濟侵略的武器。

二，現在主張國家社會主義的人很多，既行社會主義而又不廢國家制度，即不能無國際的經濟競爭；凡競爭者均以勝利爲目的。以國家的資格謀國際的貿易之發達，是否國家資本主義？以國家資本主義謀國際競爭的勝利，是否經濟的侵略主義？我以爲是的。

以上二者，第一是歷史上事例，第二是由近人的主義推論的結果。如今我們再來研究蘇俄的實際狀況，究竟與前項所說的有無相同之點。

第一，俄國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恢復貨幣，設立國家銀行，統一蘇聯全境交通，獨占蘇聯全境內重要生產；總括一句話，是積極的發展國家資本。德國威廉第二時代的國有資本，能作經濟侵略的武器，歐蘇現在的國有資本範圍更廣，規模更大，爲何偏說他不能作爲經濟侵略的武器？

第二，蘇俄如果真行共產，國的全行分配制度，對外並無國際貿易；也可說他的國有資本

不能對外爲侵略的武器。但現在他國內恢復田稅，恢復交易，恢復私營小工廠；他們國內經濟，似乎已漸傾向於私有財產上。他們所積極發達的國家資本，却把他集中來發達國際貿易。換言之，即把國家資本集中與各國之私人資本爲國際之經濟競爭。如有人硬認國際的經濟競爭無發生經濟侵略之可能性，我敢說其人非有所蔽，必有所利。

以上係汎論。再就蘇俄在蘇聯以內之行動，略爲說及：

一，就蘇聯成立的組織上考察。當一九二二年，歐俄本部武力統一以後，中央政府大致穩固，因進行蘇聯(Union of Soviet Republics)的組織。歐俄與烏克蘭(Ukraine)，白俄(White Russia)，及高加索聯邦(Transcaucasian Federation)訂立條約合組；其大意，係訂約各國之經濟制度，軍事，外交，交通及國際貿易必須統一，由中央政府執行。其餘各事各國自主。(原約適不在手邊此係略記大意)迨訂約以後，即以歐俄政府爲中央政府，於是各國之軍事，外交，交通及對外貿易皆拱手任歐俄掌理。各國因其他事務之赴莫斯科協商者，均須受理藩部變相之民族委員會(Committeey of nations)處理。各國大失所望，而軍事交通大權已歸歐俄人接收管理，多數人空口反對亦歸無效。直至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後，始將蘇聯政府與歐俄政府名義上分而爲二，並撤消民族部；其實際上，政府改組重要部分全未更動。列舉如下：

- 一，蘇聯國民會議議長，由歐俄國民會議議長加李寧兼充。
- 二，蘇聯國民委員會總理，由歐俄國民委員會總理李考夫(Rykov)兼充。

三，蘇聯軍政委員長，由歐俄軍政委員長杜洛司基調充。

四，蘇聯最高經濟委員長，由歐俄內務委員長柴辛司基（Dzerzhinsky）調充。

五，蘇聯財政委員長由歐俄財政委員長邵考尼考夫（Sokolnikov）調充。

六，蘇聯國際貿易委員長由歐俄國際貿易委員長克拉辛（Krusin）調充。

七，蘇聯外交委員長由歐俄外交委員長霍越林調充。

上述改組全爲事實，此是歐俄對烏克蘭等三國名爲聯合，實係以自己民族爲主體，去統治其他民族。烏克蘭等名爲加入蘇聯，實際上並不能參加中央政治，而本國主權，除經濟制度一項可說是主義相同外，其餘軍政，外交，交通，國際貿易，全被蘇俄大權獨攬。似此，我說：

蘇俄以本國爲主體來統治烏克蘭白俄及高加索聯邦，完全是承襲帝俄時正統的帝國主義。

二，就蘇聯內各民族的考察。蘇聯境內，除前述烏克蘭等不計外，尚有自治國九，自治區六，都是無條件加入蘇聯。他們在前俄時代，受俄皇統治，現在名爲自治。自治（Autonomy）通常解釋；是軍事外交歸宗主國，其他內政均歸自治。可是在蘇俄下加入蘇聯的各民族，是除外交軍事外如經濟制度，交通，國際貿易，都是歸蘇俄管理；此三項不能自治，與英人治理下的印度人，有何分別。尤其須注意的。各自治國中突厥斯坦（Turkistan），韃靼（Tatar），乞爾吉斯（Kirghiz），都是我們中國人種，現在都在自治的美名下，受蘇俄統治。他們在國民委員會下所得之自治權，比芬蘭在前俄皇帝下所得之自治權不及一半。前俄統治他們，是帝國主義；今

俄統治他們承襲前俄家法，有過之無不及爲什麼能說不是帝國主義？

三，專就高加索聯邦考察。聯邦包括三民族：一喬治亞（Georgia），二阿色巴顏（Azerbaijan），三阿墨尼亞（Armenia）。三國爲西亞著名產油之區。歐戰以前，聞歐洲各強國有向此地投資的，蘇俄替他們反對外資，正如現在替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狀況。他們的青年對蘇俄之歡迎，也頗類中國現在情形。迨加入蘇聯以後，油礦，鐵路，海口等均須交兼理蘇聯中央政府，蘇俄政府管理，激起各國人民劇烈反對，宣告脫離蘇聯。俄政府派重兵大事屠戮，卒將喬基亞等征服，接管油礦，鐵路，海口，以擴張俄人的國際貿易。如今此礦之油已運至中國銷行了。試問俄人用暴力征服高加索聯邦，佔據他的油礦來向中國市場上作國際的經濟競爭，與英美人以和平手段取得波斯墨西哥油礦向中國市場上作國際的經濟競爭，有何分別？誰能說：有的是帝國主義，有的不是？

以上所述多關於蘇聯本身者，再就關於中國者言之：

一，蘇俄對中東鐵路，不肯踐言交還，方有中俄關於此路的新協定。此協定已包含有不平等性質在內，（檢原協定閱之自知）以致局長俄人屢次侵我權限，並有加建新線的規畫。替他解釋的人，謂係抵制日本的。不錯。但日本在南滿攫得路權時，也是爲抵制前俄。當時日本抵制俄國取得中國之經濟特權，是經濟侵略，是帝國主義。今日蘇俄爲抵制日本，把持我們的經濟特權，爲什麼偏說他是非經濟侵略，反帝國主義？

二，蘇俄此次以兵力佔據外蒙，無論以何原因，彼如無侵略野心，交涉時必須定期退兵并聲明中蒙關係，於退兵後，聽中蒙自行解決。乃交涉結果，蘇俄僅僅承認我們對蒙古的宗主權。光復之初，蒙古及西藏受前俄及英國愚弄各自獨立，交涉結果，二國先後承認我們在蒙古及西藏之宗主權。宗主權之爲物，在國際史上空無一物，毫無價值。前俄及英國假此名義對蒙藏施行侵略政策，我們說他是帝國主義；蘇俄如今原樣照抄，爲什麼諸君要說他是反帝國主義？

總之，蘇俄對蘇聯以內之各民族及鄰近未加入蘇聯之各民族所實施與計劃實施者，無一非帝國主義。上述之例，特其一斑。今再說聯俄之當否。

兩位陳先生主張聯俄的理由，都有一個先決問題，他們論式是用不容閒位律，即中國現在不聯反帝國主義之蘇俄，即必聯帝國主義之歐美日本各邦。依我說，歐美日本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團；蘇俄是一個帝國主義單一生力軍。國際共管的說話，便是帝國主義團軍事計畫；我覺得他們同床異夢，築室道謀，是不能成功的。請看帝國主義單一軍的軍略：

- 一，第三國際的好名義，完全由蘇俄人管理，可以藉此指揮中國青年。
- 二，東方勞動共產大學中，不重共產原理，專重勞動運動，以重金津貼招致中國一部學生；入其彀中，不能自拔；畢業不論時限，凡經俄人認爲信仰堅純，能力充足者，即發給川資回國進行。

三，陸軍大學特授中國文語，限二年能用中國話指揮軍隊，能閱簡單中國文告。

四，在沿邊勾結少數中國（包蒙古等在內）人對中國宣告獨立，彼即承認互行派使，一面代為編制軍隊，接濟軍械，剿鎮反對獨立之人。

五，在可能範圍中，並接濟內地軍火以長內亂。

上述各項，均為已施行之事實。到底他們兩邊誰家的軍略毒狠可怕？就現下狀況說：我以為都不能聯。大家討論的是怕所聯的一家失敗，自己受不聯那一方的處分；我怕的是聯誰就先受誰的處分。歐戰中土爾其是聯德的。他們的國民英雄現任總統克馬兒（Mustajha Kanai）當時說得好：

我們同德國一同戰敗了，我們要受協約國處分；可是戰勝了須受德國管理；現在已經受德國管理了！弱國與強國作軍事聯合是引虎自衛。

他從此不受德人指揮，率隊入山。後來，竟成了再造土爾其，收回一切國權的大功。我是贊成克馬兒的主張的。

他們兩方要是誠心與中國作朋友，可以的。俄國方面，無條件交回中東路，將蒙古俄官撤回，軍械連走，停止前述種種對華的計畫，我們便與他是朋友。美歐日本方面，無條件交還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我們也可以與他們是朋友。不然，我們還是要振起獨立自主的精神！左手拒狼，右手排虎！

除翰笙先主謂我們為抗英起見對俄人在蒙古的陰謀，可以暫時犧牲一部分權利云云，陳先生說「暫時」，說「一部分」，時間及範圍很有限制；足證陳先生對於我們的國權國土是不願久犧牲，不願

多犧牲。可是今日我們爲抗英，對俄犧牲一部分；明日爲抗日，對美犧牲一部分；他日再謀抗俄，再謀抗美，必須再有更大的犧牲。這樣外交政策，恐怕不久非把土地主權全犧牲完了不止。

陳先生是歷史學者，近代史上有二個例，我舉之如下：

一，墨西哥當華瑞士第一任作總統時，爲債務關係，英，法，西班牙三國聯軍壓境，要求管理梵烈渡（Veracruz）等海口的關稅。華氏完全拒絕，以致後來法國大兵進境，重建帝國；後來，又經華氏光復國土，到底他的主權那一部分都不肯讓與外人的。

二，祕魯建國未久，就與智利宣戰。阿里加（Arica）一帶，被智利佔領。停戰議和後，祕魯始終不承認此地的割讓。我前年遊阿里加時，此案仍未解決。事隔數十年，去歲竟經美國調停，由祕魯出資將原地贖回。物歸舊主，到底他的國土是不肯讓與外人的。

我勸討論外交問題的同人，最要注意的只有兩事：一爲國權，二爲國土。自今以後，是祇准說挽回與收回，不准說犧牲與割讓。

兩位陳先生主張聯俄的理由，都有兩國間物質交易一項。這可說是四五年前討論對俄恢復商務的強硬理由；如或有人提議對俄經濟絕交，亦可拿這個理由駁他。但是寫在聯俄的理由書中卻無甚意義。至陳啓修先生所說：俄國政府穩固同他聯不是同將死人結契約，更不成理由。將死的人我們不當同他結契約，不錯，可不能誤爲凡不是將死的人，我們必要與他結契約。

以上拉雜寫來，文氣多不連貫，請閱者諒之。

一篇不應該做的文章

奚 若

這篇文章本來是不應該做的。第一，因為他是一篇辯論文字。辯論文字雖有時因要辯明真理非作不可，但最易流為支離或謾罵。純粹謾罵，固屬不可，爭論枝節，亦最足低落辯論標準。我近來對於外間許多攻擊文章置之不理，就是為保持這個標準的原故。第二，因為這篇文章是要駁陳啓修先生那篇「中國對蘇聯政策應當如何？」（見十月二十七日晨報社會周刊）而作，而陳先生的文章裏竟然謬誤百出，簡直可說是沒有一句不可駁。一篇文章，一篇長文章，錯到沒有一句不可駁，試問他還有被駁的價值嗎？第三，因為我這兩天本想抽暇做一篇「共產主義是否適宜於中國？」的小文，討論這個根本問題，實在沒有工夫和人講廢話。如此說，這篇文章真是不應該作。

然而明知故犯，究有何說？答：陳先生的文章雖然是沒有一句不可駁，但有許多對於這個問題不明真像的人或者還要被他那似是而非的論調所欺騙所迷誘，所以為這些人計，這篇文章還是不能不作。

在未入本題以前，先讓我說幾句「無關宏旨」的閒話。甚麼閒話？就是陳先生所最掛心和近來一般人跟着他討論的那『赤色帝國主義』的名詞問題。我以為這完全是一個枝節問題，沒有認真討論的必要。只要認清蘇俄是我們的敵人，是我們最利害的敵人，那就不管他是不是帝國主義者，更用不着問他是不是赤色帝國主義者，我們都要反對他。他是，固要反對；他不是，也要反對。我們反對的，只是因為他是我們的敵人，並不管這個敵人姓甚麼。他姓赤，我們反對；他姓白我們也反對；極而言之，就是他野蠻的很，幼稚的很，沒有開化，連姓名都沒有，我們還是要反對。此理至顯，毋庸多

說。不過有許多有學者習氣或受了「學究毒」的人一定要問我對於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的意見如何，我也就只得裝出幾分「學者」的腔調，答覆如下：

赤色帝國主義這個東西在客觀上也可說是有，也可說是沒有。這完全看你的定義如何。譬如你學陳啓修先生說帝國主義的要素是經濟侵略。那麼，或者就可說是沒有。反之，你的思想如帶有幾分哲學家或歷史家的傾向，說帝國主義的要素是拿一國的勢力去侵略他國；這種侵略的動機有時是經濟的，有時是政治的，有時或竟許是宗教的，有時僅見其一，有時數者兼備；那麼，赤色帝國主義這個東西，大概就可以說是有。你瞧，這是多麼容易！陳啓修先生因要袒護蘇俄，所以就用了這個手法，說「赤色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能成立。你們如要反對蘇俄並且要叫他爲赤色帝國主義者，也可用同一手法，說他能成立。學者玩的把戲，不過如此。你如看穿，自然沒甚希奇。你如會玩，你自然也是學者。（不過玩時千萬不要忘記引用幾本外國書作你的護符，至囑至囑！）

閒話說了這樣一大片，現在讓我折入本題，看看陳先生那篇「中國對蘇聯政策應當如何？」文章裏的錯處在那裏。方才說過，他這篇文章沒有一句不可駁。可是如要真的句句都駁起來，那就即使我不嫌憚煩，恐怕也要弄成一本小書，非副刊上所能登載了。無已，只得提綱挈領的分做以下三項駁論。

一，見解的錯誤

陳先生說研究對蘇俄政策有四個標準。這四個標準，第一是國際政治形勢，第二是本國在國際上

的地位，第三是本國經濟情狀，第四是對手國的政治情狀。他說照這四個標準判斷，我們都應該聯俄。可是他文說：

上面四個標準，自然是假定一國與我尚無任何外交的關係而言的。若是這國與我已有了外交的關係，那麼，自然還要加一個標準，就是：要看這一國在外交關係上對我的態度如何，是親善的抑是侵略的。這一層當然要緊，因為關於這一層的結果如何，足以推翻依其他各標準所得的結論。（注意末了一句——作者。）

誠然誠然，我與陳先生不能同意的地方，完全就在這一點。陳先生認蘇俄對我的態度為親善的，我認他為貌似親善而實行侵略的。認為親善的，故用那四個標準去研究；認為侵略的，故覺凡屬依據以上四個標準所得的結論全被推翻。這是我與陳先生根本不同的地方。只要把他這一點駁倒，其餘便無辯論的必要了。我說蘇俄對我係侵略的，完全係由內政上着眼，完全指他在我們內政上搗亂而言。（其詳見「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和「聯俄與反對共產」兩文中。）我以為內政比外交要緊，內政不修，外交絕無佔勝之理，所以覺得蘇俄的搗亂是很可怕。陳先生與我剛剛相反。他說：

……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例如中國這樣的國家裏面，原則上內政就是外交，除了外交就沒有內政（因為在那裏內政直接受外交的支配）……。

這句話並不能說是完全沒有道理，不過也要看用在何時，何地，何事。若要說他在無論何時何地何事，均是對的，說他含有政治學上的絕對真理，那我就不敢苟同。在中國今日的政情上，我認這

只有一二分對的，而有八九分錯的。請隨便舉幾幾個例證。

(一) 袁世凱做皇帝是受英日帝國主義者外交上的壓迫或威嚇使他不能不做呢，還是他自己昏聩想入非非呢？這是內政抑是外交？

(二) 張勳復辟是外交上不得不然呢，還是內政上有以養成他的惡劣勢力呢？

(三) 曹錕賄選是敷衍帝國主義者的外交手段呢，還是因為那數百議員的道德破產呢？他這個舉動「直接受外交支配」的地方在那裏？

(四) 彭允彝長教育，羅文幹下獄，是受外交支配呢，還是受內政支配呢？

(五) 現在的政客沒有幾個不吸鴉片。這是因為洋鬼子強迫他們呢，還是他們的自由選擇呢？

(六) 今日國中「野雞」大學林立，每年戕害青年不下數十萬。不知這是履行那一種不平等條約？

(七) 北京的市政，壞不可言。不知這是東交民巷不准改良，還是當權者的腰包無底？

(八) 青島和天津漢口數處德奧退還的租界，一天壞出一天，一年不如一年。這是外交的影響，還是內政的結果？

如此舉例，可至數百數千，而不能發現「內政就是外交，除了外交就沒有內政」這個怪論的事實根據。我不知陳先生自鳴得意的「特別政治原理」係從何處得來？

二，推論的錯誤

上文說過，陳先生的文章，因發動點錯誤，結論完全不能成立，本然無再置駁的必要。不過他的

推論有許多地方非常荒誕，如不稍加拍擊，恐怕他還要到處炫以爲奇。他說，

現在國際政治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者對壘的形勢，蘇俄是反帝國主義方面的中心……。所以我們從原則上說，當然應在反帝國主義一方……。不過還要慮到的，是：在加入反帝國主義方面後，萬一此方面被帝國主義者打敗了，其時中國所受的損失如何一點。假如失敗時損失太大，而成功時所得不多，利害相差甚遠，則上面的原則，當然可以變動。很明顯的，在這一點上說，我們所得的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而我們所失的不過現在帝國主義者束縛我們的這付鎖鍊，（比這鎖鍊還利害幾倍的鎖鍊，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所以我們是失敗時損失小，而成功時利益大，所以我們仍從原則上在國際政治形勢的標準上主張聯俄。

陳先生如真想像不到「比現在這鎖鍊還利害幾倍的鎖鍊，」那就只有怪他的想像力不強，還有甚麼話說。然而這是冤枉陳先生的話。他恰好是個大學教授，不見得連這點想像力都沒有。這並不是我任意恭維他，有他自己的話爲證。他在同篇文章裏上幾段曾說：

……中國現在若自動的有計畫的加入帝國主義及反帝國主義任何一方面，則所加入的方面戰勝時中國必一躍而爲強國，失敗時必會把現在的這樣不自主不獨立的局面，亦將失去而夷爲真正的廢國……。

這點「小矛盾」，我對大名鼎鼎的陳先生當然能原諒。不過我不能懂的地方，就是：即使我們戰敗時，束縛不比現在再加利害，當然也不能減輕；既不減輕，那我們又何必多打這回仗，又何必多此

一舉呢？倘若說是原來希望打勝，那我又要問，據陳先生平心靜氣的推測，果真打起來，英日美法在一邊，中俄在一邊，還是那邊勝的機會多呢？我想陳先生的答語一定是「中俄勝的機會多」。哼，可不是！

陳先生又說，「中國因地理的關係不能不牽入世界戰爭漩渦，斷不是依中國的力量而可阻止的，也不是因蘇聯而始牽入的。」此處陳先生所說的戰爭與他上文所說的戰爭完全不同。此處中國僅因地理的關係，被動的「牽入」。上文却因計畫的結果自動的「加入」。第一種戰爭大概不是依中國的力量所可阻止的，但是第二種戰爭實在不見得是一定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中國被蘇俄赤化引起的戰爭）。所以我以為前者我們即屬無法阻止，後者却萬萬不可不嚴密的防範。

其他關於推論的錯誤，舉不勝舉。但以限于篇幅，不能畢數，只得放他過去。現在讓我們看看他還有別種錯誤沒有。

三，事實的錯誤

陳先生的文章中最得意的幾句，恐怕就是他那「功二過一」之說，而全篇最可笑的地方，恐怕也就是這個「功二過一」之說。我求讀者恕我再引他一段原文。他說，「總結起來，在蘇聯對我態度一點上，功二過一，所以蘇俄還是可聯。若把蘇聯對我的態度和帝國主義者對我的態度相較，則前者功二過一，後者無功而有六過，所以無論如何，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危害，比蘇聯大得多」。讀者，你們如看過陳先生的原文，你可能告訴我他那「功二過一」一句話的可笑處在那裏？我替你們代答一聲，

這句話有兩個毛病。第一，功過的事實和數目都係他自己爲合他的便利任意定的。其所謂功，固未見得一定是功。其所謂過，亦未見得當真是過。一二之說，更屬極端武斷。以我看來，他所自舉十一過，除第四條俄蒙銀行外，幾乎無一條不成罪名。（我現在因這篇文章要收尾，不能一一答辨，如有機會，當詳論之。）第二，陳先生拿數目字互相抵銷，犯了哲學上一個大病。因爲同樣數目字所代表者不必爲同價值。今陳先生不問此等數目字所代表之各個事實爲何而冒然用算學方式相互抵銷之，其爲鹵莽滅裂，豈所望於學者！如有人說蘇俄在中國搗亂的過比他所有的功合攏起來都大，那「一二」或「十一」之說，自然根本推翻。

其次，我們應問陳先生所舉帝國主義者的「六過」是否也能適用於蘇俄。換言之，就是蘇俄是否有此六過之一部或全部？我以為除第三條「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一端外，其餘第一條「侵略土地」（如佔據蒙古），第二條「經濟的搾取」（如達約獨佔中東鐵路），第四條「文化侵略」（如宣傳共產），第五條「操縱內亂」（如借款賣械幫助軍閥），第六條「干涉內政」（如各種的搗亂方法）諸端，蘇俄不但兼而有之，並且最末三條的爲害處比帝國主義者還利害。

總結起來，可說陳先生那篇文章不但見解錯誤，推論也錯誤，事實更錯誤。我因爲要詳細駁他，所以枝枝節節的寫了這樣一大片，真對讀者不起。

論對俄問題

丁文江

勉己先生：

一八六

我目前實在沒有功夫做文章。承你屢次來信問我對於對俄的意見，我只好把我常常想到的幾點，單簡的說給你聽。

第一點是我們中國人現在無產可共，講不到甚麼主義。

我最恨目前知識階級的朋友，不肯研究事實只知道高談主義。俄國人共產的成功和失敗我不管他——我對於俄國共產以來的實情實在不很了了，因為所有的事實都被宣傳的謊話掩沒了，或是政府的檢查禁止了；要研究真事實的人無從下手——但是有許多單簡的事實，我們往往因為他單簡反忘記了，不可不再提一提。俄國雖然在歐洲算人口最多的國家，然而人口同土地比較起來，還是地廣人稀。在美洲的一部份，每一方英里只有六十六個人；在西比利亞的一部份只有五個多人。雖然西比利亞氣候酷冷，土地不能完全耕種，然而實際上容納殖民的能力，還是很大。歐洲的俄國，本來是農產最豐富的。蘇俄已經耕種的地不下二千兆畝，可以開墾的至少還有二千兆畝，一個人平均有二十畝以上的田地。那麼，共起產來，只要耕種得宜，至少還應該人人有飯吃。我們中國平均每方一里有二百三十八個人；除去東三省，新疆，雲南，甘肅，以外沒有那一省不在一百人以上：就是東三省也在六十以上，比在歐洲的俄國差不多。其他如江蘇，浙江，都在四百以上，山東在五百以上。而揚子江以南除去了珠江下游的三角洲，大部分都是山。北方幾省除去了黃河和白河的三角洲，山地也是很多。照最近的約計，

全國產米每年不過四百兆担，所以還要向安南暹羅印度高麗買米；北幾省年年全隴東三省供給糧食。全國已經耕種的田地不過九百多兆畝：共起產來，一個人只能分二畝有零。試問這種產如何共法？

我知道贊成共產主義的人一定要說，『我們的新資本家的財產你沒有計算在內。』勉已先生，我們的新資本家說起來太可憐！新式事業有統計可放的是鑛業，紡織業和銀行。我新近把他們的資本大略算過：

鑛業

最多一五〇兆元

紡織業

最多二〇〇兆元

銀行

最多一五〇兆元

以上三項共計不過五百兆元。其他如麵粉，化學，電氣，油廠等一切新式事業，最多也不過二百兆元。把只種產業共將起來，中華民國一個人攤不到二塊大洋！

我們平心靜氣的思想，爲了二畝多地，兩塊多錢，值得提倡社會革命，階級戰爭嗎？假如主張共產的人能夠證明，我們生產力可以因爲共產而增加，那麼，我也贊成共產。無奈就是蘇俄的宣傳部也沒法子不承認俄國共產以後，生產力有減無增。我們此刻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過了今日，不知有明日：在鄉村失業的人去當兵，在城市失業的人去拉洋車，不能當兵，拉洋車的，不是當匪，就是餓死。有點知識的人不想法子努力生產，研究生產的方法，掃除生

產的障礙，反要提倡共產，我不敢說他們受了俄國人的金錢，甘做人家的走狗，我至少要說他們沒有常識，盲從無意識的主義！譬如有一家人，因為子孫過多，祖宗留下的遺產，不值得一分。我們還是勸這家的子弟，努力想法自立，還是勸他們把全付精神來，吵着分家，使得分家以後，大家同歸於盡呢？

第二點是就外交上講，無論那一國，我們都不配聯，蘇俄我們更不能聯。就內政上講，聯外國人來改革本國的內政，沒有不失敗的。

就外交論外交，要同人家聯，一定要有相當的能力，不然不是給人家聯絡，是給人家利用。目前我們一個政府都沒有，人家爲甚麼要來聯我們？

當中日戰爭以後，李鴻章聯俄，把北滿送在俄國人手裏，至今沒有還我們。中俄戰爭以後，許多人聽日本人的話，講「同文，同種」，結果是二十一條的要求。這種教訓難道我們就忘記了麼？主張聯俄的人說蘇俄和其他帝國不同，對於我們是完全沒有私意的。我不知道蘇俄的真相，不敢武斷，但是蘇俄在北滿，外蒙的舉動，我是知道得清楚的：試問爲甚麼一條中東鐵路不肯送還我們？當初越飛來的時代，本來說還我們的，爲甚麼加拉罕來就變了卦？對於外蒙，中俄協定說得明明白白要撤兵的，爲甚麼一方面告訴我們撤兵，一方面供給蒙古人軍械，派許多軍官訓練蒙古兵，監督外蒙的內政？我最近得到蘇俄運到庫倫的軍火的秘密單子，（運察綏的軍械在外）我可以順便發表出來：

| 種類 | 十四年四月 | 五月 | 六月 | 七月 |
|--------|--------|--------|--------|--------|
| 步鎗 | 一八・〇〇〇 | 三〇・〇〇〇 | 一六・〇〇〇 | |
| 馬鎗 | 五・〇〇〇 | | | 一〇・〇〇〇 |
| 槍彈 | 四六・〇〇〇 | 一六・〇〇〇 | 一〇・〇〇〇 | |
| 新式輕機關槍 | | | | 九 |
| 機關槍 | 一五〇 | 三〇〇 | 三〇〇 | |
| 機關槍彈 | 一・五〇〇 | 四・五〇〇 | 四五〇 | |
| 野砲 | | 一八 | 四八 | |
| 七生的五砲 | | 四 | | |
| 十五生的五砲 | | 一六 | | |
| 手槍 | | | 五・〇〇〇 | 五・〇〇〇 |
| 手槍子彈 | | | 五・〇〇〇 | 五・〇〇〇 |

試問蘇俄這四個月裏面爲甚麼要運大宗的軍火到外蒙來？這種舉動，同帝國主義的國家，有甚麼分別？

還有一點，大家要注意的。蘇俄總把共產主義之下所受的痛苦，歸咎於非共產國家所用的封鎖政策。若是真的，我們要與蘇俄聯了起來，我們是否要吃同樣的苦頭？列強可以封鎖蘇

俄，更可以封鎖我們；蘇俄且怕封鎖，何況我們？在蘇俄不願獨善其身，自然要拉我們同下地獄，但是聯了蘇俄果真有甚麼好處，使我們值得犧牲？辦外交同尋常做人處世本來沒有多大的分別：無論甚麼人不肯因為聯絡一個人來得罪全世界人。蘇俄可以說他是為主義而犧牲。我們對於他的主義，並無成見，但是覺得他的成績不佳——至少可以說對於他的內容，因為他不肯公開，所以弄不清楚。在我們沒有弄清楚以前，決不敢冒昧引為同志！

至於要聯蘇俄來改革我們的內政，更是沒有討論的價值的了。我們試想想一個國家自己不能自立，要靠旁人的力量來幫忙，如何能夠成功？吳三桂之於滿清，高麗之於日本，這種前例，是不用說的了。其餘革命成功的國家，那一個不是奮然獨立不靠旁人的？「夫人必自助而後天助之。」倚賴他人是最沒出息的！就是蘇俄一毫私意沒有，我們也斷不能靠他來改革我們的內政，何況實際不是如此單簡的？我們只要看反共產白黨的歷史，我們就應該覺悟了。高而察克，丁尼鐸，烏蘭克爾，那一個沒有受外國人的重大的援助，那一個不是一敗塗地？我們要學蘇俄，應該學他的好處：學他的獨立的精神，奮鬥的勇氣，犧牲的決心，那麼就是有千萬個帝國包圍我們，我們也不怕他們，又何必去聯蘇俄做人家的走狗？

我自然是對純潔的國民說話的。至於受了蘇俄錢的人，這番話自然是不足動他。勉己先生，我還勸你小心點，不要把你副刊的篇幅，來供給人家做宣傳的機器。

對於聯俄的疑問

陶孟和

現在有人主張中國應該聯蘇俄。我對於這個主張有三種疑問。

(一) 我不知道做這樣主張的人所謂中國是指什麼。是現政府還是吳佩孚？是張作霖還是馮玉祥？或者是蔣介石？

假使我假不信任任何軍閥，不信任任何不能代表人民的政府，那末，誰可以代表中國去聯俄？假使說人民自己聯俄（我不知道怎樣聯法，姑假定是可能的）那末，人民與政府或任何軍閥所聯的外援不一致，又將如何？國內之爭豈不又演成列強以中國為傀儡之爭嗎？

(二) 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應該聯蘇俄。為抵禦外侮還是為戡定內亂？為脫離外國的帝國主義的羈絆還是為建設一個鞏固有力的政府？為幫助甲軍閥（或甲政黨）攻倒乙軍閥（或乙政黨）還是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試驗？

我想沒有人（至少明目張膽的）主張聯俄是為戡定內亂，為建強有力的政府的。至少中國有知識的人還不至於這樣沒出息，這樣沒骨頭。中國人自己不設法剷除軍閥的災厄而妄想聯絡別人來剷除，自己不設法整理自己的家務而尋找一位保鏢的來幫忙整理，我想這樣的主張未免不高明罷。若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試驗，真的試驗，倒也不必反對。不過我恐怕試驗只是一個美名，究其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掌握政治與經濟大權罷了，與某某黨曾在中國或現在中國的登政治舞台有何異。但是，倘若這一小部分人要靠聯俄登台，我想大部分的真中國人未必答應。假使聯俄是為抵禦外侮，那又引起了我的第三個疑問。

(三) 蘇俄如何可以幫助我們？供給我們鎗砲子彈，供給我們士官軍隊？替我們組織政府，政黨，軍隊，或生產機關？爲我們建設鐵路以與其他外國勢力範圍下的鐵路相爭？同我們結攻守同盟的條約以打倒在東方侵略的列強？

我不知道聯俄的人所希望得到的幫助是那一種。讀者們，千萬不要笑我是一個犬儒派（Cynic），我根本不相信國際之間有不自私的幫助，我根本不相信一個人，除了極少數的理想家以外，從國家的立足點會希望別一個國家強盛，更不必說一個政府了。

我對於國際政治完全是一個悲觀者，我相信在國際的國家成立之先，國家與國家之間完全是生存競爭。各國家爲生存競爭起見，一時的合縱連橫，使全世界成爲一種勢力均衡的局面，但是像我們這個國家還不配在勢力均衡的局面中做一個積極的分子，結果不過是其中任何一方面的犧牲。在國際的國家成立之先，沒有兩國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但是我也並不是一個極端的反俄論者。假使現在所傳說的俄國侵略中國的手段是真的，他也不過與其他侵略我們的列強一樣，即使他實施『文化侵略』的政策，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凡一個國家要在世界政局上立足，占一個位置，無論什麼手段，什麼政策都是可行的。蘇聯也不過是現今世界一個國家罷了，雖然他的政府不是一個國會的政府，他的經濟不是完全的私產制度。世上有一個政府或國家肯不顧自己的安危，不爲自己的利害，去實行平和，平等，人類親善，等等的原則的嗎？

以上所說並不是盲目的排外。我們對於無論何國的私人，只要那個人不是以政府代表的資格，都

可以相交，可以親善，可以有共同的目的。但是我們一遇見一個國家，政府或政府的代表，我們便要留心，我們便不能信賴。

中國的建國策與對蘇俄

劉侃元

月來國內的知識界忽羣起討論蘇俄到底是我們的仇人還是友人的問題，起初許多人還帶些感情的偏執，最近都轉作理論的洗鍊，可算是國家前途上最有起色的一徵候，很可引為歡慰的。但這問題，嚴格地講起來，還不算一宗大問題，只要我們根本的國策一定下來，蘇俄之為仇為友都可不言而喻。詳言之，就是我們如想步資本主義諸國的後塵以建國，蘇俄自然在理論上是我們的仇人；如想脫除資本主義諸國的壓迫而建國，蘇俄自然理論與實際都是我們的友人；——事實至為明簡，值不得天天曉曉的。尤其在現在，脫除資本主義諸國的羈絆聲，在全國既已成為一致的口號，我們尤犯不着和那些「無謀的」感情家，去打官司。讓他們自生自滅罷，這種人物，那一國家，那一時代，也是不能免的，但於大局有甚麼影響！

依我個人看起來，但問題還是沒有觸到中心；我們就從中國現在的外患情形及國際關係，論到了中國非親俄聯俄不可，也還沒有觸到中心。為甚麼呢？以中國現在情形論，聯俄還是聯不上的。我是這種樣子，俄未必和我聯；我是這種樣子，聯成也未必能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不在於外交政策的選擇上，還是在內政改革的方針上。這方針才是第一義，那選擇是第二義。這方針是因，那選擇是果。

不待說，我們誰也知道：中國現在談改革方針時，萬不能却外患而專講內憂。二豎入膏肓，誰也知道非一舉兩得的方針不足以起死回生。而「聯俄」這外交策，如於解決一豎之餘且能暗示幾分解決他一豎的方法我們自然毫無遠議。但事實上不盡能如此，第一，外交策上的聯俄不易成功且聯成

也不易解決外憂的一整的話，我上來已經說過了；至如由此以暗示解決內憂，則尤多曖昧，中國人現在的頭腦，還沒有這樣高明，我們自己也易陷於不徹底之譏，所以我們到不如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學俄」罷——內憂的解決法也學俄國，外患的解決法也學俄國罷。如此則我敢斷言：聯俄也聯得成功，不聯也自然會聯，縱不聯我們也能夠自己解決一切。

我很曉得：多數人看到我的「學俄」兩字，必立刻要大大地發皮氣，不說我是出入俄國公使館的共產黨，即必說我是「赤化」來搗亂中國內政的。但我用自己的人格答復一句：我一不是共產黨員，二又不主張「赤化」式的「學俄」的。我的學俄，第一是用俄國式的「自動地向外國宣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以謀解決外患，第二，是學俄國式的「廢除財產私有制度而取國家資本主義」，以求解決內憂的。我認為中國非前者決不能解除目前的危險，非後者決不能保長治久安。不過對後者的實行時附一重要條件：不取俄國赤色式的 Terrorism 為方法。

二

反復說一句：中國非自動自律地將一切不平等條約宣言廢除必永不易有廢除的希望，而在十八載之中且必底於亡。我現在對於租界，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勢力範圍，外國駐屯軍隊權，租借地等等不平等條約，都不說，單就關稅權一項說一說罷。我相信關稅決不能依「俎豆折衝」式的甚麼「關稅會議」能夠收回「自主」！決沒有那樣便宜的事情！我們誰也知道，我們眼前的死對頭是英日二國！這二國能夠有那樣好的同情與雅量，無條件地許我們以自主麼？與虎謀皮，鬼也不能相信！看

看日本政府對這次關稅會議的態度與發表的許多對案就知道！華府會議後，它早預想我們有今日，三年來外交財政農商三部早已縝密地作了調查與研究的工夫，此次特派大使資格の日置益爲代表，以謀指導列國的全權誰也是知道的，英美代表來華時，都路過東京和日政府有一次內幕的商榷又誰也知道，美國代表固或能保其獨立的國策，對我們表同情，但誰能保其必如是？英國代表自滬案以來受日本幹延的恩惠很多（滬案重查，是日本提出以救英國面子的，當時的東京新聞可作明證），且國策上又二者一致，安能不視日本的一步一趨爲態度！至如日本的條件與對案如何則報上已喧報很久，不值我來重述；總之以二五加稅爲原則，自主的話當待十五年後的一條已經是要我們的命！更何況二五所得的三千萬元必存於正金銀行作亡國的參戰借款的担保，此外還要廢除鑛山國有令，米穀出口令及增闢內地，許外國人自由設工場呢！

不待說，這些條件在折衝的結果總還可通融一些；但我們細察日本的國情，敢斷言此次想恢復自主決無希望。爲甚麼呢，它是恃我們爲唯一的材料地及銷貨場的。「我們一旦自主而施行保護政策時，像英國殖民地滿天下且對中國的輸出多爲機械及上等正頭貨等類，中國一時既模倣不來，自然影響不大；但它日本則不同；它對我們的輸出物率爲紡織物，火柴，油，糖，胰子，化粧品，傘，絲織品，紙等類，其總額且佔其每年對外輸出總額之半；我們加稅它已受影響不淺，何況我們要自主要行保護政策呢！

並且它全國上下，現在都主張「產業立國」，而產業立國上缺乏的原料，無論那一政黨又都主張

取用於中俄；中國如果與它經濟同盟，中國作原料輸出國，他作工業品輸出國，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否則維持現狀，它利用一切不平等條約在中國自由競爭，也是再好沒有的了。爲甚麼呢？它離我們最近，關於我們各方面的研究最精，歐戰以後對我們上下陰陽兩面所擴伏的政治勢力又最大——利用這些優點，在我們國內作平等自由的競爭時，歐美那一國也不是它的敵手。看到了這點，所以十幾年來，它一不贊成中國的瓜分二不贊成中國的共管，只希望中國永遠是「次殖民地」，維持現狀，它好在其中享最優越的漁人利。唯其如此，所以更不惜用種種惡辣手段，挑撥，指導，我們的內亂，務使我們年年忙於內爭，無限外顧。——「二十一條」以後的「對支政策」，全是這一個方針，每次內閣更換，都是換湯不換藥，而在這換湯不換藥之間，竟收了莫大的效果！

但現在我們國民自覺了，一年一年主權的收回熱增高了，滬案起後更已達了沸點，對於這次關稅會議，上下一心，有不得自主不止之勢了。它怎樣辦呢？但它還是固持它的利害，決不傾顧我們的要。它一面聯絡各特權國取一致的行動，一面又想出許多換皮不換骨的條件——如上所述——來，作朦混與交換。但這些條件，那一條我們能夠承認！據孫中山先生統計的說明，我們每年純粹的損失已達十二萬萬圓，海關一項就佔兩三萬萬。再依孫先生的說明，這樣損失下去時如十年內不能挽回，十年左右我們必得乾脆滅亡。那末怎樣辦呢？自然我們第一步就是對於關稅求收回自主權，趕快改訂稅則以振興國貨抑制外貨，這自然是唯一無二的辦法。但如使它竭力不許可，必待十五年後而後行時我們將如之何呢？豈不是在此後十五年內坐以待死麼！其餘所謂鑛山國有，米穀不許出國等法令，又是

那一宗可以撤廢得的？我們現在不已經是年年鬧飢荒麼？漢治萍撫順鞍子山……我們喪失了多少重要的鑛山權？至如更關內地許外人設工場的話，更是聞而皆裂！我們的工業不振，大半受這種內地外國工場的資本壓迫所致。姑暫不說，青島滬上的血案不是土還未乾恨積如山麼！——小鬼簡直不僅是想宰死我們，而且是明目張胆地侮辱我們！我們更由日置益想到二十一條時真是恨死了這辱國的關稅會議！但這些感情話姑不說，在這兒我只說完了中國現在的利害關係和日英兩國根本是衝突的一點就夠。它們無論如何是不會放鬆的，七縱七擒，決不會使我們真正解放的，我們的代表縱在會場上口裏出血我們的國民縱在新華門負傷至死。何況我們還要想到，除此以外，還有租界，領事裁判權……等等無數呢！所以我敢斷言：這樣許多國權，決不是平和的外交手段所能收功，非積極的辦法——倣俄國式自動地宣言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不可！

三

這決不是紙上談兵！不肇瓜分則必復招聯軍入京之禍，讀者或這樣說。但我敢答一句：說這種話的人未免歷史記得太熟，關於中國現在的國際情形未免疏忽太多。瓜分是決不會有的；中國現在是「世界的一中國」，誰想獨佔也不能，羣起分割也辦不到。獨佔在日本或希望，但其餘那一國會許可？瓜分在英法或不反對，但美俄日那會贊成（日本決不利我們的瓜分，得則全得，不得則永保其為次殖民地，這是它的國策。它愛我們也在這點，苦我們也在這點，我們當十分明白的。）？至於聯軍入寇的話，曾不能保其必無；但使我們宣言後，行動不主趨於激烈，態度又能十分示其堅決，列國投鼠忌

器，亦難斷其必有。何況我們的取消不平等條約，一不學俄國的否認國債，二不學俄國沒收外國人的私有財產，我們一面宣言時，一言即發布最合情理的要求與主張，列國不能視為與拳匪同一事例自是必然呢！所以縱有兵來，也不容易說，仍舊是列強一致，尤不能說就一定佔住北京。依我看起來那時候最持高壓手段的還是日本或是日英兩國。但二國既瓜分不能，獨占不許果能以高壓手段支持到底麼？英國的封鎖波羅的海，日本的西北利亞出兵，往事重重，我們都還記得；但結果怎麼樣？不都是自動地撤去且百方設法和俄國修好麼？我們知道：這樣一宣言下去，一時的局面是很重大的；但只要我們的主張能得全國內部的協贊，必然可得世界第四階級的同情。同時俄美兩國的外交上的援助尤其可以希冀。並且我們是農國，海疆就被封鎖，只有好處，決沒有飢寒之危，而封鎖者自身轉有破產恐慌之懼。像日本，它如果長期和我們國交破裂，只有死路一條，甚麼好處也沒有。所以我敢斷言，只要我們全國上下一致，大膽地，澈底地，幹下去，必可收效無疑。若不用這法子，而想學日本當年的辦法，俟內政整頓好再去談判，則第一個死對頭，就是日本，它必不會讓我們揚眉吐氣，永遠想出種種詭計來，害我們一籌莫展。何況我們現在和它當年情形不同，非趕快積極地取消那些東西。國家且要陷於萬劫不復呢！

所以我再反復說一句，只要我們看清國際情形，大膽地幹下去，一時列強雖或用種種方法威壓我，然結果只要我不屈不撓，像英法國內都有强有力的勞動黨在。積極的出兵決不可能，日本一國，我們毫無恐懼的必要。以它的海陸兵力論，蹂躪我們全國固然有餘，但事實上它不能做到：一因列強的

牽制，二因它的國策上不能澈底和我們結怨。所以充其量它不過占去東三省；但結果它還是非還付不可。並且我還敢說句極端的話，「不還付又有甚麼要緊？」東三省現在和我們國民確有密切關係麼？將來國民革命時又確容易連東三省也一塊兒蘇清麼？日本又會許我們蘇清麼？全體講起來，東三省現在不是名屬中國實屬日本麼？所以老實不客氣，日本它要就挪去罷！在這授受之間，或還可爲我們解決一重大隱憂！即以我們大多數的幸福論，失去一東三省，能救出其餘十九省，失去一兩千萬同胞，能救出三億七八千萬同胞，並不算得不償失。何況土地毗連，民族同種，使我們十九省的三億多人確能以後獨立自強，縱列強默認日本的占領，日本也確不能永久占牢呢！

總而言之，取這方法時，勝算可操十分之七八，別的法子，不易操到十分之三四，而時間的關係，非趕快救亡不成，捨此更無捷徑可走，我們誰也應當明白的。

四

外患的解決法談完了，以下略談內憂的解決法。——

誰也容易知道，中國現在的情形非澈底的革命不可。弔鐘響到了我們的頭上 Apollo 車上的銀箭，也已射到了我們的眉尖。死生歧途，我們已毫無所用其躊躇，昨夜被「墮落」，「虛無」，「不忠實」，諸惡魔所纏繞的靈魂，現在被曉風一吹，已發見眼前唯一的白路。這白路不是別的，就是乾脆的「革命」！無論花多大的犧牲，我們也只曉得以 Prometheus 的運命爲天職，——革命！

革命是絕無遲疑的；並且誰也容易想到，成功之期當不遠的。但革後怎樣辦呢？換句話，我們當

根據一種甚麼主義而革命呢？談到這點的時候，議論就很多了——在國內現在的情形，至少像可分爲三派。第一派，以脫除現狀爲原則，革後的組織只要比較地良好就行的人。這種人現在確還不少，但這種無責任觀念的革命法，我們雖在其原則上不反對，贊成是不能的。換句話，我們對於革後的組織，事前是不可不十分研究的。不研究時，我們決還談不上「有澈底的自覺」。十四年間國政之敗壞於野心家，傍落於軍閥，官僚，職業政治家之手的原故，都是因爲我們沒有責任心沒有澈底的自覺所致。還是這個態度，我們當配不上做一個「人」！更談不上「國民革命」！

第二派，就是三民主義的革命，這是對於將來組織有研究的。第三派爲共產主義的革命，這也是研究的，但這二者又當如何取捨呢？這正是我們眼前唯一的大問題。

但依我個人看起來，我們的革命主義，正當於這二派之間取擇之。換句話，就是我們當以三民主義的方法爲方法，以共產主義的主義爲主義。理由就是因爲三民主義在方法上不主張階級戰爭，而共產主義在主義上主張廢除私有制度，二者都是我們應當取法的原故。

反復說一遍，我們是主張私有制度當廢除的，同時又主張當廢除這私有制度時階級戰爭的方法決不取用的。三民主義的人以爲私有制度不當廢除麼？決當廢除！共產主義的人以爲階級戰爭決當採用而後能成功麼？決不採用猶能成功！——

五

„Wo eines Platz Niemand, Muss das anders ruecken;

Wer nicht Vestrielen sein will muss vestreiben……

Wer herrscht der Streit und nur die Stracke siegt"

（一物占住空間時，他物不能不避讓人們想不被趕走時，不能不趕走……在那兒作支配的是鬥爭，唯強者佔勝利）

——共產主義的人們，這不是你們階級戰爭的哲學麼？我承認，在「唯物史觀」的意味上。有史以來，個個人格的高潔者雖隨時隨地都有，但一階級，依「同情心」「人類愛」「公益心」等崇高的動機，放讓其固得的特權於他一階級的事實，則那一國那一朝的歷史裏也不能發見；所能發見的，就是第一階級差別，第二階級利益，第三階級對立，第四階級爭鬥而止。——這個話我也承認，在「歷史」確實如是證明的意味上。所以「萬國的 Proletariat 結合起來！」；國家是保護他們波淇窪的，我們打破它罷；波淇窪是萬惡滔天的，我們一切恐怖政策都用起來罷；人性裏面是永有一「人獸」(Beo-Humane)內住着的，我們仔細我們的「利益」罷；爲保護利益起見，「愛」是用不着的，我們成功後還不要忘記「肅制」罷；——這些話我也承認，在唯物史觀能夠加一貫的說明的意味上。

但是共產主義的人們！你們這些一貫的階級戰爭的作戰法在我們這中國還用不着。最大的理由，就是我們的國民都還只進化到「階級利益」那階段上，沒有到「階級對立」那意識上來，所以「階級爭鬥」那種過激的革命方法，我們現在革命時還用不着。我們並不是不承認你們唯物史觀的真理，亦不是說我們國內沒有階級。我們很知道我們國內無數的地主都是波淇窪，無數的農民都是潑洛流汰

理；但你們要知道，我們國內自階級發生以來，四十餘年，握政權的並沒有一次是波淇窪，辛亥革命以前完全是帝王與貴族階級，辛亥革命以後完全是軍閥官僚及職業政治家；所以現在一談革命，正是他們一致要求政權握得的革命決不是農民階級爲打倒地主階級的顛倒政權的革命。所以嚴格地講起來，我們現在的革命還是純粹的政治革命，談不上社會革命階級革命。所以階級戰爭那方法，我們就想用也用不來。

不待說「階級對立」的意識在農民與地主間絕對沒有也不能說。地主發揮其主人翁的派頭，對農民常持一種優越感，農民年必納其所得十分之六七於地主常抱一種不平心，這是確實有的。但這個第一因我們民族天性愛平和，妥協，與服從，遇好地主，則一種「溫情」爲之維繫，遇惡地主則農民自己又能默忍，所以歷來「對立」的溝渠還不很顯。而一二年連續豐收，或地方官又能仁以懲惡時，有溝渠也容易漸次化除。所以無論如何這個在現在不能化成「階級鬥爭」的形式。階級鬥爭的勃發，你們也很知道，是必待於產業革命後工業社會成立時而後容易有的。大工業資本家的擄取，才容易引起被擄取者的反感的。那末既然如此，你們的階級戰爭說總可施之於歐美日諸國，在它們的國內，確能如火如茶，只要它們的「國家」不爲虎作倀，你們的革命方程式，必可以馬到成功，但以之施於我們則還過分。

不待說我們很知道目前雖然過分，將來亦必無所逃於天演。因爲使我們幾年內革命成功，一面修明內政一面又得廢除不平等條約時，我們的產業革命亦必將應時而起。使我們沒有預爲之所，那時你

們所說的最後的慘淡過程必也不能不通過。

但唯其預爲之所，所以我們他面又主張採取你們的私有財產廢除制。

六

私有財產制度，無論如何，當廢除的。爲中國此後不起階級戰爭起見，爲人類進化躋於大同起見，爲人們現在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求改革求統一起見，這制度都是要廢除的；廢除這制度而後這三者可望實現。

(一) 許多人明白了中國現在革命用不着階級戰爭，又明白了這戰爭將來不得不防備，但防備的方法，則他們率主張以國家社會政策爲之調劑。但這個調劑方法是最麻煩且還是遺禍根的。我們很知道，在中國現在潑洛涑汰涅階級沒有覺悟的時候，充其量十年二十年內，中國大工業階級也還不容易大發達的時候，只要國家組織得法管理得人，用社會政策去調劑，本很可以保安於一時。其政策則爲減削資本家的利潤，制限個人資本的膨脹，防制私人土地所有之過大，或且進一步施行八時間勞動制，利潤均霑制，勞動者參與產業行政制，消費組合制等等。但這些方法，決不是根本的，猶不是次善的，這是資本主義的國內，怕階級戰爭勃發，用以彌縫補苴的。它們不如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補苴下去時，階級的慘禍即迫於目前；波淇窪，已陷於不能放手的地位潑洛涑汰涅又在必死力爭的時候，國家沒有法子，於是就絞心血想出這些東西來，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鬼混。其實它們施行這些方法後，幾曾免過危險，像英國炭礦夫罷工，鐵道夫罷工的事，不還是常常喧聞的麼？那麼

我們現 幸而好，沒有變成它們那種「欲罷不能」，「沒有法子」的局面，爲甚麼不作「澈底澄清」一勞永逸」之計，革命後即廢除私有制度呢？

談到這兒的時候，還有一密相關聯的重大問題在，就是我們此後革命成功時，還是用波淇窪執政，組成波淇窪的國家，還是用潑洛涑汰涅執政，組成潑洛涑汰涅國家呢？在主張以國家社會政策調劑勞資衝突的人，其用意自然是在組成波淇窪的國家；（不如是，他們的社會政策都無用處）但這種反乎「真正的德謨克拉西」的政治主張，我們能夠贊成麼？死也不能贊成！我上來說過了，中國眼前的革命，是「波」與「潑」合力的革命。在這意味上，我們所以呼之爲「國民革命」。所以大家又都在這兒拼命，努力。但如果革命成功後政權不歸於國民全體而歸於某一階級獨攬，豈不是「一邱之貉」，我們一脫「平民」與「貴族」（軍閥）之爭，又要陷於階級對階級之爭麼？大凡階級衝突之赤化率源於政治權之不平等。使有產階級握政，操持於內閣，跋扈於議會，借「國家」之力「治安」之名，爲固全其階級利益起見而施壓迫（日歐諸國，現在率皆如是）時，則亂爭「伊於胡底」？在說者或以爲「普通選舉」可以救濟，各階級都可在議會內擁護自己的利益，其結果像英國一樣。工黨也可以有組織政府的機會，雖日本現在無產黨也告了成立；所以只要「議會政治」施行得好，階級戰爭必不因此而勃發。階級戰爭是唯依經濟分配不公平而起的。我們只要能限制資本的膨脹與減削其利潤必可保無問題。

但這種說法是好看不好吃的：第一，中國的國情就和英日不同，第二，階級戰爭決不僅依經濟問

題而起，第三，使有產階級握政時，所謂限制資本等口號都不容易實行，第四，在有產階級的支配下，所謂普通選舉決難澈底，所謂議會政治仍不免是階級跋扈的政治真正的德謨克拉西決不可期。

中國的國情和英日不同的話，就是因為英國議會政治的訓練已逾百年，日本也已逾三四十一年，而中國則毫無訓練過。且日英都有皇室為中心的傾向，這傾向已成了國民大多數的信仰，所以政權競爭時，率取合法手續而不走極端。但中國則有國以來政治方面只有革命史而沒有改良史，辛亥以還皇帝退位，我們現在無從用一個「忠」使國人「投鼠忌器」。所以不覺悟則已，一覺悟則誰也「要！」。目前有產無產羣向軍閥要——以革命為手段，將來使有產階級握政權時，無產又必向有產要——而亦以革命為手段。所以這些地方，我們最當明白！專借他國的菩薩，是救不了中國未來的革命的。

至於階級戰爭不僅依經濟問題而起的話更是明瞭。古代歐洲平民之對貴族革命就是明事，法國大革命又幾曾不如是？蓋求經濟上分配之平均，無論如何先非政治權分配平均不可，這是原則。在唯物史觀固能認有史以來的革命，都源於經濟問題，但解決經濟問題的第一着，還在獲取政權這也是唯物史觀所承認的。

何況第三，有產者執政時為固持自己階級的利益起見，實行甚麼資本限制利潤減少之政策，決不容易辦到。我們想得到：那時候的政府是有產階級所支持的，那時候的議會，有產階級是占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占幾個議席，有甚麼辦法？他們有產階級的大多數會專以「人類愛」「同情心」等高尙的動機為動機，放讓自己的特權與利益麼？果會，則人類有史幾千年了，為何我們尋不出一個證據

來！

所以由此推起來，第四，有益階級握政時，甚麼「普通選舉」甚麼 Democracy，都是假招牌。他們不過用這些好聽的名詞混飾反對階級，其實跋扈還是由他跋扈，「多數決」之下，寧死對手的要求。我們切不可信日本的普通選舉——不過是選舉擴張了一些而止，尤不可希冀英國的工黨內閣，那是英國的特別國情，才可以產得出來的。

——所以由這政權爭奪的問題，我們想到中國眼前的革命時，當十分明白萬不可用波淇窪一階級專政！我們只可化全國為潑洛涑汰涅——用私有財產廢除的制度，而使「全國的成員」——舉出代表來執政。在這時候，階級已完全不存在了，波也沒有，潑也沒有了；有的就是全國的成員（Zunbue）；他們政治上經濟上的享受都平等——那麼我們還能想到有甚麼階級鬥爭麼？——所以一勞永逸，莫善如此，國家社會政策可以不必，有名無實的普通選舉可以不用。

不待說，這樣說完時，許多人必還要發許多疑問。第一，這私有財產如何廢除法？上來既已說過不用階級戰爭為手段。然則方法如何？第二，中國現在的情形，生產凋零已極，不使之發達不可，而使之發達時一般又必恃於私有制度的確立使之自由競爭而後有成，像現在廢除這制度其善後又如何？

——這二點我以爲可用一原則答復之就是取「國家資本主義」制度。

取國家資本主義為制度時，第一以國家的力收回一切私有歸國有決不是太難事。因為我們中國人素性既好平和，服從，又忌殺戮，危險，國家如臨之以堅決的態度訓之以勞動神聖——不工無食——

的真理，且能早爲籌措，使他們私財收去後，能率有處發揮，分配可期於平正。則決非難事。論者常引俄國爲例以爲危險已極，殊不知俄國是初次試驗，其預防與施設自然難於如意，我們現在是有例可援了，以俄國爲龜鑑法其長而改其短，安見其不事半功倍呢？并且我們的國民性和俄國人又不同，走極端的性質素來沒有；而時代正又好遇着無產階級尙沒有覺悟——對有產階級沒有怨恨，所以只要革命者早爲籌措一切，實行時決不至有慘禍可危。至如些少的慘禍，則總可不成問題，想到它日真正的階級戰爭的大慘禍時何取何從，已不待識者而喻。——要而言之，中國眼前的革命，理論上雖然是國民革命，但國民大多數還沒自覺，我們做革命事業的人，如預能規劃大計不做「近視眼」，以此至理導入於大多數的心裏，而引導之以革命，革後且進而實行這「廢除」時，決無大衝突可抵於成功。若使不在這次革命時實行而貽之於後，則行見無產者一自覺，全國的社會大革命必逐事實而俱起無疑。所以我深願全國識者及從事于革命的人關於這點，痛加研究一下，這是所謂「子孫事業」，並不是我好拉國家問題來倡高調。

其次取國家資本主義時，產業發達亦必可成功。誰也知道中國的產業非力求發達不可，在想取消私有制而行共產制的我們，更知道爲將來分配上不生問題起見非大大地求發達不可。這發達法第一就是前述的對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永絕利權外溢。第二就是國家董持一切籌備一切，用最科學的方法實行之。科有制度的自由競爭，固能促進產業的發達，但競爭的結果，奢侈品多於實用品，且生產與銷售不易調劑常起「恐慌」害實滋多，以國家主持之則必不如此，一時雖多少混沌——如俄國當時，

但漸次——日順暢——如俄國現在。併且我們應想到：中國將來要發達產業時，非借外債不可；但如使這借債權不全操於「國家」手裏，資本家任以其財產為擔保為抵押亦得向外國人借債時，我們將從何禁止其資本的膨脹及利權的外溢呢？所以原則上許認私有制度以上，甚應限制資本的話都是很難很難的，依我的淺識除俄國外。那一國像也還沒有這樣一種辦法——蓋因事實上極難辦到的原故。至如俄國獨能夠實行，則不外因它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原故，然則我們想真正行限制資本的方法也必待於原則上否定私有制度而後可能了！——事態至為明瞭，不知孫先生說了這句話後，國人為何還不一察？

七

上來我已略約記（一）為中國此後不起階級戰爭起見廢除私有財產制度的話說完了，但（二）為人們現在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求改革求統一起見及（三）為人類進化躋於大同起見也不能不廢除這制度的話還沒有說。但說來話更長，只好極簡單地合二者為一路說幾句罷。

在中國現在的時代——產業沒有發達，富者唯知低級地樂於富，貧者唯知可憐地苦於貧的時代——我們本無從談甚麼「精神生活」。國人在原則上就不省識這是甚麼東西，只要低級的享樂可以保全可憐的貧苦可以脫去，他們的人生觀就告完成，甚麼人格，道德，深刻的活動意識，生活感情，他們都不顧了，亦顧不來了。——於是社會更天天墮落，人性更天天低劣，甚麼新文化運動也無實効，甚麼知識階級也如贅疣其極，甚麼反動思潮也能存在。有是非麼？沒有，有善惡麼？沒有；是也行，非也行，善也行，惡也行；橫直這個國家這個時代不曉得「價值」是甚麼，誰也不要求它，不懷慕它。

——其結果於是卑劣與金錢同樣萬能了：孤傲者隱於高蹈，狡黠者躋於名流……風尚所播，雖最高學府亦不能免，把持操縱，爭攘攝奪，無所不為。研學麼？吃飯；教書麼？混鬼。——只可憐一部分好青年，感時疾俗，日日奔走號呼於革命！

但這個有甚麼救法呢？不待說第一步是革命。但僅依革命，能挽回這種頹風麼？萬萬不能！非實行共產制度不可！非使人人都勞動不可！唯勞動可以救這精神生活的破產，救這墮落到了極端的個人主義。又唯勞動，他們才能真正「返於自然」，拔出他們自己的人格來做「創造」工夫。

文藝復興以來，人也發見了，世界也發見了。人的發見，就是「我」的發見；我的內容的分析與精究，*since* 以來，差不多已經到了極限；但所謂最高意味的理知的我，自律的我，為甚麼在歐洲社會裏——物質文明發達到了極高程度的社會裏，還不能實現呢？並且政治，道德，宗教，藝術等方面，何以在波淇窪自己的階級中，時時也發出怒濤樣的革命聲呢？「懷疑」這惡魔，何以永遠巢在人間的靈府內，「文明」始終不給人們安息，神經過敏症專門流行呢？理想與現實，到底幾時可以一致？生活的藝術化，到底幾時可以實行？歐洲人正在苦悶中。

但我們可以答曰，這些問題，在資本主義式的社會裏決無解決的希望，這正是該社會自身的最大缺陷的暴露，該社會自身是解決不來的。要解決時唯有改門換面，到「以國家之力組成了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去！在那兒至少可以說：希望多些。（人間進化的前途是無窮盡的；我們誰也不敢說共產主義式的社會生活就是究竟的生活，但至少在現在比這更好的決不容易發見出來。）

現代人誰也不能不苦於國家生活？因為它被把持於特權階級之手，幾多大戰亂也被它弄成，幾多不正當的法律，制度，也被它弄成，而它偏說這是社會安寧上生活維持上沒有法子的事。我們知道它說的是虛偽，可是又沒有力量可以把它廢除。它是永不會廢除的，在有產階級把持的期限內。無論國際聯盟發達到甚麼程度，它為對內的關係，也永不會廢除的，有產階級要保全他們的私產與特權的原故。——我們於是對於生活愈有自覺，愈多苦痛，愈求完成，愈多龜裂。

但這種解決又當求之於何處呢？捨無產主義的國家外，沒有二途。無產主義不待說第一步也要國家，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式的國家。但這國家和那國家不同：這國家是為廢除那國家而生的，至如這國家自身則漸漸必至於自然斷氣而化成無。——關於這國家自然死滅的過程。列寧在他的 „Staat und Revolution“ 裏面，說得很詳，我現在因原書不在手邊且沒有逐句譯出的時間，記其大概則如下：

「波淇窪的國家之次，潑洛涼汰涅的國家跟着來。但這潑國家，已經不是真正的國家。並且不是用民主政治的形式，而當是用 Proletarie 獨裁的形式以實現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這是社會主義第一階段。由這一階段再進一步時就是第二階段完全的共產主義。在這完全的共產主義的時候，「各人從其才能，各人從其慾望」的原則，於是可以實行。從波國家變成潑國家時，國家機關當要破壞。但從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變到完全的共產主義的第二階段時則不如，其變化起得很舒徐且在我們不留意中變化下去。——簡言之，就是波的國家是被廢止的，

而激的國家——這個只能稱為半國家——則是自己斷氣的。」

——國家這樣絕息下去，死滅下去時，我們才真不至於受壓迫，受強制。生活才真可以自由發展——在真正的共存共榮的社會裏自由發展。「世界大同」的曙光，在那時候才真能沐浴得到，想望得來。否則是絕無希望的，甚麼國際聯盟，甚麼和平條約，都是鬼混一時的。

八

以上，我把新中國的建國方法——對外當自動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常用國力廢除財產私有制度二方法，略約說定了。由這原則與主義，再回到「蘇俄到底是我們的仇人抑或友人」的當面問題時當然沒有詳加說明的必要了。我只能一句話承認它是我們的友人：因為它的建國原則與主義和我們相似。我無第二句話可承認它是我們的仇人：因為它萬無可化成甚麼名義上就不通的「赤色帝國主義」者的可能。這到底是一句甚麼話？！不是帝國主義者中論蘇俄的一種詭辯，就是順天時報字林西報等混蛋用以欺負我們可憐的國人的！哦，真是可憐的國人！！

我起筆就說過：我們不僅因利害關係當聯俄，而且建國策上當學俄。學它有甚麼不好處？！傷了我們的虛榮心麼？我們自己有比它的建國策更好的在麼？我們開國七八十年來，那一天不是學西洋？它的現在此西洋那一國都好，為甚麼反不學？！我們學它的長處及它的試驗的結果，不學它的短處，而自加些洗鍊察些國情，為甚麼不可？！若說共產主義在中國不能實行，為甚麼在俄國又能實行？我們現在的情形比它革命當時那些不同？如果在中國共產主義行不通，我敢斷言別的甚麼社會民主黨的主義及

議會政治主義等當更行不通！爲甚麼呢？以中國歷史及民族性論，共產主義和我們的很有緣的，言必稱堯舜的人當知道那時是社會是共產——至少也和共產切似。但議會政治等怎麼樣呢？四千年歷史上就沒有看過那麼一回事！且行之十四年間，國人大多數還是莫名其妙！然則爲甚麼還要取法呢？不是爲「理想」所迫而然麼？那末百尺竿頭進一步，追到理想的極限，取共產主義又爲甚麼不可以呢？——要之，我們對於我們的行爲與主張，當十分反省，十分澈底才對。以感情談國策是絕不可以的。

我上來說過了：中國現在是最無是非無善惡的國家。就這次俄論爭看就知道，國內萬惡滔天的勢力方跋扈，將傾江倒海積極地想法子去講革除的人却不多而對微微不足數的幾百幾千（或者還沒有這樣多）個共產黨員反視作眼中之釘，不共戴天之仇！他們或誠然如攻擊者所說出入俄國公使館，弄錢賣節，（但事實上我回國兩三個月來，各方調查，並沒得到過真贓實據）但這究不過是他們的私德問題，萬不能因而就攻及他們愛國的行動。他們的行動錯了麼？卽以此次對於滬案問題而論，他們一徹地主張非英日並排不可的理論錯了麼？暫時端排侵不排日的話是一種外交手段唯政府可得而執行的，當國民的要主張時，他只能祕密對政府提出的。至於國民自己爲發揮真正的態度及喚起全國一致的輿論起見，則非從「原則」出發不可。「原則」上日本在這次是罪爲戎首，果不應澈底受排擊麼？春秋之義，我們那種趨避的辦法，果能算得是「有覺悟」的「大國民」麼？此外他們又那一點不對？打倒軍閥，他們也主張，我們也主張；國民革命，他們也主張我們也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他們也主張，——然則罪案何在？！攻擊者或猶以爲他們不應組織工會喚起工人的覺

悟？但工人不當覺悟的理由何在？不當喚起的理由又何在？即就他們的私德——所謂在俄國公使館弄錢用的話，我也有說。攻擊者如誠能實證他們純爲騙詐，則他們誠罪無可追，否則以主義相同精神一致的彼此間，金錢上通有無，又有甚麼不可？以視參戰借款金佛郎案，比例如何？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中國人腦子裏果有是非標準可求麼？我真不相信！至於三民主義的人的攻擊他們則理由又別，就是說他們不應操持國民黨務太烈，排斥真正的正統派太利害。但這個完全是國民黨內部的問題，我們不必在這兒深加討論。不過有幾句話要說：自中山先生歿後，國民黨混沌到甚麼地步？右派跋扈到甚麼程度？那時候國民黨人有曾自己出來力挽狂瀾的健者麼？依我們局外者看起來，不是共產派了派的人物存在於其間時，廣東局面，全國黨風都不曉得要變成一種甚麼現象。——這些地方，現在新起的三民主義者——正統派，似乎也應再思。一黨的問題和一國的問題一樣，要在於黨員的中堅分子自己出來「主持」，否則就無從怪他人「操持」，何況操持者亦以「革命」爲大旗，並非中山叛徒，和右黨相較有天淵之別呢，何況中山先生在世時，言論上事實上都引共產黨爲友絕未嘗視之爲仇，「三民主義」的「民生」講裏，現在還明明白白登載着呢！——蓋中山先生的主義，明明白白是社會主義，其民族與民權二主義完全是依據民生主義一點而來的。不過因他不認階級戰爭一手段在中國現在有必要，所以色彩就未進於「共產」，而止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形式。但其建國方略內所指示的一國家資本主義」的意思，和共產主義的國家進化說的第一階段，全相一致；而三民主義內所主張的限制個人資本的膨脹的話更非以廢除私有制爲前提不爲功——上面第六節，我們已經指摘了。是則孫先生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也是以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國家」建設爲目標（不過「未完」的三民主義僅說完第一階級）而方法上不取階級戰爭罷了。——這是至明的事實，精讀過三民主義與建國方略的人，誰也不容易否定的。所以我現在對於三民主義的正統派，很想進一言，以爲他們不必提甚麼「頭頂三民主義，左手打倒共產黨，右手打倒反革命」的口號，而應改提「頭頂三民主義，以作革命時的過渡，左手提攜共產派，右手打倒一切反革命」的口號，方真與孫先生的本心及言行不相違背。孫先生誠哉其爲偉大：其人格偉大，其歷史偉大，其思想偉大。在我們四千年的歷史裏，很不容易發見這樣面面俱齊的偉大。但偉大自偉大，崇拜自崇拜；我們決不可把他一切都「硬化」起來，使他變成「偶像」。尤不可固執他言說的一部，就抹煞他意旨的中樞。先生誠哉其明說過，不採用階級戰爭爲手段，但僅這一點決不能證明先生對於共產主義沒有傾向心。以先生平日政治主張的徹底及上舉各點而細察之，我們很容易看出先生有這種傾向心無疑。何況縱沒有，我們也可以擲國家百年大計爲大計，從而擴充之呢！使我們現在一面守先生的明訓，不用階級戰爭，他面又體先生的本意而力倡私產廢除，豈不是名實上都是真正的「中山信徒」麼！私有制之當廢除，已是絕無可非難的鐵則，而實行時，又本不一定要依甚麼階級戰爭。這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各依國家社會的實情，本可自由伸縮的；即共產主義的元祖 Marx, Engels 等也未嘗絕對地這樣主張過。許多學者稱 Marx 有兩個：一個是革命主義的 Marx (Marx, der Revolutionner) 一個是進化主義的 Marx (Marx, der Evolutionner)，就是一證。Engels 則尤說過這樣一些話，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寄 Marx 的書信裏……

Wir verstehen darunter (Schreckenherrschaft) die Herrschaft von Leuten, die Schrecken einflössen; umgekehrt, es ist die Herrschaft von Leuten, die selbst erschrocken sind. La terreur, das sind grossenteils auslöse Grausaukelten, begangen von Leuten, die selbst Angst haben, zu ihrer Selbst beruhigung.

我們常以爲「恐怖的支配」一語，是給他人以恐怖的人的支配，的意思；其實全然不然，所謂恐怖的支配，乃是自懷恐怖的人的支配。所謂可恐怖的事情，其大部分，是內懷恐懼的人，自己爲求自己的安心起見。幹出來的，——慘虐事情。）

不待說我們切不可誤會，他們雖間常說過這些話，但僅依這些話決不能就想證明他們反對過用實力革命，或不贊成用實力革命。他們甚麼地方也沒說過；不僅沒有說過，並且「共產宣言」裏面，還有下列的那些全相反對的言論。

「共產革命，是對從來所有的關係的最根本的打破」

「共產主義眼前的目的，和一切 Proletaria 黨一樣，第一是化 Proletaria 爲階級，第二是廢除 Bourgeois 的支配，第三是取政權歸於 Proletaria 之手。」

政權的取得法則爲

「爲得「聽謨克拉西」而戰」。「Eskämpfung der Wemokratie」。這「戰」字決不是隨便用的，便是「實戰」的意思，看以下緊接着的「Gewaltsamer Sturz」的字樣就知道。理由則不待說是認爲

非如是則萬得不着的原故。

——唯其如此，所以後來 *Marxismus* 裏就分兩派；多數派——激烈派的 *Bolschewismus*，就極端認定 *Marx, Engels* 他們都始終主張過實力革命，非照樣實行不可。所以一九一八年在俄國，他們就澈底執行這手段，演成很慘澹的階級戰爭。但我們又決不能因此就認 *Bolschewismus* 的 *Lenin* 等大不該，說他們大過激；因為這兒還有一個大大的理由，就是共產主義的大祖宗 *Marx, Engels* 等，曾沒有承認過「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可以分離」的原故。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必一致必同時舉行；一革命時，「社會的全法律全政治的上部構造必全要變更」；一般的政治革命決不就是社會革命，雖認為社會革命的前幕亦不能；而所謂法律的上部構造即是指私有制度；——簡言之就是私有制度不根本變更時，無論甚麼政治革命都不能稱為社會革命；所以「共產的革命是把從來所有的一切關係，最根本地加以打破」的。——根據這個理由，所以 *Lenin* 他們就二者同時並舉，無所謂政治革命是短期社會革命當為長期，——這種理論，他們一掃而空。所以其結果，他們用于政治革命的手段——「戰」，遂自然而然地並施於社會革命之上而成慘澹之局。

但 *Lenin* 他們的行為對不對現在不必研究；我們只問我們政治革命時是否要「戰」，第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又是否應一時並舉，第三，政治革命時的「戰」是否在社會革命時，也絕對必要——這三點答復得了時，我們的方針就可決定了。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英國日本等已有相當的議會政治的情形全不相同；軍閥那些東西，

挪着他沒有辦法，除以「戰」爲手段，民主政治決無希望，這點是誰也容易看透的。其次社會革命應與這次政治革命同時並行的話也是不錯；因爲不並行，將來成了真正的「階級對立」時，沒有解決法。

——一切的解決法，我上來都說過了決不澈底，永是禍根；並且除此之外，我們還急望「新生活」，「新人生」。但，又其次的政治革命的「戰」，亦必同時施於社會革命上則可不必。因爲我們國內的有產階級，沒有軍閥的罪惡之十分之二三，他們且有服從性，和平心，尤其現在與他們相對立的階級，都還沒有達於「怨恨」他們的地步。所以只要「國家」——政治革命後組織的新國家，能以堅決的態度，一貫的方針，及有秩序的辦法，臨之於其上，必可從容授受，而不至於要「戰」。縱事起倉卒，又值政治戰爭之後，保不住沒有多少反抗；但這點只要現在從事革命事業的人，都早做預備工夫，多設預防方法，那時持之以鎮定，忍耐的精神及恩威並用，教喻兼施的手續，亦必不至於要「戰」。縱戰也是小局面，決不至多殺如俄國（詳細請參照上面五節以下）。

九

——立於上述的國情及主張上，那末我們如想對俄國過去革命時的行爲，下惡聲的批評時，自然是可能的事。因爲他們那時的國情和我們現在並不相遠，他們的「戰」字，似不應適用如是之廣。此其一。根據這個理由。再去反對它現在對我們的宣傳——如果它確曾宣傳過無條件的「戰」，也很有理由。因爲這種戰法，我們在道德上，事實上，都不能認可。此其二。再根據這第二個理由，去教斥國內受俄國宣傳的共產黨人。如果他們確曾無條件地贊成過這種戰法，也是「振振有辭」。因爲他們太盲

從，太無研究。此其三。

但除這三種說法以外，蘇俄也好，共產黨人也好，決無再受攻擊的義務！並且那一個中國人——眼前生死關頭，莫知所出的中國人，也決無再對他們下攻擊的權利！至若由此而更進一步，攻擊到共產主義自身時，則更是可笑之尤！邏輯上既沒有這種推理法，適足以證明攻擊者自身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而止！尼采說的——

「明知之而故好多辯的人，比不知而多辯的人，還要卑怯得多！」

我相信攻擊的人，都是「學者」，「健將」，但我希望不要在不識不知之間變成卑怯漢！要說共產主義不好也不要緊，請從共產主義自身下手！說中國不能適用共產主義也好，請多方把理由說明！

二五，一〇，三〇。

晨報副刊一三〇一號十四年十一月四日出版

一三〇三 七

一三〇四 九

一三〇七 十四

۱۱۱۱

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的理由

常燕生

近來蘇俄仇友的問題，討論的人很多，我不是學政治，學經濟的，對於蘇俄的實在情況又未研究過，本不想說什麼話。只是看了關於此問題的許多話以後，覺得仍有一點爲大家所未討論及的問題，我因此不避淺陋，提牠出來。

我覺得關於蘇俄的問題應當分作好幾個部分去看。我們是否贊同廣義的共產主義（或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問題；是否贊同馬克司派共產主義又是一個問題；是否贊同過激派所依託的馬克司共產主義又是一個問題，贊同過激派的共產主義而是否即欲適用於此時之中國又是一個問題；如欲適用於中國是否完全模倣蘇俄的運動方法又是一個問題；蘇俄可聯與否又是一個問題；蘇俄的金錢可受與否又是一個問題；外蒙是否可任其聯俄又是一個問題；外蒙應否有自治權又是一個問題……像這些問題分析起來，很多很多，幾天也說不完。（不知徐志摩先生討厭這樣的分析不討厭）

我雖然對於共產主義不曾詳細研究過，但憑常識的判斷我是很表同情於廣義的共產主義的。便是馬克司派的共產主義我也有許多同意之點，尤其喜歡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運動方法和精神。我同情於吳稚暉先生的話：『俄國之社會主義僞者也，真正之社會主義國將起於馬克司之故鄉』。我爲什麼相信俄國的馬克司派是依託的，馬克司明明主張工業越發達之國家距社會主義之實現越近，而俄之過激派是乃專門傳佈其主義於工業落後之國家，即此一點，已可證其非馬克司之嫡系了。但此處我不過證明列寧之非馬克司嫡系，至於二說孰長，猶待討論。不過以列寧之不得不讓步，採取新經濟政策看之，可見工業落後之國家決無實現真正共產社會之可能，有之則僞共產之官僚主義耳。

關於這個問題，不是此時我欲討論的，姑且不講。我只說我認爲蘇俄共產主義對於中國最不適宜而且最危險之一點。這一點是什麼呢？便是蘇俄式的少數專制政策。現今蘇俄之政治不但非出於全體國民之公意，抑且非出於全體勞農階級之同意，不過少數共產黨專斷之政治耳。即此一點而論，姑無論其政府領袖之人格如何，政策之是非如何，已爲吾儕篤信民治主義之人所絕對不能承認。蘇俄共產主義者假共產之名行專制之實，與中古教皇假宗教之名行專制之實，其爲害相同，人之迷信之不以爲非也相同，羅素謂馬克司派爲新興之宗教，誠然，今之蘇俄猶謨罕默德之回教大帝國，即欲以其盲目之信仰征服世界者也。吾儕渴望自由之人對於此種宗教式之主義非反對不可。

假使此主義實行於宗教信仰素強之國家（如俄羅斯），雖不免有違反自由與人道之處，然猶以真誠純潔之精神行之，尙屬可敬（其書即在俄國已有多數弊端，請閱醒獅五十四期即知）；假使此主義而行於宗教信仰心極薄，專制餘毒極深，官僚政治色彩極重之國家如我中國者，我敢言其所生之弊惡猶百十倍於他國。蓋有此主義之後，在上之秦始皇明太祖輩即可假之以維持其獨斷政體，在中之王治馨陸建章輩又可假之以實行其官僚政治，可憐之農工固已日爲人所假而不知，少數有爲之青年又惑於主義而不生反抗之心，於是共產政府遂可維持其獨裁至於千百年。此種政治，吾中華民國在一千九百年以前之王莽時代已備嘗之矣。可惜張作霖吳佩孚輩畢竟頭腦簡單，不知利用此種頭銜，否則青年早已歌頌其獨裁政治之聖明矣，如或不信，請看廣州之蔣介石政府。

天下大政治家之成功，往往在於善於播弄名詞，以朝三暮四之術，玩民衆於股上。譬如『開明專

制』人所懷疑者也，自有大政治家改爲『訓政』，使大多數人從而恭維之矣，又如『賢人政治』亦人所懷疑者也，自有大政治家改爲『以黨治國』便又有多人從而附和之矣。其實此種『訓政』此種『以黨治國』之方法吾儕早已領略過了，謂予不信，請看模範省的模範督軍他的村範政治，非訓政而何，他的排斥異己非黨治而何，其結果亦不過造出大大小小若干委員區長之飯碗多向老百姓身上刮幾個錢耳。此種小官僚決不會到孫中山執政以後便一變而爲真了解三民主義者，更不會到列寧執政以後便真成共產主義之信徒。

所以我說蘇俄之最可怕者，卽在以其專制之榜樣暗示於青年，使青年有爲之士不從坦蕩蕩的民治大路走，而迷信使武力萬能排斥異己之黨化政治，不但不爲專制主義之敵，反變成專制主義之擁護者，其結果則促進民族之死亡而已。

我嘗謂歐戰以後世界上有兩種反動的大潮流，一是反對物質的復古主義，二是反對民治政體之專制主義。此兩種潮流實爲人類之大敵，歐洲人苟迷信此種潮流，盡棄其十七世紀以來努力之結果反向回頭路上走，則白種人必滅亡。然我信白種人絕不若是之愚，倒是退步的黃種人有點危險耳。我相信惟有物質文明與民治主義這兩條大道是人類的公路，中國人其毋走向歧途。

我
也
來
談
談
蘇
俄

張
慰
慈

在一九一九年，美國有一個社會黨首領，斯巴哥 John D. Pargo 寫了一本書叫做『把俄國看做美國的問題』Russia as an American Problem。當時蘇俄政府成立未久，一切對內對外的政策還沒有十分確定，並且照那時候的形勢看起來，蘇俄政府是否能夠站得住，什麼人都沒有把握，但就在這個時候，這美國社會黨首領已經把俄國問題看得非常重要，並且在那本書的序裏又慎重的聲明說：『我國的將來大半要看這俄國問題怎樣的解決。』

美國和俄國的距離這樣的遠，並且其歷史上的關係又不是十分深切，至於要說俄國的過激主義能夠影響到美國，那恐決不至於在短時期之內所能做到的，但美國就已有有人提出警告，大聲疾呼的唱美國將來看俄國問題怎樣解決的調子。但我們中國呢？在前幾年，我們大部份的人民對於俄國事情差不多不聞不問，有一部份少數人民看見當初蘇俄政府的宣言，就以爲俄國真能幫助我們抵抗別國的侵略政策，一心一意的把他們看做朋友。我們中國人向來有一種祇知注重空言而不求了解事實的趨向，自然很容易被蘇俄政府那種花言巧語所誘惑。比方在民國九年四月間，蘇俄外交總長霍曲林送給中國政府的公文之中有一段說到蘇俄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他說：

『蘇俄政府放棄從前俄皇在中國，滿州和別處所侵奪到的一切權利。人民自己應當決定他們願屬於那一個政府，和他們所願意採用的政體。蘇俄政府把俄皇，俄國兵士和資本家所侵奪的一切礦產權，森林權，和別種權利都恢復給中國。』

蘇俄政府又退還我們庚子賠款，放棄俄國商人所有的特權，並取消他們的治外法權。未了，他又

嚴重的聲明，以後中國人民如以武力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犯，俄國勞農願以赤色軍相助。

從表面上看起來，這是何等親善的話。但這也祇是表面上的話罷了。我們如果把民國九年以後蘇俄政府對於中國的一切行動和政策，就可以看出他們言行之間相差的道路真是遠得很哩。

但無論如何，俄國的政策和行動，與我們中國確有最密切的關係。美國的將來，未必一定要看俄國問題怎樣的解決；但我們中國的將來，確實要看俄國問題怎樣的解決。現在南邊廣東差不多已經在俄國人的勢力之下，差不多可以算是赤化了，將來萬一不幸，北邊無論那一部份也被俄國人佔了勢力，變成赤化，這兩頭的赤色勢力就很容易包圍我們中部，使之不能不同化。這一層確是最大的危險。最可憐的就是我們向來不曉得去注意這一個重大問題。近來有一部分人總算是覺悟了，曉得去注意這問題了，各種報紙上討論俄國問題的東西也多了。這也算是我們的覺悟。但大部份的討論都是『赤白仇友』問題的討論，注意理想，而不注重事實，並且又大都偏向於俄國對於中國外交政策方面，而不大注意於俄國內部狀況。所以現在各報上的討論還祇是一方面的，不徹底的。俄國問題既經與我們中國有最重大的最密切的關係，那末，非但俄國的外交政策能影響於我們的將來，就是俄國的內政也能直接的或間接的影響於我們的將來。

現在想研究蘇俄內部的事情確是很不容易的，我們不懂俄文的人實在沒有方法可以找到研究的資料。在別國文字之中，除了德文之外，差不多沒有多少關於俄國的書籍和記載。在歐戰以前，德國和俄國在商務的關係比較和別國更為深切，所以德國的商科學校之中總有俄文這門功課，並且德國人

得俄國事情的人數也比較懂得別國事情的人數來得多。歐戰以後，德國人更不能不研究俄國事情了。那時候俄國的紙幣跌落，祇有在俄國市場上，德國才能買得起一切的食料和原料。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不計外，這俄國問題關於德國人民經濟上的生死問題，德國那能不仔細研究呢。所以德國現在有好幾種報紙差不多是整個討論俄國經濟問題的報紙。在這種地方看起來，德國人就比我們中國人高明得多了。我們從前對於這個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俄國問題完全不大關心，現在覺悟這問題的重要，也祇曉得從『赤白仇友』方面發表了許多個人的主觀的意見，不曉得從客觀方面切實去研究俄國的事實。這幾天的報紙上，特別是晨報副鐫和京報副刊都充滿了仇俄和友俄兩方面的辯論，甚至於互相詈罵。這類的東西現在看看實在覺得討厭了，並且這也不是學者所應當有的態度。赤色主義不是一個仇友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學理的問題，完全是一個事實問題，就是在俄國的那種赤色主義之下，他們的經濟組織究竟是怎樣的，人民的生活又怎樣的。我們對於這種具體的事實沒有知道詳細之前，一天到晚去爭論俄國是我們的仇還是我們的友，這樣的官司總是打不清的。所以我們希望那幾個到過俄國的，懂得俄國文字，並且研究過俄國情形的學者以後不要再來空口的提倡親俄或友俄政策，也不要高談闊論，講演那套赤色主義不是帝國主義的論調，我們總是希望大家能夠平心靜氣，用一種客觀的和科學的眼光去研究俄國的事實。俄國的新制度已經試驗了八年，這八年的歷史確是極好的資料，可以給我們不少教訓。

俄國的列寧主義是一種宗教，一種信仰，其所根據的是一種特別的經濟制度。我想這一層無論是

贊成或反對俄國的人大家都可以承認的。開痕司在他那篇論蘇俄的文章裏邊（十一月四日是報副刊）提出一個問題，他說：『我們能不能希望這種經濟學幸而與人的天性是相反的，決不能賺出錢來補助傳教或軍備的活動，將來定必失敗的？』比方像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可以不必從理論方面去討論這種經濟制度是否與人的天性是相反的，是否有存在的希望，我們祇須看看俄國現在的情形，他們是否還是實行當初共產黨所提倡的主張，一些沒有改變。如果他們自己已經把他們當初所奉爲天經地義的主義改變了，那就可以證明他們這般人都是一班投機者，他們利用了很好聽的主義來得到政權，等到政權到手，爲維持自己的勢力起見，就不惜犧牲主義。我們姑且看一看俄國這八年的歷史以後，再下斷語。

俄國革命以後，那般當權的人都是一般理想家。他們對於經濟社會和工業方面的智識祇是從書本裏得到的，所以他們以爲經濟方面的一切事實，無論在怎樣的制度之下，都是能夠自動的發展。男的和女的還是各依各人性之所好，去做各人的工作。雖則發生了革命，資本主義的社會是推翻了，但資本家還是去做資本家的工作，科學家還是在試驗室裏邊研究自然界的事物，美術家還是繼續不斷的創造一切美術品。這就是唯物史觀的學說。並且依照他們的觀念，工人即使得不到工資，還是在每日早晨集衆在工廠門口，預備進去工作；田裏的收成即使收歸國有，農夫還是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預備每年的秋收。他們差不多完全沒有想到在現今的社會中，工人爲了什麼才做工的，農夫爲了什麼才耕種的，資本家爲了什麼才舉辦實業的。

俄國的執政者發現了工業方面的一切事實並沒有像他們學理上那樣的自動發展，他們起初是非常駭異，以後就大怒而特怒，把工業停頓的罪名歸到資本家和有產階級的身上。無論什麼人不執行那革命以前他所做的一種行業就犯了反叛的罪名。工廠廠主因無利可圖，把工廠的門關起來；工人因為忍無可忍而罷工，農民因田地收成收歸國有，不願意耕種，都犯了叛國的罪，作為亂黨看待。其結果就使俄國那時候的情形不堪言狀，人民凍死和餓死的每天總是上千上萬。蘇俄政府為維持它地位和勢力起見，就不得不改變方針，自行取消其共產制度，於一九二一年的三月實行新經濟政策。這新經濟政策雖不能算是完全恢復從前的資本制度，但與當初他們所奉為天經地義的馬克思學說相去已經不曉得有多少遠了。從此以後，各種工作都有差等的各級工資，私商也得法律上的承認，其餘一切經濟的情形也都不依照學理上的共產主義。

就在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前，蘇俄政府早已承認共產制度的不能實行，規定了許多例外。共產黨第一次容納人民經濟上不平等的原則是發源於一個唱戲的。這確是很奇怪的。俄國有一個唱戲的叫做嘉來品（Chalapin）他是俄國人人所愛聽的，如全從前北京的小叫天一樣。共產黨又是極力想增加那無產階級對於美術和文化方面的興趣，所以他們對於戲曲一類的藝術是極力提倡的。他們當然能夠對於戲園裏規定種種平等的規則，例如他們能夠把所有的坐位賣一樣的價錢，但他們却不能使嘉來品出來唱戲，給他一種和普通工人同等的工資。蘇俄政府的機關報紙對於這個問題討論了好久，這時候，一個唱戲的居然胆敢抗拒政府的命令，實在是無法無天了。但嘉來品確是俄國人人所喜歡

的，比之中國人現在喜歡梅蘭芳還要利害，共產黨是少他不得的。起初的時候政府對於他哀求，哀求不能發生效力，就用了種種威嚇的手段，但無論何如，他總是不聽不怕，非給他相當的價錢，他決不肯出臺唱戲。蘇俄政府於無可如何的時候，祇允許他的要求，打破共產制度的通例。以後紙幣的價值愈落，他要的戲價也愈大。這可以算是第一次的破例。以後跟了來的就有各種重要工廠中的技術人員的要求增加工資，例如兵工廠之類，這類的要求共產黨也不能不承認。所以這新經濟政策並不是偶然發生的，確是為各方面所逼迫，政府不得不讓步而採用的。

俄國共產制度失敗得最利害的地方還是在於農民方面。蘇俄政府對於農民實在沒有辦法。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十年之間，蘇俄政府用了種種方法想赤化農民。在每一個村莊裏邊，政府使那最貧窮的最無聊的人組織一種委員會，把那最有錢的農民的財產和田地充公。每一個農民又祇准留住一小部份的收成，把其餘的交給國家，作為農民送給那神聖勞農政府的貢獻。但這種計劃却完全失敗。村莊裏邊的階級爭鬥使所有田地荒蕪，沒有人去耕種。農民對於共產制度毫無一些的热心，他們不肯把田裏的收成交出來，所以政府就不得不用武力去強搶。其結果却使各處農民以武力抵抗，發生農民革命。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十年的兩年時候，俄國的農村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反叛的。農民的革命當然是很難成功的，但他們却更進一步，完全停止耕種。其結果就發生俄國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間的饑荒。蘇俄政府無論怎樣的利害，對於這種狀況就無法對付了，所以不得不讓步，改變方針，實行新經濟政策。列寧自己也承認共產制度的失敗，所以他說：

『在別國未曾發生革命之前，我們祇有承認農民的要求，才能維持現今的地位，不至於全功盡棄。……照現在的狀況，我們不能不承認中等農民經濟方面的需要，否則我們就無法在俄國維持無產階級的權力了。』

所以這新經濟政策所注重的是農民一方面，其中最重要的特點有兩端：（一）規定一種新的土地所有權制度，（二）一種新的賦稅制度。土地法典是於一九二二年的十月編製的。依照這法律土地國有的根本原則還是維持的，但關於共產制度的種種試驗却廢除了。從此以後，農民得到土地以後，這塊土地能終身為他所有。至於賦稅一層，農民從此以後須把他收成中確定的百分之若干交給政府，其餘的數目可以留給自己用。蘇俄政府從此以後對於農村方面事務又採用一種不干涉主義，赤色主義的勢力祇在於城市一方面。俄國的鄉村早已沒有共產制度了。

這是俄國共產制度從農民方面所得到的經驗。蘇俄政府的執政者總算是識時勢的英雄，他們能進亦能退，就是騎在老虎的背上，他們也有方法跳得下來。將來他們也許能夠更進一步，實行一種新新經濟政策，也說不一定的。

從我們中國一方面着想，我們對於這樣的人，這樣的政府和這樣的政策，萬萬不能處於旁觀的地位。我們總得要時時刻刻的注意他們的行動和政策，我們總得要把蘇俄看做我們中國的問題。

仇俄與反共產者的面面觀

劉侃元

其一 駁張慰慈氏

蘇俄問題討論了一個多月，友俄與仇俄相對立；前者僅從中國眼前的國際利害關係出發（不待說這點也很重要），置共產主義自身及其適合於中國與否於不談，立言墮於第二義，致引起後者仇俄派處處尋隙，鬧成一場混戰，煞是可惜！但仇俄派，則更不成話；他們的神經中樞，在前一世紀就像已被蘇俄那伯友鬧成了又衰弱，又昂奮，一觸即發，狀同顛癲。蘇俄是甚麼，他們不明白，國家資本主義是甚麼，他們不明白，國家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如何，他們更不明白。他們所明白的就是蘇俄是赤化，是國家資本主義，因而就不是共產主義，就有政治的經濟的侵略的可能，我們不僅不當友它，而且當仇它，仇它比仇帝國主義的國家還要利害些，因當它是新式的赤色的帝國主義，并且「收買了我們國民的良心，腐蝕了我們國民的靈魂」（最後兩句是「學者」張奚若說的，見晨副十月八日）。——你看仇俄論者的腦筋簡單，思感低劣，到了甚麼地步！我們真恨不得從韋癡球借「一杯麥飯」，去弔弔這陶然亭的「芳？心」，向諸葛亮借「伏地大哭」去祭祭這瀟水裏的「冤！魂」呀！至若問到共產主義自身是甚麼，則十有九不答，答亦謬誤百出，像抱朴說「俄國只有共產黨，沒有共產主義」（見晨副十月二十二日）就是一個；問到中國為救亡及將來計，當取共產主義為法與否，則更非他們所願，除勉己，關於此點有一篇「反共產的理由與主張」（見十月二十八日晨正）勉強可供我們一讀外，其餘都視作風馬牛。——要之琅琅數十篇仇俄反共產的論文裏，除一勉己外，都只有否定沒有肯定，只有批評沒有主張，其極，只有外強中乾的豪罵與教訓，沒有知識與誠意：——這是稍有學者良心的

人，都容易看到的。尤可笑者就是張慰慈，他用「宗教團體」的「阿瑪那」的共產，來論全社會大規模的共產（晨副十月二十九），牛頭不對馬嘴，姑不計外，他又撫拾些淺見近識的英美著作，來曲解俄國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動機，雌黃當時的事實（見晨副十一月十二日）。在列寧他們那些大主義家，大事功家，果會需依一個優伶要求報酬的因故，就實行新經濟政策麼？「學者」的喜劇，見演得這麼好看！

附記：張氏十一月十二日的論文內，起筆就引了一個美國的 John Spargo 的著作，但 Spargo 關於蘇俄的著作，差不多全那都是有偏見的。譬如：“Bolshevism, the enemy of political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The psychology of Bolshevism”; “The greatest failure in all history”;……等等，都是死認蘇俄為世界的脅威者，從頭頂上就下攻擊的。不僅他如此，舉凡英美學者對於蘇俄的言論差不多都是一樣，我現在別的人姑不說，即就世界有名的大識者開痕司這個人看時，他對於蘇俄的觀察也非常武斷（他的「論蘇俄」，現在又由張慰慈譯登在晨副上了——十一月四日起日）。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四日他寄東京朝日新聞的電報通信裏，批評詰諾瓦會議曰：“……反之軍國主義制勝時，經濟上的惡疫必忽蔓延，世界各國內，錯覺症的革命必續起。波爾希維茲姆，畢竟就是這精神病，他們於受壓迫與苦痛之餘，失了理智，不知不覺地化成了奴隸與猶太人的乖僻，魔於夢樣的理想熱內。這烈火樣的精神，要為法國大革命時夾哥拉黨的羅伯斯披也爾所幹的一時的恐怖政治，決不能持久”云云。——你看武斷得幾多利

害：要之英美學者中，僅一羅素的議論可觀，他的“*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誠不愧爲世界第一流學者之作；不過我們讀時，也得留神：他是一個帶無政府主義色彩的人，對於波爾主義，自然還不會多表同情。我們想研究蘇俄問題的人，最好能直接看俄文，不能則當看德文，列寧他們的著作。差不多全部譯成了德文，並且德國學者的研究態度與學者良心，比英美人高幾多倍，雖然社會民主黨的人，個個也都愛說蘇俄的壞話。

我這篇文章起草的動機，本來是專想以張慰慈及勉已二人爲對象的——前者因其是非錯亂，想舉幾個確實的證據給他看看，後者因其「主張」不澈底，「反共產的理由」不充分，想和他作切實的討論。但今日（十一月十六）在晨刷上又發見了張奚若「共產主義與中國」及常燕生「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理由」二文。前者尙未完結，在這第一天的登載裏，雖已發見了許多錯謬，但反駁總可靜以待後，後者則本天登完了，其用意不外主張民治，反對獨裁；但其民治說說不及文天倪的豐富（見甲寅十三號），反對獨裁又視共產黨獨裁與帝王軍閥的獨裁爲一物，本不值多駁，不過由此既可看出國內淪沉於英美虛偽的民治主義中者尙大有人，迎頭痛棒亦不可少。——以下我根據這三人的議論作一篇「仇俄與反共產者的面面觀」。

一，駁張慰慈氏。

蘇俄革命成功已經八年了，在今日再舊事重提，介紹他們當時實施新經濟政策前後的事實動機，真是日本俗語所說「等於算死兒的年齡」。但事實上沒有法子，中國人竟到現在還不明白，張氏那種

議論與翻譯，竟還有「社會報」（勉己自稱的）的晨報爲之登載，我們真不能不嘆爲「觀止」！張氏最大的毛病，第一是受惑於英美學者的淺薄的宣傳：不明蘇俄革命後幾年間的事實，第二就是不明「新經濟政策」的理論：像蘇俄那種未開化的國家，怎樣才能得到產業的發達。第三就是不明新經濟政策實施後蘇俄的實情：現在是否還是向下抑是向上。關於這第三點，我因此次歸國沒有多帶書，一切德日諸國學者的視察記及統計表，不能舉示出示，很引爲遺憾，但至少布施辰治氏的文章及陳翰笙氏的統計（雖很簡略）——都登在十一月十三的晨報上——希望張氏及讀者精讀。我在這兒，那末，就止談談第一點第二點罷。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向後一年間，蘇聯確陷於極混沌的局面。世界最有名的大經濟學者與社會主義研究家 Werner Sombart 在他的「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一九一九年版）裏說明其理由曰（“Bolschewismus”一章內第二節第一節）：

波爾希維仔姆的失敗，完全歸之于新秩序的罪，是不可以的（譯者——所謂新秩序，就是指革命後頒佈的綱領；詳看 Buharin, *Das Programm der Kommunisten* 1918。這書聽說 Badck 還做過一篇敘文，但我看過的維爾納「社會革命」（*Die soziale Revolution*）雜誌社所出版的，沒有這個。）原料之不足，輸送之障害（譯者——因爲革命前參加歐西大戰的原故）及其他許多原因都應該計算在內。沒有那一種原因是可以孤立的，僅以目前蘇俄產業的逼迫，來說明波爾的失敗是全然錯誤的見解。

至於該新秩序新組織的缺陷——行之半歲即已顯現出來的缺陷，則爲

(1) 各經營內勞動者能率（生產力與強度）的退步。其原因則爲

(a) 指導之缺如，

(b) 訓練之缺如。

(2) 不預先把需要精算，就集權地分配起來，想生產適應於需要，這是實行上不可能的事。

(3) 共同經濟組織裏有兩三部門，根本地失敗了。（譯者——S這兒所說的兩三部門，第

一，是指農業，因爲波爾綱領，對於農政，主張土地國有法，集產耕作法，強制徵收法，農村於是鬧成非常混亂。第二，是指工人的報酬太厚，國家無現金應付。至於濫發紙幣。第三，當時俄國營商業太利害，致國內貿易毫無生氣。看他這一章全體的論述自明。）

——S氏這種說明，大致可謂是很公平很正確的。S是德國人，主義上反對蘇聯的，然其經濟眼光的批評也不過如此。其他蘇聯許多綱領——如國家操國外貿易權，內河航行權，鑛山鐵道國營權，大工業國營權等等，S並不反對，且認爲戰後待恢復的德國，亦有借鏡的必要云云。看來蘇聯革命後所行的經濟政策，除二三部門外，并不全是無謀的暴舉，可想而知了。這二三部門爲後來改行新經濟政策的有力動機固不待說，但張氏對於這些點不多紹介，格外添加一些甚麼「工廠主人閉廠，工人罷工」等話。革命後蘇聯的工廠屬於國家。還有甚麼「工廠主人」？工人的生活保證於政府，幾曾對「主

人一罷過甚麼工？不待說大戰後與內亂中，經濟困苦萬分，政府對許多工場停止作業，許多工人因亦陷於失業，這確是事實。但失業和罷工全然兩樣，不可混同。同時政府用移住法——移都市工人於鄉村農間後，並沒有發生過大危險。且蘇聯以勞農立國，這兩階級自然是優待之列，S氏還曾譏其用人工提高工價為不當，況政府對於失業工人，又為之設特別委員會，並考慮其自身及家族的物質情形保證其必需品呢！（以上都見S同章第二節。）

——除此不論外，張氏對於農民與飢荒一面，尤多臆斷或捏造。查波爾革命後對農民的設施為集團耕作，耕地國有及強制徵收等三大項。其中強制徵收一項，一因是戰時，二因想急速恢復大工業，三因想根本地剷除富農與地主，乃暫時不得已的政策，並不是永久的政策。永久的，永久想實行的政策則為前二者。但這二者都不易成功，集團耕作，農民不慣，土地國有，農民不悅，且耕具種子都非常缺乏，於是鬧成春耕不成秋收不能的現象，這也是的確的（但張氏沒有指出）。但除此以外，還有別的大原因，就是鄉村間地主富農非常跋扈常與赤貧的農民四起爭鬪一事。Neretelli 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國民議會演說時，就明說過：

「不錯，土地的所有者，事實上確已變更了；但是，諸君，由田園得來的情形看起來，土地果已變為貧民之所有麼？革命所得的土地，事實上不是被農村的財主及富農所霸佔麼？如果農業的改良，就是這樣固定下去，我們偉大的俄國革命，可謂強者富者為王，適得其反了！」（略譯，亦見S書第二節。）

——因此之故，赤貧者於是遂組織「貧農委員會」，對富裕者行強制，富裕者則以隱藏蓄積為報復，有時且多用槍火相抗。——這些關係，於是弄成革命之後三四年間，年年有饑荒，有內亂。但這饑荒與內亂並不甚大，我們由事實可以曉得：第一，那幾年間，俄國並還得和歐西各國通商（通商始於二一年三月以後），總能自己支持下去，就可想到饑不很饑。第二，內亂的性質並不是全農民舉抗政府，乃大多數的赤貧農民舉抗豪農與財主，換句話，還是階級戰爭的延長（階級戰爭在都市解決較快農村解決較遲是必然的，布施辰治說俄國今年還下令驅逐地主由此便可想見了）。——所以在蘇聯政府當時，還是如何設法使農民慣於集耕及產物國有等點，而不在這些不關大局的點；那幾點結果做不到時，於是才別開生面，許農民以產物私有等等。但那些事待後說。

要之自一八至二〇年間的飢荒與內亂，當如上所觀察去詮究其理由，不應如張氏死認政府以一武力強搶「農民以「武力抵抗」，於是至於「完全停止耕種」。便完全停止耕種四五年，外國又不能通商，蘇聯的國民不應死盡麼？！中傷，杜撰，真太豈有此理了！

張氏還有一大錯誤，就是把二一至二二年的大饑荒視為上所述的三段論法的「結果」。政府搶，國民抗，於是完全停止耕種，於是造成二一至二二年間的大饑荒——張氏說。但這個與事實也毫不符合，二一年三月正政府頒發新經濟政策之年，饑農民以前反抗過政府，但在這年那會反抗？！那會不耕種，至於這年與第二年——二二年又饑荒！縱我們退一步抹殺事實承認張氏的「反抗」，「停止耕種」等字樣，但「完全」停止耕種還是毫無根據。Klojicow 在 "Die Missurats des Jahres 1922 (Zahlen

und Tatsachen)”，(「一九二一年的饑荒」)裏，畫有地圖，舉有數字，全耕作面積三千七百萬「特斯科丁」之中，凶作地約為四成，全農民一億一千四百七十萬人之中，飢民約為三成三分；其餘，有餘谷的地方也有，收穫夠於需要只缺少種子的地方也有，——並不是全國全饑。而其理由則無數，如天時亢旱，交通機關之尚未恢復，種子與耕具之缺乏等都是。張氏既不明二〇年前饑荒的原因又不明二〇年後的原因，一味混扯，果是學者「研究態度」所應有的麼？

除此之外，還有他對於蘇俄承認報酬不平等係因於「一個唱戲的」的話。他說這唱戲的叫做甚麼 Chaliapin。無報酬則不唱戲，勞農政府於是棄其主義，給他以重報酬，因為想聽他的戲。——真是滑稽之尤！

查蘇俄之行新經濟政策，其最彰明較著雖為二一年三月以後，但其發端則在革命後第二年——一八年。那年三月二十四日杜洛滋基「勞動，訓練，及秩序，三者其庶乎救社會主義蘇維共和國」的演說（“Arbeit, Disziplin und Ordnung Werden die sozialistische Sowjet Republik reden”）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寧「蘇聯國的諸緊急問題」的演說 “Ueber die nach stehend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 裏，就已明白表示過。上舉S氏所指摘的（1）（2）兩條缺陷他們自己就已察覺。以所杜洛滋基忠告黨員當自動地自制，不可怠業，且說凡專門家當給以自由的活動使之創造。列寧則說（A）為增進生產力及強度起見，各經營當要嚴格的訓練；指導者當多報酬；工資當依製作多寡而定；當取用「特羅組織」（Taylor-System）……（B）為完成全體的組織，調和生產與需要，及正當分配

起見，常組織消費團體等等。並且這些提案立經大會通過，實施爲法。是則階級之生等級，純是爲指導者專門技術優秀者一般而設，目的則在於生產力之增高而不是爲一戲子及在於想聽戲了！張氏不是故意栽謬麼？

二

以上我把第一點——張氏不明蘇俄革命後幾年間的事實——說完了。以下再談談第二點——他不明蘇俄新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的根本理由。

蘇俄的產業程度，比資本主義的英美諸國差得很遠，這是誰也知道的。但在共產主義的原則上，私產既不能承認，而又要謀產業的發達以謀「配裕如，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呢？這正是「未開國的共產主義」的最大苦痛處，——誠如羅素之所指摘。不待說，大工業國有，交通機關國有，國際貿易國營等，都收了很大的效果沒有失敗，但農業方面怎麼樣呢？「共產村落」，「集產的模範農場」都不易得農民歡迎，尤其是地主階級及富農所組織的「農事產業組合」不易撲滅——簡直沒有法子。又不待說，政府有的是兵力，強制徵收與壓迫都可能；但是「口口口」有句名訓：「革命中易演的惡行，和別的時候一樣」，長期的強制徵收與壓迫，然則不是惡行麼？——縱如列寧自己的辯護，這不是惡行，是一爲根絕舊制度起見，二爲戰時起見，出於不得已；但長期地這樣繼續下去，果是根本辦法麼？——這兩個事實問題，確是波爾政府所最頭痛的點，爲新經濟政策實行上兩個有力的理由。

但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大理由。就是關於「資本主義」四字的經濟學理上的解釋。在共產主義的

主義上講起來，資本主義是惡物，當勦滅，自不待說，但這是解資本主義爲「果實的收穫」(Dasein, Ouss)的意味而言的：除此以外，資本主義還有一個作「運營方法」(Modus Operandi)的解釋的一面，這一面在共產主義——尤其在未開國，產業尚未發達而想行共產主義——果亦常排斥勦滅麼？馬克斯說過：資本主義是「經營行程」(workprocess)，又說過，是「價值增進行程」(Wertungsprozess)——這正是指這第二面說的。共產主義所攻擊的，是資本主義的第一面，因爲在第一面時該果實的收穫者，完全是有產階級及資本家，而政治又爲之保護，務使其多榨取，以致被榨取者永遠沉淪；所以對於那第一面的反對，政治的意味居多，換句話，政治的資本主義，是死也不能不撲滅的。但這第二面的資本主義怎麼樣呢？這個完全是經濟上的一行程，只有助價值增進的作用，毫無化成政治的榨取的危險；換句話，政治權既絕對地操在無產階級之手，監督，制限，在在可能，縱採用也決無化成資本主義國——如英美日等的毛病——然則何所懼而不採用之呢？——根據這個學理，于是列寧等就大放寬心，謀未開化進於開化起見，外資也輸入起來，內國商業私營及土地私有等也許可起來，二二年三月以後遂大行所謂「國家資本主義」。

——這三理由決不是我所杜撰，我現在略譯一二篇列寧的重要文字——關於實行這新經濟政策的，以完本篇，並且用作對張氏及那些高罵蘇聯政府善於變節的人進一解，尤爲不明「國家資本主義」爲何的人買些材料。

一九二一年革命四週年紀念時：列寧作過一篇「現在及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黃金的重要」(Let-

in, Ueber die Goldes jetzt und nach dem vollen Sieg des Sozialismus)的文章。那裏面說：（意譯且略譯）：

「祝賀這大革命紀念日的最好方法，就是移我們的注意向於這革命所未能解決的諸問題上去。我們剩下最必要的，是關於經濟的建設的根本問題，當取改良的，漸進的，迂迴方法，的一點。我們在革命四年間，復興了大工業，且已使之社會化。爲這個，我們用強制徵發的手段，向農民取來了許多原料品。但一九二一年的春間以來，我們完全換了一個方法：就是把舊社會的經濟秩序，商業，小農經濟，小企業，資本主義等，不再加撲滅，且使之復活，而慎重地謀掌握於我們之手，不則亦使之處於國家管理之下。這方法不待說不是革命的方法；革命的方法，是必把舊社會組織連根絕滅才對的。但人們敢說我們前幾年間的革命錯了麼？敢說「革命」不必用，「改良」就夠了麼？如有說這種話的人，當是最不明政治之爲何物的人！革命是對的，革命時用「戰時共產主義」，做成（一）脫退世界二大帝國主義盜賊團的戰爭且使之鎮息，（二）確立無產階級獨裁的實現形態——勞農政權，（三）建設社會主義的秩序的經濟基礎——三者，更是我們所可自誇的：同時現在變而取改良方法也是毫無可愧的，革命家決不可忘記革命的界限與條件，決不可用自己的愚蠢，滅亡自己；我們單做一個革命家，社會主義信仰家，或共產主義家，都不夠；我們應在一切瞬間，一環緊一環地，去做預備工夫而後可能握到全鍊；各環的形態關係，歷史過程決不單純；我們眼前的一環，就是在規則的國家管理之下，恢復內國商業

一事。我們如能眼前十分確立這環，不久我們必可握到全鍊；不如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社會經濟的關係的基礎必無從樹立。人們以爲這又是奇怪麼——共產主義和甚麼商業？但這話錯了，國民經濟上講，商業和小農一樣，共產主義之於商業應如於小農一樣。

「我們在全世界上佔了勝利時，世界大都市的這兒那兒，我們當用黃金作便所，使人們——常爲那東西拚命戰爭的人們，知道那東西的真正用法。但這個要做到時，還得隱忍幾十年；我們現在當把全國的金子節約起來，高價賣出去，賤價買進外國的商品——要入狼羣當學狼吼。

「農業如不與機械的大工業，大電線網等並存時，聯絡數千萬小農與工業的唯一可能的經濟連鎖當爲商業。世界各處都是農工電網等并行了，唯我們俄國發達獨後，現在想實現這連鎖時，不是突擊戰所能成功，非持久漸次的包圍戰不可。換句話，置商業於國權下，示之以方針，與之以範圍，這當是共產階級國所能做到的事，且是不能不做到的事。

「要之，無產階級全勝以前，「改良」是革命的一副產物，個個的革命完成上不可少的且很正當的休息所。……總而言之，我們現在退到「國家資本主義」來了，國家管理商業起來了。但退却是有程度的，商業也是不久要告終局的。我們十分意識着，十分結束着，除去先入的偏見，斷行這退却時，我們勝利的前進必當更快更廣更永續。」

其次就是列寧有名的「現物稅論」(Lenin, "Die Vorbedingungen und die Bedeutung der neuen Politik Sowjet-Russlands (Ueber die Naturalsteuer)"). 這現物稅(或譯爲農物稅)是一九二二年三月

二十一日公佈的，重要的幾條如左（未依次序）：

（一）廢止強制徵發，用租稅代。

（二）參酌各農家的收穫量、人口數及飼畜數而對其產物作一定比率的徵稅。

（三）稅爲累進的。

（四）稅之多寡定於春耕前；納稅當於一定期內。

（五）納稅後，餘穀歸所有者自由處分；但亦提交國家時，國家多報酬需要品及農具與該提交者。

——列寧論之曰（略譯，意譯）：

「現行稅是由一特殊的戰時共產主義——因極端的貧乏及戰爭與破壞的結果所被強制的戰時共產主義——一變而爲秩序的社會主義的產物交換的一過渡形態。我們行戰時共產主義時，把農民一切剩餘及一部分的生活必需品都徵收了。這個在紊亂了的小農民國裏想征服地主與資本，本是不得已的。爲此，列強遂百端助惡，想破壞我們，但在解放的戰爭上，我們的農民與勞動者都表示其英雄的勇氣卒不失敗。戰時共產主義正是我們的大功名，除社會民主黨與柯字基那些拍資本階級的馬屁的人外，誰也不會說我們是失敗。但這主義究是以戰爭及破壞爲前提的，——暫時的手段，決不是和無產階級的經濟任務相應的政策。在小農國裏，想實行無產階級獨裁時，最正當的政策，當是以農民必需的工業製品與農民的穀物相交換一事。這才是和我們相應的政策，又唯如此而後社會主義的基礎可以確立而導至於最後完全的勝利。——現物稅即在未

邊這狀態之前的一個過後。」

同年莫斯科全俄大會上，列寧又補論之曰：

「我們黨員裏面，還有發甚麼『資本主義惡也，社會主義救也』那種謬論的人。這正是忽視社會經濟事情的全體而僅執其一二以爲說的，非常錯誤。所謂『資本主義惡也』是對社會主義的標準而說的話。在中古的時候，及對於小生產的時候，對於小生產的割據而伴起的官僚主義的時候，它不僅不是惡而且是救。在我們，不能從小生產一步跳到社會主義的實現以上，把它當作小生產及交換的基本產物，在某一程度內，是必要的。把它當作小生產與社會主義的中間連鎖，把它當作生產力增進的手段與方法，誘入於國家資本主義的陣營內而利用之，是必要的。聽者以爲這是逆說麼？決不然，私經濟的資本主義，是可以促進社會主義的。」

列寧在前「現物稅論」的結尾，還有幾句很可注意的：

「一九二〇年的凶作所惹起的非常的破壞，陷我們大工業的恢復於不可能，這過後的方法，於是至於不能不用，——爲提高農民的地位起見。其法，則爲現物稅，及促進農業工業間的交易，與小工業的發達等等。——這些方法即是自由商業及資本主義的意味。在打破小生產者的割據及官僚主義，這些東西都是可助我們戰勝的。但同時我們的實際經驗，必會限定它們，決不會使其極端發達。所以我們無產階級，當不感絲毫危險：因爲政權，交通機關，及大工業，都握在我們手裏。」

——由上幾段文章，罵列寧他們變節的人，當有以自反了。他們幾曾犧牲過主義？政策的改良，和人格主義的變節者安可同日而語！又認蘇俄有變成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可能的人，也應可以自反了。這種國家資本主義——以共產主義為目的的國家資本主義，會有向外政治經濟的侵略的結果發生出來麼？縱誠如抱朴氏所說，蘇俄現在只有共產黨，但他們這樣的意旨幹下去，抱朴氏當斷他們將來也無共產主義麼？中國有句古語：「觀人於其微，論人於其大」，我深望純粹批評俄國的人，應該明白他們的大處——精神；看淵泉氏介紹的那篇布施辰治氏的論文，就可以明白，他們何等緊張，何等一貫。至於中國現在當友俄與否尤應從俄國的精神及我們自國國際的利害着眼，不可多說空話，拘於小節。至於我對俄國的批評與態度，則詳「中國的建國策與對蘇俄」一文裏，登在晨副十一月四、七、九，十四等日內，讀者幸參閱一下。對於我那篇小文，徐志摩氏曾作了一篇很有派頭的「前言」，我閱後也曾「微微一笑」，下次論勉己氏時，就便答答罷。

其二 質文天倪常燕生二氏

（附質梁啓超氏）

「時代反抗時代」(Generation against Generation)，羅曼洛蘭說過，「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中國古人也說過。人們的生活，本來除各人自己在未取行動之前，先求澈底的認識，既得認識之後再用意志感情去支持，去行動外，沒有法子。這個話，在我們思感素朴(native)的少年時代，常引為悲哀，寂寞；以為心與心之間，不應有這樣一座「不可越渡的橋」——如德國俗語所說。但到現在，我

們如借心理學上的氣質先天說及藝術學上的環境說來看時，這座橋一方面固可認為人間的「運命」，沒法子想；但他方面，我們不懂不覺得悲哀，而且內面地以為可藉以促進「生」的活動，外面地以為可認作人類進化的機微。——也許這是因為人到青年，失去了童時的純貞原故。

要之，心與心是對立的，從而時代反抗時代是必不可免的，又從而各依其認識內容及感情作用以取行動外，是沒有法子的。但是雖然如此，這個話也不必看得太森嚴，太絕對；實際上，我們的感情，除一部分先天氣質最乖僻的人們以外，都是要求共鳴的，理知也都是要求理想的；所以我們還是處處和他人有因緣——無論在抱合的意味，或衝突的意味。不待說，把話題移到眼前中國人的現狀看時，甚麼理知都要求理想的話自然還談不上。但「一切存在都合理」(Alles was ist, ist vernünftig)的Hegel的歷史學說，既誰也容易認為淺薄，人們求價值生活的瞬間，遲早總是自己會要發見的。「價值的存在」當要求的點，遲早總會自覺的。所以我對中國的前途並不悲觀；眼前雖然百鬼晝行——一切事實的百鬼姑不論，像抱着紙老虎跳梁的「甲寅」及梁任公拉拉雜雜說了許多閒人閒語的「晨副」，就都在我眼前招展。但我還是不悲觀！以為只要我們有 Socrates 那樣的毅力，捨得白天打着燈籠去街上尋「人」時，遲早「人」必可以發見。所以我們先當由獅子奮迅的力去除草，赤子純誠的心去播種，因為第一尼采說過「『地』是要看得重的！」第二草種播後而後可以生「人」。大家切莫返顧或環視！因為現在返顧環視，都是悲哀；大家驀直地前進罷！前進時然後可以發見一輪「百合花」——
Zeus 大神給我們的，最後的贈品，其名曰「希望」。

總而言之，大家眼前唯一的事業，就是「反抗」——用明澈的理知爲根據強烈的感情意志作依機，去改革，去反抗。肯定產自否定，涅槃生於現實。中國既不可復任其「四馬倒攢蹄」，隱忍尤不足以成仁，緘默更不足以長德。我們所以反抗一切的惡。反抗一切的似是而非。反抗不徹底。反抗想澈底而不敢澈底。——對於人生問題如是，對於政治問題亦如是。

但是話雖如此，言歸正傳時，我在這篇文章裏，對於上述的甲寅與梁任公，還是不願多費筆墨。爲甚麼呢，我曾希望過他們「對」，我好「投誠」；但結果我發見了：我的誠投不得！我曾希望過他們「一部分對」，我好「借光」；但結果我又發見了：他們無光可借！乾脆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你要投誠時，就要墮落，你要借光時，就得黑暗！——不信麼？未質文常二氏之前，我就在這兒略說說這二 *Sphinxen* 罷。

先就甲寅看：試問它除「無內容」，「無聊賴」的「復古」外，到底有些什麼東西？中國的「古」，在其自身的價值，我們誰也能夠發見與承認。我們雖不惜 *Vincelmann* 形容希臘古典的話——「靜謐的偉大，名貴的單純」，來形容它，但學者如周張邵程，融合三教，組織宋學，我們尊重；老孔各樹一宗，陽明自成一家，我們尊重；其他藝術天才家，於唐有詩，宋有詞，元有曲，我們更尊重；其尊重之情，且敢說遠出於紙老虎之上。但紙老虎倡復古時，一，能也有些甚麼「組織」或「創造」給我們看麼？退一步，二，能有認識力與批評力，啓發那些「古」麼？三，再退一步，模而倣之，也能像個樣麼？——都不成！我只能發見它內容空虛。咬牙嚼齒，且時時欠通而止！我聽說，人們將死

時，有回光返照的現象，又聽說，Renaissance 時，有基督教會的悲鳴；它不是這種意味的存在物麼？然則那值我們鎧袖一觸呢！我們要求的是青春，決不是老死。奔赴的是曠野，決不是孤城。汲飲的是生命的清泉，決不是棺材內的臭水。藝術我們要求偉大的風格，哲學我們要求深遠的組織，思想與行爲，我們更要求深嚴與情熱。——二十年來，「支那式」的反動呻吟語，我們早丟在糞坑裏去了！

至於梁任公，則理由又別：他半生沉靡於政治，然同時又半生墮落於政治！既無高遠的政治理想以爲主張，又無崇高的政治人格以爲背襯，「年年姐姐十八歲」，除「漸進」外，他不開口。而所謂漸進者在十四年前爲「君主立憲」，十四年中爲「接近政權」，最近則不知所指，然而還是漸進！薄儀不可捧，軍閥不可與居，他明白了；他於是就高踞學府，想施政治教育於青年，然仍談漸進！但政治教育是甚麼東西？我們固不好對於他的過去加甚麼「官僚」，「政客」，「變節漢」等惡言，致傷忠厚；但至少敢說一句，沒有政治理想的人，決不配談政治教育！中國自宋明以後，最大的缺陷，就是無哲學，換句話無理想，無主義，而這民族的性格又天成的「現實的」，二五相乘，於是適得清末以來「十」的墮落。梁氏精通中史，學貫東西，偏於這點不加意，對於人生觀政治觀兩面，一味以輔助這墮落爲目的的似的，只談漸進不談急進，只談現實不談理想。但現實又是甚麼東西？漸進又是甚麼方法？橋的兩端，一爲始點一爲終點，中間爲通過點；你站在始點的現實上何能知道終點的內容，躊躇於通過點的漸進上，何能滿足渡者（人性）的欲望？現實的「存在」，固基於過去，但現實的「價值」則繫於未來；你不教人們以「價值的未來」時，「存在的現實」到底怎樣擺得脫？並且誰會前「進」；

你的漸進又那能收功？中國有句話：「取法乎上斯得乎中，取法乎中斯得乎下」。蓋人們受「情性」支配，是很利害的。所以人生的「態度」，正當地講起來，只有「朝聞道夕死可也」的一個，決不能再有甚麼第二個——「漸進」。梁氏齡齡「知命」之年了，人生行路的艱難還沒有體驗足麼？十四年來自己的政治生涯，風清月白時，不加反省麼？

不待說政治主張和倫理主張有區別，後者率成於主觀的個性，前者則當顧客觀的事實；且其應用的範圍亦廣狹不同。但這話——根於客觀的事實政治當取漸進的話，在梁氏十四年前的君主立憲的主張，或還有是處；因為那時候如不革命而可達於立憲，中國本有相當的改良希望。但現在物換星移了，不能再依樣抱琵琶了；還要依樣抱時我們除認為江頭婦時代錯誤外，沒有說法。為甚麼呢，第一外國人的經濟壓迫就要逼着你亡，第二本國人的殘殺掠奪就要逼着你死，你有甚麼辦法，還能走半步？察梁氏近來的意見，對於軍閥，像也主張排除；但排除法如何，是不是用武力革命？二，是否全部排除，還是部分排除即已足？三，排除後政府如何組織，這是議會制度抑是別的？四，別的是甚麼；如仍是議會制，其弊病如何改良？五，產業如何謀發展？六，不平等條約如何謀取消？七，未來新中國的理想如何？——這七點梁氏詳答且必從十點出發系統地答下去；因為我們必得躋新中國于世界舞台上，佔一積極的自強的位置，不許再如從來一樣，消極地被動地偷生；所以我們非要求理想不可，明星不可。唯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中國國民黨表敬意，因為它除眼前的救亡策外，且能貫串我們的民族性樹「大同」理想之幟。對於各國的社會黨及無政府黨也表敬意，因為前者手段雖迂徐，

後者雖缺少次序，亦有救世界出火坑的理想在。對於共產黨尤表敬意，因為它既不迂徐又有次序，且亦有同樣的理想在，梁氏的理想是甚麼？不陷我們於墮落，苟安，且能救我們出墮落苟安的方法是甚麼？我們在這兒公言一句：私產主義是主張廢除的，帝國主義的迷夢是反對的；代議制的虛偽是主張棄却的。反對帝國主義——國人現在一般的良心。不勞我說，廢除私產制度，我在晨副上已詳說過，茲不贅，至於代議制度的虛偽則為我本篇的課題，以下借文天倪常燕生二氏為對象，正式地言歸正傳去罷。——

一 質文天倪氏常燕生氏

文氏在「甲寅」十三號，主張代議制，反對獨裁制；常氏在十一月十六日晨副上也同樣主張。這問題確有討論的價值，正觸着我的癢處。使二氏的主張與反對都為泛泛論，我自不問，但前者之主張 Democracy 的代議制特豐富，後者之反對無產階級獨裁制特激烈；二氏果皆沒錯謬麼？我良心所命，不能不懷疑。

這問題本很簡單，在切實研究過英美式代議制的內幕的人或相當理解過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本義的人，究竟何者當反對，何者當主張，本是至顯明的事。但前者的內幕不明時，常易為 Democracy 的空聲所奪，後者的本義不明時，又常易為獨裁那伯友所嚇；於是於是而生的主張論反對論本是人情所當然，但於是於是而生的主張論反對論，究不免觀察的錯誤。

先從獨裁出發罷：原則上我們無論那種獨裁本都反對。一人格之上他人格加以不自然的制約，一

階級之上他階級施以不合理的壓制，這個就叫做獨裁或專制時，這種獨裁與專制，我們根本就地無條件地反對。但是這是唯理論，事實上「國家」這東西存在以上，無論是民主國，君主國，階級主國，都免不了專制；換句話，都是獨裁。惑於 Democracy 的名字與形式的人，只知後二者為獨裁，殊不知前二者也是獨裁，尤其是最惡毒的獨裁，又尤其是不可救藥的獨裁。

這個話怎麼說呢？三語破的時，不外就是代議制是有產階級的私生兒，因而又就是該階級的保護者，在他階級——無產階級，則為獨裁物。

文氏是贊成代議制的人，對於代議制的毛病說得很詳，曾舉出六大點（詳看原著）；且認其中四大點為該制的「根本弱點不易救濟」，又說「二十世紀的立憲政體，實不能不謂為彷徨於不安狀態之中」。文氏這些話雖絲毫也不錯，但所謂六大點的弊病，猶是該制的形式的弊病，不是內容的弊病；——內容的不可救藥的弊病則為有產階級獨裁一點；文氏是反對獨裁制度的人，然於這點竟未注目及之真是怪事！文氏於獨裁制，似只認「官僚政治」及「蘇俄共產主義的政治，集政權於一黨」二者為然；於前者說這種「舊態非今日國民自治精神所許」，於後者說「與一切之專制實同其弊害，其不足取，自不必辯」。這些話在表面看又似不錯，但他不察官僚專制與無產階級專制的內容之不同，目的之懸絕，竟混為一談，可是大錯誤！蓋官僚政治的專制固誰也不贊同；但以共產的主義為目的，行一時過渡的無產階級專制，——那種專制，又何能厚非呢？我們僅視專制為惡民治為善時，其皮相當和僅知資本主義為惡社會主義為善的人一樣。資本主義固惡，但只要該階級不握政權，產業沒發達的國

家，轉可用爲增進價值的手段（第一篇參照），同理，專制主義固壞，但只要該專制者無私心，有好目的，在謀根本的舊鏟除與新建設上，轉是必要的方法。我們如硬說近世現世的國家制度政治制度，已達了進化的極限，不僅無弊可求，而且非擁護之不可——時，那末問題自當別論；否則略其形式而顧其目的，忍小而全其大，又安見其「不足取」呢！——但這些話都是泛論，根本的解答法，還是分晰二者內容上的利弊孰多孰少爲是。——

代議制內容上的大弊害有四：借 Democracy 爲名，壟斷政權，藉治安爲名，操持國家，以金錢選舉及「多數決」，對內壓迫無產階級，是其大弊一。借國力發展爲名，行有產階級膨脹之實，對外壓迫弱小民族，是其大弊二。結果資本帝國主義與資本帝國主義（近世帝國主義無論如何都是資本主義作背景作先鋒，陳啓修氏的話是對的；晨副上許多議論，可謂是「中國學者」的遊戲！）相衝突，國際間引起無數大規模的惡戰爭，陷人類於水深火熱之域，是其大弊三。在有產階級支持之下，無論如何形式改良（如普通選舉），最後的當選者還是有錢者多無錢者少，結果想不出好救濟法來是其大弊四。——這四大弊是代議制的根本罪惡，誰也不能否認的；因而代議制的 Democracy 是虛偽；二十世紀的人類，無論生在那一僻村，那一孤島，現在皆爲所苦，這也是誰也不易文吾的。我們遠事不必提，最近世界大戰的內面理由，試問當不當歸罪於它？未來的太平洋戰爭——如果必不能免時，又是否當不當歸罪於它？

反之無產階級專制怎麼樣？全然相反！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第一既在於「廢除階級」，一時對

於舊來的有產階級雖免不了專制，但只要這一個短時期通過後，既無所謂有產，亦無所謂無產，全是共產；那時候「專制」和「國家」一塊兒，「自自然然地死滅下去」(Absterben)。如前者的第一弊，那還有，有亦不過一時的。第二，共產主義既是反抗資本主義而生的叛逆兒，對於資本主義式的侵略弱小民族自無是理；它不待說反是弱小民族的真正朋友，為反抗侵略者立於第一戰線的；且是躋世界於大同，躋人類於解放，自由，平等之域的。所以其結果，第三，它決無與同類的國家或民族相衝突的可能性，這兒，我們尋帝國主義式的毒瓦斯不出來。(至於與異類的國家民族相衝突則為題中應有之文自不待論)。第四，至於它的毛病——「專制」的毛病，不待說在這二字還可以加之於它的時候，它還未能達於最後目的的時候，無論如何是不能免的。但這個我們當用政治眼光去遠看，不當用道德眼光來狹看，它既不是單就這樣固定下去以魚肉他階級，縱形式上有使人蹙眉處，然和帝王，貴族，軍閥，官僚等的專制動機既絕不相同，和有產階級專制的居心亦渺不一致。有產階級專制無救，它有救，——在階級消滅時。有產階級專制永無光明，它有光明，——在國家消滅時。

——以上都是就二者的政治方面比較而言的，若經濟方面社會道德方面，更明顯：貧富既絕，苦樂懸殊，「文明」產罪惡，「進化」釀破壞；無產階級由苦痛而嫉妬，由嫉妬而怨恨，由怨恨而直接行動，——舉凡代議制的國家，現在都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時代，如履薄冰如臥火山的時代。——要無非因代議制自身的 Democracy 是虛偽的原故，有產階級專制，獨裁的原故。至於真正的 Democracy 到底有沒有，可求不可求，則我很信 Marx, Engels, 及 Lenin, Kautsky 他們所說，國家不消

滅時，是不能有，是不可求的。理由就是：一般國家都是「階級國家」，都是專制，萬無所謂Dobro，Cracy——的原故。在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不待說正是主張廢除這種似是而非的東西，而用別的獨裁方法，去求些真正者之出現的。所以我以為，不，我相信，像常燕生氏那種喪心景慕真正Dobro，Cracy的人，似正應走這條路，而不應轉反對這條路。

二

——以上我把代議制獨裁及無產階級獨裁的得失，在其自身的性質方面，已經大概比較說完了。以下再看看中國將到底當取何者為法而後可。

原則上我們既明白了無產階級獨裁強於代議制萬萬，中國將來，當取用這個，自不待多言而喻。人間的事業是有偉大性的；我們謀國，尤其不可不忠，知難而懼是卑怯，知其虛偽而猶奔趨更是卑怯。我們最先是要把理路看清楚，看清之後，擲出人間的崇高性及創造力來，大家一致，把褲帶繫緊些。真幹不了麼？我就不信！幹不了的原故，不是諸君看不清理路，是諸君不願看清這理路，又不是諸君沒有崇高性和創造力，是諸君不願發揮這崇高性這創造力。中國現在如確在老衰中墮落中時，我們當怪我們自己，怪我們自己這些點——我相信。奚若氏與張慰慈氏都說共產革命要人物——純潔為國的人物；然則二氏不是人物麼？二氏自認不純潔為國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為甚麼要厚自菲薄，而站在趙壁上作反面叱咤呢？要知道，我並不是甚麼共產黨員，尤不是專攻政治經濟社會各學科的人，不過自蘇俄革命後，我因當日時艱，在小鬼那國內又刺激太多，時時對這些問題，留過一點點

神器了；其實侈口多談，在我豈敢！但不要脫軌，言歸正傳罷。——

僅說一句原則上共產制的無產階級獨裁好時，必還不足以服國人的心。像梁任公先生就必第一用教訓的派頭來說「小子誌之：你不要做洋舉人，世界沒有萬靈的膏藥，他國行得好的，你國未必也一定行得好！」但要這樣說時我就要問：第一，任公先生，你的「君主立憲」，是不是外國的膏藥？又是不是你這洋翰林打外國學來的？中國共產制必行不好的根據何在？你的立憲制必行得好的理由何來？十四年來，同盟會，國民黨得勢的時候少，你的，或和你相近的共和黨，進步黨，研究系，得勢的時候多，然則你的成績何在？第二，他國行得好，你國未必行得好的話，對你的立憲制代議制講才確切！爲甚麼呢？因爲你國數千年來的歷史和行代議制的英美日德法諸國歷史，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都不相同。這點詳細說起來很長，我只能簡單地答曰：中國的政治史完全是帝王專制史，人民不問政治，同時對帝王又無尊敬心如日本人之對天皇（因爲在日本歷史上皇室是萬世一系，且君民一家），無親愛心如英國人之對皇室（因爲在英國有百年來的陶冶上下藩籬已撤）。所以列朝革命如茶飯事，割據分裂亦茶飯事。——這樣的國民，對於政治素無繫念，無依歸，你能要他一旦談民權行立憲麼？第二經濟方面是小農制度，人民只求溫飽；交通阻隔，郡縣分立，工商階級既不發達，富農巨戶亦無連絡；不到「天災流行」或「苛政猛於虎」時，決不會「揭竿而起」；即起時亦不外爲衣食，衣食一滿，取而代之天下者又從而「約法三章」時，他們還是回他們的「老圃」；——這樣無有產階級爲骨幹的國家，你能使立憲不成空設，供梟雄軍閥官僚職業政客去操縱麼？第三社會方面是家族主

義；尤其是皮相的倫常主義；數千年儒教的仁恕，老莊的無爲，佛教的現實否定，又都中入於其中很深；而民族性又素好勤勉，服從，苟安，樂天；——然則你容易求他們突然明白權利義務及民權諸觀念，講參政麼？何況教育極不發達極不普及，不待羅素說，我們都可想到：有這一點，就是代議制，Democracy 的運用上的致命傷呢！——以上諸特點，大多數是我們歷史所獨有，英美日德法諸國所俱無，然則任公先生，你那塊外國膏藥，醫得中國好麼？

要之，在中國談代議制，Democracy 的人，不是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看見東西洋行這把戲行得很好看，回國主唱的人，就是到現在還沒看破代議制在東西洋所生的惡果的人。這兩種人可真是洋翰林，洋進士，洋舉人，洋秀才！梁先生喜歡用這種話形容他人時，我看當先照照自己。

唯其如此，所以孫中山先生到底眼高一着，他的政治就有軍政時期，訓政時期等區別；尤其有先知先覺，後知後覺等學說；——暗暗地都諷示幾分獨裁的意思，雖沒有明說出來。常燕生氏認這個爲「開明專制」，反對；但常氏你到底有甚麼法子可使大多數的中國人一脚飛到天空間去談 Democracy？文氏則想出了許多法子來，或是洋式的，或是舊式的；且主張仰軍閥頭兒，去做各省省長，省務院歸他自由擇人任命組織責任內閣制對省議會負責云云；我就請問你，省議會的議員是一羣甚麼東西？你這不外也是一種聯省自治制；那末，就請你看看我們湖南罷！省議會幾曾監督過趙省長大人，又那能監督得了他？結果狼狽作買賣萬年省長，萬年省議會，那到底叫做甚麼政治？Democracy 的理想果如是麼？！

——要之在中國各種歷史及十四年來試驗上看起來，我們始終反對代議制，主張獨裁制，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制。

二五，一一，二一，于北京。

——京報副刊第三三三號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三三四 二十

三三八 二十四

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意義和世界革命 統一指揮的必要

蔣中正演講

別的團體，可以講甚麼性質，甚麼界限，惟有革命黨，是志同道合的團體，祇有以主義爲中心，決沒有彼此界限之分。革命黨是不分民族，不分國界，並且是不分你我，更不能有強弱大小的勢利之見。是要請各位牢牢記着！

很多的同志，都講我們黃埔的優勝。但是我在實際上看來，實在是沒有什麼好處。黃埔的基礎，可說是一點都沒有。所以黃埔的生命，是狠危險的。大家不要自滿自足！今天我們所以能在汕頭與各位同志們開這樣的聯歡盛會，原因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去年和前年不來，恰恰今年纔成立了國民革命軍，就能完全克復潮梅，來到汕頭？這種迅速的進步，可以說完全是從我們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一點成效。時代變遷的影響，中華民族的覺悟，本黨同志的快心，和羣衆的力量。固然對於革命進步的地方很多，但是本黨不改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我們今天能夠消滅叛逆，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說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國際的實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革命的效力。因爲他們幫助中國革命，就是幫助世界革命。中國革命成功，就是世界革命成功；並且是俄國革命完全的成功。反轉來說；中國革命如果失敗了，那就是世界革命的失敗。如果世界革命不能完成，那俄國的革命就沒有意義。而且俄國的本身也非常危險。所以大家能夠不分彼此，同心協力，纔能達到今天的勝利。從這個關係，已看出我們要達到世界革命成功的目的，便先要完成中國革命。還要明白革命黨是以主義和精神來團結的。現在有人說：我們中國革命黨，受俄國人的指揮。在他說的人的用意，以爲這句話就是可以誣蔑我們革命

黨的一個最好的材料。我以爲作這樣想的人，就好一方面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十九世紀以前的具有國家主義的英雄而已。然而他並不明白現時代是一個什麼時代。我們要曉得這種偏狹的思想，在數十年以前閉關時代來說，他還算是一個愛國的英雄，但在現在二十世紀時代就不行了。因爲現在中國問題，幾乎就是世界問題。若不具世界的眼光，閉了門來革命，不聯合世界革命黨，不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那麼與革命成功的路徑，南轅北轍，決無成功的希望。因爲中國革命，如不加入世界革命之內，不但是不能成功，而且是沒有意義了。我且舉個例來說，在歐戰時候，當初德國兵力很強，兵器很精，列強各國都用全力去攻擊他，總打不過他，後來協約國聯合了戰綫，以推出一位法國的福煦大將來做聯軍總司令，從此聯軍的指揮統一起來，纔把德國打敗，這位福煦大將，並不是美國人，亦不是意國人，也不是美國日本人；但是英意美日等國的軍隊，通通要受他的指揮，然後纔能夠戰勝德國。可見要達到世界戰爭勝利，非國際間革命指揮統一不可。不說歐洲大戰，就是此次東江作戰，也是如此，我們能夠戰勝叛逆，一半也是在指揮統一的效力，這一點要請大家格外明白！

帝國主義者所造的謠言，最有力量，最能動人聽的一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應受俄國人的指揮」。我們且不講我們是否已受了俄國人的指揮，但我敢老實說，叫革命先進國的蘇俄來指導我們中國的革命，我們世界革命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的，而且是應該接受的。去年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對我不但是有面諭，而且是有手諭。總理的面諭，說是：「鮑羅庭同志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容納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個樣子才好。」現在

總理死了，各位俄顧問對本黨的努力，仍然與總理在日一樣。以親愛的精神，以同志的資格，有事大家互相討論，求得真理，誰的主張有道理，就是實行誰的主張，並沒有一些勉強或遷就的事情。事實上蘇俄同志，並自居在指揮的地位；不過我們以世界革命黨員自居，也很願意受革命先進國同志的指揮。這並不是妄自菲薄甘居人下的一件倒霉的事，實在是世界革命，聯合被壓迫民族的戰綫。指揮統一是現在對帝國主義者作戰最要緊的一個戰術原則。我們對於俄國同志認識的要點，根本上是在於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者。他們的敵人，亦是帝國主義者。他們的政策，是要解放弱小民族；本黨的革命，亦是要求東方民族聯合的解放，進而至於世界不同。尤其是他們認識三民主義爲救中國的惟一主義。所以我們對於蘇俄同志，根本上的主張，認識之後，就要免除一切的界限，消滅個人的意氣，而來同心協力的共同奮鬥。我們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列強之所以能欺壓中國的原因，就是國民勇於私鬥，黨員徒爭意氣，團體慣於破裂。如果再不改過這些惡習，國也亡了，種也亡了，試問大家還許你爭意氣麼？現在帝國主義者，看見我們中國國民黨，他就現出一種恐怖的現象：其原因是什麼地方呢？他固然是怕俄國同志來幫助我們革命工作，并且是妒忌中國人聘請俄國同志來做中國革命的顧問。但是他最怕的一點，還是在世界革命指揮統一之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站在一條戰線上向帝國資本主義者共同攻擊，四方八面來包圍兜剿他，使得他們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逃竄。這一點實在是他國際帝國主義者的致命傷。因爲他明白這一點，所以也，對於我們革命黨員聯合恐怕世界革命指揮從此統一。所以凡是可以挑撥我們國民心理，離間我們革命黨員的方法，他是無所不用其極。

的來設法破壞我們世界革命聯合戰線。有些中國革命黨同志竟被他這句受俄國人指揮的話所搖動。以爲是無上的恥辱。不知恰恰中了帝國主義者離間我們國民革命，破壞我們世界革命的毒計了。今日革命，完全是國際性的世界革命。所以我說。革命是不分種族。不分國家。只要希望我們革命能夠成功，不教我們做賣國滅種的事，那麼我們做救國保種的革命事業，受外國人的指揮。是沒有什麼希罕的事。如果今日俄國人勾結我們來做害國殃民的勾當；或是幫助我們來做軍閥，做亡國奴。那我們不但不能受他的指揮，而且要竭力的攻擊他了。試問各位：蘇俄同志，這兩年來的事實，還是幫助我做賣國殃民的亡國奴？還是幫助我們做救國保種的革命黨？這樣一想，我們大家就可以明白總理聯合蘇俄的意義。並且應該明白，如果蘇俄同志，願意指揮我們革命，我們亦願受他的指揮。不但不足爲恥，而且同列于世界革命黨員的地位是一件人生最大的意義。不但是中國革命黨受蘇俄同志的指揮；如果我們中國革命黨員，有能力，有本事，也可以指揮各國革命黨員來革各帝國主義者的命。我敢講一句話，蘇俄同志在中國革命黨工作的人，自鮑爾廷同志以下，人人當我們總理是他們的一個領袖，誠心誠意的受我們總理的指揮。這是什麼緣故。這就是世界革命黨，不分強弱，不分彼此，誰有本事就可以指揮誰人的一個好例。我可斷定，若是中俄同志誠心誠意的照現在這樣繼續的努力做去，中國在五十年之內，革命定可以成功的。我們不祇希望俄國同志來指導我們。就是別的民族，如朝鮮人，印度人，安南人，祇要他們有本領，肯誠心誠意像我國同志一樣的來革命，我們也願意接受他們的指揮的。總理在日其主張常與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完全相同，就是以我所見所聞的，總理與鮑同志的主張

是小的地方有些不同，而大的主張，是如出一個人的意思一樣的，蘇俄同志看見中國有這樣思想偉大主義堅定的革命領袖，將來革命一定可以成功。所以他辭遠道，不惜犧牲一切，不怕艱難辛苦，來同我們真正聯合在一條戰線上，共生死，同患難。這也可說是我們總理的誠心感召所致而蘇俄同志這樣誠懇的來同我們合作，我們中國同志，不但不誠心的接受，而且還要懷疑，豈不可怪？歸納起來說一句話我們接受革命先進國同志的指導。就是接受總理指導，就是實行總理的遺囑，我們總理遺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句話大家不要輕忽過去了！

講到此，還有一句重要的話：我們實行總理遺囑，不是在形式上的，要真正的實行遺囑，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國革命的方法去做，纔是總理真正的信徒。俄國革命黨是怎樣情形呢？今日在座的幾位俄國同志，就是榜樣。他們像何師長所講，肯負責任，能耐勞苦，服從命令和遵守紀律。所以能夠得到成功。現在我們本部人員，多數是不負責任，不熱心，苟且偷安。不止本部如此，全國大概都是如此。所以我說，中國人是一個半死半活的人；中國的國家是一個不死不活的國家。各位如果是有良心的，應該馬上要負起責任來，如同俄國同志一個樣子要熱心做事，總可以救中國，救自己。辦事一定要有方法，要有組織，并且要熱心去做。中國人辦事，有兩個大毛病：一個是孟子所說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中國人的智識能力，並不弱於外國人，有許多的地方，或許有超過外國人的。外國人做得好的事，難道中國人有做不好的嗎？所以望大家要熱心去尋事來做，不要得過且過；第二個毛病，是韓退之所說的「怠者不能終，而忌者畏人修」。中國不但是他自己不熱心，不做

事，並且嫉妬別個人做事，甚至設法來破壞他。像本黨裏面，有許多同志，不來幫助我們革命就算了，而且他反要想各種方法，來反對我們革命，破壞我們革命。這種弊病，中國人最深，若不免除，中國前途便沒有救藥！現在我們惟一的方法，祇有本着「親愛精誠」，服從紀律，拿出責任心來做事。

今天歡宴各位同志，在興高彩烈酒酣耳熱之後，大家起來高呼；

中俄同志聯合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十四，十一，七。

——國民新報甲種副刊第二十三號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出版——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本黨總理孫先生召集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廣州。大會以一致議決，通過總理提出之宣言。其宣言內容，首在說明中國之現狀，次爲對於三民主義之解釋，次爲最少限度之政綱。自第一次代表大會閉會以來，本黨同志，在總理指導之下，努力奮鬥。總理更於此時，制定建國大綱，完成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之講演。更於挺身北上之際，發佈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宣言，而殿以最後之遺囑。凡總理之所言者，必以力見之於行。本黨同志，以總理之言爲軌範，以總理之行爲表率，無間生死，以迄於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深念總理之遺教，綜覈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來之事實，確信總理所定之主義及政綱，實爲今日中國之唯一生路。謹按諸世界現狀，中國現狀，及本黨努力之經過，宣言如左：

第一世界之現狀

總理遺囑有言，『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曰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孰使此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於中國，曰帝國主義。故打倒帝國主義，實爲國民革命之第一工作。而打倒帝國主義之必要方法，總理於遺囑中，亦已明告曰，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有已能以其自力，打倒帝國主義，自致於平等，同時以平等待我者，如蘇俄是。有與我同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期相與努力，以打倒帝國主義者，如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被壓迫民族是。此等民族，對於平等之觀念有二，（一）自求平等，（二）同時求他人之平等。合此二觀念，故民族運

動，與國際運動，實爲相須，而民族主義，與國際革命主義，其內容實爲一致。惟其如是，乃能與以不平等待人之帝國主義，作殊死戰。本黨既抱此目的，故對於蘇俄，以誠意與之合作，雖受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土豪之種種誣蔑，種種挑撥離間，而繼續進行，初不因之少撓。至於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被壓迫民族，以地位相若觀念相同之故，其聯合實出於自然，且其聯合之程度，亦日以密切。請析言之如下。

歐戰以後，世界地圖，實表示一幅人類被奴隸之可怖的寫真。如世界全面積等于一萬三千四百萬方基羅米突，則屬於帝國主義及被管轄于帝國主義之殖民地，其面積等于是九萬方基羅米突。如世界人口爲十七萬萬五千萬，則其中有十二萬萬五千萬爲帝國主義之牛馬奴隸。英國爲帝國主義之巨擘，其本國面積僅三十一萬四千方基羅米突，而其殖民地之面積，則爲約四千萬方基羅米突，蓋十三倍于其本國面積矣。法國本國人口，僅四千六百萬，而其殖民地之人口，則爲四萬二千九百萬，蓋一英人與九殖民地奴隸之比矣，法國本國人口，僅三千九百萬，而其殖民地人口，則爲五千四百萬。甚至渺乎其小之比利時，其本國人口僅七百萬，而其殖民地人口則一千七百萬。日本之殖民地人口，幾與其本國人口相等。此猶專就殖民地而言耳。至於半殖民地，如中國暹羅等尙不在內。帝國主義者以極少數之本國人民，而能駕馭大多數之殖民地人民，其工具有三。

- 一，高度發展的工商業，龐大的資本積聚。此等資本積聚，能供給帝國主義者以偉大之信用。
- 二，強大的海軍及航空隊，能使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民族，雖蓄怨望，謀反抗，而卒不能脫離

其勢力範圍之外。

三，强有力的宣傳機關，若千百種之新聞雜誌，若千百種之學校，若教會及戴面具的慈善事業，若無數受薰陶于統治殖民地人民的精神之官吏，皆足以爲帝國主義之喉舌與爪牙。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奴隸，不特有摧殘的能力，而且有麻醉的作用。對於一切帝國主義者，不特能幕蔽其罪惡，且能使人相與歌功頌德之不暇。

有此三者，帝國主義之歷史，乃能趨於發榮滋長，以極少數之人類，乃能強制大多數之人類，而使之屈服。然而歐戰之後，帝國主義之基礎，已被動搖，其所以使之動搖之條件如左。

一，帝國主義之最龐大者俄羅斯帝國，已歸於覆滅。其結果使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脫離帝國主義之區域。同時使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在自求解放的奮鬥中。得一先進者以爲之指導。此爲帝國主義之一大損失。德意志帝國，本亦爲帝國主義之極猛烈者。而以戰敗的關係，受其他各個帝國主義者所排斥，而處於被抑服之地位。此亦爲帝國主義之一大損失。蓋不啻帝國主義家庭中之分子，因減少之故，而卽於衰微也。

二，各個帝國主義者中，以利害衝突，而互相妒忌，互相排拒。英國對於法國之陸軍與航空隊，極端猜嫌，乃於近東及歐洲大陸，爲不斷的暗鬥。例如洛加拿協定，卽英國所設之圈套，欲使德國，入其玄中，而卽利用德國，以對抗蘇俄，并於相當時機，對抗法國。此等帝國主義之互相衝突，適足陷於美國的經濟帝國主義之陷穽中，而莫能自拔。而東亞帝國主義之日本，則又以美國在太平洋與在

中國之經濟勢力之增漲，認爲相逼太甚，謀以海陸軍之勢力，摧挫而覆滅之，凡此各個帝國主義者間之互相衝突，皆所以自暴其弱點也。

三，在歐戰中，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之工業，驟形發展，其天然結果，適爲工人階級之發展。工人階級已以可驚之速度，而成爲國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同時更於民族解放運動中，取得領導的地位。

四，爲帝國主義巨擘之英國，其殖民地雖廣大，而于經濟上已與本國脫離，由是其加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之縲紮，亦更爲嚴緊。法國本國之領土，被燬于歐戰中之槍林礮雨，則欲盡其力所能至，剝削殖民地，以爲之補償。於是此兩帝國主義者之殖民地之奴隸，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乃不得不鋌而走險，爲不斷的騷動與反抗。

五，一切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已於繼續的民族運動中，表示其自覺。此等自覺，因蘇俄與土耳其之革命獨立，與以暗示，且與以模範。其最大之意義。則爲蘇俄與土耳其能以民族羣衆的勢力，而打倒强有力的帝國主義之軍隊也。

六，在帝國主義之本國以內，因勞動羣衆之失業，生活程度，日以低落，貨幣日以跌價，不得不陷於貧窮之境遇。而貨幣跌價，且使中等階級，失其儲蓄之資。此種經濟上之慘淡與恐慌，足使階級鬥爭，更形激烈。其結果必至於將大多數民衆驅入革命的戰線以內。而此大多數民衆，又必同情於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願與之合作，爲解放而奮鬥也。

由此種種，可斷定帝國主義之基礎，已被動搖，其崩潰之期，必不在遠。而世界上一切被壓迫

的民族及民衆，聯合奮鬥，實足爲其致命之傷。中國之國民革命，由中國言之，爲中國民族之自求解放。由世界言之。爲一大部分人類之自求解放。故中國之國民革命，實爲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中國人民從事於國民革命，決非孤軍轉戰，若蘇俄，若世界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若帝國主義本國內之被壓迫民衆，皆與中國之革命民衆，立於同一戰線者也，試錯舉事實如下。

美洲之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等國，其共和制度，爲美國所蹂躪，其城市爲美國海軍所佔據，其國民爲美國所摧殘，其憲法爲美國所修改以適合美國銀行家的利益，其自決權被拒絕，其獨立被完全打銷。此外尚有無數黑種人，爲自命民主先進國所壓迫所剝削所虐待。夫壓力愈重，則反抗力亦愈大。故夏威夷之愛國團體，墨西哥之農工黨，全美洲之反帝國主義大同盟，黑人之救國保種的組織，皆一致努力，以求其種族或民族的解放。

普通的觀念，皆以爲歐洲乃帝國主義的老巢，在此老巢中，必不至尚有被壓迫的民族。按之實際，則殊不然，阿爾塞斯羅倫，歐戰以前，被德國帝國主義所壓迫，歐戰以後，被法國帝國主義所壓迫，四十五年以來，法國以阿爾塞斯羅倫由祖國淪於異域，引爲莫大之悲哀。其實則法國正爲阿爾塞斯羅倫之煤鐵而悲哀也。一九一八年以來。阿爾塞斯羅倫。重歸於所謂祖國。以嘗試法國帝國主義之壓迫，乃較德國帝國主義之壓迫爲尤甚，前以二十萬操法語之民族，受德國民族主義之壓迫。今則以一百萬操德語之民族，受法國狹隘的愛國主義之壓迫。法國政府，在學校，在官廳，在法庭，在商業上，禁止土人之操土語，法國政府所派遣之官僚，憲兵警察等，所在充滿，爲嚴厲之監視。青年被

強迫而在殖民地的軍隊中服務。工人運動，遭遇最嚴酷的摧殘。於是阿爾塞斯羅倫之人民，因工人與農民的團體之指導，已宣言自主。

其在墨西哥尼亞，(Macedonia)有居民二百三十萬，在其歷史中，已以不斷的奮鬥，而求其民族之獨立，乃凡爾賽條約，竟相與瓜分之，南斯拉夫(Jugo-Slavia)取其五，希臘取其四，布加利亞取其一。此等新興之帝國主義者，其對待墨西哥尼亞，一如法國之對待阿爾塞斯羅倫。對於所征服人民，務壓抑之，或使之同化。此實為現在巴爾幹半島各國的共同政策。而此種政策，實受國際聯盟所擁護。為是之故，墨西哥尼亞之革命黨人，已於聯邦派指導之下，努力進行，以求實現其國家的獨立，及為巴爾幹半島革命的聯邦。

其在皮沙拉比亞，(Bessarabia)布哥維那，(Bukovina)西里西亞，(Silesia)克洛西亞(Croatia)諸地，其民族所受之待遇，與墨西哥尼亞大略相同，故此等民族，已各準備其戰鬥能力，以求脫離奴隸之待遇。

其在非洲，被壓迫的民衆，已由沉睡而即於猛醒。自地中海以至好望角，反抗帝國主義之空氣，瀰漫於黑人及阿拉伯人的大陸，其民族革命運動之最顯著者，為里夫(Rif)的戰爭，里夫民族，為數不及一百萬，而能與世界上開拓殖民地最早的西班牙，及世界上陸軍最強的法國，為勇猛的對抗。里夫民族革命運動之領袖，為阿白爾克里姆，(Ab el Krim)以所部兵六萬五千，擊敗西班牙兵十萬。繼以法國之陸軍六萬，及航空隊，鐵甲車隊，統之以最善戰之將領，戰爭半年，法國之陸軍，死

者萬人，而里夫民族，仍能於艱難危苦之中，支持其勇氣。至於阿爾及利亞（Algérie）埃及等，其反帝國主義之運動，亦隨時勃發，經一度之屈服，復為一度之反抗，且其反抗之程度，更烈於前。帝國主義者，已知非洲種人非復如曩日之易與矣。

其在亞洲，如波斯，在歐戰以前，受英俄帝國主義雙重的壓迫。及俄國革命，波斯人民，已由俄國革命黨人之手，解除俄帝國主義之羈絆，而受平等之待遇。波斯人民，受此刺激，更謀脫離英帝國主義之羈絆，使英帝國主義之工具波斯國王，碎於人民一擊之下，而成立波斯民主的政府。如阿拉伯，其民族解放運動之思潮，已達于最高點，能以碎石擊走波爾福（Lord Balfour）勳爵于巴勒士登（Palestine）最近更宣布政治的罷工，以表同情於敘利亞（Syria）同胞。如敘利亞，自去年七月廿四日以來，反抗法國帝國主義，法國之陸軍，屢敗於敘利亞愛國黨人之手，其狼狽之態，不亞於在摩洛哥。（Morocco）而其野蠻之行爲，亦較在摩洛哥為烈。殺戮婦孺，縱火擄掠，無所不爲。此等野蠻行爲，實足使敘利亞人奮鬥之志，益以堅決。國民政府，已於最近成立。敘利亞之愛國運動，雖一時或不免為法國陸軍優越的勢力所屈服。然終信最後之勝利，必操于敘利亞愛國黨人之手也。如土耳其，在一般帝國主義者中，久已視為無問題之捕獲物。諡之以近東病夫，加之以壓迫基督教徒之罪名，刀俎魚肉，一惟所命。而近則以土耳其國民黨之努力，及蘇俄之扶助，已脫離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而成為自由獨立的國家。最近土耳其國民政府，因英國搶奪莫塞爾（Mosul），集合國民軍，并與蘇俄成立更密切的同盟，以準備保護其領土及其政治的經濟的主權。如荷屬東印度，其國民革命的

奮鬥，已積極進行。荷蘭帝國主義者對待土人，與英法同其殘暴。土人所有學校及種種團體，皆被封閉。一切集會及示威運動，皆被禁止。教授新聞記者，可以隨意監禁。愛國黨人，可以隨意殺傷。一九二五年三月，荷蘭警察，在爪哇槍擊愛國黨人一百有七人，伏尸枕藉。九月，復捕獲愛國黨人一百六十三人。此等殘暴行為，適足使爪哇之國民黨及農工黨，更堅固其團結力，及更增益其為國民革命而共同奮鬥之決心與勇氣而已。如印度，自治黨人，及共產黨人，正共同努力，以反抗英帝國主義。英帝國主義對之，雖以無人性之殘暴，加以摧毀。而所謂不合作運動，經濟的絕交，消極的不服從，進行如故。如菲律賓，安南，台灣，高麗，其民族革命之奮鬥，或以公開，或以秘密，相與為不懈之努力。此等奮鬥，終必使帝國主義所施與之桎梏，歸於粉碎。

綜合此等錯舉之事實，可得結論如下：

一，被壓迫的民族，已開始覺悟其所處地位之不平等，已認識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之種種壓制，及掠奪，故民族革命運動，已普及於全世界。此等民族革命運動，有已與帝國主義直接發生武裝的衝突者，如里夫民族及敘利亞民族是。有其武裝的衝突，已得勝利，使其民族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已得解放者，如土耳其是。而其中尤當注意者，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帝國主義者直接衝突之過程中，有一種歷史的事實，能促進此過程，此事實為何，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因工業發達而產生之無產階級是已。此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能以漸立於前線，而為民族革命運動之指導者。

二，凡民族革命運動，欲求成功，必須有廣大的民衆參加。而農工階級，尤為必須。過去民族革

命運動之失敗，由於參加者限於知識階級，故不能得廣大之基礎，與廣大之勢力。於現在及將來，爲民族革命運動，必須以其意義普及於田間與工廠，且必須使之組織於反抗帝國主義的奮鬥中。

三，凡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明瞭其共同之敵人爲誰。對於共同之敵人，而共同奮鬥，自助與互助，初無異致。所以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之革命運動，有聯合戰線之必要。

四，凡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排除狹隘的國家主義。此等狹隘的國家主義，常爲帝國主義之誘因。縱使民族革命成功，亦徒成爲新興之帝國主義。故一切被壓迫民族，相互之間，要求人以平等待我，同時亦要求我以平等待人。必如是，乃能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中國之國民革命，對於革命先進之蘇俄，固共同奮鬥。而對於一切被壓迫之民族，亦共同奮鬥。於此之時，彼此以平等相待，以期民族革命成功之後，同進於大同。

五，各個帝國主義者間之衝突，及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人民之憤激與怨望，實爲與世界上被壓迫民族以推倒帝國主義完成民族獨立之良好機會。凡從事於民族革命運動者，必須勿失此良好機會，務使一切革命的勢力，皆得以集中，而活潑進行。

六，在民族革命運動進行中，必須看破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及防止其一切包藏禍心的宣傳。此等宣傳，實含有挑撥離間之兩種作用。帝國主義，爲遮斷其本國內大多數人民與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則倡黃禍之論，以爲恐嚇。爲遮斷東方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間之聯合，則倡赤化共產之論，以爲恐嚇。此種恐嚇手段，能使革命勢力，歸於離散。故凡從事於民族革命運動者，必當大聲疾呼，以喝破

其陰謀。同時益以誠意與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人民及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聯合一致，向於共同敵人帝國主義者，猛烈進攻。

第二中國之現狀

如上所述，可知中國國民革命，實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所挾以為暴之工具，前已言之。然使中國以內，無為帝國主義之內應者，則帝國主義，亦無所施其技，試列舉如下。

一，軍閥。軍閥之大者，藉口武力統一，把持中央。其小者，藉口聯省自治，把持地方。其唯一目的，在掠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其唯一手段，在擁兵自衛。其聚養之軍隊，不知有國家，不知有人民，祇知為受其聚養之軍閥而效死。顧其聚養之程度，乃至為微薄。軍閥掠奪所得國家及人民之利益，祇以自肥其身家，及分肥于同惡共濟之將領。至於大多數之士兵，不過仰其所不屑之餒餘。故大多數之士兵，其生活至為困苦。戰時則驅之死地，平時則不免於飢寒。由是大多數之士兵，遂被迫而為盜賊之舉動，以自絕於人民。而為將領者，則以軍閥為終極之目的，惟知以相斫求其大欲。中國之內。於是兵戈相尋，而莫知所屆。

二，官僚。凡民主之國家，所謂官吏，本人民之公僕。其自身實為人民，於執行國家之政務及事務時，乃為官吏。而中國之官僚，則于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階級。其結果惟有助軍閥為虐，以掠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肥軍閥，且藉以自肥。

三，買辦階級。帝國主義者如虎，而買辦階級則爲之俵。帝國主義恃之，對於中國國民，得以擇肥而噬。而買辦階級則於無數中國國民被噬後之殘尸中，咕囁其血肉，以饜其下流之慾望。

四，土豪。此爲封建制度之餘孽。其在鄉村間，自爲刀俎，而以人民爲魚肉，其爲厲於人民，甚於盜賊。

以上四者，在帝國主義者之心目中，實爲應用之工具。蓋帝國主義者，欲使中國永爲其次殖民地，則其所采之方法，莫大於阻遏中國之國民革命運動。而欲阻遏中國之國民革命運動，則其所采之方法，又莫大於遮斷國民間之各階級的聯合，尤莫大於摧抑農工階級之發展。蓋不如是，則不能分散國民革命之勢力也。而買辦階級與土豪，其性質上實爲摧殘農工商各階級之利器。故必利用之，以壟斷中國經濟之利益，同時即以窒塞中國國民革命之生機。顧經濟上之勢力，必得政治上之勢力，爲之輔助，然後能活潑無碍，以日即於繁榮。故又必收軍閥官僚，以爲己用，使政治上之勢力，歸於掌握，所以軍閥官僚與買辦土豪之於帝國主義，實猶車之雙輪，鳥之雙翼。而軍閥官僚與買辦土豪，其生活之目的與條件，同爲掠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自肥。於是四者之間，不期然而出於共同行動。帝國主義，得此等工具，遂敢悍然破壞中國國民革命而無所憚。

徵之民國元二年間，五國銀行團，不惜以二萬萬五千萬之大借款，貸諸袁世凱，以助其驅除東南之革命黨人。六七年間，日本又不惜以三萬萬之參戰借款軍械借款及種種借款，貸諸段祺瑞，以助其掃滅西南之護法軍隊。八九年以後，歐戰終了，各國恢復其遠東勢力，則又相與痛抑日本，助曹錕吳

佩孚，以推測段祺瑞，其各種借款，爲額之巨，至今尙未能知其確數，而曹錕吳佩孚則亦以摧破廣州革命政府，爲效忠於帝國主義之表示。蓋帝國主義者，由借款而得之利益，不特經濟方面而已，於政治方面，尤獲有種種特權，而其最大作用，則爲助軍閥以鎮壓國民革命也。前歲秋冬之間，直奉再戰，其結果曹錕吳佩孚推倒，而段祺瑞張作霖崛起，要不外易英美帝國之傀儡，爲日本帝國主義之傀儡而已。帝國主義得軍閥爲之傀儡，對於中國，遂得爲所欲爲。軍閥得爲帝國主義之傀儡，則亦有恃無恐，雖獲罪於人民亦恬然不以而意。前歲冬間，段祺瑞不恤以尊重不平等條約，爲各國承認臨時執政之交換條件。去歲五卅以還，張作霖之軍隊，在天津上海，極力摧殘各界人民之愛國運動，而於工人運動，尤遏抑之不遺餘力。軍閥之甘爲帝國主義之鷹犬，以咋噬人民，阻礙國民革命之進行有如此者。

大軍閥之把持中央者，受帝國主義之卵翼，爲之效命，如上所述。小軍閥之把持地方者，論者或以爲其地位勢力，尙不足當帝國主義之一顧，故把持地方之小軍閥，其殃民之罪狀，雖視大軍閥爲甚，而賣國之罪狀，似反從末減。顧按之實際，則殊不然。徵之去歲夏間，唐繼堯起兵，寇桂窺粵，語其內幕，乃在受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唆使，與法國帝國主義者之慫恿。而十二年來，陳炯明等之得苟延殘喘於東江，以爲禍於廣東，乃全恃英帝國主義者爲之後援。自去歲夏間以還，更公然以香港爲其寇粵之大本營。運兵籌餉，皆以香港爲策源地。北洋兵艦，集中於香港，以往來窺伺廣東之沿海岸。復由香港輸運軍械，以接濟南路諸賊。而陳炯明等更於海豐摧殘農民運動，於汕頭摧殘工人愛國運

動，務殘害同胞，以取媚於帝國主義。嗚呼，五卅以來，青島九江上海漢口廣州各處慘殺案相繼而起，全國之愛國民衆，方血肉狼藉於帝國主義槍刀之下，而陳炯明等乃忍心受其豢養，聽其唆使，以危害國民革命運動。蓋小軍閥之末路，倒行逆施，久已梟獍之不若矣。

以上爲各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之現狀，至於買辦階級，受帝國主義之頤指氣使，以爲屬於民國，其罪狀亦擢髮難數。大抵數年以來，北京之財政總長，幾成爲買辦階級之專利品，自王克敏以至於李思浩，無非竊國帑以納諸外國銀行，同時更以無數政治上經濟上之特權爲之賂。至於各省巡按使督軍之屬，其盜國病民之所得，莫不由買辦階級，爲之置業於租界，以爲其賤污之保障。財政現狀之紊亂，政治現狀之污濁，實以此爲一大原因。買辦階級之罪惡，深足爲國民所唾棄。而其罪惡之尤著者，莫如十三年秋間廣州沙面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之作亂。陳廉伯始則藉英帝國主義之資助，而得自由販運軍械，組織商團，以謀反抗廣州革命政府。繼則受英帝國主義之袒護，以類似袁的美敦之通牒，恐嚇廣州革命政府。其始末於總理致英國前首相麥克唐納之電報中及宣言中已詳之。及乎作亂失敗，仍得安居香港，終日從事於破壞廣州革命政府之行爲，贖資助戰，擾亂地方，視爲當然，曾不稍怪。蓋中國自有買辦階級，而國民人格，幾於掃地以盡矣。

在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之現狀中，官僚則駿奔以爲軍閥之給事者。在買辦階級受帝國主義之頤指氣使之現狀中，土豪則蟻附以爲買辦階級之響應者。

不寧惟是，買辦階級及土豪，平日於經濟上，既占優越之地位。泊乎得帝國主義者之媒介，以與

軍閥官僚勾結，則進而於政治上亦占優越之地位。試觀全國，商埠表面，雖似趨於繁榮。而其內幕，則不免受帝國主義及其附庸者之支配，至於村落則其困窮之象，每況愈下。蓋商業爲所操縱，新興工業爲所扼制，農業手工業爲所摧毀，農民工人之利益爲所吞蝕，更無待言。民窮財盡，悉由於此。加之各個軍閥間，其互相衝突，在原則上，無可倖免。或爲擴張地盤而戰，或爲保障地盤而戰，或迭相雄長，或以下烝上。數年必戰，甚至數月必戰。其破裂之期，可以預測而逆臆。有如前歲秋間，江浙之戰，直奉之戰，去歲冬間，江浙直魯及遼東之戰，所殺傷者，人民之生命，所蕩析者，人民之財產，蓋人民至是，已岌岌然不能保其生存，更無生活程度之可言矣。

中國之現狀具如此，吾人苟一體認，可知今日之中國，其當前待決之問題，實爲求一生路，然所謂生路者，果如何乎，關於此點，第一次大會宣言中，曾列舉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商人政府派，之各種主張，而指示其謬誤。近更有所謂國家主義派者，以爲今日欲救中國，但當如日本之維新即能自致於富強，爲此說者，不惟未知日本維新之際，尙留封建制度之餘毒，以爲害於其人民，且已生帝國主義之厲階，以爲害於世界。且其於日本維新之際，時代與環境之關係若何，亦忽焉不察，日本維新之際，帝國主義正如旭日初升，故日本之摹仿，出於不自知其然而然。若夫今日帝國主義，已近末路，其自然崩潰之期，已可以推算而得，尤而效之，適見其惑而已。至於所請良心救國派，所倡導者，爲性善，爲自由，陳義不爲不高，然其除惡不勇，其紀律不嚴，一方坐視率獸食人者之猖獗，咨嗟扼腕，而不能制。一方不能組織民衆，既不能以紀律自繩，自亦不能以紀律繩人，遂使

團體行動，散漫而無力。於此而欲求撥亂致治，亦徒見其幻想而已。凡此，皆坐不能體認中國之現狀，故於救治之法，亦茫然莫知所措。吾人所指爲中國之生路者則如下：

其一，對外當打倒帝國主義。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聯合世界革命之先進國。二曰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之民族。三曰聯合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之人民。

其二，對內當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首爲軍閥，次則官僚買辦階級土豪。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軍隊。二曰造成廉潔的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新興工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扶助其發展。

凡此對內對外之必要手段，約而言之，即總理遺囑所謂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也。此於中國之現狀，爲對症發藥之救治，觀於以上所列舉之事實，可灼然而無疑。

第三 本黨努力之經過

吾人既深信總理所定之主義及政綱，爲中國之唯一生路。故於第一次大會閉會之後，即服從於總理指導之下，以努力而進行。吾人非不知當時所處之環境，至爲惡劣。所挾持之勢力，亦至爲微弱。彈丸之廣州，已爲香港帝國主義者，納諸掌握之內。而北洋軍閥，如曹錕吳佩孚等，復耿耿然欲滅此而朝食，不恤百計以求逞。陳炯明等跳梁於東江，鄭本殷等負隅於南路，楊希閔劉震寰等，更反側於肘腋之下。吾人苟鮮明其主義及政綱，無異自樹一的，以待此等敵人之共同進攻，況所謂官僚買辦階級土豪，正環繞於吾人前後左右，將以保護其不正當之利益之故，而同心合力，務置吾人於死地。惟吾人則百無所畏，準備與之爲殊死戰。吾人於此四面包圍之中，所艱難成立者，有中央及各地之黨

部，以宣傳民衆，組織民衆。有陸軍軍官學校及黨軍，以造成與人民合作的軍隊，使進而爲人民的軍隊。有各種工人的組織，及農民的組織，俾之能保衛其利益。而發揮其能力。吾人曾與勾結北洋軍閥之叛軍戰，曾與勾結帝國主義之商團戰，其結果，此等敵人，不特不能困苦吾人，且使吾人益增長其氣勢，進而與北洋軍閥曹錕吳佩孚戰。曹吳推倒之後，總理挺身北上，以開國民會議，制軍閥之死命，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制帝國主義之死命，事雖未成，而以身殉道之精神，已普及於全國民衆，而深入其肺腑。去年五月卅日以後，青島上海九江漢口廣州等處之慘殺案，接踵而起，帝國主義窮兇極惡的面目，暴露無遺，而全國民衆努力從事於國民革命之精神，已漸爲世界所認識矣。最近北京民衆之示威運動，又足以褫軍閥之魄，使知與帝國主義勾結，非惟不能恃以爲固，且適足以犯衆怒而促其死亡。大河南北大江南北及湖南北閩，農工民衆，團體組織，日以堅固，能力日以發達，其參加國民革命運動，亦日以熱烈，吾人更於此時，鞏固廣州之革命根據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掃除東江南路一切叛徒，建立與人民合作之政府，及與人民合作之軍隊，以坦白真摯之精神，爲民衆謀利益，同時領導民衆，從事於國民革命雖受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之重重壓迫，屹然不爲之搖動，且決其覆滅之期，必不在遠，最後之勝利，終屬之吾人，此吾人於第一次大會閉會之後，至於第二次大會開會之前，努力之經過，所可爲國人告者也。

第四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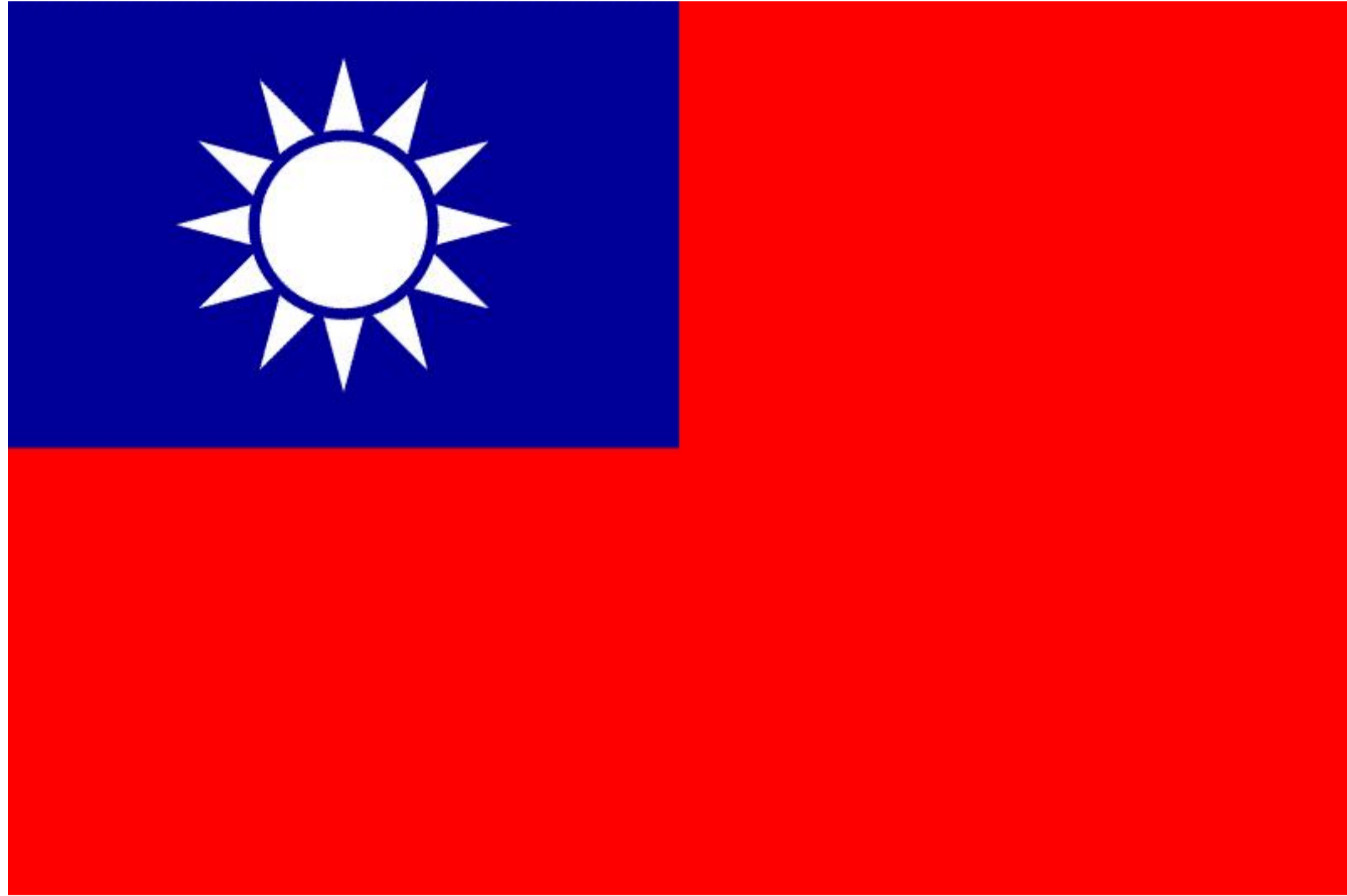
世界之現狀，中國之現狀，及本黨努力之經過，綜合而觀察之，可得結論如下。

總理所提出於第一次大會之宣言，對於三民主義之解釋，及最少限度之政綱，實爲中國之惟一生路。吾人於第一次大會閉會以後，所努力者，僅爲掃除障礙，以準備主義及政綱之實行。不獨主義之自身，未能實現，即最少限度之政綱，亦未能施之實際。故第二次大會，對於主義固當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即對政綱，亦無所修改，惟期其得見諸施行。前乎宣言，有建國方略。其後復有建國大綱，及民族民權民生之講義，暨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以迄於總理臨終之遺囑。凡此皆總理披荆斬棘，爲中國開此生路，吾人循此路以前進，若總理時時指導於吾人之前，使吾人之熱誠，彌以興奮，吾人之信念，彌以堅固，吾人惟有一致遵守總理之遺囑，以奮鬥不懈，吾人敢舉此信念與熱誠，以昭告世界民衆及全國民衆之前，吾人願獻此身以爲一切民衆之前驅，爲一切民衆而效死，吾人尤知欲爲民衆有所盡力，則不可不鞏固吾人之組織，擴大吾人之能力，以期能負荷吾人所欲盡之責任，第一次大會，已於黨員之紀律及訓練加以注意，第二次大會更將使此紀律益以森嚴，訓練益以精密，凡爲革命黨人者，不可不忠實誠篤，勇於改過，黨員之間，互相親愛以互相扶助。互相攻錯，蓋不扶助不足以爲親愛，不攻錯，尤不足以爲親愛也。

若過而不改，則不能不以鐵的紀律，加諸其身，蓋對於黨員姑息，即對於黨爲不忠也，吾人必努力使黨員成爲革命化團體化，以期不負總理之指導，不負民衆之期望，吾人大呼以祝

中國國民革命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